内 容 提 要

本书属论文体学术专著，是作者最近五年撰写的有关巴国古都——涪陵的历史文化研究论文的一次结集。所收19篇论文，从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宗教哲学、历史考古等角度总结和探讨了涪陵文化的历史内涵、特色、价值，在一个侧面反映了涪陵历史文化研究的最新成果和动态，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创新及开发利用具有积极的学术意义。附录选入作者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方面的4篇文章，有对史家文学批评特点的综论检讨，也有对诗词名作字音字义的精细考辨，立论有据，分析求实，反映了作者的治学风貌与学术创新。

《涪陵历史文化研究》序

杨　忠

人类创造的一切文化现象，都在时空的交汇中发生和展现。因此，我们不仅要从史的角度关注某时历史文化的演变，也要从区域的角度审视某地历史文化的特色与变化。多年来学界对于中国古代区域文化的研究多着眼于较宽广的范围，大则以南北西东划分，小则以今省区为界，而对更小范围的区域文化研究，则显得较为零散。

涪陵地区疆域虽小，其文化却自古便具有鲜明特色。它的文化渊源最早可上溯至涪陵殷商遗址出土的新石器时代文物，涪陵白涛镇小田溪巴人墓葬群出土的战国青铜器，则反映出了上古时期涪陵手工业之精及文化开发之早，而司马迁笔下的巴寡妇清，以矿冶致富，“名显天下”，更是巴人中最早引人注目的人物。由于涪陵地处长江和嘉陵江交汇处，是古代交通要道，历代土著文人和流寓贤士大夫汇聚于此，作文吟诗、著述讲学，创造了辉煌的文化。司马迁、杜甫、张祜、孙定、苏轼、黄庭坚、程颐、谯定、崔子方、陆游、范成大、朱熹、王守仁、杨慎、王士禛、张问陶……我们可以排列出一长串与涪陵有关的文化名人，他们在涪陵的著述或吟咏涪陵的诗文，使涪陵文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涪陵文化值得关注，但深入系统研究涪陵历史文化的学者却甚少。李胜君有感于此，埋首五载，撰写了一批较为系统地研究

涪陵历史文化的论文，并集为专书出版，成为第一本研究涪陵历史文化的专著，是一件有意义的事。

李胜君的专著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细大不捐，二是言之有物。所谓细大不捐，是说他将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结合起来，抓大而不弃小，将最能体现涪陵历史文化特色的专题研究做得比较深入具体。如《涪陵文化的渊源、特点与历史地位》、《涪陵学派论纲》、《涪陵历代方志举要》、《兰溪道隆的东游传道及其对日本文化之影响》等文，以宏观的视角建构起涪陵历史文化的概貌，也使读者对涪陵历代英才作出的贡献及影响有较全面的了解。而像《黄山谷点绛唇浊酒黄花词序"时再涪陵"者考识》、《高应乾及其白鹤梁观鱼诗的时代考断》、《有关唐代诗人孙定材料的三则考辨》、《苏诗"山胡"考》等文，则就某一细事作考辨，以求其实，从而解决了不少具体问题。所谓言之有物，是说作者的每篇文章都能从翔实的材料出发，不作空论与臆测。这一特点不仅表现在他的考辨性文章中，如考证黄山谷点绛唇词序中之"时再涪陵"者为黄叔向，而非山谷本人，考定高应乾为清代人而非宋人，都纠正了前人的失误。即使在宏观性的述论中，作者也极注意以材料作论断，做到言之有物，言必有据。

作为中青年学者，作者肯花大力气从事扎实的文献考证与搜求工作，在学术探究的道路上努力前行，其论集亦多求实之心，少虚矫之气，学风也是值得提倡的。故乐为之序。

2006 年 2 月

自 序

我开始注意涪陵的古代文史资料，并摸索着作一点研究，是2001年暑期比较偶然的事情。

当时，我从大学毕业分配来涪陵师范专科学校这所当地唯一的高校任教已有十五个年头，而且讲授的课程又是中国古代文学。考虑到学校刚刚通过了专家评估，十月份将举行的升本“戴帽”系列庆典活动定会有不少外地来宾参加，而学校学报届时亦将改版全新推出，于是我萌生了借此机会写篇文章，把涪陵的历史文化作一简要介绍，尤其是介绍给那些对于涪陵这样一个并不出名的中等城市，通常只能联想到“涪陵榨菜”的来宾的想法。我是一个有了想法就会付诸行动，办事从来不会拖沓的人。可是，原以为身在此地，最不成问题的资料收集，这时却出了麻烦。整整半个月时间跑遍全城的主要收获，就是在学校图书馆里借得所藏仅有的两本一直没有读者的地方志——巴蜀书社1992年影印出版的《同治重修涪州志》、《民国涪陵县续修涪州志》，在涪陵方志办购买了一本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新修《涪陵市志》。资源紧缺自然就该注意节约、充分利用，这早已是我这种出自草根阶层的人根深蒂固的潜意识。我在这方面的第一篇文章《涪州文化的渊源、特点与历史地位》，就是在反复阅读这三本书的基础上草就的。

不曾想到的是，这样的一个开端，竟然引发了我的研究兴趣，并进而转化成一个文史工作者对地方所应承担的学术责任。

于是，我便在后来的教学工作和日常阅读中多了一个心眼，随时留意与涪陵有关的古代文史资料，利用各种外出学习的机会努力访求前贤时彦的相关论著。偶有所得，即写成札记，积累稍多，则整理成文。虽然，由于资料条件的限制，闻见视野的限制，学识水平的限制，所论极其粗疏，进展也较为缓慢。但几年坚持下来，零零碎碎、陆陆续续也就有了汇成今天这本小书的将近二十篇文章，涪陵历史文化的研究也成为我除古代文学之外最重要的治学内容之一。

科学研究原本就是一桩十分艰辛的事情，对于我这样一个学力和修养都很低浅的人来说，更是有如长途跋涉，其间的每一次进步，都来得很不轻松。幸亏这些年来，一直得到陶文鹏先生、王菡先生等学界前辈的关心和扶持，郑园、胥洪泉等等学长也不断的给我鼓励、帮助，指点我的研究工作，使我少走了许多弯路。特别是最近一年，我在北京大学进修访学，投杨忠先生门下，更是受到严格的学术训练和那里良好学术氛围的熏陶，从师友的论著或相互切磋中获得不少做人、治学的有益启发。

而今，倏忽之间好几年过去了，我也到了平常所说的四十不惑，勉强可以著述立说的年龄。虽则仍然一事无成，但每每回想起最初那篇十分稚拙的文章的写作经过，回想起从那时到现在所走过的每一步足迹，特别是回想起那些始终关怀着我的成长，长期给我以鼓励、帮助和力量的师长们、朋友们，却是不能不怀着一段深长感慨的。是为序。

李 胜

丙戌年元宵节于涪陵江东

目 录

附录

涪州文化的渊源、特点与历史地位

涪州文化即现在重庆市涪陵区的古代文化。其特点是具有源远流长的历史传统，兼收并容的文化群体，尚简勤学的文化氛围，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博大精深的思想内涵，文章节义的地域特色。另外，涪州文化的历史地位也非同一般，其在理学、水文、饮食等方面的贡献，更是饮誉全国乃至全球。

涪州文化；特点；历史地位

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1]这里所说的"条件"，就是以传统文化为具体表现形式，包括思想、道德、信仰、心理、观念、习俗等在内的，直接影响现实的国情民情的历史传统。可以说，它是民族之根、民族之魂。五千年的中国历史已经证明，中华民族的强大凝聚力，中华民族的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就来源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而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涪州文化不但哺育出了孙定、谯定、崔子方、晁渊、贾元、刘滋、周煌、石彦恬等一大批杰出的历史人物，为中国古代文明书写着辉煌；而且它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浩然正气一直影响到当代，形成"团结求实，文明诚信，艰苦创业，不甘人后"的涪陵精神，使涪陵城市建设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有工业经济也得以持续、健康、快速发展，成为中西

部欠发达地区国企改革的成功代表，引起国内经济理论界和新闻媒体的关注，获得了多次来涪视察工作的江泽民、李鹏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评价，被新华社称为“涪陵现象”。[2]前引马克思的话使我们认识到，研究、弘扬涪州文化，对于我们推进涪陵当前各项事业发展很有必要。这里，先仅就涪州文化的渊源、特点和历史地位谈点粗浅的看法，以期引起大家对这个问题的重视，并以此就教于方家。

一、关于涪州文化的范畴

什么是涪州文化？所谓涪州文化，用简单的一句话来说，就是今天重庆市涪陵区即古之涪州涪陵郡在民国以前的古代文化。它是一种地域文化，但又是整个中华民族文化不可分割的部分。

志乘记载，古涪州地域辽阔：“东九十里至三华山抵丰都县界，东南一百七十里抵武隆司，南一百六十里至冷水关抵南川县界，西南一百五十里至铁瓦寺抵巴县界，西一百五十里至羊鹿口抵巴县界，西北百里至黄草山抵长寿县界，北二百二十里至观斗山抵垫江县界，东北一百二十里至马颈子立石镇抵丰都县界”[3]，方圆六百余里。康熙七年（1668）武隆县并入后，辖地更广，包括了现在武隆甚至垫江、长寿、南川等县市的一些地方。

涪州人创造了辉煌的涪州文化，这是当代涪陵人引以自豪的事。但笔者认为，中原人以及受中原文化熏陶的外地人在涪州所进行的文化活动，他们所写的有关涪州人和事的作品、文章和著作，同样为涪州文化作出了贡献。清朝涪州人王应元、傅炳墀编纂的《同治重修涪州志·艺文志》，把司马迁（陕西龙门人）《史记·货殖列传》中与涪州有关的“巴寡妇清，其先得丹穴……名显天下，岂非以富耶！”一段文字和宋绍圣、绍兴年间来涪的黄庭坚（江西分宁人）、曹彦时（河南荥阳人）所写的《与秦世章文思》、《伊川先生祠堂记》等置于“散体文三十九首”

开头，把杜甫（河南巩县人）《黄草峡》、张祜（河南南阳人）《送李长史归涪州》、唐求（四川青城人）[4]《题范贤观》、《明月峡龙女赠（何）光远》等放在所选“古今体诗一百八十五首”之首，就说明了这个问题。

据史志资料，历史上涪州文化最为兴盛的是宋代，有“文风齐两蜀”[5]之咏。而草味初启、顿开风气的，是北宋著名理学家、教育家、洛阳人程颐。绍圣年间（1094－1098），崇政殿说书、西京国子监教授程颐“以党论放归田里，四年十一月，送涪州编管。”[6]他来到涪州后，讲学于州城长江北岸的北岩普净院，使涪州学风大兴。程颐在涪数年，身穷而道通，凿洞注《易》，撰成《周易程氏传》，涪州点易洞亦因此成为宋明理学的“发祥圣地”闻名天下。几乎同时，又有著名文学家、大书法家黄庭坚以修实录不实谪涪州别驾黔州安置。其来涪为程子讲学处题榜的“钩深堂”三字，至今仍高悬于北岩崖壁，成为涪州文化的一件珍品。此外，据笔者粗略统计，仅《同治重修涪州志》和以宣统三年（1911）为下限的《民国涪陵县续修涪州志》中，即辑存有民国以前的外地作者（多半“尝客止于涪”）吟诵涪州风土人情、记叙山川景物的诗文140余篇，其中不少出自名家，如汉代司马迁；唐代张祜、杜甫、戴叔伦、唐求；宋代黄庭坚、苏轼、苏辙、陆游、范成大、朱熹、尹焞；明代王守仁、杨慎、邱濬；清代蒋士铨、张问陶、翁若梅、王士禛、林鸿年等。可以说，他们都为发展涪州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笔者认为，只有这样看问题，才能较全面地认识涪州文化的内涵，找出涪州文化的运行规律，为建设社会主义新涪陵服务。

二、涪州文化的特点

作为古代的地域文化，涪州文化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依托其“边连黔徼，两江还（环）抱”，“为夔渝门户”[7]的特殊地

理环境，逐渐形成了自己作为“三巴巨邑”[8]、“夙昔名胜之区”[9]的鲜明地方色彩。概括起来，主要有：

（一）源远流长的历史传统

涪州建县（秦时）已有两千多年，设置州郡（唐初）也有一千多年。实际上，它的文化渊源要比它的名字更为古老久远。蔺市镇凤阳村和镇安乡白源村殷商遗址出土的新石器时代文物，至少有四、五千年的历史；白涛镇小田溪巴人墓群出土的战国青铜器，距今也有差不多三千年。春秋战国时期，则系巴国祖陵所在地，处于巴文化的中心地带，属巴楚、巴蜀文化的范围。秦汉以降，经蜀汉、两晋、隋、唐、五代发展到宋、明，涪州文化便进入鼎盛时期。清中叶以后，涪州文化虽处于衰微阶段，但不久，“五四运动”爆发，中国共产党登上了政治舞台，领导人民武装夺取政权，这就使它发生革命性的变化，而开始向大众化方向发展。现在的涪陵文化，就是在古代的涪州文化和“五四”新文化思想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发展起来的，是一种崭新的、富有浓厚巴渝地方色彩的社会主义新文化。

（二）兼收并蓄的文化群体

涪州人善于吸收，勇于创造。小田溪青铜器就学习了中原文化的先进铸造工艺，展示出乌江流域的地方特色。以后随着中华民族的几次大迁徙和南北、中外文化的频繁交流，涪州文化更是大量吸收了各方面的养料，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区域特色。它包括人文文化（以“五贤”为代表）、书院文化（以北岩书院为代表）、水文石刻文化（以白鹤梁题刻为代表）、佛教文化（以白象山天宝寺为代表）、道教文化（以北岩三仙楼为代表）、音乐文化（以八牌耍锣鼓为代表）、榨菜文化（以邱家榨菜为代表）和茶文化（以梓里方坪贡茶为代表）、竹文化（以灵寿竹为代表）等，都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这些文化群体既互相碰撞，又互相融合，构成了涪州文化兼收并容、百花争艳的格局。

（三）尚简勤学的文化氛围

涪州地处乌江与长江汇合处，交通便利，“财货舶集”，生产发展，经济繁荣。上古，巴国曾建都于此，后历为郡、县、州治所；宋代是巴蜀六大商贸中心之一，清代“隐然为蜀东第一重镇”[7]，“有‘小重庆’之称”[10]。尤其是民风俭约——“通显世家，无名园别馆以侈游观，往往急流勇退，图书之外无珠玉玩好，亦不染名流金石之癖”，崇儒重教，“士勤于学”[11]，“人喜诵读”，因而序塾相望，“家弦户诵，邑之文风在川东称最”。由于学校多，培养的人才也多：“朝廷有忠贞尽节之臣，乡党有主文歌咏之士”[12]。据不完全统计，涪州历代进士约有 70 余人，其中 9 人供奉翰林 3 人充任尚书；而有著作传世者，单清代就有 28 人。

唐代文学家刘禹锡在《陋室铭》中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涪州在全国闻名，首先是因为它拥有著名诗人孙定，大理学家、教育家谯定、夏渊、崔子方，佛教禅宗高僧道隆，文学家、史学家贾元，贤良忠臣刘滋、夏邦谟，学者、书法家周煌、石彦恬，志怪小说家陈骧翰，川菜专家邱寿安等众多的杰出人物。他们象明星闪耀天空，使涪州文化放射出永不熄灭的光辉。

（四）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

涪陵历史上出现了许多作家诗人、专家学者、能工巧匠。他们自强不息，奋力进取，在各自的领域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比如城西洗墨溪邱寿安、邱翰章兄弟，在光绪二十五年（1899）创制“榨菜”以后，为了扩大生产创立名牌，远走上海四处张贴广告宣传榨菜的特点，同时将它切成细块、小包分装，附上说明书派人到茶社、餐馆、车站、码头等公共场所分送请人品尝。经过艰苦的努力，鲜香脆嫩的“涪陵榨菜”终于赢得了国人的喜爱，并逐步进入国际市场，最终成为世界三大名腌菜之一。

（五）博大精深的思想内涵

理论思维是一个民族成熟的标志。涪州出了不少理学思想家，他们的学说和思想指引着涪州文化前进的方向。特别是程门之一大弟子谯定的“洛学涪陵学派”[13]学说，崔子方的《春秋》学说，朱熹考亭沧洲精舍门人戛渊的“戛学”，道隆的“顿悟”禅法，贾元的“禹生石纽”说，以及渡江老叟[14]的“心存诚敬不若无心”之说，都是中华民族思想宝库中的精华。涪州历代人文蔚起、英才辈出，正是这些博大精深思想哺育的结果。

（六）文章节义的地域特色

涪州“士风敦厚”、“人多憨勇”[12]，自古以来就是文章节义之邦。从谯定、崔子方“贤而有守”[15]开始，代代讲节义，人人歆诗文，重节操、擅文章成为涪州的社会风尚。不难看到：在民族危难之际，以徐邦道为代表的涪州人以救社稷为已任，身先士卒，浴血奋战，取得了甲午中日战争土城子反击战的重大胜利，忠烈之气贯九天；在和平发展时期，以刘溎、夏邦谟、张善吉为代表的涪州人则又“视国事如其家”[16]，凡“职所当为者，悉明目张胆言之”[17]，不避疑怨，勿问得失，廉直之心动于朝。可以说，爱国主义精神，是涪州文化的灵魂；文章节义并重是涪州名士的主体形象。爱国家、爱民族、爱家乡、爱人民，是涪州人的最宝贵传统，是涪州文化的最显著特色。

三、涪州文化的历史地位

说到涪州文化的历史地位，让我们回忆起二十多年前发生的一件往事：1972 年 4 月，白涛镇小田溪群众在乌江西岸台地上烧砖取土时，意外地发现了 8 座战国时期的巴人墓葬群。经考古专家发掘，在 6000 平方米左右的范围内，共出土铜器、玉器、陶器等 290 余件。其中蟠虺纹错金编钟是迄今最完整的一套巴式编钟，被列为国家一级文物并选送到欧美展出；而虎纽錞于、铭

文铜戈、错银铜壶等亦属原四川地区巴文化考古首次发现。可见，涪州文化的历史地位实非一般。

让人感到惊喜的是，涪州人不仅创造了灿烂的青铜文化，而且随着历史的发展，又创造了光辉的白鹤梁水文题刻文化。白鹤梁位于城北靠江心南岸，长 1200 米，宽 12 至 36 米，枯水时高出江面 4 至 5 米，石梁中段有唐代水标双鲤图和宋元明清包括黄庭坚、晁公武等名家在内的百多段万余字枯水石刻题记，不但可为利用长江进行灌溉、航行、发电以及桥梁设计、城市建设、厂矿供水提供依据和参考，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而且有一定的史料、书法、艺术、文学价值，是“长江中最古老的水文站”，同时也是中国乃至世界至今唯一保存完好的历史最悠久的“江河枯水水位站”，素有“长江古代水文资料宝库”、“水下碑林”[18]之称。

当然，涪州的出名，最早是得力于“涪陵先生”谯定。谯定是我国两宋之际的一位大理学家、文化巨人，是洛学入蜀、蜀学转型的关键人物。《宋史》本传记载，谯定“少喜学佛”，后学《易》于南平（今重庆綦江）郭曩氏。“一日至汴，闻伊川程颐讲道于洛，洁衣往见，弃其学而学焉，遂得闻精义，造诣愈至，浩然而归”。绍圣间，程颐贬居涪州，定得更近程颐，“北岩有山，师友游泳其中。”[19]《宋元学案》列出谯定的学术源流：“谯氏门人”有刘勉之、胡宪（均为朱熹师从）、张浚、张行成、冯时行等；“谯氏再传”有朱熹、张栻、吕祖谦、王十朋、李心传、李道传等；“谯氏三传”有蔡元定等沧州诸儒 159 人，岳麓诸儒 33 人，二江诸儒 10 人，丽泽诸儒 67 人；“谯氏四传”有王应麟等。所以王梓材说：谯定“固程门一大宗也”[20]。他的学术、教育成就，促进了宋代经学思想的嬗变，对理学史上朱熹、张栻共续濂洛学统的“乾（道）淳（熙）之盛”产生重大影响。[21]

应该说，涪州文化的地位，是与谯定的名字分不开的。谯定奠定了涪州文化的基础，开辟了涪州文化发展的康庄大道。此后经崔子方、晏渊、贾元、刘滋到周煌、石彦恬，涪州文化的博大精深更为人们所慨慕。

此外，涪州人"尚忠厚，树清节"[22]也往往令人仰止。众所周知，刘滋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忠臣烈士。倪斯惠《邹刘合刻序》[23]、周汝梅《刘滋墓表》[24]称，他为人廉直，"雅好读书"，于忠义"居是邦士大夫之贤者"，为"明目张胆解衣折槛烈丈夫"，"至今以司谏传"。当刘瑾煽权潜谋不轨，国势危疑而朝绅靡然之时，"独能出万死一生之计，不愧其职"，抗疏论劾，痛陈忠悃。其所上《劾逆璫刘瑾疏》、《荐兵部尚书刘大夏疏》、《乞谥宋景濂先生疏》等，至今读来，亦是"凛凛生气，令人舌吐"。王守仁尝寄诗云："骨鲠英风海外知，况于青史万年垂。紫雾四塞麟惊去，红日重光凤落仪。天夺忠良谁可问，神为雷电鬼难知。莫邪亘古无终秘，屈轶何时到玉墀。"[25]

当然，人类文明的进步，是在文化传承的过程中进行的。可以说，没有继承，便没有创造。为此，涪州学者在这方面作出了巨大的努力。早在宋理宗淳祐十年（1250），涪州学者就在当时知州赵汝廩主持下刻印朱熹编著的《易学启蒙》一书，在出版印刷史上得以留名。到清末，涪州城内已有聚贤书社等3家书社（局）可印刷出版书籍。特别是州人周煌，更是参加了举世闻名的《四库全书》的编纂工作[26]，为中华文化的传承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晚清石彦恬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以省吃俭用所聚千金购得蕲州（今湖北武昌）宋版《淳化阁帖》归涪，使涪州书法得以繁荣兴盛，出现了周煌、傅炳墀等名重一时的书法家，也在书法史上传为佳话。

涪州文化昌盛，人才辈出，自然还得力于她发达的教育。从现在掌握的史料来看，宋嘉定十年（1217）由范仲武创建于州

治大江北岸的北岩书院（清代更名为钩深书院），是全国最早的官办书院之一，而且在朱熹嫡传虁渊弟子、川东大儒阳枋（大阳先生）主教的南宋中后期，与东湖、濂溪、象山等书院“并闻名于朝野。”[27]此外，明代正德年间（1506－1522）刘滋于凤凰山创办的白云书院，万历三十七年（1609）何环斗于璧山创办的琴堂书院，清同治九年（1870）徐浩于江南岸附城创办的涪陵书院（后更名桂馨书院）等，也都是前四川地区比较有名的书院。尤其是北岩书院，其前身普净院就是洛学入蜀的重要场所，程颐、谯定、黄庭坚师友游咏其中。嗣后，天假斯文，荟萃了两宋六韶人豪；源远流长，对中国文化产生深刻影响。朱熹《北岩题壁》诗云：“渺然方寸神明舍，天下经伦具此中。每向狂澜观不足，正如有本出无穷。”[28]

总之，涪州文化为中华民族培育出了优秀的人才、优秀的著作、优秀的产品，其影响是深远的。

现代著名作家郁达夫在《怀鲁迅》一文中说：“没有伟大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为了振兴中华，我们必须十分珍惜自己的传统文化—— 涪州文化，大力宣传我区历史上的著名人物，把他们当成宝贵的精神财富，并使之服务于当前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我们相信：古代的涪州曾经辉煌，今天的涪陵一定会更加美好！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603．

[2] 马传松、朱桥．试论“涪陵现象”[J]．涪陵师专学报，2001，(1)：5．

[3] 吕绍衣，王应元．同治重修涪州志（卷1）·舆地志·疆域 [A]．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第46集）[Z]．成都：巴蜀书社影印

本，1992.
[4] 房锐. 唐求初探 [J].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1，（4）：88.
[5] 涪陵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涪陵市志 [Z].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 1320.
[6] 程颢，程颐. 二程全书遗书附录 · 伊川先生年谱 [A]. 四部备要 [Z]. 上海：中华书局，1936.
[7] 吕绍衣. 重修涪州志序 [A]. 吕绍衣，王应元. 同治重修涪州志（卷首）[Z]. 中国地方志集成 · 四川府县志辑（第46集）[Z]. 成都：巴蜀书社影印本，1992.
[8] 王鑑清，施纪云. 民国涪陵县续修涪州志（卷27）· 乾隆五十年乙巳续修知州多泽厚序 [A] 中国地方志集成 · 四川府县志辑（第47集）[Z]. 成都：巴蜀书社影印本，1992.
[9] 王鑑清，施纪云. 民国涪陵县续修涪州志（卷27）康熙五十三年续修郭宪仪序 [A]. 中国地方志集成 · 四川府县志辑（第47集）[Z]. 成都：巴蜀书社影印本，1992.
[10] 涪陵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涪陵市志 [Z].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 1.
[11] 王鑑清，施纪云. 民国涪陵县续修涪州志（卷7）· 风土志 · 风俗 [A]. 中国地方志集成 · 四川府县志辑（第47集）[Z]. 成都：巴蜀书社影印本，1992.
[12] 吕绍衣，王应元. 同治重修涪州志（卷1）· 舆地志 · 风俗 [A]. 中国地方志集成 · 四川府县志辑（第46集）[Z]. 成都：巴蜀书社影印本，1992.
[13] 杨金鑫. 程朱理学与书院 [J]. 哲学与文化（台湾），1990.（6）.
[14]《同治重修涪州志》第10卷《人物志 · 隐逸》原作“渡江老叟”，疑为音近而误，径改。
[15] 朱彝尊. 经义考（卷183）黄庭坚语 [A].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
[16] 许国. 吏部尚书夏松泉公墓志铭 [A]. 吕绍衣，王应元. 同治重修涪州志（卷14）[Z]. 中国地方志集成 · 四川府县志辑（第46集）

[Z]. 成都：巴蜀书社影印本，1992.
[17] 卫国史. 恩荣堂序 [A]. 吕绍衣，王应元. 同治重修涪州志（卷14）[Z]. 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第46集）[Z]. 成都：巴蜀书社影印本，1992.
[18] 涪陵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涪陵市志 [Z].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 1395.
[19] 脱脱，等. 宋史（卷459）·谯定传 [A]. 二十五史 [Z].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20] 黄宗羲. 宋元学案（卷30）·刘李诸儒学案 [A]. 北京：中华书局，1986.
[21] 胡昭曦. 谯定、张栻与朱熹的学术联系 [M]. 中国哲学（第16辑）[J]. 长沙：岳麓书社，1993.
[22] 涪陵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涪陵市志（附录）·夏道硕序 [A].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
[23] 吕绍衣，王应元. 同治重修涪州志（卷14）·艺文志·散体文 [A]. 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第46集）[Z]. 成都：巴蜀书社影印本，1992.
[24] 吕绍衣，王应元. 同治重修涪州志（卷9）·人物志·忠烈 [A]. 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第46集）[Z]. 成都：巴蜀书社影印本，1992.
[25] 吕绍衣，王应元. 同治重修涪州志（卷15）·赠刘秋佩 [A]. 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第46集）[Z]. 成都：巴蜀书社影印本，1992.
[26] 乾隆四十七年七月十九日奉旨开列办理四库全书在事诸臣职名 [J]. 四库全书简明目录（附录）[Z].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933；任松如. 馆员一览表 [A]. 四库全书答问 [Z]. 成都：巴蜀书社，1988. 8.
[27] 魏了翁. 鹤山集（卷65）·跋御书鹤山书院四大字 [A].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Z].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28] 吕绍衣，王应元. 同治重修涪州志（卷15）·艺文志·古今体诗 [A]. 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第46集）[Z]. 成都：巴

蜀书社影印本，1992.

（原载《涪陵师范学院学报》2001 年第 4 期）

李远并非“《全唐诗》中惟一有诗作传世的巴渝籍作家”

——与熊笃先生商榷

本文通过全面清查《全唐诗》所载唐代诗人之生平、作品材料，参以《唐摭言》、《唐诗纪事》、《蜀中广记》、《唐才子传校笺》等相关文献暨今人重要研究成果，辨明了熊笃先生称李远为《全唐诗》中惟一有诗作传世的巴渝籍作家的说法所存在的偏颇。

《全唐诗》；巴渝籍作家；传世诗作；李远

《文学遗产》2002年5期载刘明华、杨理论撰《“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第十一届年会暨唐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召开》一则学术活动报道称，有关巴蜀文化的作家作品研究，是此次会议的亮点之一。熊笃先生（重庆商学院教授）“考订了《全唐诗》中惟一有诗作传世的巴渝籍作家李远的家世生平，论述了其诗作的题材内容和艺术特色。”（第138页）按“报道”之义，其中所称李远为“《全唐诗》中惟一有诗作传世的巴渝籍作家”云云，应理解为是熊笃先生的看法。

考《全唐诗》卷五一九“李远”（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5930～5936页），《唐才子传校笺》卷七辛良史“李远”传文及梁超然先生笺证（傅璇琮主编，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册217～227页）等可知，李远字求古（案：《全唐诗》5930页名下小

传脱“古”字），一作承古，夔州云安县人（今重庆云阳县人。案：《全唐诗》、《唐才子传》原作“蜀人”。《校笺》第3册218页梁超然先生据《玉芝堂谈荟》称李远“夔州人”，《嘉靖云阳县志》载其名，《嘉庆一统志》又谓“李远墓，在云阳县西五峰麓”，以及其《长安即事寄友人》、《及第后送家兄遊蜀》诗举“巴国”、“巫峡”抒思乡之情等断为云安人。又，据《嘉庆一统志》三九七“夔州府”，云阳县唐时称云安县。《校笺》第3册别处均作“云安”，惟218页笺文作“夔州云阳县”，误。）《全唐诗》5930～5936页录存其诗一卷，共三十五首，句四（案：经反复核计，《校笺》第3册226页作“三十四首，句二”，误）。熊笃先生称其为“《全唐诗》中有诗作传世的巴渝籍作家”，当不诬谀。然冠以“惟一”，则值得商榷。

后学以为，据“报道”中前后“巴蜀”、“巴渝”之辞，该次会议举办单位西南师范大学地处重庆，以及熊笃教授称云安人李远为“巴渝籍作家”等等差乎可断，其所谓“巴渝籍作家”，盖源于古巴郡渝州（含今重庆直辖市大部分地区和四川省的阆中、南充、泸州等地）之名，实指祖居或出生地在今重庆市所辖长寿、涪陵、万州，云阳、奉节、垫江、合川等十三区二十三县（自治县）和四个县级市的地域范围内的作家。而属此之列者，在《全唐诗》中除李远外，尚有四人：

一、雍陶　字国钧，夔州云安（今重庆市云阳县）人，寓居成都（案：《全唐诗》及《唐才子传》均言陶为“成都人”。《校笺》第3册244页梁超然先生考其《再经天涯地角山》、《忆山寄僧》、《和河南白尹西池北新葺水斋招赏十二韵》等诗中“每忆云山养短才”、“到来空认出云峰”、“雨夜思巫峡”之句，曰：“陶之故乡实居云山之下”，“疑陶原籍云安，而成都乃其寓居之地。”信从）。《全唐诗》卷五一八，5910～5929页录存其诗一卷，计一百三十一首又四句（案：《全唐诗》5924页录

《哀蜀人为南蛮俘虏五章》有题无诗，不计；5929 页之“句”尽皆五言、押韵，仿佛一绝，故《校笺》第 3 册 254 页作“共一百三十二首”)。

二、孙定　字志元，涪州（今重庆市涪陵区）人，《全唐诗》卷七一五，8219 ~ 8220 页录存其诗《寄孙储》（一作《下第醉中寄储》）一首。

三、幸夤逊　五代后蜀夔州云安监（在今重庆市云阳县东北约三十里，时为盐场）人，一云成都（今属四川）人。《全唐诗》卷七六一，8644 页录存其《云》诗一首，断句若干（六联共十二句）。

四、刘敬之　夔州云安（今重庆市云阳县）人，雍陶之舅。《全唐诗》卷七九五，8946 页录存其诗一联：“山近衡阳虽少雁，水连巴蜀岂无鱼。”

其中，幸夤逊是否“巴渝籍”的云安人，尚属两可；刘敬之诗仅存一联，断句而已，难称有诗作传世。二人均可排除在“《全唐诗》中有诗作传世的巴渝籍作家”之外。雍陶，存传诗作既多，梁超然先生对其“原籍云安，而成都乃其寓居之地”的考证又确凿有据，可为凭信，堪称是“《全唐诗》中有诗作传世的巴渝作家”。退而言之，即使熊笃先生业已坐实雍陶籍贯的另一种说法（“成都人”）或别有新见，也还有涪州孙定证明李远并非在《全唐诗》中有诗作留存的“惟一”巴渝籍作家。

综上所述，至少孙定为“在《全唐诗》中有诗作传世的巴渝籍作家”的身份是毫无疑问的。如是，则熊笃先生称李远为“惟一”的说法，不免有一障之失。

（原载《文学遗产》2004 年第 6 期，收入本书时有改动）

有关唐代诗人孙定材料的三则考辨

一、《蜀中广记》的悠谬之言

唐诗人孙定，新旧《唐书》、《唐才子传》均无记载。其事迹、作品，见于《唐摭言》、《唐诗纪事》、《全唐诗》及《蜀中广记》等。《唐摭言》卷十云："孙定字志元，涪州大戎族之子，长于储。定数举矣，储方欲就贡。或访于定，定谑曰：'十三郎仪表堂堂，好个军将，何须以科举为资。'储颇衔之。后储贵达，未尝言定之长。晚年丧志，放意杯酒。景福二年，《下第遊京西出开远门，醉中走笔寄储》诗曰：'行行血泪洒尘襟，事逐东流渭水深。秋跨蹇驴风尚紧，静投孤店日初沉。一枝犹挂东堂梦，千里空驰北巷心。明日悲歌又前去，满城烟树噪春禽。'定诗歌千余首，多委于兵火，竟无成而卒。"（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1035 册，页 768）《唐诗纪事》卷六六"孙定"条（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1479 册，页 935）所记，与《摭言》颇为一致，仅文字上略有精减而更显文气（"或访于定"省"或"字；"十三郎仪表堂堂"作"子仪表堂堂"；"好个军将"作"好将军材"；"何须"作"何必"；"储颇衔之"省"颇"，"衔"异作"銜"；"明日"作"明月"），当是出于《摭言》。《全唐诗》卷七一五"孙定"条言："孙定字志元，涪州大戎之族子。景福中，应举无成。诗一首。"（中华书局 1960 年版，页 8219）虽极简略，亦与前二书吻合。且按其所录《寄孙储》诗"明月"之句与《纪事》同而异于《摭言》可推，《全唐诗》所

记又源自《纪事》。与《纪事》等出人较大的是曹学佺《蜀中广记》。《广记》卷一〇二《诗话记第二·十一》云："孙定字志元，与涪州大戎之族子储某同学。储长于定，定数举矣，储方欲就贡。……出《唐诗纪事》。"（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592册，页643）不惟说"储长于定"，更说"储"为"储某"（案：据此，"某"即不详名代字。又，据《摭言》、《纪事》，"储"本指孙储，疑为定之从弟），与定同学。而孙定是否涪州人，是否"大戎族之子"也因此成了悬案。但曹氏之说自相抵牾处甚多："储"既指储某，为姓氏，以常例不当云"储长于定"，应曰"储长于孙"或"某长于定"；言"储长于定"，又分明以"储"为名矣。而所录孙定《醉中走笔寄储》诗"事逐东流"句之"东流"独作"东风"、"明日（月）悲歌又前去"句更作"明月影前愁又去"，亦与各本相去甚远，益发增其可疑。原以为曹氏或别有所本，末则自注云："出《唐诗纪事》"。其卤莽灭裂、不足采信之处，于此可见。

二、关于"储贵达"

《唐摭言》、《唐诗纪事》皆言"储贵达"（见前引），而怎样贵达，未详。《中国文学大辞典》金文伟撰"孙定"条于此独有申说，云："（孙储）后来贵达，历任天雄节度使、兵部尚书等职。"（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页2458）然未明所据。

按，孙储既为贵达显要之人，必见载记。考诸史籍，凡三见之：《旧唐书》卷二〇《本纪第二十上·昭宗》云："以金紫光禄大夫、守兵部尚书、上柱国、乐安郡开国公、食邑一千五百户孙储守兵部尚书，兼京兆尹。"（中华书局1975年版，页767）又，《新唐书》卷七三《表第十三下·宰相世系三·下》云："储，字文府，京兆尹、乐安郡侯。"（中华书局1975年版，页2959）同书卷一八三《列传第一百八·孙偓》亦云："孙偓，字龙光。父景商，为天平军节度使。……兄储，历天雄节度使，终

兵部尚书。”（页 5386）文伟之说与之密相吻合，殆源于此。其既有典据，又切中“贵达”之义，似可定谳。但是，问题在于，除了同名“孙储”这一未必有实际意义的惟一相关处外，上述材料并无一言半句表明此一孙储即是诗人孙定之从弟孙储。即，二者是否为同一人，明显缺乏确凿证据。虽然依据《古今同姓名大辞典》（上海书店 1983 年版）、《新旧唐书人名索引》、《新旧五代史人名索引》（中华书局 1998 年版《二十四史人名索引》）等，也同样无法找到当时偓兄孙储之外尚有另一名孙储者的记载，以证实二者确非同一人。而且，据《新唐书》孙偓本传、《唐摭言》卷八、《资治通鉴》卷二六〇与二六一的相关记载可知，偓乃武邑（今河北武强县）人。其兄储与涪州（今重庆市涪陵区）孙定从弟储各处一方，为同一人的可能性自然更小。不然，则孙定当为偓兄，籍改武邑，家世可考矣。又何谓其“涪州人”、“当地大戎之族子”、“生卒年不详”（均见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中国文学大辞典》，页 2458 金文伟撰“孙定”条）云云。质言之，除姓名相同而外，今见有关偓兄孙储的各种资料没有与孙定从弟储任何相关的信息，即使这并不完全排除二者存在某种联系的可能，而当下却举不出这种联系的任何证据。因而，对于诗人孙定之从弟储，金文伟氏来自新旧《唐书》的资料貌似相关而实经不起推敲，至多只具有潜在的价值，而缺乏现实适用性。在没有旁证的情况下，其不足为论说孙定生平事迹及其从弟储仕履经历的根据显而易见，宜当先行悬置或存疑。

三、“大戎族之子”非谓少数民族

孙定籍里，《唐摭言》、《唐诗纪事》谓“涪州大戎族之子”，《全唐诗》谓“涪州大戎之族子”。《同治涪州志》卷一六《拾遗志·轶事》、《民国涪州志》卷二二《艺文志四·诗选一·寄孙储》题下小注均称引《全唐诗话》（案：实为《唐诗纪事》

之删节本）转作“涪州大戎之族子”（巴蜀书社 1992 年版《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46 册，页 702；47 册，页 169）。由于“大戎之族子”（或“大戎族之子”）义存暧昧令人费解，以及缺乏旁证支持，受到编著体例、篇幅限制等原因，故至今人近著，要么避而不论，如：《唐诗大辞典》吴在庆撰“孙定”条省作“涪州人”（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0 年版，页 142）；要么直摭原文，如：《中国文学大辞典》金文伟撰“孙定”条析为“涪州人……当地大戎之族子”（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页 2458），于此鲜有增益。而相反，如《涪陵市志》那样，由此遽断孙定为“涪州大戎族人”（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页 1529），是“大戎族（少数民族）诗人”（页 1320），似也不免有疏略草率之嫌。

据《涪陵市志》“孙定”条“《唐才子传》载其行迹”（页 1529）的叙述，其材料来源应自《唐才子传》。而《唐才子传》实不传孙定，故其材料仍当是出于《摭言》诸书，尤以承续同治、民国等涪州旧志为极大可能，并把“涪州大戎之族子”曲解成“涪州大戎族人”，界定为“少数民族”。考《全唐诗》“大戎之族子”中“族子”一词，《朱子语类》卷八五《礼·二》云：“自高祖四世而上称族子”（岳麓书社 1997 年版，页 1977），结合参考《史记》卷一《五帝本纪·第一》“高辛于颛顼为族子”（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1 年版，页 14）的用法，其在“大戎”不为具体人名的语境中明显不能成立，故此“大戎之族子”当读作“大戎之族/子”，义同“大戎族之子”。其中，“子”即子嗣、子息、子弟、子孙、后裔之义，而“大戎族”则可有双解。其一，“族”指种族、民族，“大戎族”即春秋时分布在晋国及其以北（今山西太原、安邑、平陆一带）的众多戎族支系之一种（参见施正一主编《民族辞典》，四川民族出版社 1984 年版，页 108；陈永龄主编《民族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7年版，页364）。然若依此，当言孙定“大戎族人”，谓“大戎族之子”或“大戎之族子”则反常不可解。更何况，古代民族并不一定就是少数民族，且一般认为该族在春秋末年已被秦、晋所并，即唐前早已寂灭。即使有所流徙，亦是东向。而三巴巨邑涪州不惟在其所在古晋之地西南，还相去辽远。故《涪陵市志》称孙定为“大戎族（少数民族）诗人”的说法，理解起来在时间空间方面均存疑义，值得商榷。其二，“族”指宗族、家族或族类、族群，“大戎”或即元戎，可指战车（《诗·小雅·六月》：“元戎十乘，以先启行。”）、军器（《三国志·蜀志（卷五）·诸葛亮传》“损益连弩”注引《魏氏春秋》：“损益连弩，谓之元戎，以铁为矢，矢长八寸，一弩十矢俱发。”）以及与之有关的人：兵众（《汉书（卷九三）·董贤传》：“往悉尔心，统辟元戎。”）、将帅（《韩昌黎集（卷二）·徐泗豪三州节度使掌书记厅石记》：“元戎整齐三军之士”）等；也可直接指兵部尚书（《容斋四笔（卷一五）·官称别名》：“唐人好以它名标榜官称，……吏部尚书为大天，礼部为大仪，兵部为大戎，刑部为大秋，工部为大起”。）在文献不足征的情况下，将“大戎族”理解为军旅一族（当兵的人）应该是大体合理的。由是，则“大戎族之子”当是说孙定家庭出身或族望，言其生于行伍之家，长于军营之中，为当地军家之后。这不仅符合了“涪州大戎族之子”的行文逻辑，亦与孙定戏谑孙储“仪表堂堂，好个军将，何须以科举为资”相契合。因而，笔者以此为正解。

（原载《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05年第1期）

苏诗“山胡”考

本文广泛查阅古今载记，在前人相关成果的基础上，对苏轼《涪州得山胡次子由韵》诗中所写做了进一步的名物考证，认为“山胡”即今黑喉噪鹛。

苏轼；涪州（涪陵）；山胡；黑喉噪鹛

嘉祐四年（1059）十月，苏轼苏辙兄弟服母丧期满后，与父洵再度出蜀，前往京师开封。舟过涪州（今重庆市涪陵区）时，得鸟名“山胡”者，苏辙作《山胡》诗云：“山胡拥苍毳，两耳白茸茸。野树啼终日，黔山深几重。啄溪探细石，噪虎上孤峰。被执应多恨，筠笼仅不容。”[①]东坡则次韵相酬，写下了以理趣见长的《涪州得山胡次子由韵》：“终日锁筠笼，回头惜翠茸。谁知声㖞㖞，亦自意重重。夜宿烟生浦，朝鸣日上峰。故巢何足恋，鹰隼岂能容。”[②]

坡公诗所咏之“山胡”，除了其题下本有自注“善鸣，出黔中”[③]而外，明人彭大翼亦曾有考：“山胡，一名山呼，一名珊瑚，出岭南，巧声之鸟。”[④]当代辞书、词典，或取注[⑤]，或取考[⑥]，或注、考兼收[⑦]，固是鲜有增益[⑧]，也算得载列详备，便于稽核。然则世易时移，今之读解该诗者，往往疏于查证，无心求实，于“山胡”此一名物之所知，竟至不如古人，辄曰：“今为何鸟，未详”。如，林坚、陈华、沈彦选注《历代咏鸟诗品评》：“山胡子，亦称‘山胡’，古籍中鸟名。羽色青翠，善于鸣啭；

产于西南地区的丘陵地带。今为何鸟，未详。"⑨；张秉戍、张国臣主编《花鸟诗歌鉴赏辞典》："山胡子，亦称'山胡'，古鸟名。传说羽色青翠，善鸣。今为何鸟，未详。"⑩十分清楚，二书中撰写者在释说"山胡"时，不惟对苏辙之原唱、彭氏之《肆考》置诸不理，甚至连前面举到的常见工具书也惮烦一查，而仅仅只是依据了坡公诗本身（含小注）的"翠茸"、"善鸣"、"声嗰嗰"、"出黔中"等语进行随便的发挥。特别"传说"两字，更属率尔落笔，又见得其读诗不看诗题，亦不看"舟过涪州而得，故题云然"⑪之类别人早已写过的案语。故，其所谓山胡"今为何鸟，未详"云云，自然也就是顺势开出的一张"空头支票"而已。

谨按：山胡今为何鸟，可详。合坡公诗注与彭氏《肆考》提供的"黔中"、"岭南"之地域方位线索，于古今图书特别是川、渝、黔、滇、湘、鄂、闽、粤、桂等地的方物志书，以及关涉到这些地方的风物描写的文学作品中可以比较容易地找到不少有助于我们了解"山胡（山呼、珊瑚）"为何物的记载和描写。择要如下：

1. ［北宋］邹浩《山鹕》："大如青莱小如乌，色亦苍然二者俱。嗣岁不惟催布穀，可人尤是劝提壶。巧兼琴弄端谁使，追得年光赖尔呼。萱草堂高欣属耳，筠笼随我入东吴。"（《道乡集》卷十一，《四库全书》本，集部第1121册第258页）

2. ［明］李梦阳《贡禽赋》："鸟则秦吉了、画眉、山鹕……"（《空同集》卷三，《四库全书》本，集部第1262册第29页）

3. ［明］杨慎《罗甸曲》其六："林间山胡鸟，声声啼我前。何似故园里，花亭闻杜鹃。"（《升庵集》卷十二，《四库全书》本，集部第1270册第110页。又，罗甸，在贵州省中部，故鄂尔泰、靖道谟《贵州通志》卷四十五亦载该诗，见《四库

全书》本，史部第572册第553页）

4. ［明］杨慎《滇载记》载僧奴诗句：“珊瑚勾我出香闺，满目潸然泪湿衣。”（《丛书集成新编》本，第94册第576页）

5. ［明］王济《君子堂日询手镜》下卷：“横地多产珍异之鸟……珊瑚鸟，比画眉差大，彼皆写‘珊瑚’二字，不知何义。余谓以其珍贵故耳。或别有名，考诸《埤雅》、《尔雅》，皆不见录。然此鸟好斗，彼人多畜以赌胜负，甚至以鞍马为注者，如吾地斗促织然。”（《丛书集成新编》本，第94册第172页）

6. ［明］曹学佺《蜀中广记》卷五十九《方物记第一·鸟》：“黔中有山胡鸟，善鸣，一作山呼。”（《四库全书》本，集部第592册第6页）

7. ［明］谢肇淛《滇略》卷三《产略·十四》：“山呼似鹦鹉而差小，樊之易驯。宋苏轼有咏山呼诗……”（《四库全书》本，史部第494册第127页）

8. ［明］徐应秋《玉芝堂谈荟》卷三十三：“山胡鸟大如鸠，苍色，两腮圆点黑白相映，清调如莺。”（《四库全书》本，子部第883册第796页）

9. ［明］刘文征《滇志》卷三《物产·元江府》：“山呼鸟，调之能为百鸟音。”（云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古永继校点本，第119页）

10. ［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二十《禽语·山鹋画眉》：“山鹋青紫，画眉红绿，形色小异，而情性相同。……山鹋一名山乌，其铁脚者眼赤而突者善斗，臆间有黑毛一片圆小而长者善鸣。雄者尾长雌尾短，雄者音长雌音短。……山鹋喜栖水，自调其声，与流波相应以自娱。……阳春、东安人喜斗此鸟及黄头，购以重金，致有以骏马易之者。美食雕笼，视若娇子，家家皆有之。画眉性燥，山鹋性静，尤易畜。一名珊瑚，珍之也。予诗‘人家尽养珊瑚鸟’是也。”（《续修四库全书》本，史部第734

册第723－724页）

11.［清］吴绮《岭南风物记》（十四）：“山呼鸟出广州府，一名珊瑚，形似喜鹊，能为百鸟之音，甚可听。”（《四库全书》本，集部第592册第835页）

12.［清］陈元龙《格致镜原》卷八十一《鸟类·五》：“《事物绀珠》：珊瑚鸟大于画眉，好斗。《山堂肆考》……”（《四库全书》本，子部第1032册第513页）

13.［清］姚之骃《元明事类钞》卷三十七《飞鸟门·珊瑚鸟》载杨基咏珊瑚鸟诗：“黑翎红嘴珊瑚鸟，映花一点珊瑚小。”（《四库全书》本，子部第884册第601页）

14.［清］郝玉麟、谢道承《福建通志》卷十一《物产·福宁府·羽之属》：“喜鹊、乌、鸠、鸲鹆、莺、燕、山呼……”（《四库全书》本，史部第527册第483页）

15.［清］郝玉麟、鲁曾煜《广东通志》卷五十二《物产志·鸟》：“山乌形如八哥（双行小字原注：按一名山鹕，又名珊瑚），能作种种禽兽音，教之能学人语。臆间有黑色圆长者善鸣，眼红者善斗。彼处多畜之。”（《四库全书》本，史部第564册第454页）

16.［清］金鉷《广西通志》卷三十一《物产·南宁府》：“山鹕色青紫，铁脚赤眼者善斗，臆毛带黑色圆小而长者善鸣。各土州俱出。”（《四库全书》本，史部第565册第777页）

17.［清］《钦定续通志》卷一百八十《昆虫草木略·禽类七》：“珊瑚鸟大于画眉，好斗。出岭南，巧声之鸟也。见《山堂肆考》。”（《四库全书》本，史部第394册第868页）

18.［清］《钦定鸟谱》卷二“珊瑚鸟”条（按，条目下双行小注：亦作山鹕，一名山乌）：“珊瑚鸟形如百舌，赤目黑睛，黑嘴尖喙，顶有帻，黑颊，颊旁有白毛一片，通身至尾纯苍色，足细而黑纤爪。《闽书》云：山鹕鸟大如鸠，苍色，两腮有圆点

黑白相映，翔跳不定，声清调如莺，人笼畜之。《粤志》云：山鹕一名山乌，其铁脚者眼赤而突者善斗，臆间有黑毛一片圆小而长者善鸣。雄尾长雌尾短，雄音长雌音短。喜栖水自调其声，与流波相应，嘴爪最利。东安人笼畜之以斗胜负，一名珊瑚，珍之也。”（《续修四库全书》本，子部第1119册第507页）

19.［清］李调元《南海竹枝词十首》其二：“自是繁华地不同，鱼鳞万户海城中。人家尽蓄珊瑚鸟，高挂栏杆碧玉笼。”（《续修四库全书》本，集部第1456册271页；广州荔湾区文联《历代名人咏荔湾》，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年版，第40页）

20.广东省昆虫研究所动物室、中山大学生物系《海南岛的鸟兽》：“黑喉噪鹛，别名：山土鸟（原注：琼山）、黑喉笑鸫。地理分布：遍布全岛。”（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33页）

21.浙江动物志编辑委员会《浙江动物志·鸟类》：“黑喉噪鹛地域分布：浙东南及海岛。”（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年版，第22页）

22.华南濒危动物研究所《广东鸟类彩色图鉴》：“黑喉噪鹛别名黑喉笑鸫。……栖息于海拔700米以下的低山、丘陵、滨海台地的次生林或竹林中。喜集群，常见几只或十几只成群活动。”（广东科技出版社1991年版，第114页）

23.陈青林、邓曾《百只珊瑚鸟回归林区》：“9月8日，永福县百寿林业公安派出所在百寿镇查获一起非法狩猎案，缴获自治区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珊瑚鸟100余只。……目前，100余只珊瑚鸟已全部放生。”（《广西林业》1995年第6期第18页）

24.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广西通志·生物志》第二编第四章《鸟纲·雀形目》：“黑喉噪鹛，别名：珊瑚鸟（原注：南宁等地）……为广西南部常见的经济鸟类之一，其啄食多种农林害虫；因其善鸣唱，观赏价值仅次于画眉，南宁、梧州等地百姓家中饲养的数量不少。”（广西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321 页）

25.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中国云南野生鸟类》："黑喉噪鹛……分布于云南西南山地，为留鸟。"（中国林业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37 页）

26. 中国科学院中国动物志编辑委员会《中国动物志·鸟纲》第十一卷《雀形目·鹟科·画眉亚科》："黑喉噪鹛……分化为 6 个亚种，其中 3 个产于我国境内。①指名亚种：头顶蓝灰色，与背部区别不明显；背部橄榄灰褐沾绿色；眼后具一大形白色块斑。②滇西亚种：头顶蓝灰色，与背部区别明显；背部橄榄褐色；眼后具一大形白斑。③海南亚种：头顶深蓝灰色，与背部区别明显；背部棕褐；眼后无白色块斑。"（科学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01 页）

27. 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中国鸟类图鉴》："黑喉噪鹛，全长 198—290 毫米。额斑、眼先、眼后纹、颏、喉和上胸的中央均绒黑色，额斑后缘缀有白羽；头顶至后颈灰蓝色。上体呈沾棕或绿的橄榄褐色；尾羽橄榄褐，先端黑色并具暗斑。两翅黑褐，外侧初级飞羽外翈灰白。耳羽及喉侧白色，形成一块白斑；下体橄榄灰，向后转为橄榄褐色。栖于季雨林下的灌丛、竹丛间。结小群活动。以昆虫和植物种实为食。分布于云南、广西、广东、浙江、海南岛（原注：留鸟）。"（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68 页）

28. 郑光美、张词祖《中国野鸟》："黑喉噪鹛……栖息于 1000～1500 米的季雨林中，常结小群在次生林、竹丛，或林下茂密处活动，鸣声清晰悦耳。以昆虫、草籽为食。为云南南部至广东及海南等地常见的留鸟。"（中国林业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06 页）

29. 中华人民共和国濒危物种进出口管理办公室《常见贸易鸟类识别手册》："黑喉噪鹛……保护级别：国家保护的有益的

或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分布：云南、广西、广东、浙江、海南。国外分布于越南、缅甸、泰国、老挝。”（中国林业出版社2002年版，第93页）

30. 郑光美《世界鸟类分布与分布名录》雀形目画眉科：“黑喉噪鹛，拉丁名：Garrulax chinensis；英文名：Black - throated Laughing - thrush”（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75页）

根据以上材料，我们可以知道：所谓“山胡”，当为“山鹕”之异、俗写。以其巧声善鸣，“能为百鸟之音，甚可听”，一作“山呼”。名之为“珊瑚”，则是“以其珍贵故耳”。在广东、海南，该鸟又叫做“黑喉笑鸫”。广东人大概因为发音的缘故，又称之为“山乌”，而海南琼山一带则有称为“山土鸟”的。无论怎么称呼，所指实一，即今“黑喉噪鹛”。而结合子由“山胡拥苍毳，两耳白茸茸”之句，我们还可以知道，东坡诗所咏，当为其中的“指名亚种”。由于有很高的观赏价值，该鸟至迟自苏轼时代起，即被作为赏玩鸟驯养，一直为人所爱。今被列入《国家保护的有益的或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简称《“三有”保护动物名录》），特别是在广西，更被列为重点保护之野生动物[⑫]。而且，据中华新闻网消息称，在2003年台湾中华邮政公司发行的故宫鸟谱古画系列邮票的最后一套中，还曾印行过一枚清朝宫廷画院所绘的“珊瑚鸟”邮票。

注释：

① 傅璇琮等主编《全宋诗》卷八四九，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9816页。

②《全宋诗》卷七八四，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9087页。按：该诗诗题，冯景《苏诗续补遗》卷下作《涪州得山胡》，查慎行《苏诗补注》卷一作《黔中得山胡》，见《四库全书》本，集部第1110册第759

页、第1111册第38页。又，“朝鸣”一作“朝吟”，见旧署王十朋之《东坡诗集注》卷三十，《四库全书》本，集部第1109册第588页。此外，查本在诗末尚附录有苏辙《山胡》诗，并云“附子由次韵”。考以别本及二诗内容上明显之先后承续关系，其以东坡诗为原唱，显误。

③ 按：善鸣，宋黄善夫家塾刊《王状元集百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作“山胡善鸣”。见《苏轼诗集》卷一该诗注，曾枣庄、舒大刚主编《三苏全书》，语文出版社2001年版，第6册第349页。

④《山堂肆考》羽集卷四五，万历乙未刻本。

⑤ 见《辞源》“山胡”条，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498页。

⑥ 见《中文大辞典》“山胡”条，台湾中国文化研究所民国五十七（1968）年版，第4320页。

⑦ 如：《大辞典》“山胡”条，台北三民书局民国七十四（1985）年版，第1325页；《汉语大词典》“山胡”条义项②、“山呼”条义项③、“珊瑚”条义项④，上海辞书出版社1986年版，第3册第778、776页，第4册第451页；《中国古代名物大典》“山胡”条，华夫主编，济南出版社1993年版，第1567页。

⑧ 按，增益处仅见《汉语大词典》“山胡”条义项②之引例：“黄庭坚《青玉案·至宜州次韵上酬七兄》词：‘山胡声畴，子规言语，正是愁人处。’邓初民《我要歌唱》：‘可惜我不是一只善于歌唱的山胡鸟’”。

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16页。按：该书诗题“山胡”下多一名词后缀“子”字，故云。今查四库本《东坡诗集注》、《苏诗续补遗》、《苏诗补注》等，概不作此，莫知所据。

⑩ 中国旅游出版社1990年版，第1067页。

⑪（清）冯应榴（《苏轼诗集合注》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8页。

⑫ 见桂政发［1993］107号《（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保护野生动物严厉打击违法犯罪活动的通告》。

黄山谷《点绛唇》（浊酒黄花）词序“时再涪陵”者考识

黄山谷《点绛唇》（浊酒黄花）词序云：“重九日寄怀嗣直弟，时再涪陵，用东坡《余杭九日〈点绛唇〉旧韵》。”《全宋词》：“案‘再’字疑是‘在’之误。”人皆以为此词系山谷“再（在）涪陵”作。如，《文献》1998年第4期胡可先《黄庭坚词系年考证》“绍圣二年乙亥（1095）”条：“考山谷谪涪州别驾、黔州安置在绍圣二年，其《黔南道中行记》云：‘绍圣二年三月辛亥次下牢关。’词当即是年在涪陵作。”

然胡氏已疑：“据山谷《到黔州谢表》，其到黔州在四月二十三日，则是年重九必不在涪陵。又宋任渊《山谷内集诗注》原目：‘绍圣二年乙亥，据《实录》，绍圣元年十二月甲午，黄庭坚谪涪州别驾、黔州安置，而《范公家传》乃云二年正月，盖据受命时也。山谷既初命，与其兄元明出尉氏、许昌，由汉阳趋江陵，上夔峡，三月辛亥至下牢关。四月二十三日到黔州。’再考宋黄嵤《山谷年谱》，无九日在涪陵事。疑山谷贬涪州别驾、黔州安置，官在涪陵，身在黔州，而此词言涪陵，未必身在涪陵也。”

今按，考《山谷年谱》卷二六“绍圣三年”：“嗣直名叔向，给事之子。”《宋诗纪事》卷三五“黄叔达”条：“叔达字知命，山谷之弟。”又，《同治涪州志》497页卷四《秩官志·历代秩官》“黄叔向”条：“绍圣中为涪陵尉，字嗣直，山谷弟也。在

黔州日《答瀘州安抚王补之书》云，并託渠作数字附客舟到涪陵尉舍弟叔向处。又《山谷碑》在涪陵尉厅壁，正叔向尉涪陵时书也。《答宋子茂》云：‘知命前往涪陵视嗣直舍弟，近方略到家，犹能道碑楼下相从也。’”622页卷十二《人物志·流寓》：“黄知命，山谷弟，尝客涪州。《与王补之书》云：‘知命舍弟昨过涪陵官所，留连十余月，所将侍妾遂生男，名小牛，近方挈归。小牛白皙魁岸，含饴弄稚子亦可忘老。’又《答李长倩》云：‘知命在涪陵逾岁，舟行日又留舍弟官所，约九月来归，犹未得近音。’”由上可知，山谷《点绛唇》该阕词序中，“时再（在）涪陵”者当是“嗣直弟”黄叔向；既曰“寄怀”，则山谷其时必不与叔向同在涪陵，惟在黔州是也。故山谷此词，虽曰“时再涪陵”，实乃黔州之作。

（原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2年第4期）

崔子方及其《春秋》研究考述

涪陵人崔子方是宋代一位具有较高知名度的《春秋》经传学家、隐士。其主要活动于神宗熙宁年间至钦宗靖康南渡之际，为人贤而有守，好学善问，富赡文采，名辈重之。他的《春秋经解》等三书，辨正三传，独抒己见，自成一家之言，具有独特的学术风采，不仅使儒家典籍中的许多疑问得以晦而复明，而且对近代今文学的复兴也有一定影响。本文从典籍中检得相关文献加以考辨论列，旨在揭櫫其在春秋学、宋学中的地位、影响，以补涪陵历史文化研究之缺。

崔子方；生平交游；春秋研究；影响

宋代是中国文化史、学术史上一个极具特色的朝代，也是“巴蜀文化的一个黄金时代。”[1]（引吴天墀语）涪州学术，尤其如此。自太祖建隆至帝昺祥兴三百年间，不惟有程颐、黄庭坚、尹焞等当世硕学名儒来此著述讲学，留下北岩书院等千古胜迹；更重要的是，在他们的带动影响下，州人中“出现了谯定、崔彦直、夏亚夫①等理学、教育名家。”[2]（3页）上三者，谯定、夏渊与程、黄、尹诸人并称“涪州五贤”[2]（1408页），生平事迹于脱脱《宋史》（中华书局1997年）卷四五九《隐逸传下》、王梦庚、寇宗修纂《道光重庆府志》（1992年巴蜀书社影印本《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集五））卷八《人物志》、吴枫、宋一夫《中华道学通典》（海口海南出版公司1994年）

页989、以及《涪陵市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之《概述》、《大事记》、《文物名胜》、《人物》等部分，均有详略不等的记载。惟有崔子方彦直，因《宋史》无传，《道光重庆府志》不载，故何崇文《巴蜀文苑英华》（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及李有明、陈红涛主编《四川古代名人》（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诸书无法涉及，《涪陵市志》亦语焉不详，只有前引一处仅及其名。而论其学术成就、地位和影响，依笔者愚见，似不在谯、夐之下，实为所谓"五贤"之外又一贤人，且系正宗之"涪州牌"。是以作文标榜。

据《永乐大典》（中华书局1986年版）卷2741第2册1357页"崔子方"条引《仪真志》、朱彝尊《经义考》（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年）卷183引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景印文渊阁本）经部五春秋类《春秋本例提要》（乾隆42年）《春秋经解提要》（乾隆46年）馆臣案引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记载可知：崔子方[②]字彦直，晁说之[③]《景迂生集》又称其字伯直，北宋夔州路涪陵郡（今重庆市涪陵区）人，后流寓淮南，徙居江苏真州[④]六合县南远城之西，号西畴居士。子方为人介直，贤而有守，好学善问，富赡文采。尝与欧阳文忠辨（辩）《芳草涧》诗；为知滁州曾子开作《茶仙亭记》，刻石醉翁亭侧[⑤]；又尝贻书问《春秋》于陆佃，与之"气同声比，不待相见而相知"[⑥]。与苏东坡、黄山谷诸名士交游，尤与晁说之相友善。其《江上逢晁適道》诗云："渺渺连江雨，微微到面风。主人留一晌，佳士得相逢。会面嗟何晚，论诗许有功。君家好兄弟，更觉此心同。"[⑦]黄山谷称之"六合佳士"，朱震[⑧]《进书劄子》又称为"东川布衣"。

崔子方通春秋学，是著名经学家。熙宁（1068－1078）年间，宰相王安石用事，独任私意，不喜春秋之学，斥《春秋》为"断烂朝报"[⑨]。在他执政时期，贡举不以《春秋》，庠序不以

设官，经筵不以进读，时学者以治春秋为讳。而子方独抱遗经，潜心专研，伏读三年，然后知其所书之事与所以书之之意。哲宗元祐元年（1086），司马光执政，在太学设立春秋博士，一度恢复《春秋》取士。至绍圣间（1094－1097），章惇执政，再次取消了这个学官。子方三次上疏乞求复置，未获准许，遂不应进士举，隐居于六合之山⑩，杜门著书，撰成《春秋经解》十二卷、《春秋本例》二十卷、《春秋例要》一卷，以遗子孙。子方著是书时，王安石之说方盛行，故未能彰显于世。至子方辞世、靖康南渡（1127）以后，其书始显，渐为时重。王应麟《玉海》载：建炎二年（1128）六月，江端友曾上书请求到湖州取子方所著藏于内府秘阁，未果。绍兴六年（1136），翰林学士朱震连上劄子复请，八月始由子方之孙平江府崔若上之。

子方三书，取三传而并纠之，直寻经义，自成一家之言。《本例》“大旨谓圣人之书编年以为体，举时以为名，著日月以为例。而日月之例又其本。”[3]（卷27经部春秋类2《〈春秋本例〉提要》）乃条分缕析，定为王、王后、王臣、公、子以至外事、戎狄等十六门。每门又分著例、变例二子目，一一排列“例日”、“例月”、“例时”，盖《公羊》、《穀梁》之学也。有纳兰性德汇刊之《通志堂经解》本。《经解》、《例要》“原本久佚”，由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裒辑其文，依《本例》次序排纂成篇，卷帙书名并遵宋史，以还其旧。前者原与《本例》一体共为二十卷，“大旨与本例相发明”；后者则主从左氏，间取公、穀，考以情理，“大抵推本经义，于《三传》多所纠正。”[3]（卷27经部春秋类2《〈春秋经解〉提要》）三书相为表里，《本例》、《经解》各有自序一篇，《经解》尚有后序一篇具述其疏解宗旨。

崔子方认为，“圣人之有作，欲以绳当时之是非，著来世之惩劝，使人皆知善之可就而罪之可避也。”孔子修《春秋》，是

为寄托政治理想，提出其匡扶天下、经世治国的主张，因而，予夺笔削，寓义宏深，绝非一般的单纯记载史事。作为一部具有拨乱反正意义的政治书，《春秋》义严辞约，以例明义，主要依赖其不同于一般史书的特殊书法——日月褒贬之例来体现其中存在的奖善惩恶、表达政治见解而又“辞之难明”的“微言大义”。即《春秋》大义具见于记事文字的详略：“详中夏而略外域，详内而略外，详君而略臣”；“著日以为详，著时以为略，又以详略之中著月焉”。记事中写明具体日期，就代表圣人对事件的重视即褒，反之则否。他反复强调，此乃《春秋》固有之本，不知此而欲知《春秋》，“是犹舍舟楫之用而以济川瀆者也”；“苟通乎此，则于春秋之义斯过半也”。

子方又认为，《春秋》之为“完经”，以辞、例成书，以情、理託言，文质兼备：“辞与例其文也，情与理其质也”。虽古今异时而圣贤异用，然情之归理之致则一也。故治《春秋》之经，除知道例要外，还应该“合情与理举而错诸天下之事”，“度当时之事以情，考圣人之言以理，情理之不违，然后辞可明而例可通也”，方为“无难”。而世之学者往往“舍情理而专求乎辞例之间，是以多惑而至于失也”。即使以文辞或论说见长的正经三传《左氏》《公羊》《穀梁》，也“于情有不合”“于理有不通”，各有所失：“左氏之失也浅，公羊之失也险，穀梁之失也迂。左氏求圣人之意而不得，一皆以事言之，而略其褒贬，故常取于近而失之浅；公羊谓圣人欲以成后世法，必有惊动人之耳目而难言者，故常志于难而失之险；穀梁谓圣人苟致意焉，不当浅近易知必有委曲而深者，故常求于远而失之迂。”因而，他力主去除三家之短，博考深求，以决学者之疑而复见圣人之意。

子方治《春秋》，不主一门，与时人解释《春秋》纯以“义例”显著不同。《例要》《本例》以日月为本，推明《公》、《谷》，言例重义，接续汉儒，强调必须遵从董仲舒、何休对

“《春秋》立百王之法”和三世说的论述，进而穷究一字褒贬，总结阐发西汉今文经学的微言大义。虽因《春秋》无达例而过泥日月褒贬又推之以概全经，不免墨守穿凿、支离轇轕、委曲迁就之病，然其“要不失为谨严”，对于唐以来啖助、赵匡、陆淳诸人的废例言经，凭臆自用，“亦未始非补偏救弊之道。”[3]（卷27经部春秋类2《〈春秋本例〉提要》）《经解》比较三传之得失，辩正三传之是非，兼取其长，并考诸情理，于三传的夹缝中搜寻经义，独抒己见而不乏精彩，使儒家典籍中的许多疑问得以晦而复明，正确道理得以发挥出来，以裨修己治人之用。

清代四库馆臣有云：“说《春秋》者莫多于两宋。”[3]（卷29《日讲春秋解义》条）四库《春秋》类著录，共114部1838卷。宋人之作，即38部689卷，占三分之一或强。若据《宋史·艺文志》，有关的专著则在二百种以上；《经义考》所考录的宋人著作，更在四百种以上。可见宋儒重视《春秋》，《春秋》经传学为宋之显学。而崔子方与孙复、孙觉、刘敞、叶梦得、吕本中、胡安国、吕祖谦等，“皆其著者”。[4]（250页）其不趋荣利，于新学方炽之时，砭砭然致力于《春秋》，在广泛收集材料基础上，重视考据训诂、钩稽贯串、归纳演绎，力求做到无征不信，笃实严谨，方法上具有近代科学的因素，学风上具有独特的风采。这对经学研究冲破唯古是从的正统思想，活跃学术气氛和《春秋》经传学的初步政治化并最终成为宋学之荦荦大端，无疑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对近代学术尤其是今文学的复兴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注释：

①谯定字天授、崔子方字彦直、晏渊字亚夫。此处名、字错列，未安。

②明代廖用贤编《尚友录》作“子房”，误。

③说之字以道，清丰人。以慕司马光之为人，自号景迂生。元丰间进士，

苏轼以著述科推荐。元祐中，以党籍放斥。后终徽猷阁待制。说之博极群书，善画山水，工诗，通六经，尤精《易传》。有《儒言》、《晁氏客语》、《景迂生集》。《宋史》无传。

④宋大中降符六年（1013）升建安军置，治所在扬子今仪征，辖境相当今江苏仪征、六合地。

⑤据实地考察，今已不存。又，《尚友录》、《经义考》谓子方尝知滁州，误。考《永乐大典》引《仪征志》云及朱震《进书劄子》"东川布衣"之谓可知，子方仅为一介秀才，未曾入仕。

⑥见《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陶山集》卷12《答崔子方秀才书》（第1117册153页）。陆佃字农师，山阴人。熙宁进士，官尚书右丞，罢知亳州卒。佃长于礼家名数之说，尝受经于王安石，而不以新法为是。有《埤雅》、《礼象》、《春秋后传》、《陶山集》诸书。传见《宋史》卷343。

⑦此诗为崔氏孤篇，载见厉鹗《宋诗纪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1056页。诗中"好兄弟"盖指晁以道，诗题中"晁適道"疑为以道从弟，待考。

⑧朱震字子发，荆门军人，政和进士，官翰林学士。以经学深醇著于时，人称"汉上先生"，有《汉上易传》。传见《宋史》卷435。

⑨此说数见。如，苏辙《〈春秋集解〉自序》云："近岁王介甫以宰相解经，行之于世，至《春秋》漫不能通，则诋为'断烂朝报'，使天下士不得复学。"（《四库全书》第148册经部142春秋类）此外，周麟之《孙觉〈春秋经解〉跋》（《四库全书》第147册经部141春秋类）亦有类似记载。

⑩即今江苏仪征、六合界之六合山。

⑪江端友字子我，陈留人。靖康初以吴敏荐召见，赐进士出身，为承务郎。宋升平江军置，即今江苏吴县治。

⑫参马宗霍《中国经学史》，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120页。

⑬此看法不免胶固。《春秋》之例，实为学者就《春秋》经传比较归纳而得。详可参蒋伯潜《十三经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六编第四章所论。

⑭前二段所引，均出自崔氏《经解》自序、《例要》和《本例》自序，分别见于文渊阁本《四库全书》第148册175～176、335、336页。

⑮可参皮锡瑞《经学历史》（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八章"经学变古时代"、沈玉成《春秋左传学史稿》（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八章"《春秋》经传学的进一步政治化"、《魏源集》（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上册《公羊春秋论》等。

参考文献：

[1] 彭朝阳等. 加强巴蜀文化研究，促进西部大开发［J］. 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3).

[2] 涪陵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涪陵市志［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

[3] 永瑢，纪昀. 四库全书总目［M］. 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65.

[4] 皮锡瑞. 经学历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59.

（原载《涪陵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5期，收入本书时有改动）

涪陵学派论纲

学者称为宋代洛学“涪陵学派”的谯定及其川籍门人，兼具伊洛学统和蜀中学统，其学术活动对洛蜀会同、蜀学转型和程朱理学思想体系的构建均曾产生深刻影响，却由于谯定的隐处未显和朱熹的激烈批评而声名不振，长期得不到应有的关注和评价。本文以考述谯定的生平、著述、学术源流为基础，对此作了充分论述。

谯定；涪陵学派；洛学；蜀学；洛蜀会同；程颐；朱熹；程朱理学

一、谯定生平、著述考略

谯定生平事迹，散见于《宋史》、《南宋书》之隐逸本传，程迥《周易古占法・周易章句外编》、曾敏行《独醒杂志》卷7，王象之《舆地纪胜》卷151、174、祝穆《宋本方舆胜览》卷55、61，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8、《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6《道学兴废》、陆游《剑南诗稿》卷19《寄谯先生》及涪陵、长寿新旧县志。且记载互有出入，详略未等。校同参异，约略可知：谯定字天授，北宋仁宗时涪州乐温县（今重庆市长寿区，时属涪州即今重庆市涪陵区）人，以长期隐处，博学擅《易》，人称“涪陵处士”、“涪陵先生”、“谯夫子”。谯定“少喜学佛”[1]（卷459《谯定传》），继而学《易》于蜀人郭

载①。既成，“过武候庙观八阵图，谓必本于《易》。”[2]（卷183“易传”条）熙宁中，谯定隐于岷山青城，饱诗书，以博学教人，人诵其“两轮日月磨兴废，一合乾坤夹是非”之句，称“夫子”。又见其“貌寝陋且怪，长目而广鼻，海口而虬髯，瘿累累络颔下，性直率不自饰，虽冠带，往往爬痒扪虱腰胯间，忽为歌诗，则奇言异句有足骇人耳目者”，以为“古之隐君子。”②元祐间，谯定游于汴京，闻程颐讲道于洛，洁衣往见，造诣愈至，浩然而归。哲宗绍圣四年（1097）十一月，程颐削籍窜涪州，谯定返乡与之同游于北岩山穴，研讨《易》经终日不倦。元符三年（1100）正月，程颐移峡州（今湖北宜昌），旋复宣德郎还洛，谯定亦返洛，隐于嵩山深绝。谯定得程氏之学，有“自立之操”[1]（卷459《谯定传》），“去取不苟，非甘于肥遁者比”。钦宗建康初年（1126），吕好问荐召崇政殿说书，以政见不合力辞不就。高宗建炎初（1127－1128），许翰复荐召赴维扬（今扬州）拜通直郎、直秘阁。定“至维扬寓邸舍，窭甚。一中贵人偶与邻，馈之食，不受；与之衣，亦不受。”[2]（卷146“谯定”条）及诣行在，逢金兵至，又与宰相不合，遂去，丧乱莫知所终。一说复归蜀，隐于青城大面山[1]（卷459《谯定传》）或故县乐温[3]；一说终于嵩山少林寺[4]（卷7《涪陵先生祠记》）。

谯定著述，据许肇鼎《宋代蜀人著作存佚录》（巴蜀书社1986年版第227页）知，有《易传》今已不存，今存者惟一诗一文。文见刘应李《新编事文类聚翰墨全书》（元刻本）辛集卷二，题为《答胡藉溪（宪）论<易>》，仅102字：“某老朽无用，常欲缄口例俗，迂疏之学得遂弃置，私心所尚。然以吾友听过情之问，奋苦学之志，旷心无择主善，而适当风之窍，虽冀泯声，不可得也。示喻‘见乃谓之象’，若如是言，推为文辞则可，于见处则未必。公不思‘象之在道，乃《易》之有太极’

耶？语直伤交，惟冀亮察。”诗收入阮阅《诗话总龟》后集卷七“达理”门，题作《牧牛图》，凡9章。朱熹谓诗前尝有序，“其序略云：‘学所以明心，礼所以行敬，明心则性斯见，行敬则诚斯至。’草堂刘致中（勉之）为作传，甚详。”[5]（卷67）兹据今人周本淳点校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2～43页）抄录于下：

喜见双眸白，通身黑尚全。整思南亩稼，还忌牧童鞭，妄色无轻学，非观已屡悛。回光惟圣道，此外竟何缘？

耳角冰霜洁，须知听不讹。法言缘理辨，邪说自心诃。响外聆微旨，音中味太和。淫荒无复入，非礼莫之何！

白口缠圈索，言非驷莫追。心声休妄发，敬道复何疑？正信通神鉴，渊谈协礼仪。能为天下则，诚自我无欺。

四足虽更白，犹宜鼻索拘。草田方缓执，禾径未相逾。步步无非履，心心向大途。见闻言动事，至此竟何殊！

鼻索何劳执，长鞭已弃闲。大田随俯仰，古道任回环。义草餐清野，仁泉饮碧湾。德纯非用牧，危坐对层山。

一饱心休息，安眠百不知。有形随处寄，毋意复何疑！用舍非关念，优游绝所窥。相忘人世外，惟有牧童儿。

圈索虽牵执，从兹牧者亡。何心拘小节，平步蹈中常。饥饱随时过，行藏任运将。青山春草绿，逢处可充肠。

日暖随方去，天寒隐有余。当行非侯牧，可止便安居。饮食和粗细，周旋契疾徐。杖几虽运用，岂外是如如。

相尽云何故，心融孰是牛？我人依妄立，学行假名修。不见当选迹，宁知有后由。鞭绳应到此，聊为且□留。

（周校：“□”原作“有”，当误，从清抄本缺，疑为“存”字。）

二、谯定的学术渊源及涪陵学派之形成

谯定的学术思想，由于他的著述大多数散佚，很难作具体阐

说。但其学术渊源，据史传记载及其残存诗文以及朱熹对谯定学术的零散评论看，大致是清楚的。

1. 释氏佛学

《宋史》本传称谯定“少熹学佛”，并“析其理归于儒”。而在其遗存作品中，又有《牧牛图》诗九章。《说文》云：“牧，养牛人也。”《周易·谦卦》“谦谦君子，卑以自牧”王弼注云：“牧，养也。”养牛必看守，故“牧”于人即持守、修养之义，是一种强调内心体认的修养工夫。至佛经中，“牧牛”则常以比喻牧人，专讲心地修炼，《阿含经》之“牧牛十二法”、成就比丘的“牧牛十一法”之类是也。谯作《牧牛图》诗，提倡“见性”、“明心”，契合禅宗主悟，亦复如此。刘勉之《传》云：“一章言其崇明礼法”“非礼勿视”，“如牛双目变白”；“二章言其外屏非闻”，“非礼勿听”，“如牛耳变白”；“三章言其诚谨辞气”，“非礼勿言”，“如牛唇口变白”；“四章言其遵守礼法”，“非礼勿动”，“如牛四足变白”；“五章言其学习美成，礼法文质”，“如牛首尾变白”；“六章言其抑为不厌”，“超然凝绝”，“如牛全白，纯一不杂”；“七章言其逆顺难测，混同体用”，“犹如白牛，虽带圈索，已无牧人”；“八章言其仕止久速，咸契所宜”，“犹如白牛随方运动，饮食无系”；“九章言其无方无体”，“与道混融”，“犹如无牛可得，惟存鼻索”[6]（后集卷七“达理”门），正是体现了典型的佛家思想。这在后来朱熹对谯定“颇杂佛、老子之学”[7]（卷30《与汪尚书》末书）的评论中也可得到印证。

2. 郭载易学

蜀人尚善治《易》，源远流长，自古有名。自汉至唐，即有严君平精《大易》，扬子云作《太玄》，李鼎祚撰《周易集解》闻名于海内。入宋以后，巴蜀成为文化最发达地区之一，《易》学尤为勃兴，解易之风遍及民间，研究水平居各域前列：陈抟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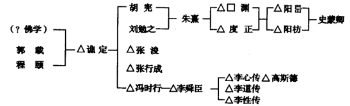
《先天图》、《无极图》创先天易学，东坡父子撰《苏氏易传》，龙昌期撰《周易祥符注》等，治易深达微奥自不必说，即如酱翁蔑叟，亦能让人大有所得。故云："《易》学在蜀"[1]（卷459《谯定传》引程颐语）。蜀中易学，不仅有《易传》的多种流派，更有一批杰出的《易》学家。郭载便是其中之一。载家于南平（今重庆綦江），始祖在汉为严遵（君平）之师，世传《易》学，精通象数。郭载易学则传自君平（见注①引），而授之谯定。《宋史》云，谯定"学易于郭曩氏，自'见乃谓之象'一语以入"；朱熹又说，其师刘勉之师事谯定，即因闻言谯定"从程夫子游，兼邃《易》学"，而谯定则对伊川所讲《易》学，"似不以为然"[7]（卷30《与汪尚书》末书）。可见，谯定《易》学建基于郭载，造诣颇高，独立于程颐之外，蜀中学者郭载应是谯定学术思想的一个重要来源。

3. 二程洛学

谯定与程颐关系密切，且得程颐之传。其从学程颐的地点、次数，虽然诸书记载有异：《周易古占法·周易章句外编》、《独醒杂志》卷7、《朱熹集》卷30《与汪尚书》末书等以为，谯定是在绍圣四年至元符三年程颐"编管"谯定家乡涪州时始识程颐，在涪州长江北岸的北岩山普净院向程颐论学请教，只有这一次问学经历；《宋史·谯定传》等则以为，在之前的元祐七年（1092）至绍圣四年（1097）十一月谪涪，程颐官崇政殿说书、判西京国子监祭酒居住洛阳期间，谯定闻伊川讲道于洛，曾从汴梁到洛阳向其问学求教，"伊川授其学以《大学》、《中庸》，而指其法以'敬'"，谯定"悦之，弃家破产疲曳妻子以从之游"[4]（卷7《涪陵谯先生祠记》），获闻治学修身的"主敬"工夫，还有一次问学经历。但有一点记载相同，即谯定曾在涪陵向程颐深入学习理学，且得闻精义，达到了很高的造诣。

谯定既是程门高徒，学兼佛儒，又师承蜀中学者郭载，长于

《易》理，因而成为“为时尊敬”[8]（卷8《跋青城赵日休居士文》）的理学家，有不少学者从其问学。《宋史》本传谓：“定《易》学得之程颐，授之胡宪、刘勉之，而冯时行、张行成则得定之余意也。”朱熹《少师保信军节度使魏国公致仕赠太保张公行状》又云：“时渊圣皇帝（钦宗）召涪陵处士谯定至京师……公（张浚）往候见至再三，定开关延入。公问所得于前辈者，定告公但当熟读《论语》。公自是益潜心于圣人之微言。”[7]（卷95）故《宋元学案》以谯定为“程门一大宗”[9]（卷30《刘李诸儒学案》），详列其学术源流：门人胡宪、刘勉之、张浚、冯时行、张行成等；再传朱熹、李舜臣等；三传、四传更是遍及全国各地，尤以蜀人居多。继此，杨金鑫先生提出，按照传统说法，就宋代学派的地域而言，二程洛学分为七派，其中“在四川有谯定的二程之学，即涪陵学派”[10]。胡昭曦先生又综合诸书所载，表列出谯定“涪陵学派”之主要成员（表中带有“△”符号的宋代四川人）及其学术源流：[11]



说明：

1. 胡昭曦先生原表郭载前有“△”，标明其为涪陵学派成员。但据杨金鑫先生在提出“涪陵学派”概念时的界定，所谓涪陵学派，是指宋代四川谯定的二程之学，郭载与伊洛之学了无关涉姑置不论，谯定为该派开祖之义甚为明确。故此取消“△”符号，不将郭载入派。

2. 为与前文一致，完整显示谯定学术渊源，列表中增加了胡表原无的“？佛学”一栏。

三、涪陵学派影响论

尽管谯定留下的著作很少，学术地位却不低，由他所开创的涪陵学派是宋代传播程朱理学的重要派别之一，在当时具有较大的学术影响：

（一）谯定之学通过其本人和门人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程颐、朱熹的思想而参与了程朱理学宏伟体系的构建，从而对中华民族学术思想产生全局性影响。

1. 对程颐《易传》的影响

程颐自哲宗绍圣四年末“编管”涪州，至元符三年春移峡州“任便居住”，在涪州生活两年有余，一直住在长江北岸北岩山的普净院。“北岩山石壁有洞，宋程伊川注《易》于此”[12]（卷2），完成了他最重要的学术著作《周易程氏传》（或称《程氏易传》、《伊川易传》），并授学于当地学者谯定，故《宋史》有谯定《易》学得之程颐之说。其实，这种说法极不准确。如前所述，谯定《易》学自然有其宗奉伊洛所得，但最重要的成分恐怕还是四川的传统易学。对于蜀中治《易》的传统，程颐自是非常重视。早在嘉祐年间（1056－1063），程颐从任官合州（今重庆合川）的业师周敦颐及与周有长期交往的傅耆等人那里已经对蜀中易学有所了解；治平四年（1067）至熙宁三年（1070）间，程颐随侍父珦知汉州（今四川广汉）时曾过成都，遭遇蔑叟挟《易》发问而“涣然有所得”[1]（卷459《谯定传》），又对“蜀易”之发达有了切身感受；大约在元祐绍圣时期，以《易》学见长的谯定到洛阳听程颐讲道，程颐自然进一步从谯定那里得知蜀中易学研究的进展和现状。也就在这时，“袁滋入洛，问《易》于程颐，颐曰：‘《易》学在蜀耳，盍往

求之？'"[1]（卷459《谯定传》）这里，程颐所云"易学在蜀"，完全可以理解成其基于对蜀易传统和现状的了解所做出的结论，也极可能就是对眼前来自蜀中的对易学研究有深度、有特色的学者谯定的指称。谯定于《易》学有自己独立的渊源和见解，精于象数，自成一家，并著《易传》于程颐之前③。而程颐在涪陵时，"欲与（谯定）同修《易》书"[13]（《周易章句外编》）；离开涪陵时，又"约以同居洛中"[7]（卷30《与汪尚书》末书）。故谯定易学似不让于程颐，其与程颐在北山岩"师友游泳其中"[1]（卷459《谯定传》），就易学而言，实当为共同研讨与切磋。这对此间程颐的注《易》不发生影响几乎是不可能的，甚者，这种研讨切磋本身也就是当时谯定协助程颐注《易》的方式。尽管目前我们还没有文献依据来说明其切磋内容和这种影响之具体所在。

2. 对朱熹思想的多元影响

朱熹虽然一生未能踏足四川，却与植根巴蜀大地的学术文化有着广泛而密切的学术联系。其受到谯定的学术影响，主要是通过早年所师事的父挚胡宪、刘勉之来实现的。同时，朱熹也通过对谯定的川籍门人冯时行、张行成、张浚等的思想接触，而可能受到谯定学术的进一步影响。

①朱熹以师事刘勉之、胡宪受到谯定思想的多方面影响

从谯定到刘勉之、胡宪，固然不是朱熹主要学术观点的直接师承，但确为朱熹在学术成长过程中的重要师承，为其后来师事李侗得二程之学、入纯儒之宗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其对朱熹学术思想的影响是不能忽略的。绍兴十三年（1143），朱熹父朱松病逝，临终前，托孤于好友"武夷三先生"胡宪、刘勉之、刘子翚。朱熹受业于胡宪及二刘十数年，其中事胡宪"为最久"[7]（卷97《籍溪先生胡公行状》），刘勉之"教诲熹如子侄"，且将长女配与朱熹[7]（卷90《聘士刘先生墓表》）。而胡、

刘二人心向洛学，均系谯定门人。朱熹《聘士刘先生墓表》云，刘勉之"闻涪陵谯公天授尝从程夫子游，兼邃《易》学，适时以事至京师，即往叩焉，尽得其学之本末。"其《籍溪先生胡公行状》又云，胡宪"客彼洛阳"时，亦曾备下束修"踵门升堂"，"学《易》于涪陵处士谯公天授，久未有得，天授曰：'是固当然，盖心为物渍，故不能有见，惟学乃可明耳。'先生（胡宪）于是喟然叹曰：'所谓学者，非克已功夫也耶！'"刘、胡二人从谯定那里得到伊洛之传，深入学《易》，比较全面地继承了谯定思想，并将其传授给朱熹，从而对朱熹思想历程的发展产生多方面影响。

其一：《易》学方面

谯定《易》学深邃，在刘、胡二人心目中有崇高地位和独立于伊川之外的特殊价值。二人从谯定，除上溯伊洛之学外，学习"谯易"是又一重要目的。因而，谯定的象数易学思想必然是其授学朱熹的重要内容。这不仅可以从朱熹言论中得到证实，而且对朱熹《易》学思想的衍进具有显著意义。它造成朱熹一方面推崇程颐《易传》而俨然《易》学义理派，但同时又耽嗜象、图的复杂性和最终通过周敦颐转而倾心象数《易》学，作《太极图说解》的重大转变。因为正如有的学者所说，谯定概括的"象之在道，乃《易》之有太极"一句，"几乎可以说是周敦颐一篇《太极图说》的方法论大纲"，"朱熹作《太极图说解》的最初思想源头正是从这里获得。"[14]

其二："牧牛"思想

如前所述，谯定"少喜学佛，析其理归于儒"，思想中含有佛老成份，并有儒佛比附融合倾向。所作《牧牛图》诗，即以佛学"牧牛"，结合《周易》"自牧"和有关儒学思想，倡导内心体认、主体自觉。胡宪、刘勉之二人同学谯定，深受影响，刘勉之还为《牧牛图》诗作了详注，再传于朱熹。因而，朱熹在

师事李侗前，曾长时间出入佛老之学，绍兴二十年（1150）至二十五年（1155）更直接师事道谦，学习径山宗杲派佛儒融合、宣扬三教有同的主悟禅学，取“牧斋”为书室名，作《牧斋记》、《牧斋净稿》，进行读书探道的艰苦“自牧”④。朱熹后来对门人讲：“释氏言牧牛，老氏言抱一，孟子求放心，皆一般。”[5]（卷126）虽然佛老之理“空”而儒家之理“实”，但它们在为学修养的方法上自有相通之处。从这个意义上看，朱熹的“牧斋”生活就不能说没有谯定“牧牛”思想的影响。谯定思想的佛学成分对朱熹的思想历程就不能不烙上印迹。

②朱熹以接触、研究冯时行、张行成、张浚等谯定门人学术而受到其《易》学思想的进一步影响。

朱熹受谯定影响，得谯定“余意”的冯时行（巴县人⑤）、张行成（临邛人，今属四川）也可能是一条途径。冯时行“传谯定之《易》著”，继承谯定的象学思想，做了画卦并重的发展，“有《易论》二卷，尝言‘易之象在画，易之道在用。’”[15]（《冯时行传》）又曾“与曾开，朱松等极言和议之非”[2]（卷7），忤秦桧坐贬。朱熹从好友汪应辰、张栻处得闻冯时行的一些情况后，亲读冯氏文集，以为“其论皇极，深合鄙意”[7]（卷72《皇极辨》），赞其“博学能文”，“议论伟然”，对冯深表推重，“尤恨不得一见其面而听其话言也”[7]（卷84《跋张敬夫与冯公帖》）。以至冯下传李舜臣所著《易本传》（佚），亦为朱熹晚年“每为学者称之”，所著《周易本义》还“多取之”[16]（卷14《赠甥李松坡天瑞序》）。张行成则继承了谯定象数《易》学中的数学内容，并结合探索邵雍数学，“以通诸《易》之变”[17]（卷49张行成《进易书状》）。其于乾道年间（1165－1173）至成都府路钤辖司干办公事致仕后，杜门十年潜心易学，著作《周易通变》（40卷）、《周易述衍》（18卷）、《潜虚衍义》（16卷）、《翼玄》（12卷）、《元包数总义》（2卷）、《皇极经世索

引》（2卷）、《观物外篇衍义》（9卷）等7种凡99卷，达到了很高的成就，"遂成一家"[9]（卷78《张祝诸儒学案》）。隆兴元年（1163）孝宗即位之初，朱熹好友汪应辰入蜀，曾举荐张行成⑥。大约就在这时，通过汪应辰，朱熹对张行成之学已经有了一定接触和了解，后来他还说："《潜虚》后截是张行成续，不押韵，见得"[7]（卷67）。朱熹重视象数的《易》学思想，也应该包含着来自张行成的影响。

此外，从学过谯定的张浚（绵竹人，今属四川）和受张浚影响的张栻也使朱熹受到谯定的影响。张浚曾从谯定问学，"一本天理，尤深于《易》"[7]（卷95《张浚行状》），著有《紫岩易传》、《论易数》、《论刚柔》等。其论《易》之"数"与"刚柔"，与谯定所谓"通此一句（指'见乃谓之象'），则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通"[5]（卷67）的思想，颇有近似之处。而在政治和学术上，张浚又深得朱熹的敬重与关注，故朱熹很可能通过直接接触和研究张浚思想而受到谯定学术一定程度的影响。至于张栻南轩之学，虽禀承五峰胡宏而宗奉二程，又得东坡再传，但亦得之于乃父张浚。而张栻与朱熹"吻志同而心契"[7]（卷87《又祭张敬夫殿撰文》），自隆兴二年（1164）在豫章（今江西九江）到丰城张浚灵舟中论学始，至淳熙七年（1180）张栻在谭州（今湖南长沙）辞世，有着长达17年的学术交往。二人或"胜游朝挽袂，妙语夜连床"[7]（卷5《有怀南轩老兄呈（范）伯崇（林）择之二友二首》），或激烈论争"三日夜而不能合"[18]（卷1），几乎在其治学的每一个领域都有讨论，尤其是在关乎理学的一些根本问题上进行了深入充分的交流。作为朱熹"生平相与切磋得力者"[9]（卷50《南轩学案》）中所最为佩服的人，张栻与朱熹相互发明，使在直探孔孟以求道成圣路上、思想正处于渐趋成熟的关键时期的中年朱熹"心开目明"[7]（卷32《答张敬夫》）、"反复开益"[7]（卷42《答石子重》），对朱

熹理学体系的形成有极大影响⑦。而这种影响中，理应包含有张栻受到的张浚来自谯定的学术影响的成分。

（二）谯定及其门人学习传播理学，促成了洛蜀会同、蜀学转型及南宋中后期在川东的复兴，并由于其中部分学者的外迁而对浙江局部地区学术文化发展起到了推进作用，具有突出的地域影响。

1. 谯定、“井研四李”、夏渊、度正等人学习传播理学，促成了洛蜀会同与蜀学转型

所谓“洛蜀会同”、“蜀学转型”，主要指以程颐为首的洛学和以苏轼为首的苏氏蜀学，从激烈斗争到融合会归，蜀学由以苏学为主转而以程朱理学为主的转变。本来，洛、蜀二学皆以儒为本，是儒学复兴的产物，颇有相通之处。相对王安石“新学”而言，又同被视为“元祐学术”，一度备受打击。但在对“礼”的理解上，尤其在对佛道“异端”的态度方面，二者又存在诸多差别，有的甚至不可调和，遂由程、苏二学之争渐衍为洛、蜀二党之争，所谓“洛闽诸儒，以程子之故，与苏氏如同水火”[19]（卷11《东坡书传》）。孝宗以后，洛学进入“乾淳之盛”，占居主动，朱熹追修洛蜀旧怨，于苏氏兄弟攻击如仇，谓“苏氏之学，坏人心术”[20]（甲编卷2“三苏”条），将苏学斥为“流于异端”的“杂学”[21]（卷72《杂学辨·苏黄门老子解》），对苏学进行了系统的清算，并多方面有选择地会融吸收了以苏学为代表的蜀学学术成果，“合众理而大备于身”[7]（卷31《答张敬夫集大成说》），形成程朱理学。蜀学遂由北宋中期第一次高潮的以苏学为主转而进入南宋中后期第二次高潮的以程朱理学为主。

在洛学入蜀、蜀洛会同的过程中，谯定是较早且贡献卓著的学者之一。谯定早先从郭载学习象数，深邃易学，在四川地区有较大影响；同时又宗奉伊洛之学，不仅由汴赴洛求教于程颐，程颐贬涪带洛学入蜀时又从游问学，助其完成《易传》。尤为不易

的是，徽宗崇宁以后，在蔡京擅权，“元祐学术”被视为“邪说”，“追毁程颐出身文字，其所著书悉令监司察觉”[1]（卷19《徽宗纪》）的政治压力之下，谯定就在汴京和洛阳向当时还是青年太学生的胡宪、刘勉之传授二程之学和蜀中易学，并在后来对朱熹等产生影响而成为“程门一大宗”。谯定学术渊源既有蜀中学统，又有伊洛学统，而且由蜀中学统转向伊洛学统。从谯定揽精集粹汇于一炉的学术变化，可见洛学入蜀、洛蜀会同之一斑，其亦确为“其中突出的人物”。[22]（39页）

谯定之后，在传播理学，促使蜀学转型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涪陵学派成员首推“井研四李”李舜臣及其三子李心传、李道传、李性传。李舜臣师从谯定门人冯时行，既得程氏洛学再传，亦有蜀中宿学，注重家学相传，“一庭相为师友”。其父子四人均研治传播理学，被称为“一家理学，共仰儒宗”[23]（卷10）；李舜臣的《易本传》与朱熹《易本义》互为表里，朱熹“独称之”[5]（卷首：李性传《饶州刊朱子语录续录后序》）；李心传的《道命录》与朱熹《伊洛渊源录》相伯仲，是程朱理学的简史；李道传、李性传致力辑汇朱熹语录，先后刊于池州（今安徽贵池）和饶州（今江西波阳），是后来《朱子语类》的初编本。此外，李道传还上书朝廷为理学名儒请谥，希望将周、程、邵、张等理学家从祀孔子庙；李心传则发展义理史学，写出了在史学上很有价值和地位的史学著作《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与此同时，还有一些涪陵学派学者慕朱子之名东出夔峡，不远万里直接师从朱熹，然后将程朱理学回传巴蜀。著名者有旻渊（涪州今重庆涪陵人）、度正（合州巴川今重庆铜梁人）。旻渊先从蜀中学者李焘，绍熙四年（1193）复于建阳、长沙从朱子学，是朱熹川籍门人中记有其语录的惟一一人，所录为《易说》一编，今存452条，散见于今本《朱子语类·易类》各目之中。度正、阳枋说，“熹之门人众矣，惟渊从之为最久，闻其言为最

详，记其说为最备，故其得之为最精"[24]（卷5《权夔宪举夏亚夫遗逸状》），且"尽得其学以归"[8]（卷8《莲荡先生坟亭记》）。夏渊后讲学涪州北岩书院®20余年，"问《易》考亭，得《易》涪乡，见知闻知，融明方寸"[8]（卷9《涪陵北岩秋祀祝文》），将朱熹《易》学与乡里之学（包括谯定《易》学）融会贯通，形成有自己特色的《易》学思想，成为朱门中较有造诣的理学家，蜀士慕从之游。度正"于庆元三年（1197）问学于考亭（朱熹）"[25]（210页），在理学上也有较高造诣，著有《周濂溪先生年谱》，且在宣扬和维护朱熹之学上非常突出，被同门称为"守师道如守孤城"[26]（卷7《跋性善堂后集》），"吾党第一人"[9]（卷70《沧州诸儒学案下》引叶贺孙语）。夏渊、度正之学后下传阳枋、阳岊，代不乏人。要之，由于有谯定、"井研四李"等几代涪陵学派学者自哲宗元祐（1086－1093）至理宗绍定（1228－1233）前后一百五十年，尤其是孝宗、光宗、宁宗三朝以讲学、撰著、请谥等多种方式大力传播理学的努力参与，蜀学的发展顺利完成了从以苏学为主到以理学为主的转型，并从两宋之际的低谷期逐渐进入孝宗以后的再盛期。

2. 宋蒙战争造成川西地区学者流散浙江，蜀学重心向川东转移，涪陵学派在阳枋之后渐趋式微

由于历代行政建置和自然条件等原因，巴蜀地区的学术重心向来在川西平原及其周围一带。但这种情形在蒙古灭金后的南宋后期发生了变化。宋理宗端平二年（1235），蒙古大军攻宋，并以攻蜀为战略重点。"宋之将亡，蜀先被兵"[27]（卷6《邵庵先生虞公（集）行状》），蒙古军队"屠成都，焚巴州"，"青烟弥路，白骨成丘"，"西州（川）之人十丧七八"，"昔之通都大邑，今为瓦砾之场；昔之沃壤奥区，今为膏血之野。"[17]（卷84吴昌裔《论救蜀四事疏》）因了成都的残破，淳祐二年（1242）末，南宋朝廷不得不把四川制置使司由成都迁至重庆，并任命余

玠为四川安抚制置使知重庆府，任责全蜀事务，重庆成了四川的政治、军事中心，川西则沦为蒙宋拉锯争战之地。这时，学术文化发展赖以依存的政治稳定局面和文化教育设施等基本条件，在川西地区已经基本失去，学者没有了安身立命之所。川西籍的涪陵学派学者，由于战争，在川的不得不狼狈奔走以保遗息，而川外游宦之士也只好望蜀兴叹，流寓他乡——李心传约于嘉熙元年（1237）冬举家从井研迁至湖州霅溪（今浙江吴兴）；李性传宝祐二年（1254）以咨政殿大学士致仕后因战乱不能归蜀也寓居霅溪；高斯德（邛州蒲江今四川蒲江人）德祐二年（1276）年元兵陷临安时由于同样的原因而遁隐那里⑨——所谓“衣冠流散，而蜀之文章萃于东南。”[28]（卷6《隆山牟先生文集序》）随着李心传等人迁居浙江，他们的学术文化也随之传播当地，陶铸人才，推动了迁居地的学术文化发展和地域性文化的交流，而川西一带的学术却因此急速衰萎。

较之川西地区，当时主要属于夔州路的川东地区在咸淳十年（1274）蒙军大举进攻以前的三十年间则战争较少，社会相对安定，学者仍然可以设馆招贤，继续其学术生涯，使经过谯定、冯时行，戛渊、度正等人接踵努力已经发展起来的学术文化仍然基本存于当地并持续有所发展。其中最为活跃的就是人称“大阳先生”的合州巴川（今重庆铜梁）籍涪陵学派学者阳枋。阳枋为朱熹嫡传，在学术上长期师从度正、戛渊，得《易》学甚多，著有《字溪集》12 卷（11 卷，附录 1 卷），并类编《晦翁诗谱》、《文公语录四书》、《伊洛心传录》、《朱文公〈易〉问答语要》、《文公进学善言》（五书皆佚）等传学桑梓。嘉祐二年（1238）后，阳枋辗转避地南川、涪陵、清溪，又应蜀守余玠之请，分教广安、绍庆（今重庆彭水），累任省试别院考官。淳祐十一年（1251）至宝祐三年（1255），尚以古稀高龄主教于涪陵北岩书院，汲引后学，养育人才，大力传播理学，及门从游者甚

众。阳枋终生孜孜力学，至老不衰，凡诸子百家，天文地理，医药卜筮，莫不博考穷究，不仅是当时川东地区最著名的学者，也是当时巴蜀全境最著名的学者。恰如其从子阳昂所说，在四川"考亭之后，有度、夏，由度、夏而来，我叔父字溪（阳枋）一人而已。"[29]（卷28《静清处士史君墓志铭》）。正是由于阳枋以及阳岊（"小阳先生"）等涪陵派学者广泛积极的学术活动，才使得川东学术在川西学术的衰隐中凸显出来，川东地区一时成为四川学术重心之所在。然而，由于"二阳"年事日高和战争的日益临近，这样的情况并没能维持长久。咸淳三年（1267），阳枋谢世；咸淳十年（1274），元世祖正式颁发平宋诏书，元军在川东地区展开大规模进攻，川东地区同川西地区一样深陷血火。在这样的双重打击下，涪陵学派及其所支撑的川东学术，就此式微。

四、涪陵学派衰隐原因分析

谯定及其涪陵学派，从哲宗元祐绍圣年间谯定于洛阳、涪陵从伊川习传洛学起算，至南宋末该派最后一个堪称大家的学者阳枋辞世，前后共五代学者，绵历近两百年，是宋代以蜀易见长传播程朱理学的重要学派之一。其主要成员张浚、张行成、冯时行、"井研四李"、夏渊、度正、"二阳"均为当时比较著名的学者，开派人谯定则更是"程门一大宗"，具有很高的学术地位和影响。正因如此，谯定生前于北宋末南宋初两度受到朝廷征召；孝宗隆兴初年逝后，时守涪陵的程颐之孙又"念其祖而欲崇其徒，奖其先贤而欲风励其后来者"[13]（《周易章句外编》）兴修谯定祠，供乡人崇祀。然而，在宋代以后元明两朝长达三、四百年的时间里，谯定诸人却少有论及者，专门的研究显得相当沉寂。个中原因，拙见有二：

1. 朱熹基于卫道立场对谯定学术的偏激批评，大大贬低了谯定的学术地位，削减了谯定在文人士林中的影响力

谯定学术虽然对朱熹思想的发展有着较大的影响，但其渊源于郭载象数《易》学的对《周易·系辞上》第十一章“见乃谓之象”一句的重视与独特阐发却招致朱熹的强烈不满和尖锐批评。朱熹认为，“见”句只是《周易》中极普通、并不难理解的一句话：“见本音现”，意即出现、显现，“象”则“只是说那动而未形，有无之间者‘几’底的意思。‘几’虽是未形，然毕竟是有个物了。”[5]（卷67）“见乃谓之象”义即事物变化过程中显现在外面的一种状态、一种征兆，称之为象。由“见”至“形”，就是由“象”至“器”，是一种“生物之序”，这是原话的“本意”[30]（卷3）。而朱熹从胡宪那时所知道的谯定对该句的理解却是：谯定不仅讲“见”如字意，是见到、知晓、明白的意思，读为 jiàn，而且把“见乃谓之象”的“象”（指具体的卦象、爻象）与“象之在道，乃《易》之有太极”的“象”（总括、主宰义）做了同一规定，认为“见乃谓之象”就是见象明道，只要懂得了象，也就明白了《易》道。谯定如此理解“见乃谓之象”，远远超出了它的本意，使之具有了《易》学纲领的性质，因而格外重视。这对于同样重视探寻《周易》本义的朱熹来说，自然是不能接受的。并且，由于二人对这“一言半句”[5]（卷67）的理解不同，他们在学《易》的顺序上产生了很大的分歧，谯定主张学《易》当如郭载教他那样，“自‘见乃谓之象’以入”，只要领会了这纲领性的句子，就能卦爻皆通；朱熹恰与此相反，认为应该逐字逐句地理解具体的卦爻之义，进而最终明白圣人作《易》之意。而这样的分歧，又进一步暴露出二人在如何格物穷理这一重大理论问题上或由理一而贯分殊或由分殊而上升到理一的认识差异，具有了“鹅湖之会”朱陆分歧、聚讼失和的意义。基于这样的学术背景，以远绫孔孟、近接周程自命的朱熹就不能不对谯定给予严厉批评，谓其“不得师之说”[5]（卷101）、“非学问正脉”[7]（卷3《与程允

夫》首书)、"不知其所谓卒业者果何事耶","恐未得以门人称也"[7](卷30《与汪尚书》末书),认定谯定没能在程颐那里拿到毕业证书,将谯定与程颐的关系由"门人"变成私淑,把谯定逐出了程门,在乾道九年(1173)撰成的《伊洛渊源录》中遂不为谯定立传。朱熹对谯定学术的这种为争"正学"而欠公允的态度及其由坚定的卫道立场出发所作的偏激批评,虽然也遍施于程门其他弟子,并非仅仅针对谯定一人,固然无损于谯定在程门中的已有地位,但对后世的影响却是十分深远的[⑩]。

2. 谯定长期隐处不仕和研究者受学术惯性影响形成的研究盲区使后人难以睹其学术真貌

蜀士多奇。"蜀人虽知向学,而不乐仕宦。"[31](卷4)这似乎是蜀中学者的一个传统。谯定基本《易》学思想所自从来的郭曩氏便是"隐君子"[1](卷459《谯定传》),谯定也是如此。他一生长期隐处,交游甚少,虽然一再受到朝廷征召,均因政见不合,未有正式任职而不及"通显"[32](甲集卷6《道学兴废》),故有关记载较少,著述散佚颇多,使后人难得了解其学术思想。加之论宋代理学者往往偏重闽、浙显要学者,而论宋代蜀学者又往往囿于"巴武蜀文"之传统成见,多注意学者较为集中的成都、眉山地区,对僻处川东的学者视若不见,致谯定诸人容易成为研究上的盲点。即或偶有注意者,也可能因为资料匮乏产生的畏难情绪和学术惰性而放弃,或者面对朱熹对其学术的明确尖锐批评,以缺乏承担学术风险的勇气故而简单信从了朱熹。

应该是主要由于上述原因,致使谯定长期不为后人注意,其著述、思想也几至湮晦。直到康熙朝清儒纂修《宋元学案》,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才发现谯定是不可忽视的重要理学家,在当时四川乃至全国都有较大的影响。又过了三百年,直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始有杨金鑫、胡昭曦、粟品孝等严谨诚正、富于开创

性的学者远绍前贤，拨云见日，正式提出谯定“涪陵学派”的概念，并将其作为宋代理学研究的重要对象给予关注，以期还历史以真实面目，给谯定及涪陵学派一个确当的“说法”。显然，这后面还有相当漫长艰难的一段路要走。因为对谯定思想、学术的细致探究和深入剖析，既是谱写新篇，又要修正错误，而修正错误往往会比谱写新篇倍加费力，何况这一修正在一定程度上还不得不面对巨儒朱熹。

注释：

①郭载，《宋史》（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年二十五史本）卷 459《谯定传》失其名，云：“（谯定）学易于郭曩氏，自‘见乃谓之象’一语以入。郭曩氏者，世家南平，始祖在汉为严君平之师，世传《易》学。”然清嘉庆常明、杨芳灿纂修《四川通志》（巴蜀书社 1984 年版）卷 183“易传”条云：谯定“尝受《易》于羌中郭载”，“载告以‘见乃谓之象’”，“郭本蜀人，其学传自严君平”。故“郭曩氏”应即郭载。程迥《周易古占法·周易章句外编》（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黎靖德《朱子语类》（中华书局 1986 年点校本）卷 67 亦作“郭载”。

②此段材料载明人傅振商《蜀藻幽胜录》（巴蜀书社 1985 年版）卷三所收宋代周表《焦夫子碑记》。世人恒不知“焦夫子”为谁，也未将其与“谯夫子”定联系起来。然细考《碑记》“蜀之故老传岷山有焦夫子，国初时人，亡其名。”“熙宁中，吾乡贤士文与可（同）游天彭，馆倅舍之徐公园，杯酒笑谈中，忽放笔绘夫子之像于学之壁，不敷笔而成之”等语，实与《宋史·谯定传》谓“（谯定）爱青城大面之胜，棲遁其中。蜀人指其地曰谯岩，敬定不敢名，称之曰谯夫子。有绘像祀之者，久而不衰”云云多所谋合：虽一曰“焦”，一曰“谯”，焦、谯本一声之转，况有王质《涪陵谯先生祠记》（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雪山集》卷 7）谓定“隐居青城之老人村，易姓”之说；虽一曰“岷山”，一曰“青城”，然杜光庭《青城山记》（民国十八年壁经堂丛书本）云：“岷山连峰接岫，千里不绝，灌县青城山乃其第一峰也”，文与可以游天彭而念夫子绘其像，见夫子隐于天彭一带，天彭即灌县西北灌口山有两石相立

如阙之天彭阙，与青城山连接一体，同属岷山；又有绘像之事同。且由陆游乾道六年至八年（1170－1172）在蜀所写《寄谯先生》（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剑南诗稿》卷19）诗序称其"今百三十余岁犹存"逆推，谯定约当生于景祐宝元年间（1034－1039），距太宗太平兴国四年（979）宋灭北汉一统天下五十左右，称"国初时人"也通。故疑"焦夫子"实即"谯夫子"，将《碑记》相关材料且系于此。

③据胡昭曦《析"易学在蜀"》（载河南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宋史研究论文集》）一文对宋代四川地区易学研究的学者和著作所列表，谯定著《易传》于仁宗朝，至迟不晚于嘉祐八年（1063）。而程颐《易传》则是元符二年（1099）正月在涪州完成（《二程全书·伊川易传序》，1936年中华书局四部备要铅印本）。

④参见福建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束景南《朱子大传》第88－111页。

⑤冯氏籍贯旧有璧山、巴县及恭（州）南之洛碛诸说，今据胡问涛、罗琴《冯时行及其<缙云文集>研究》（巴蜀书社2002年版）所考。详该书第271－272页。

⑥见汪应辰《文定集》卷6《荐张行成札子》，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⑦详见杨天石《朱熹及其哲学》，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5－27页；侯外庐《宋明理学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上卷第370、322页。

⑧北岩书院，即昔程颐谪居之普净院，宋宁宗嘉定十年（1217）由知州范仲武改建。见祝穆《宋本方舆胜览》卷6，199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曹彦约《昌谷集》卷19《朝议大夫直焕章阁范季克（仲武）墓志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⑨见《宋史》卷438《李心传传》、卷419《李性传传》、卷409《高斯德传》及卷47《瀛国公纪》。

⑩详见粟品孝《朱熹与宋代蜀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43－149页。

参考文献：

[1] 脱脱，等. 宋史［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二十五史本，1986.
[2] 常明，杨芳灿，四川通志［Z］. 成都：巴蜀书社，1984.
[3] 长寿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长寿县志［Z］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7. 1130.
[4] 王质. 雪山集 [M].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Z].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5] 黎靖德. 朱子语类 [M]. 长沙：岳麓书社杨绳其、周娴君点校本，1997.
[6] 阮阅. 诗话总龟 [Z].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周本淳校点本，1987.
[7] 朱熹. 朱熹集 [M]. 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郭齐、尹波点校本，1996.
[8] 阳枋. 字溪集 [M].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Z].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9] 黄宗羲，全祖望. 宋元学案 [M]. 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86.
[10] 杨金鑫. 程朱理学与书院 [J]. 哲学与文化（台湾），1990 (6).
[11] 胡昭羲. 谯定、张栻与朱熹的学术联系 [A]. 中国哲学（第16辑）[M]. 长沙：岳麓书社，1993.
[12] 吕绍衣，王应元. 同治重修涪州志 [Z]. 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第46辑）[Z]. 成都：巴蜀书社影印本，1992.
[13] 程迥. 周易古占法 [M].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Z].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14] 束景南. 朱子大传 [M].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2. 64、65.
[15] 陆心源. 宋史翼 [M].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Z].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16] 牟巘. 牟氏陵阳集 [M].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Z].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17] 傅增湘. 宋代蜀文辑存 [C]. 台湾：龙门书店影印本，1971.
[18] 王懋竑. 朱子年谱 [M]. 北京：中华书局何忠礼点校本，1998.
[19] 永瑢，纪昀. 四库全书总目 [Z]. 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65
[20] 罗大经. 鹤林玉露 [M]. 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83.
[21] 朱熹. 朱文公文集 [M]. 四部丛刊：初编 [Z]. 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22] 胡昭曦. 四川书院史 [M]. 成都：巴蜀书社，2000. 39.
[23] 张宁阳. 井研县志 [Z]. 北京：国家图书馆藏清嘉庆元年 (1795)

刻本.
[24] 度正. 性善堂稿 [M].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Z].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25] 方彦寿. 朱熹书院与门人考 [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210.
[26] 曹彦约. 昌谷集 [M].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Z].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27] 赵汸. 东山存稿 [M].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Z].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28] 黄溍. 文献集 [M].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Z].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29] 袁桷. 清容居士集 [M].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Z].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30] 朱熹. 周易本义 [M]. 北京：中国书店点校本. 1994.
[31] 范镇. 东斋纪事 [M]. 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80.
[32] 李心传.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 [M].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Z].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原载《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 2005 年第 1 期，收入本书时有改动）

晏渊事迹征略

涪陵人晏渊，虽为朱熹高弟和南宋中后期的理学、教育名家，专门的研究却由于记载的零散而十分罕见。本文梳理有关文献材料，对其从学经历、门人著述、故居遗迹等生平大事做了考证。

晏渊；朱熹；朱子语类；北岩书院；“二阳”；涪坪山

晏渊，字亚夫，号莲荡，宋孝宗乾道、淳熙间涪陵县（治今重庆市涪陵区）人，南宋中后期享誉巴蜀的理学、教育名家。其生平事迹，旧集中散见于朱熹《晦庵集》卷63《与晏亚夫书》，度正《性善堂稿》卷5《权夔宪举晏亚夫遗逸奏状》，阳枋《字溪集》卷4《答谊儒侄昂书（二）》、卷8《莲荡先生坟亭记》、卷9《涪州北岩秋祀祝文》又《晏莲荡祝文》，黎靖德《朱子语类》卷116《训门人四》训晏渊及附录《语录姓氏》，以及曹学佺《蜀中广记》卷91“宋晏渊《孟子注》”条，朱彝尊《经义考》卷234“晏氏渊《孟子注》”条，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卷69《沧州诸儒学案（上）》“晏莲塘先生渊”小传，常明、杨芳灿《四川通志》卷146“晏渊”条，吕绍衣、王应元《同治重修涪州志》卷2“晏溪堂”、卷3“晏溪桥”、卷8“晏渊”、卷10“晏亚夫”，王鑑清、施纪云《民国续修涪州志》卷3“晏子山”“四贤楼”“晏溪堂”、卷11“晏渊”、卷19“《孟子注》”等。近今纂著如许肇鼎《宋代蜀人著作存佚录》

（见巴蜀书社 1986 年版 228 页），傅平骧《四川历代文化名人辞典》（见四川文艺出版社 1992 年版 292 页），徐世群、杨世明《巴蜀文化大典》（见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 122 页），蒲国树等《涪陵市志》（见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3、13、14、864、1408、1529 页）亦时有登载。兹就寓目，爬栉综核，择要数端，言其崖略。

一、从学经历

昱渊学历，以同门度正所记较全。其《权夔宪举昱亚夫遗逸奏状》云："（昱渊）少从故礼部侍郎李焘游，焘爱其志；中年又往建宁从故侍读朱熹，熹亦爱之，留之门使与诸孙校书。"[1]（卷5）按，李焘乃著名史家，所著《续资治通鉴长编》费时 40 年，取材广博，考订精核，为治宋史之典要。昱渊早年从其学，自然以治史为主。这在下文引《朱子语类》所录朱熹训昱渊第一条二人的问答中可以得到验证。至于受业朱熹的时间、因由、收获等等，除了昱渊次子之诚在昱渊离世后写给其弟子阳枋的信中有："王考平生好《易》，凡古今易学靡不研究，以为未足也。闻建安朱文公深得羲、文、周、孔之奥，万里往考亭而师焉。越三年，尽得其说以归。"[2]（卷 8《莲荡先生坟亭记》）一段专述，以及阳枋据此又在《昱莲荡祝文》中有所提及（引文见后）而外，则有更多的相关材料提供的丰富信息，足以使我们能够了解到其中的一些具体情节。

黎靖德《朱子语类》附《语录姓氏》列昱渊"癸丑所闻"[3]（3020 页），为《池录》第 28 卷。"癸丑"即宋光宗绍熙四年（1193），时朱子"始筑室于建阳之考亭"，"以六月落成而居之"[4]（222 页）。由此可知，昱渊当于本年夏方从朱子学于闽北建阳三桂里考亭之竹林精舍（后称"沧洲精舍"、"考亭书院"）。通检《语类》，在甘节、潘时举、叶贺孙、李壮祖、袭盖卿、林学蒙、李方子等十一人所录"亚夫问（曰、云）"或"昱

问（曰）"、"晏渊问"共计六十九条（见附1《<朱子语类>同门所录晏渊问答条目分布表》）中，林恪所录卷116《训门人四》训晏渊四条之第一条："先生问晏渊：平日如何做工夫？看甚文字？曰：旧治《春秋》并史书。曰：《春秋》如何看？曰：只用刘氏说看。曰：公数千里来见某，其志欲如何？曰：即拜先生，只从先生之教。……"[3]（2514页）第二条："晏亚夫将上赵子直黄文叔二书呈先生。先生曰：公有志于当世，亦自好。但若要从自家身上做将来，须是舍其所见已学，从其所未学。"[3]（305页）和卷14"晏亚夫问：《大学序》云：……所谓气质，便是刚柔、强弱、明快、迟钝等否？"[3]（230页）、卷16"亚夫问致知、诚意"[3]（3020页）二条，以及郑南升所录卷20"晏亚夫问'杀身成仁，求生害仁'"等七条，潘植所录卷23"晏亚夫问'为政以德'云云"等八条，亦可作为晏渊从学于本年之补证。因为在《语类姓氏》中，林恪三人均系"癸丑所闻"[3]（3020、3021页），在绍熙四年与晏渊同学。

又，根据《朱熹年谱》，朱熹在绍熙四年"冬十二月，除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抚使"至绍熙五年（1194）"八月，赴行在"[4]（224、230页）之前，曾讲学于长沙岳麓书院。《语类》卷116《训门人四》训晏渊之第三条："先生语晏亚夫云：亚夫归去，且须杜门安坐数年，虚心玩味他义理，教专与自家心契合。若恁底时，病痛自去，义理自明。大抵静，方可看义理。"[3]（2515页）第四条："亚夫禀辞，先生勉之曰：归后且杜门潜心二三年，仍须虚心以读书。"[3]（2515页）分别为长沙门人萧佐、袭盖卿所录。盖卿所录，还有卷69"亚夫问进德修业"[3]（1538页）、卷94"亚夫问太极、两仪、五行"[3]（2136页）二条。而萧、袭二人，一为《池录》第29卷，一为《饶后录》第22卷，《语录姓氏》均列"甲寅（绍熙五年，1194）所闻"[3]（3020、3023页）。可见朱子绍熙五年在长沙任上时，晏

渊仍从受业，并在八月朱子赴行在时“禀辞”。

此外，朱熹《晦庵集》卷63还收有《与晏亚夫》书三通（案：见文渊阁本《四库全书》1145册188－189页），书一云：“奉别逾年，思念不置。然一向不闻问，不知何时到家，州举得失复如何也？比日冬寒为况，想佳门中尊幼一一佳适。熹去岁到阙，不及五旬而罢。……信蜀士之多奇也。亚夫别后进学如何？向见意气颇多激昂，而心志未甚凝定。此须更于日用之间，益加持敬工夫，直待于此见得本来。明德之体，动静如一，方是有入头处也。因夔州江教授便人附此，讬赵守转致。地远不能多谈，唯千万进德自爱而已。”书二云：“长沙之别，忽忽累年都不闻动静，深以为念。度周卿来，略知还家已久。不审比日为况定何如，德门尊少计各平安？家居为学，所进复如何也？熹连年疾病，今岁差胜。然气体日衰，自是无复强健之理。所幸初心不敢忘废，亦时有朋友往来讲习。伪学汙染，令人恐惧，然不得辞也。周卿相见，必能道此间事与所商榷之曲折。因其归，谩附此纸。相望之远，会面无期，唯以慨叹耳。”书三云：“一别累年都不闻动静，不审比日为况何如。计且家居奉养，读书求志，不必远游以弊岁月也。熹衰朽疾病，更无无疾痛之日，明年便七十矣。区区伪学，亦觉随分得力，但文字不能得了，恐为千载之恨耳。……不知亚夫比来所进如何。今因建昌包君粥书之行附此，奉问别后为学功夫次第所得所疑。……去年度周卿归，尝讬致意，不知曾相见否？刘范李游诸贤，计各安健，前此便中亦时得声问也。无由会面，千万进学自爱，以慰千里相望之怀。目昏，灯下草草。”综合书一“奉别逾年”、“比日冬寒”、“熹去岁到阙，不及五旬而罢”，书二“长沙之别，忽忽累年”、“度周卿来，略知还家已久”，书三“明年便七十矣”、“去年度周卿归，尝讬致意”等等和《朱熹年谱》中朱子绍熙五年八月赴行在，十一月“戊戌，至玉山，讲学于县庠”[4]（251页），“丁未，还

考亭"[4]（252页）的记载，知三书分别作于庆元元年（1195）岁末"冬寒"、庆元三年（1197）党禁之时、庆元四年（1198）朱熹六十九岁之时。从中，不仅可以证实夏渊确曾肄业于长沙，还可结合其它的相关记载进一步明确其与朱子最后分别的时间、地点和离开长沙的实际时间，并使其它的相关记载得到合理解释和生动补充：1. 绍熙五年八月的长沙之别，为朱、夏师徒二人之永诀。之后，虽时有书信往来，但朱熹生前可能再也没有见过夏渊。2. 长沙之别夏渊禀辞时，朱熹"留之门使与诸孙校书"，夏渊因此可能并未马上启程。其离开长沙，应在朱熹赴阙"不及五旬而罢"之后还于考亭的十一月丁未前后迁家之时，追及返涪，已是来年（庆元元年，1195）矣。这与夏之诚云乃父万里往考亭师事朱熹，"越三年"而尽得其说以归的家说正相吻合。3. 夏渊归家后，虽然远隔千里，朱熹仍一如既往地一再过问、指导夏渊学业，勉励其读书求志、进德自爱，一片爱生如子的殷殷赤诚化作满怀的想念、希望溢于言表，至今让人动容，足见度正"熹亦爱之"所言不虚，更是朱熹天下师表风范的具体表现。这对夏渊学术即后之所谓"夏学"[5]（1529页）的最终形成，成就其蜀中名儒地位，无疑是至关重要的。

二、门人、著述

朱熹训夏渊时曾经称其"有志于当世"，并在《与夏亚夫》第一书中问及过其"州举得失"情况。可见，夏渊在返回涪陵的当年即庆元元年（1195）就参加了举试。度正《权夔宪举夏亚夫遗逸奏状》也说："夏渊性资沈静，履行清修，深明经学，颇通世务……尝应举于乡"，"适遭权臣以朱熹之学为伪而抑绝之，故虽文理优长而有司不敢取。及朝廷清明，崇尚其学，而渊已衰老，不复从事于科举矣。"[1]（卷5）因此，夏渊尽管"禀刚健之资，负盖世之志"[2]（卷8《莲荡先生坟亭记》），特立独行，力学不缀，终是涪州一介布衣，老于岩穴。

然而，并非夏渊的所有努力都是徒劳。正如阳枋在《夏莲荡祝文》中所说："先生宁宗朝（案：宁宗登极在庆元元年，"宁宗朝"显系"光宗朝"之误）毅然志道，万里寻师，阅三年而后闻《易》于考亭以归。（三）十有余年至于戊子（案："戊子"为理宗绍定元年 1228 年，距庆元元年 1195 年夏渊"闻《易》于考亭以归"三十余年。疑"十"前夺"三"字，据补。）而先生之学始传，又二十有余年至淳祐庚戌从祀于北岩而先生之学始显。"[2]（卷 9）经过长达三十余年坚持不懈的勤学清修，夏渊终于"问《易》考亭，得《易》涪乡，见知闻知，融明寸方"[2]（卷 9（《涪州北岩秋祀祝文》），将朱熹之学与乡里之学（包括谯定《易》学）融会贯通，形成有自己特色的《易》学思想。而后，讲学于北岩书院，传道授业二十余年，直至"淳祐庚戌"（十年，1250）去逝，蜀士慕从之游。

夏渊门人，《宋元学案》卷 69《沧州诸儒学案》记有合州巴川（今重庆铜梁）"二阳"——阳枋、阳岊。枋字宗骥，一字正父。7 岁诵《九经》，8 岁能作文。早年师从度正，笃志力学，研习群经，凡诸子百家、天文地理、医药卜筮，莫不博览穷究。绍定二年（1229）四十二岁时，由度正引荐赴涪陵从夏渊学《易》年余，收获良多。理宗端平元年（1234）冠乡选。淳祐元年（1241）赐同进士出身。历监昌州酒税、大宁理掾、绍庆学官、朝奉大夫。著有《字溪集》12 卷（今存《永乐大典》本，收入文渊阁《四库全书》1183 册）和《易学正说》（已佚，部分内容残存于《字溪集》），并类编《晦翁诗谱》、《文公语录四书》、《伊洛心传录》、《朱文公〈易〉问答语要》、《文公进学善言》（五书皆佚）等传学桑梓。淳祐十年（1250）夏渊逝世后，又绍师遗德，以古稀高龄主教北岩书院五年，门人弟子甚众，人称大阳先生。枋侄阳岊，字存瑞，理宗淳祐间进士，仕履不详。与阳枋为夏渊同门弟子，著有《存瑞易说》（今佚），人称小阳

先生。据《四川通志》卷146阳枋阳岊传、《宋元学案》卷87《静清学案》:“二阳”易说，其学本于㬊渊，又下传史蒙卿。因而，作为㬊氏再传，浙江鄞县（今宁波市）学者史蒙卿的较高学术造诣与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㬊渊易学“足以嗣伊川之传，使其得与谯公达微（定)、尹公彦明（焞）同时，则伊川必深‘与点’”[2]（卷8《莲荡先生坟亭记》）的高度成就。

㬊渊著述，《蜀中广记》卷91“宋㬊渊《孟子注》”条、《经义考》卷234“㬊氏渊《孟子注》”条等均载其有《孟子注》，已佚。据《广记》“（㬊渊）尝言：淳熙四年，文公年四十八，注《孟子》‘子产听郑国之政’章，谓成周改岁首而不改月，则晚年之确论也。尝欲更注，而其书已行于世。以时令考之：戌亥之月，未甚寒，犹可褰裳以涉也；子丑之月，涸阴冱寒，当此之时而以乘舆济民，民能免于病涉乎？桥梁道路，可以观政。九月成杠，十月成梁，戒事之辞也。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舆梁成，序事之辞也。《国语》有戒备之意，《孟子》就冻极之时言之，皆夏时云。”[6]（案：亦见《经义考》卷234“朱子《孟子集注》”条，文渊阁本《四库全书》680册95页）云云，朱熹在孝宗淳熙四年（1177）注《孟子》一书行世后，确认周代原改岁首而不改月，欲重注《子产听郑国之政》等章而未及，引为憾事。㬊渊乃撰《孟子注》就时令考之，谨承师学以证其说。惜是书早佚，仅见著录而莫得知其详。

㬊渊遗留文字，今仅见于《朱子语类》。笔者检索、统计的结果是，今本《语类》中，共有㬊渊所录问答4万余言473条(见附2《 <朱子语类> 㬊渊所录条目分布表》)，且除前5条外，余468条均属《易》类（案：粟品孝先生《朱熹与宋代蜀学》一书有这方面的统计数据、分布列表和深入分析，但其“《语类·易类》共有452条㬊渊所录问答”的统计结果与此存在较大出入。详参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184－188页）。根据度正

《权夔宪举晏亚夫遗逸奏状》“今建阳书坊所刊朱熹《经说》，渊之所录《易说》实居其首。故江东提举李道传所集朱熹《语录》，渊之所录亦附载其中。”[1]（卷5）和李性传《饶州刊朱子语续录后序》“（《易》书）晏渊所录一编，与《本义》（案：指朱熹《易本义》）异者十之三四”[3]（卷首）的记载，晏渊在受学于朱子时曾录有《易说》一编，并被收入最早的《语录》汇编即李道传编纂的《池录》中。又，据今本《语类》附录《语录姓氏》，知晏录《易说》具体收载于《池录》第28卷。虽然《池录》早佚，原貌不存，但其内容基本上被今本《语类》吸收。故，裒辑《语类》中晏渊所录易类各条，当可得见其《易说》的大致面目。而以之与现在通行的《周易》篇目安排（从乾卦至未济卦一卦一篇，另有系辞上、系辞下、说卦、序卦、杂卦各一篇，统共69篇）相比较即可看到，《语类》中除“噬嗑”一卦外，其余68篇，连同前面的三卷“纲领”均有晏渊记录。这说明晏渊从朱子以学《易》为重点，有一个比较连续、完整的过程，也非常用功；晏录《易说》是晏渊“癸丑所闻”朱熹与门人“讲论卦爻的言语”[2]（卷4《答谊儒侄昂书（二）》），全面、真实地反映了朱熹当时的易学见解。所以其同门好友度正说：“熹之门人众矣，惟渊从之为最久，闻其言为最详，记其说为最备，故其得之为最精。”[1]（卷5《权夔宪举晏亚夫遗逸奏状》）至于晏录《易说》出现的与《本义》“异者十之三四”的情况，有研究表明，这固然同晏渊笔录间或不能尽然反映朱子本意，以及门人弟子整理翻刻《本义》、《语类》可能产生某些流变等种种不确定因素有关，但主要还是由于晏渊所闻时间较早，其所记仅是朱熹六十四岁时的观点；而朱熹随着自己《易》学思想的发展，在《本义》稿成后多次修改《本义》注文部分的底稿，直至庆元四年（1198）即朱熹六十九岁时方始封笔，因而《本义》对晏渊记录的观点多有修正造成的（案：详见王风

《从〈朱子语类〉看〈周易本义〉成书过程》，中国哲学史学会《中国哲学史》2003 年第 4 期 57 - 66 页）。学者倘若以此讥贬《易说》，恐怕有失公允。

三、故居、遗迹

言及㬊渊家世生平，现存以《蜀中广记》为最早。《广记》"宋㬊渊《孟子注》"条下云："《涪志》：渊字亚夫，号莲荡。晋中郎将㬊靖之后，世居襄阳。后徙居蜀，家涪坪山。"[6]（卷91）查考曹学佺之前有关涪州地方志修纂文献，民国《涪州志》卷27 载《明户部员外郎编纂州人夏国孝序》、《康熙癸亥年（1683）续修州人文珂序》（见巴蜀书社 1992 年版《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第 47 册 193、194 页）等言及：明嘉靖三十年（1551）前后，夏国孝曾参与纂修过州志。又，据《明史》卷 97《志第七十三·艺文志二》（见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 1986 年版《二十五史》8040 页）、《四川通志》卷 188（见巴蜀书社 1984 年影印本 5465 页）及同治《涪州志》卷四《秩官志·历代秩官》"金光"条（见巴蜀书社 1992 年版《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第 46 册 500 页），明代万历间（1573 - 1619）知州金光编纂有《涪州志》二卷（今佚）。《广记》所谓《涪志》，当指此云——为其中之一；或者，二者实为一种亦未可知。尔后，《经义考》、《四川通志》诸书，所载虽详略有别，而殊无差忒，且均标有"曹学佺曰"或"《蜀中著作记》"字样以明确出处。惟一的例外是《宋元学案》，既不标出处，亦稍有异文。其卷 69《沧州诸儒学案（上）》传曰："㬊渊，字亚夫，号莲塘，涪陵人。西晋中郎将㬊清之后。世世居襄阳，后徙居蜀，家培坪山。受业文公。所著有《孟子注》，今佚。门人阳枋、阳岊。"[7]（2283 页）显然，其渊源所自，亦当是《广记》之类。只是"莲荡"误为"莲塘"，"㬊靖"误为"㬊清"，"世"字用双，"涪坪山"误读误记为"培坪山"而已。根据以

上简单辨证，晏渊故里为“涪坪山”无疑。考涪坪山，除本文开首所列诸书言及晏渊家世者谓其家此，尚未见他处有丝毫记载。其中，颇可注意的是民国《涪州志》卷11《人物志一·乡贤》“晏渊”条，较别处相应句增出三字，谓“家长寿之涪坪山”[8]（79页）。而循由“长寿”二字翻检新编《长寿县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虽仍无“涪坪山”记载，却可以找到惟一似与晏渊有关的山名“晏子山”的两处记载：其一，见页91“明月山（案：一名邻山或西山）”条，谓晏子山“在但渡乡三堡石场西北约3公里”，为明月山支脉五华山主要曼衍岗岭之一；其一，见页92“铜锣山”条，谓晏子山“在万顺场西南约3公里”，为铜锣山分支山岭，海拔高500～600米。另外，在民国《涪州志》卷三《疆域志三·古迹》亦有“晏子山”的一条记载，云：“在州西北五十里。晏亚夫读书处。其下为夫子坪。”[8]（18页）综合来看，晏子山应该就是晏渊故里涪坪山。它位于旧涪州州治即今重庆市涪陵城区西北五十华里处的今重庆市长寿区龙溪镇但渡乡境内，紧邻涪陵区致韩镇，由五华、铜锣二山派生支脉交汇形成，当时属夔州路涪州涪陵郡涪陵县（州郡县同治今涪陵城区）辖地。大约由于晏渊生于斯、长于斯，万里寻师，从学李焘、朱熹之前曾在这里长期生活、读书，而数十年后成为著名学者、一代贤儒受到人们尊崇，邻里乡党引以为荣，遂改名曰“晏子山”，称山下坝为“夫子坪”，以表景仰、怀念之情。

可能是为了学习、交流的便利，晏渊从朱子学成归来以后，也就从较为偏僻的涪坪山移居到了当时的州治涪陵城。因而，除了晏子山（涪坪山）、夫子坪外，文献记载有关晏渊的数处历史遗迹都在这里。它们是：

1. 晏溪、晏溪堂、晏溪桥

同治《涪州志》卷二《舆地志·古迹》“吴公堂”、“晏溪

堂”条[9]（452页），卷三《建置志·津梁》“夏溪桥”、“吴公桥”条[9]（491页），民国《涪州志》卷三《疆域志三·古迹》“吴公堂”、“夏溪堂”条[8]（18、19页）等载：州城东长江南岸旧有溪水泛滥，宋太守吴光辅疏之，建小石拱桥方便过往行人，民怀其惠，故号吴公溪、吴公桥。其孙信仲继守是郡，临溪建堂，因名吴公堂。后夏亚夫于此卜居建宅，溪环其下，遂名“夏溪”，溪桥亦名“夏溪桥”，宅则为“夏溪堂”。堂后有石泉，壁镌“清冽泉”三字，末署“古恕斋志”。夏溪堂早毁，清同治时原地址上已有天庆宫梵宇。至于今代，桥已俗称为“大桥”，溪亦音讹为“灌溪”。近年，随着城市的改、扩建，“大桥”亦复不存，溪也变成了涪陵城著名的下水道，名“灌溪沟”。

2. 北岩书院、四贤祠（楼）

同治《涪州志》卷三《建置志·学校》“钩深书院”条[9]（486页）、卷十《人物志·隐逸》“夏渊”条[9]（573页）、民国《涪州志》卷三《疆域志·古迹》“四贤楼”条[8]（18页）、卷五《建置志·书院》“钩深书院”条[8]（32页）载，在州治大江北岸北岩下有普净院，宋程颐谪涪注《易》曾辟地为堂，谯达微（定）从其问学研极幽眇，黄山谷题曰“钩深堂”，尹和靖辟三畏斋以居。至嘉定丁丑（十年，1217）州牧范仲武请建为北岩书院，并特建四贤祠崇祀四人。夏渊于绍定元年（1228）至淳祐十年（1250）在此传学授徒，任书院堂长二十余年。夏渊死后，其高弟阳枋主教北岩书院，大力宣扬夏渊学术，谓“《易》由先生而有传，岩因先生而有光。道晦而明，名久而彰，从祀四贤，无愧兹堂。”[2]（卷9《涪州北岩秋祀祝文》）使夏渊得以配享北岩，与“四贤”同祀于祠堂，故四贤祠有时也称五贤祠。清乾隆九年（1744），州牧罗克昌从新建筑，嘉庆八年（1803）州牧李炘修头门及仰止亭，置正堂三：中祀程子，左祀

四贤，右为讲堂，东西书舍各二所，看司宅一所。今原址犹存。

由于“五贤”当中，实则仅有谯定、夏渊两人生长于涪陵，是真正的涪州“乡贤”，因而，“谯达微之以理学著，夏亚夫之以惠淑名”[8]（卷27《康熙辛亥年（1671）续修州人刘之益序》），在当地史不绝书，光争日月，成为构筑涪陵优秀人文精神传统的重要两极。抚今追昔，夏渊对于当代涪陵人之意义，仍如数百年前阳枋所说：“思其刚健高明，则学毋悠悠；思其特立独行，则志毋混混；思其继程朱之学淑人心于千载，则计毋浅近。”[2]（卷8《莲荡先生坟亭记》）

附1：《朱子语类》同门所录夏渊问答条目分布表（共69条）

卷第四 性理一 人物之性气质之性（甘）节录“亚夫曰：‘性如日月，气浊者如云雾。’……”

卷第十四 大学一 纲领（潘）时举录“亚夫问大学大意”

卷第十四 大学一 序（林）恪录“亚夫问：‘大学序云：……所谓气质，便是刚柔、强弱、明快、迟钝等否？’”

卷第十六 大学三 传六章释诚意（叶）贺孙录“亚夫问：‘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此章当说所以诚意工夫当如何。”

卷第十六 大学三 传七章释正心修身（林）恪录“亚夫问致知、诚意”

卷第十六 大学三 传十章释治国平天下（甘）节录“亚夫云：‘务使上下四方一齐方，……’”

卷第二十 论语二 学而篇上 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章（郑）南升录“夏亚夫问杀身成仁，求生害仁。”

卷第二十二 论语四 学而篇下 夫子至于是邦章（潘）时举录“亚夫问：‘良何以为易直？’”

卷第二十三 论语五 为政篇上 为政以德章（潘）植录“亚夫问‘为政以德’云云”

卷第二十三 论语五 为政篇上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章（潘）植录“曼问‘志于学’章”

卷第二十七 论语九 里仁篇下 子曰参乎章（郑）南升录“亚夫问‘忠恕而已矣’”

卷第二十九 论语十一 公冶长下 颜渊季路侍章（潘）时举录“亚夫问子路言志处”

卷第三十二 论语十四 雍也篇三 人之生也直章（郑）南升录“亚夫问：‘如何是生理本直’?”

卷第三十二 论语十四 雍也篇三 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章（潘）时举录“亚夫问此章”

卷第三十二 论语十四 雍也篇三 子谓颜渊曰章（潘）时举录“亚夫问‘子行三军，则谁与’”

卷第三十二 论语十四 雍也篇三 曾子以能问于不能章（郑）南升录“亚夫问：‘黄叔度是何样底人?’”

卷第三十二 论语十四 雍也篇三 兴于诗章（潘）时举录“亚夫问此章”

卷第三十二 论语十四 雍也篇三 可与共学章（潘）时举录“亚夫问‘可与立，未可与权’”

卷第三十八 论语二十 乡党篇 第二节在朝廷事上、接下不同（潘）时举录“亚夫问‘朝，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与上大夫，誾誾如也’”

卷第三十九 论语二十一 先进篇上 季路问事鬼神章（潘）时举录“亚夫问‘未知生，焉知死’”

卷第四十一 论语二十三 颜渊篇上 颜渊问仁章（叶）贺孙录“贺孙问……亚夫又问”

卷第四十一 论语二十三 颜渊篇上 颜渊问仁章（郑）南升录“亚夫 问‘克己复礼’章”

卷第四十一 论语二十三 颜渊篇上 颜渊问仁章（潘）时举录

“亚夫问：‘克己复礼’，疑若克己后便已是仁，不知复礼还又是一重工夫否？”

卷第四十一 论语二十三 颜渊篇上 颜渊问仁章（潘）植录“曼渊问‘克己复礼’”

卷第四十二 论语二十四 颜渊篇下 子张问政章（潘）时举录“亚夫问‘居之无倦，行之以忠’”

卷第四十二 论语二十四 颜渊篇下 子张问政章（叶）贺孙录“亚夫问：‘居，谓存诸心……’此固分明。然行固是行其所居，但不知居是居个甚物事？”

卷第四十二 论语二十四 颜渊篇下 樊迟从游舞雩之下章（潘）时举录“亚夫问：‘先难而后获’，‘先事后得’……故如此告之？”

卷第四十三 论语二十五 子路篇 子路曰卫君待子章（潘）时举录“亚夫问‘卫君待子为政’章”

卷第四十三 论语二十五 子路篇 子路曰卫君待子章（潘）时举录“亚夫问：此是礼乐之实，还是礼乐之文？”

卷第四十三 论语二十五 子路篇 子路曰卫君待子章（叶）贺孙录“亚夫问：论道理，固是去辄，……天子既自不奈何，方伯又是晋自做，如何得？”

卷第四十三 论语二十五 子路篇 诵诗三百章（叶）贺孙录“亚夫问：‘诵诗三百’，何以见其必达于政？”

卷第四十三 论语二十五 子路篇 樊迟问仁章（郑）南升录“亚夫问：如何‘虽之夷狄不可弃’？”

卷第四十三 论语二十五 子路篇 樊迟问仁章（潘）时举录“亚夫问‘居处恭，执事敬’一章”

卷第四十四 论语二十六 宪问篇 子路问成人章（潘）时举录“亚夫问‘子路成人’章”

卷第四十四 论语二十六 宪问篇 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章

(潘)时举录"亚夫问:'管仲之心既已不仁,何以有仁者之功?'"

卷第四十四 论语二十六 宪问篇 子路问事君章(潘) 时举录"亚夫问'勿欺也,而犯之。'"

卷第四十四 论语二十六 宪问篇 以德报怨章(潘) 时举录"亚夫问'以德报怨'章"

卷第四十四 论语二十六 宪问篇 子路问君子章(叶) 贺孙录"亚夫问:程先生说'修己以敬',因及'聪明睿知皆由此出',不知如何。"

卷第四十五 论语二十七 卫灵公篇 颜渊问为邦章(潘) 时举录"亚夫问'颜渊问为邦'"

卷第四十五 论语二十七 卫灵公篇 吾之于人也章(潘) 时举录"亚夫问三代直道而行"

卷第四十五 论语二十七 卫灵公篇 知及之章(潘) 时举录"亚夫问:'知及之,仁不能守之'一章,上下文势相牵合不来相似。"

卷第四十五 论语二十七 卫灵公篇 君子贞而不谅章(潘) 时举录"亚夫问'贞而不谅'"

卷第四十七 论语二十九 阳货篇 阳货欲见孔子章(潘) 时举录"亚夫问:扬子云谓孔子于阳货,'敬所不敬',为'诎身以信道',不知渠何以见圣人为诎身处?"

卷第四十七 论语二十九 阳货篇 子谓伯鱼章(潘) 时举录"亚夫问'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

卷第四十七 论语二十九 阳货篇 宰我问三年之丧章(潘) 时举录"亚夫问宰我问短丧处"

卷第四十八 论语三十 微子篇 柳下惠为士师章(潘) 时举录"亚夫问柳下惠三黜"

卷第四十八 论语三十 微子篇 齐景公待孔子章(潘) 植录"曩问:齐景公待孔子,虽欲'以季孟之闲'……如齐王欲以孟

子为矜式，亦是虚礼，非举国以听孟子。"

卷第四十八 论语三十 微子篇 子路从而后章（潘）植录"亚夫问：'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

卷第四十八 论语三十 微子篇 子路从而后章（叶）贺孙录"亚夫问：集注云：'谓之义，则事之可否，身之去就，诚有不苟然者。'"

卷第四十九 论语三十一 子张篇执德不弘章（叶）贺孙录"亚夫问：如何是'执德不弘'底样子？"

卷第四十九 论语三十一 子夏之门人小子章（叶）贺孙录"亚夫问：伊川云：'洒扫应对'，便是形而上者……"

卷第五十五 孟子五 墨者夷之章（潘）时举录"亚夫问：'爱无差等，施由亲始'，与'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相类否？"

卷第六十三 中庸二 第十二章（李）壮祖录"亚夫问：中庸言'造端乎夫妇'，何也？"

卷第六十七 易三 纲领下 辞义（李）壮祖录"蔓亚夫问'中、正'二字之义"

卷第六十九 易五 乾下（袭）盖卿录"亚夫问'进德修业'，复云'居业'，所以不同。"

卷第七十七 易十三 说卦（林）学蒙录"蔓问：如何以仁比刚？"

卷第八十七 礼四 小戴礼 礼运（甘）节录"蔓曰：方动者欲，行出来者欲。"

卷第九十四 周子之书 太极图（袭）盖卿录"蔓问太极、两仪、五行。"

卷第九十四 周子之书 诚上（潘）植录"蔓问：举'一阴一阳之谓道'以下三句，是证上文否？"

卷第九十四 周子之书 诚上（潘）植录"蔓问：诚上篇举易

'一阴一阳之谓道'三句"

卷第九十四 周子之书 理性命（潘）植录"曩问'五殊二实'一段。"

卷第一百 邵子之书（甘）节录"曩问易与经世书同异"

卷第一百一十六 朱子十三 训门人四（林）恪录"先生问曩渊：平日如何做工夫？看甚文字？"

卷第一百一十六 朱子十三 训门人四（林）恪录"曩亚夫将上赵子直黄文叔二书呈先生"

卷第一百一十六 朱子十三 训门人四（萧）佐录"先生语曩亚夫云"

卷第一百一十六 朱子十三 训门人四（李）方子、（袭）盖卿录"'须是静，方可为学。'谓亚夫曰……"

卷第一百二十七 本朝一 英宗朝（叶）贺孙录"亚夫问'濮议'"

卷第一百三十七 战国汉唐诸子（郑）南升录"曩问：温公最喜太玄"

卷第一百三十九 论文上（李）方子录"亚夫曰：欧公文字愈改愈好。"

附2：《朱子语类》渊所录条目分布表（共473条）

卷第一 理气上　太极天地上　2条

卷第二 理气下　天地下　1条

卷第六 性理三　仁义礼智等名义　1条

卷第三十四 论语十六　述而篇　1条（德之不修章1）

卷第六十五 易一　纲领上之上　25条（阴阳2数1河图洛书11伏羲卦画先天图11）

卷第六十六 易二　纲领上之下　16条（卜筮9象7）

卷第六十七 易三　纲领下　32条（邵子易2程子易传1

朱子本义启蒙1读易之法2总论卦象爻7卦体卦变5辞义5上下经上下系1论易明人事3论后世易象5)

卷第六十八 易四　乾上　29条

卷第六十九 易五　33条（乾下19坤14)

卷第七十 易六　91条（屯3蒙7需6讼8师3比6小畜6履6泰7否5同人5大有1谦8豫6随5蛊5临1观3)

卷第七十一 易七　28条（噬嗑1贲3剥1复2无妄5大畜2颐2大过2坎3离7)

卷第七十二 易八　50条（咸2恒2遯1大壮1晋3明夷1家人1睽5蹇2解3损5益6夬8姤5萃4升1)

卷第七十三 易九　69条（困4井7革5鼎4震3艮5渐1归妹3丰2旅3巽3兑2涣7节3中孚4小过6既济3未济4)

卷第七十四 易十　上系上　19条（第一章5第二章1第四章4第五章4第六章3第七章2)

卷第七十五 易十一　上系下　20条（第八章2第九章4第十章6第十一章6第十二章2)

卷第七十六 易十二　系辞下　27条（第一章4第二章2第三章1第四章1第五章6第六章4第七章2第八章3第十二章4)

卷第七十七 易十三　29条（说卦27序卦1杂卦1)

参考文献：

[1] 度正. 性善堂稿［M］.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Z］.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2] 阳枋. 字溪集［M］.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Z］.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3] 黎靖德. 朱子语类［M］. 长沙：岳麓书社杨绳其、周娴君点校本，1997.

[4] 王懋竑. 朱子年谱［M］. 北京：中华书局何忠礼点校本，1998.

[5] 涪陵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涪陵市志［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5.
[6] 曹学佺. 蜀中广记 [M].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Z].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7] 黄宗羲，全祖望. 宋元学案 [M]. 北京：中华书局陈金生、梁运华点校本，1986.
[8] 王鑑清、施纪云. 民国涪陵县续修涪州志 [Z]. 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第47辑）[Z]. 成都：巴蜀书社影印本，1992.
[9] 吕绍衣，王应元. 同治重修涪州志 [Z]. 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第46辑）[Z]. 成都：巴蜀书社影印本，1992.

此土他邦头头合辙
寒岩幽谷面面回春

——兰溪道隆的东游传道及其对日本文化之影响

本文梳理有关史料，对南宋临济宗僧兰溪道隆东瀛传道、盛倡禅宗，开创建长寺派的历程作了考述，并具体分析了他在镰仓时代给日本文化带来的多方面深刻影响。

兰溪道隆；禅宗；理学；建长寺派；日本文化

十三世纪中后期，即中国南宋的理宗、度宗、端宗时代，日本源赖朝的镰仓时代，中日两国禅僧的交往，达到了历史高潮，出现了继唐代鉴真东渡、日本向中国大量派遣留学生、学问僧之后，两国文化交流的又一个新局面。双方往来禅僧浩浩荡荡、数以百计，日僧入宋求法者自是络绎不绝，而到日本游行化导的南宋高僧，也有十多人。其中为之嚆矢，也最为著名的，莫过于兰溪道隆。

一、兰溪道隆东游经历考略

兰溪道隆（1213－1278），临济宗高僧，俗姓冉氏，自号兰溪[①]，蜀之涪州[②]（今重庆市涪陵区）人。道隆十三岁出家，落发成都大慈寺，圆具后出蜀南游，赴浙江学禅于北磵居简、痴绝道冲、无准师范等。后至姑苏双塔遇阳山无明慧性禅师，以室中举“东山牛过窗棂”话有省得所传而嗣其法，挂锡于明州（今

浙江宁波）天童山[3]。当时，中华文化发展进入历史高峰期，佛教已完全中国化，禅宗独树一帜达于烂熟。受此影响，日本亦禅风渐起，执政之镰仓幕府尤醉心禅事，常欲延师皈依，故日本的佛门弟子羡慕南宋禅风而人宋者络绎不绝。1238 年（南宋绍兴八年，日本历仁元年），日僧俊芿弟子明观智镜入宋，在明州与道隆交往甚厚，屡劝其东渡，道隆遂生游行化导之志。1246 年（南宋淳祐六年，日本宽元四年）某日，道隆“闻日本商船泊于来远亭，往浮桥头观之，忽有神人告之曰：‘师之缘，在东方’”[1]（卷 19《道隆传》），遂携无明法印，率徒义翁绍仁、法平、龙江等三人，托身商舶，东渡日本。道隆由明州出发，经值嘉岛、博多来到京都，首先访问了时住涌泉寺来迎院的明观智镜。由于明观的建议，他又转去镰仓，投靠退耕行勇弟子、龟谷山寿福寺大歇了心禅师。当时掌握日本政治大权的北条时赖主要出于政策上的考虑，愤慨天台、真言诸宗不能脱离旧势力之羁绊，更欲获得宗教上之实权，故决意采用和日本佛教毫无关系的、纯中国式的、而且当时正在勃兴、大有发展前途的禅宗，招道隆至镰仓。1248 年（南宋淳祐八年，日本宝治二年）12 月，受镰仓幕府执权北条时赖邀请，道隆移住镰仓粟船常乐寺，并于次年建立僧堂，接受北条时赖皈依。这便是日本佛教史上镰仓的第一个禅宗道场。道隆在常乐寺开堂上堂时曾说：“道虽远而行之必至，事再易而惧之则难。所以，十方丛林，十方人建立。山僧住持此间，只要与诸人同究佛祖无上妙道，报答三有四恩。”并说：“种种依唐式行持。”[2]（卷上）因而这一道场几乎完全依据中国丛林的清规办事。1253 年（南宋宝祐元年，日本建长五年）十一月，北条时赖经过长达五年的努力，终于完成了他想在镰仓修建一所大伽蓝以压倒京畿地区诸旧教寺院，使镰仓这一政治中心同时也成为宗教中心的宿愿，在巨福吕地狱谷建成了日本临济禅祖庭寺庙建长寺，并于门额上亲题标明其为当时日本最高禅院的“天下禅林，东海法窟”

八个大字，延请道隆入住，以为开山第一祖。由于禅寺规矩的严正受到重礼节尚志气的镰仓武士的钦悦，而禅僧的质朴寡欲、专心为道，又与素以勤俭朴实为旨趣的镰仓武士正相符合，与旧教诸宗僧侣逞私营利、腐败堕落形成对比，故北条时赖以下镰仓武士渐多热心参禅，皈依禅法。1255 年（南宋宝祐三年，日本建长七年）二月，北条时赖又发愿向淋长等一千余人募缘铸造巨钟，道隆自作铭文，署其名曰："建长禅寺住持宋沙门道隆"。[3]（第 81《镰仓五山记》）自此日本始有禅寺之名，向来和天台、真言混在一起，倍受台密僧徒阻害困扰甚至一度遭当局下令禁止的禅宗，在幕府的竭力保护之下获得了完全独立的地位，并逐渐兴盛。正如道隆自己所说："予依大檀那之力，成此大丛林，正如顺风使帆。"[2]（卷中）1260 年（南宋景定元年，日本文应元年），在道隆等人通信的一再劝请下，在临安径山时与其有着深厚交谊的南禅福圣寺无准师范法嗣兀庵普宁禅师赴日。他先从博多到京都，在东禅寺访问了与他同为无准师范法嗣的法弟、该寺开祖圆尔辨圆后，于 1216 年（南宋景定二年，日本弘长元年）接受北条时赖邀请至镰仓。其时，道隆在镰仓主持建长寺已有 13 年，门下诸僧往谒、衲众云集，有日籍嗣法弟子无隐园范、南浦绍明、藏山顺空、不退德温、宋英、直翁智侃、林叟德琼、桃溪德悟等二十四人，约翁德俭、苇航、桃溪、无及有"门下四杰"之号，建长寺派业已成形，因此受到后嵯峨天皇敬慕，加诏谒见，敕迁京都建仁寺。道隆遂让其建长寺席位于普宁，前往京都。普宁任建长寺后，因感化执政北条时赖，使其领得大事，达到大彻大悟之域有功，很快声名大振。与此同时，台密僧徒妒嫉他的声誉，亦毁谤纷起，加之大施主时赖于 1263 年（南宋景定四年，日本弘长三年）十一月逝世使其失去有力支持，普宁终于 11265 年（南宋咸淳元年，日本文永二年）留下"无心游此国，有心复宋国，有心无心中，通天路头活"④一偈突然

归宋。普宁归宋后，道隆重回镰仓，住在由北条时赖参禅修行的最明寺改建而成的禅兴寺主持丛林。1269 年（南宋咸淳九年，日本文永六年），宋僧大休正念（佛源禅师）自温州至日，又承道隆退让，住禅兴寺。道隆因此受到中伤，于 1274 年（南宋咸淳十年，日本文永十一年）迁居甲州之寿福寺，旋返镰仓，辗转常乐、寿福、建长诸寺。1278 年（南宋祥兴元年，日本弘安元年）七月二十四日，道隆以老病侵寻示寂于建长寺，寿六十六，敕谥“大觉禅师”，为日本有禅师谥号之始。其法系建长寺派因而亦称“大觉派”。道隆圆寂后，建长寺席位出缺。当时执政北条时宗为了邀请可以替代他的宋朝高僧，随即亲书请帖，于十二月二十三日派时任建长寺藏主（或曰知藏，掌管经藏）和典座（掌管斋粥）的道隆弟子无及德诠、宗英二僧赴宋，于次年五月，迎得无准师范门下又一大德高僧无学祖元（佛光禅师）莅日，开启了日本禅宗史上继道隆大觉派时代之后的另一个昌盛时代：无学派时代。

兰溪道隆自十三岁出家至六十六岁圆寂，修禅究道共 53 年，在日本传法（1246－1278）就长达 33 年，走过了一条虽不十分平坦却越来越广的传教道路。特别是住持建长寺的 13 年，他把南宋禅林清规、坐禅方法等传到日本，广收门徒，弘布禅风，使禅宗在关东立下根基，对日本建立正格禅宋、形成建长寺派作用至大，被誉为“此土禅宗的初祖”。[4]（卷中）在中、日佛教、禅宗史上，道隆以他的生命历程书写了多项第一——开创镰仓的第一个禅宗道场；开创了日本的第一个禅寺；是第一个获得日本国禅师称号的人；是中国禅僧游化日本之嚆矢即第一个到日本传法的中国禅师；是在日本传法时间最长的中国禅师；是日本临济宗建长派的创始人——对日本禅宗的繁荣和发展，对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贡献（见附表），是历朝历代由华赴日的僧侣中最为伟大的四人（其余三人是唐代鉴真、宋代祖元、

明末隐元）之一，他当时在日本的名望几乎可与唐代的鉴真和尚相比。道隆之后，禅宗逐渐风靡日本，成为其文化支柱达五、六百年之久，现在也是其传统文化的一大主流。“直到今天，道隆仍然受到日本佛教徒的怀念，1986 年，还有日本佛教徒到涪陵瞻仰道隆故居。”[5]（《导言》，第 30 页）

附：日本临济宗兰溪道隆大觉法系中日僧人赴日入宋一览表⑤

字(号)、名、谥	往来年代	在住年数	资料来源
兰溪道隆（大觉禅师）	宽元四年（1246）赴日	三十三年	《大觉禅师语录》、《大觉开山塔铭》、《元亨释书》、《本朝高僧传》、《延宝传灯录》等
义翁绍仁（普觉禅师）	（同上）		《佛源禅师语录》、《本朝高僧传》、《延宝传灯录》
龙江	（同上）		《一山国师语录》、《本朝高僧传》等
法平	（同上）		《大圆禅师语录》等
约翁德俭（佛灯大光国师）	建长中入宋	八年	《佛灯国师塔铭》等
南浦绍明（大应国师）	建长十一年（1259）入宋	九年	《大应国师语录》、《镰仓五山记》等
元隐圆范			《镰仓五山记》
直翁智侃（佛印禅师）	文永元年（1260）入宋		《圣一国师年谱》、《本朝高僧传》、《延宝传灯录》等
禅忍	文永元年（1260）入宋	五年	《延宝传灯录》、《大觉禅师语录》等
藏山顺空	文永三年（1262）入宋	七年	《元亨释书》等

字(号)、名、谥	往来年代	在住年数	资料来源
林叟德琼	文永中入宋		《镰仓五山记》等
不退德温	（同上）	四年	《圆觉寺文书》、《佛光国师语录》等
宗英	文永六年（1269）、弘安二年（1279）两度入宋	四年、半年	《圆觉寺文书》、《佛光国师语录》等
无及德诠	弘安二年（1279）入宋	半年	《圆觉寺文书》、《镰仓五山记》

二、兰溪道隆东渡传道对日本文化的影响

禅宗是发源于印度的佛教在中国土地上的变种，完全是按中国人的思想和习惯建立起来的，是完全“中国式的佛教”[6]，是包含了当时理学的中国思想的产物。其经典语录用汉文，偈赞诗文读华音，附丽于佛寺的建筑、工艺、绘画等也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产物，也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因此，道隆的东渡扬禅，不光是对日本禅宗的繁荣和发展有巨大影响，不仅仅是中日两国佛教间的传通，而是涉及到思想、政治等多个领域，其对日本文化的影响是多方面和深刻的：

1. 传布教义，扩大禅宗影响，确立了禅宗在日本佛教各派中的领导地位，并对镰仓时代幕府政治、武士精神和国家命运产生深刻影响

禅宗是中国佛学中最有影响的四大宗派之一，也是中国佛教界占据优势的一个宗派。它创始于唐朝，至南宋而达于烂熟之期。1168 年（南宋乾道四年，日本仁安三年），日本僧人荣西人宋学禅，带回禅宗教义。当时，日本佛教已由上层贵族的小圈子里“解放”出来，并和民间信仰、生活习俗相结合，成为一种大众化的宗教，由天台宗、真言宗派生出来的净土宗、日莲宗等新教派较为流行。至 1192 年（日本建久三年，南宋绍熙三年），

武士们虽以武力夺取了京都贵族的政权，建立起镰仓幕府，但宗教的领导权仍然掌握在贵族手中。在这种情况下，禅宗宣扬安于现状、安分守己，对不合理的社会现象要妥协不反抗，注重思想修养，提倡心性本净，直指人心，没有繁杂的教义和仪式，主张不经过累世修行就可以成佛或死后进入西方极乐世界，日本禅宗派又适时提出“兴禅护国论”，使镰仓幕府认识到，禅宗派教义的传布以及确立其在日本流行的净宗、莲宗等所有佛教各派中的领导地位，将会非常有利于幕府统治，因而深得幕府武士的赞赏与支持，先后修建了建仁、永平诸寺，为禅宗的推广兴风播雨。但是禅宗教派那时并没有在日本真正独立，直到兰溪道隆到达日本，幕府才借助这位宋朝高僧的声望和日本人对中华文化的崇拜景仰，以道隆为开山祖师建立起禅宗祖庙建长寺。由此，道隆广收门徒，弘布禅风——弟子无隐圆范，入宋遍游江南诸地，归国后历住建仁、圆觉、建长诸寺；弟子林叟德琼，入宋历访江南寺林，归后住于镰仓禅兴、寿福诸寺；弟子约翁德俭，入宋参诣育王、天童、净慈、灵隐诸寺，归后历任建仁、建长、南禅诸寺；弟子直翁智侃，文永中入宋归后转嗣道隆同门师兄弟圆尔辨圆之法，开万寿寺于丰后；弟子藏山顺空，入宋参诣径山之偃溪广闻及断溪妙用诸名宿，归后开高城寺于肥后，后住筑前之承天寺；弟子无及德诠、宗英，入宋迎无学祖元东渡——形成大觉法系，使禅宗作为一个独立的宗派在镰仓勃然兴起，并向日本列岛传播，带动了各地方禅宗的迅速发展，进入日本佛教史学者所谓的“纯禅时代”。一时间，禅宗教派独领风骚，从天皇到幕府，从武士到百姓，上上下下深信禅法：不仅将军落发受禅，武士热心参禅，中、下层百姓甚至妇女也竞相修禅[6]，禅宗成为其重要的精神支柱。

幕府将军对大觉禅宗的皈依，直接影响到镰仓时代的幕府政治和国家命运，而对日本武士精神的影响，则尤为深远。由于道

隆禅师的到来，当时控制幕府实权的是第五代执政北条时赖，逐渐成为禅法的热心信奉者。他不仅亲自参禅究道，了悟大事，还希望能得到道隆的剃度。虽然由于未至大彻大悟之境而并没有得到道隆的印可，却借助于禅宗在日本的建立迅速掌握了宗教统治权，并最终确立了稳固的北条氏专制体制。所谓“镰仓盛世”局面的出现，与道隆的东渡传道是分不开的。其后，第八代执权北条时宗更是深信禅法，以禅护国。1281 年（元至元十八年，日本弘安四年），当百万元军大举进逼博多，日本面临空前浩劫时，北条时宗能够泰然自若，断然贯彻自己的信心以从容息难，使“国家贴然”[7]，多半应归功于他对禅学的修养。至若这一时期由道隆传道引发的武士参禅热潮对日本武士精神的影响，更是至巨。当时，参谒道隆的武士为数不少，单是在《大觉禅师语录》中提到名字的就有十数人。这些武士和僧侣不同，都有职务，终日忙于公事，很少余暇，但他们为了参究一个课题，竟能花费十年二十年的岁月。其孜孜不倦地参禅究道的情况，可从道隆语录所载的法语、问答中看得出来。而他们之所以如此热心，则是基于他们的精神追求与禅宗教义本质上的一致性。按照修禅者的说法，禅不同于一般人的常智。常智是相对的知识，往往昨“是”而今“非”，没有确定不变的真理，致使人生感到无限不安，临事周章而狼狈。禅却是万古不变的、不能用文字来解说的绝对真理，非无非有，有无共存，有无俱空。所谓“色即是空，空即是色”[8]，所谓“两头俱截断，一剑倚天寒”[9]，正是禅的本旨和境界。因为禅是绝对的，生亦一时，死亦一时，如春而为夏，夏而为秋，秋而为冬，故此对生死也有如一的看法，视出生入死如同在游戏场中，泰然自若，胸中了无芥蒂。镰仓武士们于参禅孜孜矻矻，主要就是想凭深奥的禅学修养突破生死牢关，一旦临事丝毫不乱，得以随处采取主动，能够做到所谓“立处皆真，随处为主”[10]（卷4），譬如盘中之珠，永不颠覆。这对后

来日本武士道的形成发展产生了颇大的影响。

2. 援儒入佛，阐说宋学义理，使程朱理学在日本的传播进入了一个由形式到探究内容的阶段，对于形成佛学与儒学相互渗透的具有日本特色的民族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十三世纪中后期，当赴宋日僧致力于通过朱子“四书”等宋儒经典的输入以摄取宋学（此处指传入日本的程朱陆杨等派学说，并不指宋学全部）的同时，日本称为“归化僧”的中国赴日禅僧也正在努力地把宋学介绍到日本。由于禅宗本身在不断中国化的过程中已经融入了不少儒家思想元素，加之长期受到宋学的濡染熏陶，他们往往释儒兼通，不仅赴日入籍时多携有儒书经典，更能够在后来的布道讲学中借着其雄厚的儒学修养和宋学与禅宗对立之中的相似共通之处，援儒入佛，着重于宋学义理的阐发。这要比主要是引进著作的日僧又深入一步，对把中国宋学传入日本，取得镰仓幕府的支持逐渐被吸收从而构成日本思想文化的新内容，无疑是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禅宗与宋学，在中国社会昌盛于同一时期，它们的发达有其相同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思想条件，它们的区别只是在意识形态中采取了不同的表现形式，实际上，它们之间在宇宙观、方法论以至伦理学方面，都有许多共通之处。禅宗以见性成佛为主，宋学以穷理尽性为宗，禅宗的性相与宋学的性理极为相似；禅宗主张坐禅内观至于顿悟以回复自己的本源，宋学主张静坐省察以求豁然贯通探求自己的本性，二者所讲的修养方法几乎同出一辙。并且这两种学说都鼓吹禁欲主义。所以，无论儒释之间如何对立，禅宗与宋学实质上是可以交互为用的。即使象朱熹这样的宋学大师，虽然曾经激烈地抨击过佛教，但也说过“今之不为禅学者，只是未曾到那深处；才到那深处，定走入禅去也”[11]（卷13）这样的话。他自己既然鼓吹“明天理，灭人欲”以达到“豁然贯通”[12]（《经一章・大学之道》）的神秘境界，就已经构

筑起了他与禅宗相联系的桥梁。所以，不但是在宋学的形成与发展中曾经吸收了禅宗的思想；而且，在禅宗的发展中也吸收了不少宋学的思想。正是宋学与禅宗的这种融通，使中国禅僧具备了雄厚的儒学修养。不少东渡布道的中国禅僧同时也是儒学行家，于理学深有研习，也就不足为奇了。而其中最可注意，与日本宋学渊源关系最深者，当推兰溪道隆。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禅宗道场，在当时简直就是中国宋学传播日本的一个重要基地。

从现存的《大觉禅师语录》三卷来看，兰溪道隆的讲学往往援儒人佛，充满了儒家思想，处处皆儒僧口吻，貌类禅林而神似宋学。《语录》记载，北条时赖常就教于道隆，一日问教化之道。道隆答曰："天下大事非刚大之气，不足以当之。要明佛祖一大事因缘，须是刚大之气，始可承当。今尊官兴教化、安社稷、息干戈、清海宇，莫不以此刚大之气，定千载之升平。世间之法能明彻，则出世间之法，无二无异矣。"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这里所说的'刚大之气'，不过是宋儒推崇的孟子所谓'浩然之气'的演绎"[13]（第58页），再蒙上了一点宗教的色彩而已。道隆在建长寺僧堂上曾发过一段议论，其曰："盖载发育，无出于天地，所以圣人以天地为本，故曰圣希天；行三纲五常，辅国弘化，贤者以圣德为心，故曰贤希圣；正心诚意，去佞绝奸，英士踏贤人之宗，故曰士希贤。乾坤之内，兴教化，济黎民，实在于人耳。"[2]（卷中《建长寺小参》）这也完全出于周敦颐的《通书・志学》⑦，并杂糅了四书《大学》、《中庸》之说。至于《语录》中引用诸如"政者正也"、"正心诚意"等《论语》、《中庸》的语句，更是随手可拾。从这些可以清楚地看出，兰溪道隆在传授禅法的过程中，往往掺入了理学说教和儒家思想。他不仅谙熟宋学的精髓"四书"，而且是根据宋儒的哲理来加以理解和阐发的。由此，宋学在日本的传播进入了一个由形式到探究内容的阶段，兰溪道隆亦因之成为日本宋学史上的一位重

要人物。而且，继道隆之后来日的宋末禅僧兀庵普宁、大休正念、无学祖元等，也都是禅学而兼理学，以儒僧的面目出现的。这对于日本的佛学与儒学的相互渗透，使宋代理学成为日本思想史上的一项重要思想内容，从而形成具有日本特色的民族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3. 移植仪轨，奠定禅宗规模，于日本禅刹之建制、伽蓝之兴造、禅书之刊印，顶相之具备以及茶道之开催等做了重要工作，对日本文化发展有多方面的积极作用

自道隆东渡，开山建长，盛扬禅风，宋禅宗之五山十刹制（即径山兴盛万寿禅寺，北山景德灵隐禅寺，太白天童山景德禅寺，南山净慈报恩光孝禅寺，阿育王山鄮峰广利禅寺等五大官寺的建置体系）亦随之传入日本，被仿设于各地。其中最著名的是镰仓、京都之五山：建长寺、圆觉寺、寿福寺、净智寺、净明寺，曰镰仓五山；天龙寺、相国寺、建仁寺、东福寺、万寿寺，曰京都五山。五山之上，并建南禅寺以为统领。自此以降，直至德川时代初期，五山僧侣得以各嗣其法，秩序井然。除能更好地习禅究道外，于幕府之外交事务及当代学术之维系亦有更多襄助。

寺院建筑方面，因受宋禅宗影响，亦呈现出显著变化。日本自宋朝输入的有所谓天竺式和唐式两种建筑式样。其中唐式一名禅宗式，就是把宋朝禅刹的式样照搬过来，随着禅宗的兴盛应用于大量的五山禅寺建筑。最初把这种式样传到日本的是日本入宋僧荣西和圆尔辨圆。荣西曾两度入宋，并营建宋天台山万年寺及天童山千佛阁等，颇有建筑经验；辨圆在径山住了六年，饱观宋朝禅式建筑。故其归国后，所建博多圣福寺、镰仓寿福寺、京都建仁寺及东福寺等，均仿照了宋朝禅寺的式样。但在这些寺院的建筑群体中，还夹杂有天台、真言宗的建筑，并非纯粹的禅宗建筑。直至1253年，北条时赖为迎入兰溪道隆，在道隆的指导下

创建建长寺于镰仓，纯粹禅宗建筑之规模，方始名实俱备。日本历史上最为著名的佛教史学者村上专精先生曾讲，在名为《建长寺草建人佛记》的古抄本中，记载有建长寺创建时的规模："法堂十七间四面高三丈，二重二丈五尺；客殿十三间九间半；经堂五重八间，四面高六丈二尺；中门高二丈五尺，平七间，横四间半；镜楼五间四面；食楼五间四面；本房方丈十间八间半；库里八间五间半；山门高二丈，平五间，横三间半；禅堂十间七间；修楼八间四面。"[8]此后禅刹伽蓝的新建或重建，往往以此为标准，并有入日宋僧参与其间，遵从宋朝丛林的清规，将宋禅寺堂内之诸种设备、布局，一起殖入日本。今日本宅邸民居的"书院造"结构布局，即由此演变形成。可见，道隆禅师的赴日，对于日本的建筑艺术和技术，是有促进作用的。

镰仓时代日本禅籍的刊印事业，也是由道隆等渡日行化宋僧所开创。宋朝禅寺贯以募捐刻印佛典禅籍广施海内外嗣法弟子使其便于参究领悟为功德，此风尚由道隆带入日本后，日本禅林亦率相仿效，着意于刊印禅书。只是由于印刷技术上的差距，禅籍刊印都深蒙入籍宋僧的指导。特别是当时镰仓缺乏优良刻工，一些禅籍就直接被带到宋朝开版。显著之例，如道隆的《大觉禅师语录》三卷，就是 1260 年（南宋景定元年，日本文应元年）由弟子禅忍、智侃带往宋朝，1262 年（南宋景定三年，日本弘长二年）请临安府上天竺寺佛光法师写序、净慈寺虚堂智愚题跋校勘[9]，于 1264 年（南宋景定五年，日本文永元年）在绍兴府刻版后再回日本印刷流布的。受此影响，五山各寺僧人纷纷组织禅籍的雕版印刷，刻印之各种禅书，不胜枚举，并从禅书逐渐发展到刊行其他书籍，使日本印刷技术迅速提高，印刷事业蓬勃发展，从而开启了日本印刷史上的新纪元：五山版时代。

同样，书法绘画方面，受宋禅宗传入日本的影响，亦变化较著。1253 年建长寺建成之后日本禅寺所绘之佛涅槃画，往往色

彩淡薄，用笔巧妙，描线粗细分明，有宋代画风的明显痕迹。禅师之顶相即肖像画同样如此。禅宗贵行顶相授受之礼，弟子若得其师印可，往往受其师之顶相以为证。故日本禅僧入宋求法，多携无准师范等宋禅师肖像以归。而伴随道隆东渡传法，禅宗昌盛一时，法系繁衍中顶相授受激增，日本肖像画遂亦因之发达。其著色画法，均以南宋写实肖像画为模范。而就书法言之，兰溪道隆在宋时书学黄庭坚，笔力遒劲，渡海传禅，其书法对日本禅林亦具影响，成为与“荣西书派”并行的重要一派。

另外，闻名世界的日本茶道与禅宗东渡也有深厚渊源。1169年（南宋乾道五年，日本嘉应元年），日僧荣西从中国带回茶种，又著《吃茶养生记》谓吃茶能消食遣困散懵快心，可为修禅之资，日本始兴吃茶之风。至道隆赴日，更将宋代丛林禅茶一味的关系深植日本禅林，使饮茶由公卿僧侣渐次推行于民众，茶文化遂以寺院为中心普及到日本各地。1259年（南宋开庆元年，日本建长十一年），道隆弟子南浦绍明入宋求法谒虚堂智愚禅师，1265年（南宋咸淳元年、日本文永二年）随虚堂移住径山。径山三年期间，南浦绍明不但勤穷佛禅，而且认真学习了径山的种茶、制茶技术及茶宴礼仪。1267年（南宋咸淳三年，日本文永四年）绍明回国时，做为受法印证，他又从虚堂禅师处得到一张茶台子（茶具架）和一套茶具，同时还将中国《茶道清规》等7部茶典一齐带回了日本，日本茶道主要的仪程框架规范由此得以奠定基础。因为茶台子的使用是日本点茶礼仪开端的关键，现代日本茶道所信奉的和、清、静、寂四规也是来源于茶典。尽管日本茶道后来在内容、形式上均有较大改进，但其“禅茶一味”之说早已道出了道隆传禅与茶道形成的密切关系。

综上所述，道隆东渡，确立了日本禅宗文化，促进了理学在日本的传播，而中国传统的建筑、书画、印刷、饮茶、礼法等也在这一过程中为大和民族所吸收。其作为宋代这一中华历史文化

高潮期中日交通中的重大历史事件，为两国的文化交流做出了卓越贡献，尤其对日本民族文化建设和镰仓时代的社会进步发展有着至深且巨的影响，是中日关系史上辉煌的一页。

注释：

①兰溪，一说为道隆字，见《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0 年版，1601 页）"道隆"条。日人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商务印书馆 1980 年版，380 页）引宋景定甲子（五年，1264 年）虚堂智愚禅师为道隆《大觉禅师语录》所题跋文则云："宋有名衲，自号兰溪。"应以宋人著述为准。

②有关道隆籍里，虚堂智愚跋文（见注①）有"一筇高出于岷峨"之语；日人村上专精《日本佛教史纲》（商务印书馆 1981 年版，175 页）谓"中国西蜀"；《辞海》（1061 页）、吴杰主编《日本史辞典》（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310 页）谓"西蜀涪江"；《巴蜀禅灯录》（四川省佛教协会主编，成都出版社 1992 年版，304 页）、《巴蜀文化大典》（徐世群主编，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1517 页）谓"蜀之涪州"。又，《辞海》、《禅灯录》、《大典》均按指即今重庆涪陵。

③道隆早年事，所知甚少。惟见日人忽滑谷快天撰《中国禅学思想史》（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年版，434 页）第四编《禅道烂熟时代（前期）》第十一章《圆通居讷与育王怀琏》中有"道隆与仁宗"一节，略云：至和元年，仁宗帝梦至景德寺门乃为龙蟠之地，惊觉，中夜遣使往视。有一僧熟睡，问其名曰道隆，不知何许人，游京师客于景德寺，日纵观都市，二鼓归山，不得入，即卧门下也。使者归奏，帝闻道隆之名，以为吉征。明日，召见便殿问宗要，隆奏对应声如响，与大觉怀琏问话，亦机锋迅捷。帝大悦，馆之大相国寺烧朱院，继于曹门外护国寺之北敕建华严禅院安置，赐号应制明悟禅师。隆少参石门慧彻，闻洞上宗要，后嗣广慧元琏，得临济旨诀，殁年八十有余。按以是书该编编目、章目排列次第，此"道隆"应即兰溪道隆，所说当为兰溪道隆之事。然所记事在"仁宗至和元年"即 1054 年，又说其"殁年八十余"、"嗣广慧元琏"云云，与他书之可靠记载出入颇大，殊不可解，未知忽滑谷氏何所从来，

恐中有误传或误译。

④《兀庵禅师语录》(卷中)，转引自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0 年，364 页。

⑤《日本临济宗兰溪道隆大觉法系中日僧人赴日入宋一览表》史料根据，来自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商务印书馆 1980 年版) 第 369－370 页《来日宋朝僧人一览表》和王辑五《中国日本交通史》(上海书店 1984 年版) 第 117－120 页《入宋僧一览表》。

⑥在《大正藏》第 80 册道隆、正念、祖元三人的语录中提到名字的修禅女性就有三十余人。其中最为著名的是镰仓幕府第八代执政北条时宗的夫人，后来担任东庆寺 (旧道心寺) 主持并使该寺得以复兴的觉心志道大师。

⑦参见吴怀民主编《中国文化通史·两宋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0 年，118 页。

⑧转引自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0 年，385 页。

⑨据日人椿庭海寿撰《东福第十一世敕谥佛印禅师直翁和尚塔铭》，道隆《语录》乃浙江灵隐寺大川普济禅师痴绝道冲校正。然《卧云文件录》"文安五年四月一日"条载："东福光藏院直宗 (翁)，本大觉弟子也。将入唐时，大觉以语录就痴绝求序。直宗 (翁) 入唐，痴绝 (道冲) 已迁化。时虚堂旺化，因请其序。"疑《塔铭》传误。

参考文献：

[1] 师蛮. 本朝高僧传 [M]. 大日本佛教全书 [Z]. 东京：佛教刊行会，大正二年 (1913).

[2] 大觉禅师语录 [M]. 高楠顺次郎. 大正新修大藏经 (第 80 册) [Z]. 台北：佛陀教育基金会，1990.

[3] 近藤瓶城. 改定史籍集览 [Z]. 东京：近藤活版所，明治三十五年 (1902).

[4] 一山国师语录 [M]. 大正新修大藏经 (第 80 册) [Z]. 台北：佛陀教育基金会，1990.

[5] 四川省佛教协会，等. 巴蜀禅灯录 [M]. 成都：成都出版社，1992.

30.
[6] 孙昌武. 中国佛教文化［M］.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 113.
[7] 佛光国师语录（三）［M］.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80册）［Z］. 台北：佛陀教育基金会，1990.
[8] 般若心经［M］.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33册）［Z］. 台北：佛陀教育基金会，1990.
[9] 维摩诘经［M］.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14册）［Z］. 台北：佛陀教育基金会，1990.
[10] 赜藏主. 古尊宿语录［M］. 中国佛教典籍选刊［C］. 北京：中华书局，1994.
[11] 黎靖德. 朱子语类［M］. 长沙：岳麓书社，1997.
[12] 朱熹. 大学章句集注［M］. 四书五经［Z］. 北京：中国书店，1996.
[13] 王家骅. 儒家思想与日本文化［M］.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

（原载《涪陵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

贾元三题

本文认为，易岩为贾元别号，贾元、贾易岩同为一人，而不是如同治、民国《涪州志》所列载的二人；其籍里，或谓涪州、涪陵，或谓长寿，似存抵牾，实指称上州、县大小之别，均不为误；又，文献资料证明，贾元《涂山碑记》固然于昔日纷纷不一的涂山地望作出了精详考证，但《涪陵市志》称“禹生石纽”之说为其“首创”，则不可从。

贾元（贾易岩）；涪州；长寿；涂山碑记；禹生石纽

笔者近年研习涪州文化[①]，于乡土地方志书颇为注意，并有一些附带发现。现仅就元代涪州学者贾元字号、籍里、学术观点等方面，摘为三札，识者鉴之。

一、贾元即是贾易岩

吕绍衣、王应元、傅炳墀等修纂，清同治九年（1870）刻印的《同治重修涪州志》，在其卷一〇《人物志·文苑》次列有元代乡贤二条。“贾元”条云：“字长卿，涪州人。有文学，凡使蜀还京者，必问曰‘得贾先生文章否’。题《观澜阁歌》，撰《文庙御碑亭记》，乡人重之。”小字注：“见《通志》及《蜀中著作记》”。又，“贾易岩”条云：“涪州人。以文名，著有《涂山古碑记》。”小字注：“见《通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第46册572页，巴蜀书社1992年版）其后，王鑑清、施纪云等修纂，民国十七年（1928）铅印的《民国涪陵县

续修涪州志》于此悉数抄录，不易一字。在卷一三《人物志三·文苑》中所列条目（见《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第47册93页，巴蜀书社1992年版）与之全同。按此，贾元（长卿）与贾易岩当别各一人。且同治《涪州志》收录《涂山古碑记》[2]和《文庙御碑亭记》[3]分别署名贾易岩、贾元亦可证之。然而，覆核《四川通志》及《蜀中著作记》等书中相关记载，两州志实误。

1. 《四川通志》：卷八《人物志上》“贾长卿”条云：“长寿人，淹贯经史，以文章名。凡使蜀者事竣还朝，士大夫相访必首询曾得贾长卿文字否。其为人所慕如此。”（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59册352页）又，卷四〇《艺文二》收录同治、民国《涪州志》之“贾易岩”条所云《涂山（古）碑记》，题作《涂山古碑》（同上第561册323页），系于贾元名下。

2. 《蜀中广记》：卷四五《人物记第五·川东道》云：“贾长卿，长寿人。淹贯经史，以文书名世。凡朝贵使蜀者无不求其文为橐中装。”（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91册626页）卷九九《著作记第九·集部》著录《贾先生集》云：“贾长卿，涪州人，有文学。凡使蜀还京者，人必问曰得贾先生文章否。题《观澜阁歌》，撰《文庙御碑亭记》，乡人重之。”（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92册607页）

3. 《全蜀艺文志》：卷四七《碑文下》迻录《涂山古碑》一文，作者署名为“贾易岩”，名下双行直书小字注“考长寿志名元”，正文居首有题款：“至正十五年（1355年——笔者）三月初四日涪陵贾易岩撰。”（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81册662页）

4. 《民国长寿县志》及新修《长寿县志》：民国三十三年（1944）陈毅夫、刘君锡等修纂《民国长寿县志》卷九《人物列传下》“贾元”条云：“字长卿，号易岩。淹贯经史，以文章名。

凡使蜀还者，士大夫相访，必首问得贾长卿文字否。其人所敬慕如此，崇祀乡贤。”小字注“《蜀中人物记》”。提行有修纂案语二则：一曰“杨升庵《全蜀艺文志》载贾元《涂山碑记》小注云‘号易岩，长寿人’”；二曰“旧志云：‘元者，善之长也。’（此语出《周易·乾卦》——笔者）元之取字号以此。《文庙碑》误分为二以贾元列明时人，今正之。”又，卷一四《金石》录《涪陵学宫碑亭记》、《涂山碑记》，均署“贾元撰”。（《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第7册117、229页，巴蜀书社1992年版）沿此，新修《长寿县志》第三十三篇《人物·传略》贾元小传云：“贾元（？年—？年），字长卿，号易岩。据杨升庵《全蜀艺文志》载贾元《涂山碑记》、《涪陵学宫碑亭记》小注及旧志记载，其为元末长寿县人。……”（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1130页）

5.《涪陵市志》：第二十六篇《文物名胜》之《北岩名胜》“观澜阁”云：“在点易洞前，首建于元代。以朱熹《北岩题壁》（诗见同治《涪州志》卷一五，有‘每向狂澜观不足’之句——笔者）诗意命名。阁名为元代文史学家、涪州人贾长卿题写，并作《观澜阁歌》（已佚）。阁之上有‘江天独坐轩’，仅容坐一人。阁轩前临悬岩峭壁，可俯瞰长江波澜。”第二十九篇《人物》“人物表”中又有“贾元”条，云：“字长卿。元代涪州人。著名学者，今存《涂山碑记》，首创‘禹生石纽’说。”（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1408、1529页）

综合上述材料，由《通志》“凡使蜀事竣还朝，士大夫相访，必首询曾得贾长卿文字否”与《广记》“凡朝贵使蜀者无不求其文为囊中装”、“凡使蜀还京者，人必问曰得贾先生文章否”记事相同可知，其所记贾长卿虽或作涪州人或作长寿人（详后），所指实一；由《广记》谓贾长卿“撰《文庙御碑亭记》”，民国《长寿县志》收录贾元《涪陵学宫碑亭记》，而二文其实为

一以及民国《长寿县志》引旧志以《易》语释说贾元取字长卿之由来、《涪陵市志》记贾长卿题写北岩观澜阁名并作《观澜阁歌》佐证其为涪陵文庙（学宫）新建碑亭落成为文以纪不为虚事可知，贾长卿即贾元；由《通志》收录《涂山古碑》系于贾元名下，《全蜀艺文志》收录《涂山古碑》作者署名贾易岩及名下注易岩“考长寿志名元”可知，贾元亦即贾易岩。故，正如新旧《长寿县志》之所云，诸志书称贾元贾长卿贾易岩者，乃乎一人：元为其名，长卿、易岩为其字号。同治、民国《涪州志》以贾元（长卿）与贾易岩为二人分列入载，非是。

二、贾元占籍考异

贾元籍里，其《涂山碑记》题款自谓“涪陵”（《全蜀艺文志》卷四七），同治、民国《涪州志》、《涪陵市志》等称其“涪州人”；《全蜀艺文志》、新旧《长寿县志》又称其“长寿（县）人”；《蜀中广记》、《四川通志》则既称“长寿人”，又称“涪州人”（以上均见本文第一部分引文）。众说纷纭。

考涪陵、长寿新旧县志及《太平御览》、《元史》、《明史》、《读史方舆纪要》、《历代地理沿革表》诸书有关历史地理文献：涪州、涪陵（今重庆市涪陵区）古名枳，北周迄清曾置涪陵镇、县、郡、涪州等；长寿县（今重庆市长寿区）即三国蜀汉常安县，自唐至元数百年间曾置有乐温、温山（一说尚有永安）等县。在建置沿革方面，因涪陵“北靠长寿”（《涪陵市志》第1页）而长寿“东南邻涪陵”（新修《长寿县志》第1页）的紧邻关系，二地有着深刻的历史联系。具体情况如下：

涪陵、长寿古代建置沿革关系表

历史	名称		建置时间及治所、域境变迁		隶属	
时代	涪陵	长寿	涪陵	长寿	涪陵	长寿
春秋战国	枳、枳邑	(枳、枳邑地)	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克殷建巴国都枳;公元前3世纪楚邑。治今涪陵枳里乡		巴国、楚国	枳、枳邑
秦、两汉	枳县	(枳县地)	秦昭王三十年(前277)、汉高祖五年(前202)、光武帝建武元年(35)置。治今涪陵枳里乡或城区		秦国巴郡、汉益州巴郡	枳县
三国	枳县	常安县	蜀汉章武元年(221)置。治今涪陵城区	蜀汉章武间(221~223)置,治今长寿城区。延熙十七年(254)废	益州巴郡	益州巴郡
西晋	枳县	(枳县地)	秦始二年(266)置;成汉玉衡元年(311)复置。治今涪陵城区		梁州巴郡荆州巴郡	枳县
东晋	涪郡(枳城郡)	(枳县地)	永和三年(347)枳县县治迁今江北县洛碛镇后,以原枳县地置。治今涪陵城区		梁州	梁州巴郡枳县

历史	名称		建置时间及治所、域境变迁		隶属	
刘宋、南齐、梁、西魏	枳县	(枳县地)	永初元年(420)、建元元年(479)、天监元年(503)、废帝元年(552)还治置。治今涪陵城区		益州巴郡、巴州巴郡、楚州涪陵郡	枳县
北周	涪陵镇	(巴县地)	保定元年(560)省枳县入巴县，四年(564)置镇。治今涪陵城区		楚州巴郡巴县	楚州巴郡巴县
隋	涪陵县、镇	(巴县地)	开皇三年(583)移汉平县驻涪陵镇，十三年(593)改置涪陵县。大业三年(607)复为镇。治今涪陵城区		渝州巴郡	渝州巴郡巴县
唐、五代、宋	涪陵县	乐温县；(温山县)	武德二年(619)、天佑四年(907)、乾德三年(965)、建炎元年(1127)置。治今涪陵城区	武德二年(619)分巴县地置，五代、宋循唐制。治今长寿乐温、云集。熙宁三年(1070)省温山为镇入涪陵县	涪州涪陵郡	涪州
元	涪陵巡检司		至元二十年(1283)省涪陵、乐温二县置巡检司，由涪州直辖。治今涪陵城区		重庆路涪州	

历史	名称		建置时间及治所、城境变迁		隶属	
大夏	涪州	长寿县	仍旧制,建置不变	大夏天统二年(1363,元至二十三年)废巡检司,以宋乐温县旧地置。治今长寿乐温镇	重庆路	重庆路涪州
明	涪州	长寿县	洪武四年(1371)置。治今涪陵城区	洪武六年(1371)改由重庆府直辖。成化十九年(1483)迁治今长寿河街	重庆府	重庆府
清	涪州	长寿县	顺治十二年(1655)置。治今涪陵城区	嘉靖七年(1802)迁治今长寿新署街	重庆府	重庆府

表中显示,元至元二十年(1283)至至正二十三年(1363)八十年间,宋涪陵县(今涪陵区)、乐温县(今长寿区)地共置涪陵巡检司隶属重庆路涪州。明玉珍天统二年(1363),巡检司废,大夏政权以宋乐温县旧地有长寿山、人多寿考置长寿县,隶重庆路涪州(州治今涪陵城区)。明洪武六年(1373),长寿县改由重庆府直辖。贾元撰《涂山碑记》于长寿县建置之前的至正十五年(1355),自称“涪陵贾易岩”,其时籍在涪州辖下涪陵巡检司。

《全蜀艺文志》、民国《长寿县志》等称“长寿人”，盖由明夏撤司建县、贾元籍隶变易之故。同治、民国《涪州志》等谓其“涪州人”，则是概以州名相称耳。故，关于贾元籍地的不同说法，实际均不为误。不仅如此，其间所含带的丰富信息（如由《蜀中广记》、《四川通志》一时称“长寿人”一时称“涪州人”而未称“重庆（府）人”，略约可知贾元应殁于明初改长寿由重庆府直辖之前，等等），还可以作为进一步推断贾元地望与大致生卒年限的重要依据。而由此应该能够得出的结论是：贾元籍地在明玉珍据蜀时为涪州长寿县，即宋代乐温县，今重庆市长寿区东部乐温镇；其生年当不早于建置涪陵巡检司的至元二十年（1283），卒年当不晚于长寿县脱管于涪州的明洪武六年（1373）。

三、贾元“首创”禹生石纽说辨

根据《蜀中广记》、《四川通志》等书记载，贾元以淹贯经史、博学能文而声称于时，为人敬慕，在当时的文化界具有相当的影响力。此足以为地方增光添彩，故“乡人重人”，许以“文史学家”、“著名学者”云云。然而，不虞之誉亦有错杂其间者，如：《涪陵市志》“贾元”条谓其《涂山碑记》“首创‘禹生石纽’说”（见前引），即是显著一例。为方便说明问题，兹以《四库全书·全蜀艺文志（卷四七）·涂山古碑》作底本，参校《四川通志》、民国《长寿县志》、同治及民国《涪州志》之所载，将该文备录于左。

《华阳志》云：渝郡涂山，禹后家也。古庙废宋，至正壬辰郡守费著仍建庙堂。尝考娶于涂山之说，一谓在此，一谓在九江当涂。《东汉郡志》云：涂山在巴郡江州。杜预考曰：巴国也有涂山、禹庙。又，古《巴郡志》云：山在县东五千二百步岷江东圻，高七里，周围三十里。郦道元《水经注》云：江州涂山

有夏禹庙、涂后祠，九江当涂亦有之。杜预所谓巴国江州，乃今重庆巴县，则江州非九江之江州也。《汉史》、《蜀志》可稽。至今洞曰涂洞，村曰涂村，滩曰遮夫，石曰启母。复合《帝王世纪》、《蜀本纪》、《华阳国志》、《元和志》等书参考之，禹乃汶山郡广柔人。其母有莘氏感星之异，生于石纽。广柔，隋改为汶川，石纽在茂州，城隶石泉军。所生之地方百里，夷人共营之，不敢居牧，灵异可畏。禹为蜀人，生于蜀娶于蜀，古今人情，不大相远。导江之役，往来必经，过门不顾，为可凭信。先是，帝曾大父曰昌意，为黄帝次子，娶蜀山氏生帝颛顼，颛顼生鲧，鲧生帝。帝之娶于蜀，又有自来。又谓蜀涂山肇自人皇为蜀君，掌涂山之国，亦一征也。至会诸侯于涂山，当以九江郡者为是。《东汉郡志》云：山在当涂。杜预云：在寿春东北。今有禹会村，柳子厚有铭，苏子有诗。且于天下稍向中会，于此宜矣。《通鉴外纪》亦云：禹娶涂山之女生子启，南巡狩会诸侯于涂山。如是则娶而生子，生子而后南巡，南巡而后会诸侯。娶则在此，会则在彼，次序昭然。会稽乃致群臣之地，或崩葬之所，故有禹穴。所谓涂山，一曰栋山，一曰防山，纷纷不一。意者，晋成帝世，当涂之民，徙居于此，故亦名其县曰当涂。好事者援此以为说，而实非涂山。世次绵远，地名改易烦乱，傅会不足征。况会稽、当涂，在禹时未入中国，禹安得娶于彼哉？今特辨而正之。庶祠庙之建，得其本真，而禹后安享于诞生之地，尤不可阙尔。

按《碑记》意旨，其要本不在“禹生石纽”，而在乎“禹娶涂山”。“禹娶涂山”之事，早见于《尚书·益稷》（“予创若时，娶于涂山，辛、壬、癸、甲，启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史记·夏本纪》（“禹曰：予辛、壬娶涂山，癸、甲生启，予不子，以故能成水土功。”）、《华阳国志·巴志》（“禹娶于涂山，辛、壬、癸、甲而

去，生子启，呱呱啼，不及视，三过其门而不入室，务在救时，今江州涂山是也。帝禹之庙铭存焉。"）等。但涂山究竟何在，历来各家聚讼纷纭，莫衷一是，计有安徽九江寿春或当涂（出《左传·哀公七年》）、浙江会稽（出《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越绝书·记地传》）、巴郡江州（出《华阳国志·巴志》、《水经注》、《续后汉书·郡国志》巴郡江州下刘昭注）及河南嵩县（《方舆纪要》）、四川汶川（《蜀王本纪》、《新语·术事》）共五、六种说法流传于世。贾元《碑记》，就其中当时最流行的几种看法作了精详考证，认为"禹娶涂山"之涂山，是渝郡涂山（今重庆城区长江南岸，一名真武山），而非九江或会稽之涂山。至于"禹生石纽"，文中曰："复合《帝王世纪》、《蜀本纪》、《华阳国志》、《元和志》等书参考之，禹乃汶山郡广柔人，其母有莘氏感星之异，生于石纽。……禹为蜀人，生于蜀娶于蜀，古今人情，不大相远。"所及不过寥寥数十字，仅为论证"禹娶涂山"乃渝郡涂山之逻辑前提，而且显然是包含在《帝王世纪》等书中的现成结论。更何况，于夏史稍加留意，即可知在贾元之前的古籍文献中有记"禹生石纽"传说者亦实不少：陆贾《新语·术事》"大禹出于西羌"；贾谊《新书》"文王先于东夷，大禹出自西羌"；杨雄《蜀王本纪》"禹本汶山郡广柔县人也，生于石纽。其地名刳儿坪"；桓宽《盐铁论·国病篇》"禹生西羌，父王生于北夷"；司马迁《史记·六国表序》"禹兴于西羌"；范晔《后汉书·郡国志》蜀郡广柔县引《帝王世纪》"禹生石纽"；陈寿《三国志·蜀志·秦宓传》"禹生石纽，今之汶川郡是也"；萧常《续后汉书·郡国志》刘昭注广柔县下引《华阳国志》"夷人共营其地，方百里，不敢居牧，有过逃其野中，不敢追，云畏神禹，能藏三年，为人所得，则共原之"；裴骃《史记·六国表序·集解》引皇甫谧"孟子称'禹生石纽，西夷人也'"；张守节《史记·六国表序·正义》"禹生于茂州汶川县，本冉駹国，皆西羌"；萧德言《括地志》"茂州汶川县石纽山，在县西北十三里"。故而，《市志》虽美处良多，此处尚有

疏失。

注释：

①即今重庆市涪陵区古之涪州涪陵郡民国以前的古代文化。详参李胜、张勤《涪州文化的渊源、特点与历史地位》，《涪陵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4期第41－45页。

②该文载于同治《涪州志》卷一四《艺文志·散体文》，民国《涪州志》卷二〇《艺文志二·文征二》亦载，题目均省“古”字作《涂山碑记》。见《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第46册637－638页、第47册153－154页，巴蜀书社1992年版。

③署名贾元的作品，民国《涪州志》失收。惟于同治《涪州志》卷一四《艺文志·散体文》贾易岩《涂山碑记》之后有《学宫碑亭记》一篇，略云：“碑亭之建，臣子所以奉扬国家至美，勒之金石以示无穷。至正癸巳（1353至正十三年—笔者，下同。）夏四月，涪郡守臣僧嘉闾新建碑亭成，教官张安具其事之本末，俾元为文以纪之。……今皇上以天纵之姿，尤用意文治。人才彬彬，克复至元之盛，此当勒之金石，为万世法程也。涪之文庙，旧惟一碑刻至元三十一年（1294）、大德十一年（1307）诏文，其余封谥之碑未建也。守臣僧嘉闾至郡，叹为缺典。乃捐俸金采坚珉，召将抡才，勒碑建亭，命学正张安董其事，丹镬华丽，金碧辉映，诸郡所无。……先是，庚寅（1350至正十年）秋公甫莅政，首创尊经阁，次御碑亭。后先相继，其于学宫可谓详且尽矣。元，草野布衣，幸亲见休光，敢拜手稽首敬为之记云。”（《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第46册第638－639页）按：以文意暨唐开元二十七年（739）封孔子为文宣王（《旧唐书·玄宗纪下》）后，孔庙称文（宣王）庙，亦称学宫，此即同治及民国《涪州志》“贾元”条所称之《文庙御碑亭记》无疑。

（2004年国家图书馆“地方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交流论文，原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2005年第9期）

明清涪州进士述录

本文依据多方面文献资料，对明清两代涪州进士这一地域历史人群之成员总数、各自的生平事迹等做了简略的考查核定，重点述录其事功与德行，以为进一步深入研究的线索和今人之借镜。

明清时期；涪州（涪陵）；进士

在隋大业三年（607）至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中国实行科举制度的一千三百年时间里，无论哪一个地方，能够卓越恒流、考取进士，成为天子门生的人总是凤毛麟角、寥寥可数。作为最高层次的科举功名获得者和科举人才的杰出代表，他们不仅大则登台阁，小则任州县，在各个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历史舞台上充当着重要的角色，成为国家的中坚和精英力量；而且也是社会一般民众特别是其出生地或考籍地的读书人学习效仿的楷模，在整体和局部的社会风尚形成、伦理道德构建、传统文化维系诸方面有着显明的导向和表率作用。因此，对进士这一特殊历史人群进行考察研究，也就具有了深刻的社会内涵。即以一地言之，从其进士人数之多寡与事功状况，往往能够了解到当地文化、教育发展的历史水平与特点，乃至推测出其政治、经济嬗变推移的大致轮廓，并垂作历史的经验教训，为现实的资政、教化提供人镜和参考。

涪州进士，现存的记载本见于宋、明、清三代。据清同治九

年（1870）吕绍衣、王应元、傅炳墀等《重修涪州志》卷七《选举志》，宋代涪州有进士九人：任昌大，庆历间（1041－1048）进士，武隆人；韩翱，崇宁间（1102－1106）进士，注见白鹤梁题名；张方成，嘉熙间（1237－1240）；蹇世芳，咸淳甲戌（十年，1274）年进士，武隆人；韩铸，咸淳甲戌（十年，1274）年进士，武隆人；韩涛，咸淳甲戌（十年，1274）年进士，武隆人；韩俦，咸淳甲戌（十年，1274）年进士，武隆人；冯造，字深道，熙宁甲寅（七年，1074）进士，注见白鹤梁题名；卢遘，字彦通，熙宁甲寅（七年，1074）进士，注见白鹤梁题名。（见巴蜀书社1992年版《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影印本，第46册，第516页。）然而，正如民国十七年（1928）王鑑清、施纪云等《涪陵县续修涪州志》所云："九人中，隶武隆者五，而四为韩氏，又三人同在甲戌，皆有可疑。"（见巴蜀书社1992年版《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影印本，第47册，第68页。）故，兹述涪州进士，仅以明清为限，辑录查核同治《重修涪州志》、民国《涪陵县续修涪州志》、《道光重庆府志》（清王梦庚、寇宗等修纂，巴蜀书社1992年版《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影印本第5册）、《万历四川总志》（虞怀中、郭棐修纂，齐鲁书社1996年四库存目丛书本）、《四川通志》（常明、杨芳灿等修纂，巴蜀书社1984年版）、《国朝全蜀贡举备要》（孙桐生、赵增荣辑，清光绪九年〈1883〉刻本）、《清代四川进士征略》（李朝正著，四川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朱保炯、谢沛霖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及有关史籍、文集的记载，按登第时间先后，分人头将其主要事迹、著述等粗略整理如下，聊作同道钩沉一助。

一、明代（共34人）

舒　忠　建文庚辰（二年，1400）进士。官山西平阳府

（今临汾）知府。卒葬白里（按：在涪州，里甲名。下文“长里”、“云里”等同，不注。）沙坪场。

白　勉　榜姓蒋，一作蒋勉。永乐乙未（十三年，1415）陈循榜进士。历刑部尚书，练达刑名，兼匡济才。及卒，得赐谕祭，有刚方清介之褒，乡人荣之。葬于长里石鼓溪。

夏　铭　宣德庚戌（五年，1430）林震榜进士，精于理学。任江西道监察御史，持宪公平。母死，庐墓三年。著《四书启蒙》行世，以惠后学。

刘　纪　景泰辛未（二年，1451）柯潜榜进士。任监察御史。卒葬白里高楼。

朱　灏　字仲明，明景泰辛未（二年，1451）柯潜榜进士。官御史，以抗疏切谏忤旨罢。归置义田赡族，赈恤贫苦，里人德之。卒葬东里龙坝。

刘　岌　字凌云，景泰甲戌（五年，1454）孙贤榜进士。清慎谦和，居官恂恂，历仕两朝，眷注独厚。官礼部尚书加太子少保致仕，终养涪州。卒葬白里金装岩，年八十五。沈德符《万历野获编》、施显卿《奇闻类记》载其老年得子、失而复遇之事，以为厚德之报。

郭　澄　景泰举人，天顺丁丑（元年，1457）黎淳榜进士。官户部郎中。

张善吉（按：吉或作言，误）　成化丙戌（二年，1466）罗伦榜进士。官工科都给事、兵科给事中、湖广巡抚。卒葬白里鹤遊坪太平坝。张廷玉《明史》卷三一七列传一九五载其曾以秘术佞幸中官、乞复官职，士论以为羞。

钱　玉　成化壬辰（八年，1472）吴宽榜进士。任陕西华亭县知县。卒葬长里某地。

陈　常　成化戊戌（十四年，1478）进士，长寿县人，涪州名籍。历湖南常德、山东东昌府同知，清戎有法，鞫讯明决，

狱无冤滞，吏民怀畏。卒于官，囊箧萧然，乡评重之。

夏彦英　弘治癸丑（六年，1493）毛澄榜进士。官御史。

刘　滢　字惟馨，号秋佩，弘治己未（十二年，1499）伦文叙榜进士。正德初，任户科给事中，劾议户部尚书揆钟纵子受贿，外戚庆云侯、寿宁侯家人侵牟商利、阻坏盐法，文选郎张彩颠倒铨政诸事，有直声。中官刘瑾擅权，尽召出镇内臣代以其党，滢抗疏极言其奸、指摘时弊，曰：“用新人不若用旧人，养饥虎不若养饱虎。”忤旨，夺俸三月，被笞落职。瑾败，起知金华，治行卓异，未及迁告归。嘉靖初，复起知长沙，迁江西副使。卒赐祭葬。有《见闻录》、《秋佩先生文集》等传世。传见张廷玉《明史》卷一八八列传七六。

张　柱　弘治壬戌（十五年，1502）康海榜进士。任贵州思南府知府、岭南道参政。卒葬白里鹤遊坪。

夏邦谟（1485－1566）　字舜俞，号松泉。幼年颖悟，弱冠登第。正德戊辰（三年，1508）吕柟（一作枬）榜进士，授户部主事兼户部考功稽勋、德州仓正等职，掌管户口、财赋、官吏考核。因持论公正，对收支严加监督、核审，禁止地方官员损公肥私遭嫉恨，贬两淮运判。正德十二年（1517），移知通州（今南通），建南望江楼备倭。寻转道州（今湖南道县）同知，推行“一条鞭法”。历任云南参议、湖广浙江江西副使、云南参政、福建按察使、右都御使等职，参与、主持平息内乱五次，勋绩茂著，所至有声。嘉靖二十六年（1547）后，任工、户、吏三部尚书加太子少保，査田亩，裕税赋，纳群言，拒馈赠，小心缜密，清白自守，深得世宗倚重。权贵忌恨，不断寻隙攻讦，嘉靖三十年（1551）罢官。晚年居涪州，与杨升庵赋诗唱和。卒，年八十一，葬云里郝家坝，世宗两次谕祭，勒碑墓前。《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大辞典》（人民日报出版社 1999 年版上卷）等有载。

黄景新　弘治己酉（二年，1489）乙榜举人，正德辛未

（六年，1511）杨慎榜进士。祖贯不详，寄籍涪州。

黄景夔　正德甲戌（九年，1514）唐皋榜进士，丰都人，寄籍涪州。正德十六年（1521）任兵部主事。事见康熙九年（1670）陈天植、陈名远等辑纂《山海关志》卷四名宦、雍正十三年（1735）李卫等撰《畿辅通志》卷二十八学校：山海卫学。有《城东新泉记》（见周复俊《全蜀艺文志》卷三三）、《泮池铭》（见《四川通志》卷四〇、《全蜀艺文志》卷四四）等文传世。

夏国孝　号冠山，嘉靖癸未（二年，1523）姚涞榜进士。官南京户部员外郎。辞归终养，行李萧然如寒士。晚年居长里火凤滩（或作和凤滩、鹤峰滩），修州志，著文集（佚），以诗文自娱。

谭　棨　字朝器（凌迪知《万姓统谱》卷六六），嘉靖戊戌（十七年，1538）茅瓒榜进士。任浙江承宣布政司右参政、提刑按察司佥事（嵇曾筠等《浙江通志》卷一一八职官八），山东提刑按察司（岳濬等《山东通志》卷二五职官一），陕西参政、副使（刘於义等《陕西通志》卷二二职官三）。历官清廉，居家孝友，乡评重之。卒葬白里罗家庙。

谭　臬（按：臬或作杲，误）　嘉靖庚戌（二十九年，1550）唐汝楫榜进士，历佥事道、南阳府内乡县令（王士俊等《河南通志》卷三四职官五）。卒葬云里金井坝。

黎　元　嘉靖丙辰（三十五年，1556）诸大绶榜进士，福建按察司佥事。卒葬白里黎家洞。

王　堂　嘉靖己未（三十八年，1559）丁士美榜进士，任部郎中。

徐　尚　嘉靖戊午（三十七年，1558）乙榜举人，嘉靖壬戌（四十一年，1562）申时行榜进士。历给事中、副使，隆庆末任云南按察使（鄂尔泰等《云南通志》卷一八上）。

文　作　隆庆戊辰（二年，1568）罗万化榜进士，倜傥有才略。任山西闻喜知县，清苦勤慎，洞悉民情（觉罗石麟等《山西通志》卷一〇〇名宦一八）。以治功擢武选郎、兵部主事，任云南大参。分守临沅时，罗雄（今云南罗平县）土舍弑父据险，潜谋不轨，奉檄剿之。贼党再叛，复平之。上闻，升广西布政使司加一品服俸。卒葬长里某地。

刘养充　隆庆辛未（五年，1571）张元抃榜进士，万历元年（1573）任河南祥符（今属开封市）知县（王士俊等《河南通志》卷三三职官四），官至广东道监察御史。大差贵筑（今贵阳市）时，土司构乱，以巨万贿送私室，悉绝之。后转临巩（今兰州附近）兵备，补筑长城百里，衣惟布衣，边饷丝毫无所减。边人感其廉肃，钦附甚众。以积劳殉于边，余图书数箧而已。卒时，途悲巷哭，虽毡裘之伦亦遣使致吊。归葬白里螺迴坝。

文　德　万历甲戌（二年，1574）孙继皋榜进士（按：《四川通志》卷三四记为万历庚辰〈八年，1580〉进士），授湖广麻城（今湖北麻城）令，有善政。后官至监察御史，巡按山西，有直声。典晋试亦得士心。崇祀山西名宦祠。然终于场屋，不竟其用，人咸惜之。卒葬长里大坝。

况上进　万历丁丑（五年，1577）沈懋学榜进士（按：《四川通志》卷三四记为万历己丑〈十七年，1589〉进士）。仕至直隶巡按（傅泽洪《行水金鑑》卷三八）、江南道监察御史。卒葬白里陶家坝。张廷玉《明史》卷二二一列传一〇九李祯传、卷二二四列传一一二蔡国珍传载其弹劾兵部左侍郎李祯庸鄙、吏部尚书蔡国珍八罪之事。

何　伟　字汝器，万历癸未（十一年，1583）朱国祚榜进士，新喻县（今江西新余市）人，寄籍涪州。授慈溪令，宽和为治。秩满，召拜给事中（嵇曾筠等《浙江通志》卷一五二名

宦七)。万历二十七年(1599),任惠州知府(郝玉麟等《广东通志》卷二七职官二)。后以岭东参议升贵州参政(鄂尔泰等《贵州通志》卷一七秩官)。分守贵筑(今贵阳市)时,以征苗筹饷功擢方伯,因母老乞归。卒葬白里石二坵。著有《何伟诗文集》(亦称《何氏家训诗文集》)。

曹愈参　字坤釜,一说字古清,万历丙戌(十四年,1586)唐文献榜进士。授黄冈令,躬俭约政,狱讼衰止,以卓异擢吏部考功主事(迈柱等《湖广通志》卷四三名宦)。万历三十九年(1611)任昌平兵备道,停矿税,捕盗贼,除强暴,清营蠹,兴利除害,军民怀德,建生祠祀之(李卫等《畿辅通志》卷五九职官、卷六七名宦)。历官参政、河南按察司副使(王士俊等《河南通志》卷三一职官二)、云南巡抚(鄂尔泰等《云南通志》卷一八上)、都察院佥都御史等职。虽至方伯,家如寒素,平生不欺,有"一路福星"之谣。卒葬长里葛树溪。

杨景淳　万历己丑(十七年,1589)焦竑榜进士。万历二十二年(1594)任荆州教授,与雷思霈等修葺郡志,以博学洽闻著,升国子监博士(迈柱等《湖广通志》卷四四名宦)、户部郎中。今南京博物院藏万历三十六年(1608)由宫中太监据利马窦蓝本摹绘的彩色世界地图《坤舆万国全图》有其序文一篇,署"蜀东杨景淳"。

张与可　万历己丑(十七年,1589)焦竑榜进士,历任河南归德府(今商丘)知府、按察司副使,于乡多义举。天启间,涪州龟龙关滩势汹汹,常覆舟,捐俸凿削,患稍息;沙溪沟春水暴涨,冲溺无算,倡捐建桥,州牧韩邦哲(湖北黄州举人)额以"永赖"二字。卒葬白里双石桥。

陈　策　万历间(1573－1619)进士,武隆县人,涪州名籍(按:《四川通志》卷三四记为嘉靖壬辰〈十一年,1532〉进士,忠州人)。任云南巨津州(治今丽江县西北巨甸)知州。

向　鼎　字六神，天启乙丑（五年，1625）余煌榜进士。崇祯间官长兴令、浙江提刑按察司佥事（嵇曾筠等《浙江通志》卷二六学校二、卷一一八职官八）、分守上荆南兵备道（迈柱等《湖广通志》卷二八职官），刚直不阿，多治绩。岁旱，尝代涪民输一年赋捐建水塔，遇贼变而止。卒葬文里东青驿。

刘起沛　崇祯戊辰（元年，1628）刘若宰榜进士，大理寺卿。卒葬钱家塆。

陈　正　字岷水，崇祯庚辰（十三年，1640）魏藻德榜进士，浙江金华府推官。

二、清代（共41人）

（一）文科36人：

文景藩　康熙癸丑（十二年，1673）韩菼榜进士。卒葬白里杨家塆。

何有基　雍正癸丑（十一年，1733）陈倓榜进士。官湖北沔阳州（今仙桃市）知州。卒葬州西黄溪口。

任国宁（按：《四川通志》卷三四记为铜梁县人）　雍正癸丑（十一年，1733）陈倓榜进士。官北京刑部主事。卒葬长里马羊坪。

邹锡彤　雍正乙卯（十三年，1735）举人，乾隆丙辰（元年，1736）金德瑛榜进士。任山西襄垣县知县，才识练达，劝课农桑，县无游民。万邑、安泉两县民因争界聚众戕官，上命星驰办理议剿，彤与潞安李太守力请鞫办，贷死者数千人。后荐升云南迤东道，卓著循声。乾隆三十七年（1772）在贵州铜仁创建铜江书院。卒葬云阳县盘沱。

周　煌　字景垣，号海山，乾隆丁巳（二年，1737）恩科于敏中榜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四年，任八旗通谱馆纂修。十五年，充国史馆纂修。二十年，偕侍讲全魁册封琉球国王

尚穆，二十二年使还。寻迁右中允侍讲、兵部侍郎，充浙江乡试主考。四十四年，擢工部尚书。四十五年，移兵部尚书。四十七年，命为上书房总师傅。未逾年，以不胜罢，充《四库全书》总阅官。四十九年，调左都御史。五十年，以病乞休，诏以兵部尚书加太子少傅致仕。寻卒，进太子太傅，赐祭葬，谥文恭。葬长里明家场七贤塆。著有《琉球国志略》十六卷、《海山存稿》内集八卷外集十二卷、《海东集》二卷续一卷及《豫章集》、《应制集》、《蜀吟》等行世。善行楷，得颜书堂奥，功力深厚，笔法遒劲，有大气象。《清史稿》卷三二一、薛天沛《益州书画录》等有传。

张　煦　字春晖，乾隆丁巳（二年，1737）恩科于敏中榜进士。任山西蒲县知县。卒葬白里鹤遊坪马蹄穴。

刘为鸿　字天衢，乾隆己未（四年，1739）庄有恭榜进士。官广西郁林州知州。

徐五书　字素存，乾隆辛未（十六年，1751）恩科王杰榜进士。任越嶲厅（今四川凉山州越西县）教谕。卒葬长里龙头山。

邹锡畴　字范禹，乾隆壬申（十七年，1752）恩科秦大士榜进士。任浙江遂安、萧山等县知县。

陈于午　字凉松，号蕉园，乾隆丁丑（二十二年，1757）蔡以台榜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未赴散馆试，即告归。数诲生徒，循循善诱，不苟言笑，盛暑衣冠，乡党咸钦之。卒葬白里鹤遊坪。

陈鹏飞　字之南，乾隆癸未（二十八年，1763）秦大成榜进士，聪慧颖悟。凡作一艺，独开生面。士类为文，力追先正。任山东曹县、莱芜等县知县。幼年失怙，母性严。母怒，必长跪，俟解乃起。及成进士，宰莱芜，迎养三载。母卒，庐墓三年。仲父无子，爱季父子，立为后，众侄意不悦，乃皆量给产以

安之，而浮议稍息。飞乃推所得产让争者，众始贴然。卒葬长里朱家坪。

张永载　字二水，乾隆丙戌（三十一年，1766）张书勋榜进士。任河南罗山、上蔡等县知县。

周兴岱　字冠三，号东屏（一作坪），周煌次子，擅书法。乾隆辛卯（三十六年，1771）黄轩榜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编修、武英殿提调官。平匪有功，累迁侍讲学士，礼、吏、户诸部侍郎，充江西考官，擢内阁学士。嘉庆十四年（1809）晋都察院左都御史卒，葬长里插旗山。事见《清史稿》卷三二一、薛天沛《益州书画录》等。

文　楠　字璞园，乾隆壬辰（三十七年，1772）金榜榜进士，甘肃候补知县。卒葬长里花垣坝。

熊德芝　字露田，乾隆壬辰（三十七年，1772）金榜榜进士。历官河南襄城知县、许州知州。乾隆五十二年（1787），任贵州仁怀县知县。卒葬长里罗汉桥。

周宗岐　字对岩，乾隆乙未（四十年，1775）吴锡龄榜进士。任翰林院编修，校有《三命通会》（明万育吾撰，见《四库全书》本）等书。卒葬长里黄溪口。

潘履谦　乾隆庚戌（五十五年，1790）恩榜进士，赐翰林院检讨。

陈　煦　字晓峰，嘉庆辛酉（六年，1801）恩科顾皋榜进士。历任江西信丰、南昌等县知县，吴城同知，凤阳府知府，调安徽安庆府署赣南道。父廷璠宰滕县告归，迎养，丧葬尽礼。叔廷达官德庆，弟昉官上杭，公亏累累，悉代偿之。母王氏外戚，家多贫，以俸金分赡之。卒葬长里曾家坝。

陈廷达　嘉庆辛酉（六年，1801）恩科顾皋榜进士。官广西宜山、崇山等县知县，广东平州知州。

陈永图　字固庵，乾隆戊申（五十三年，1788）举人，嘉

庆壬戌（七年，1802）吴廷琛榜进士。官湖南永兴、宜章等知县，三次充乡试同考官。博通经史，为文力追先正。以经术造士，门下登甲乙科甚众。所得石承藻、黄德琏辈，皆负重名。主持纂修《宜章县志》，著《章水唱和集》行世。卒葬长里花园（一作垣）坝。

陈伊言　字莘畲，嘉庆乙丑（十年，1805）彭浚（一作俊）榜进士。

刘邦炳　字寅谷，嘉庆戊辰（十三年，1808）吴信中榜进士。官广西海康县知县。著有《海上吟》一卷。卒葬白里尖山子。

张　进　字以渐，嘉庆己巳（十四年，1809）恩科洪莹榜进士。任四川龙安府（今平武县）教授。

邹　枏　字石岩，嘉庆戊辰（十三年，1808）恩科举人，嘉庆丁丑（二十二年，1817）吴其濬榜进士。任工部屯田司主事。卒葬长里小东溪。

陈　昉　字午垣，嘉庆庚辰（二十五年，1820）陈继昌榜进士。任翰林院庶吉士，福建福州、上杭、同安等县知县。卒葬长里苍蒲沟。

陈　𤊹（按：一作曦）　字春腴，道光壬辰（十三年，1833）恩科汪鸣相榜进士，笃学敦品，孝友成性。历任给事中、翰林院编修、山西道监察御使、江苏常镇道、河南河库道。出官河库道数年，道库耗羡岁数万金，毫无所取。丁父忧奔丧，同官资之，归至扬州卒。

陈　镕　字仲玉，道光癸巳（十二年，1832）吴锺骏榜进士。官浙江龙泉县知县。卒葬长里曾家坝。

毛凤五　同治乙丑（四年，1865）崇绮榜进士。官安徽望江县知县。重修《西河毛氏宗谱》二十卷。

周　淦　原名周銓，字子衡，同治乙丑（四年，1865）崇

绮榜进士。任河南灵宝、修武等县知县。主持纂修《灵宝县志》。

傅炳墀（1832－1891） 字子卿（一作鹄），一字练谱，号少岩，咸丰戊午（八年，1858）举人，同治乙丑（四年，1865）崇绮榜进士。历任云南邱北、陆凉、平彝、元谋等县知县二十余年，五次充云南乡试同考官，任《云南通志》总纂，进内阁中书。学识渊博，淹通经史，工诗文，书法直造晋唐，文名遍播滇黔，藉甚一时。著有诗文集《薇云山馆杂存》等，与吕绍衣、王应元合纂《重修涪州志》十六卷。光绪十七年（1891）在云南武定州遇土匪暴乱毙命。薛天沛《益州书画录续编》有传。

施纪云 原名缙云，字崔生，光绪癸未（九年，1883）陈冕榜进士。任施南知府、湖北提法使。总纂《涪陵县续修涪州志》二十七卷附民国纪事一卷。

周垣 光绪癸未（九年，1883）陈冕榜进士，署湖北咸宁、黄梅等县知县。

邹增祜 字受丞，光绪乙未（二十一年，1895）骆成骧榜进士，以即用知县分发广东新兴，升任嘉应直隶州知州加知府衔，两次奏保循良，传旨嘉奖。二十一年中日《马关条约》签订，曾作《闻和议定约感赋三首》，愤怒鞭鞑清朝统治者的卖国行径："（一）早有忧时语，无如幕燕嬉。南溟弃屏翰，东道失藩篱。曲突薪谁徙，危楼木岂支。舐糠须及米，深悔补牢迟。（二）圣主终神武，其如国贼何。元戎甘割地，上将竟投戈。漏瓮焦难沃，諺台债愈多。向来无一策，富贵只求和。（三）委肉当饿虎，虚名说善邻。金缯罗掘尽，匕鬯丧亡频。刑马要盟汉，输龙枉誓秦。徒闻天帝怒，麟阁尔何人？"（阿英编《甲午中日战争文学集》，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81页。）增祜平生研精汉学，淹通经史，词章典雅，诗文皆有师法，不同凡响。晚年承乃祖名医邹榻旧业，尤长于医学。著有《天风海水楼诗文集》、

《蕙言》、《医学丛钞》等书，与堂兄增吉齐名。

施　愚　光绪戊戌（二十四年，1898）夏同龢榜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光绪二十七年（1901），赴日、英、法、美、德等国游学，五年后返国旅居北京，充宪政馆委员，任职于度支部、邮传部、法制院等。民国回籍，隐没不仕。

方　正　字守之，光绪戊戌（二十四年，1898）夏同龢榜进士，博学能文。任贵州天柱县知县，庚子（1900）、辛丑（1911）两次充乡试同考官。著有《磨砚斋诗文集》。

萧　湘　光绪癸卯（二十九年，1903）王寿彭榜进士，授刑部主事，升员外郎，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回国后任四川谘议局副议长，主张立宪。宣统三年（1911年），为聚奎学堂堂长邓鹤翔起草《聚奎学校为白沙首义布告全川父老文》，率白沙（今江津市白沙镇）市民起义。

（二）武选5人：

夏　瑀　康熙壬辰（五十一年，1712）科进士，安徽安庆府水师营守备。卒葬长里杨家林。

余　藻　光绪庚辰（六年，1880）科进士，花翎侍卫。

潘从福　光绪癸未（九年，1883）科进士，蓝翎侍卫，授陕西鄜州（今富县）都司。

何炳烈　光绪甲午（二十年，1894）科进士，绥宁右营守备。

汪洋叙　光绪乙未（二十一年，1895）科进士，绥宁中营都司。

综上所述，明清两代，涪州共考取进士75人。其中，明代34人，以嘉靖、万历两朝为多，占13人；清代41人，以乾隆、嘉庆、光绪三朝最盛，占31人。他们或执策台阁，清廉正直，为朝廷所倚重；或掌管地方，明达干练，为百姓所爱戴；或充任教官，才识淹博，为士子所敬慕；或带兵守土，严毅果敢，为部

属所钦服，都在各自的领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于政治清明、文化传承、国家安定、社会进步有功斯大，是我们今天仍然应该学习的榜样。

（原载《重庆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收入本书时有修改）

高应乾及其《白鹤梁观石鱼》诗的时代考断

高应乾诗，今存一首，题为《白鹤梁观石鱼》：“访胜及春游，双鱼古石留。能观时显晦，不逐浪沉浮。守介难投饵，呈祥类跃舟。胥归霖雨望，千载砥中流。”《全宋诗》第72册、卷三七七九李洪波先生据清代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卷八三整理辑入了该诗，传云：“高应乾，字侣叔，涪州（今四川涪陵）人（清同治《涪州志》卷一五）。”[1]；《宋代蜀诗辑存》据“清同治《重修涪州志》卷一五”也同样将该诗采入其中，按作者籍贯分县排列编次于“涪陵市”下，传云：“高应乾字似叔，生平不详。”[2]覆核原文，在《八琼室金石补正》卷八三所收宋代涪州“石鱼题刻一百段”里确有该诗，置“何宪等诗”与“杨太守诗”之间[3]，杨殿珣先生《石刻题跋索引》将其一并附于“宋末”[4]；而同治《涪州志》，除了在卷一五《艺文志·古今体诗一百八十五首》所录苏轼、陆游、范成大等13人17首宋代诗歌中确有该诗，排马提幹《涪州十韵》后、张士环《张桓侯刁斗》前，只是题下小传作“西陵人高应乾侣叔”[5]，诗人籍贯与前二书不同（按：《蜀诗辑存》谓高字“似叔”，系编著者读“侣<侣>”为“侣<似>”致误。）外，卷二《舆地志·碑目》也是将其列入宋代，排“刘叔子诗序”、“王庶诗”之间，云：“高应乾诗镌白鹤梁”[6]。可见，自晚清同治以来直至现在，人们一般都是把高应乾及其《白鹤梁观石鱼》目为宋人与宋诗

的。

然而，事实果真如此么？今年初始，笔者因故从事白鹤梁题刻文字的校理工作，通过反复审读原诗，并且广泛查证相关记载之后认为，相沿已久的以高应乾《白鹤梁观石鱼》为宋人宋诗的观点应予完全否定。具体理由如下：

一、诗歌最后两句存在的疑点

《白鹤梁观石鱼》尾联云："胥归霖雨望，千载砥中流。"从诗意看，"千载"为"双鱼古石留"距离高氏"访胜及春游"赋题该诗的时间约数。而涪州（按：原四川省涪陵市，今重庆市涪陵区）水标石鱼，最早为"唐代所见鱼"，简称"唐鱼"。历史考古学界根据宋代乐史《太平寰宇记》等文献资料及白鹤梁上现存的开宝四年（971）谢昌瑜等题记的记载，一致认为其初刻年代当在唐代的广德二年（764）及其以前[7]。倘若高应乾真是宋代人，其观鱼赋诗至迟不会晚于祥兴二年（1279），距离"唐鱼"出现的最早可能时间武德元年（618）也仅有六百多年，去"千载"差之远矣，何敢言之？尽管，诗歌有诗歌的语言特性，也允许夸张，但纵观全诗的纪游性质和记实偏向，"千载"二字不能不让人放心不下，疑窦顿生。

二、原始文献未包含时间信息

本文首段举证材料显示，《全宋诗》、《宋代蜀诗辑存》等之所以将高应乾诗作为宋代诗歌加以辑录，主要是甚至可以说完全是因为采信了陆氏《八琼室金石补正》和同治《涪州志》的判断。那么，此二书又是依据什么把高应乾诗列为宋代的呢？笔者通检再三亦不得而知。在进一步广泛查阅《涪州石鱼文字所见录》（清姚覲元、钱保塘，上海国粹学报社 1912 年古学汇刊本）、《宋人传记资料索引》（昌彼得、王德毅等，中华书局 1988 年）、《宋人传记资料索引补编》（李国玲，四川大学出版

社1994年）、《中国地方志宋代人物资料索引》（沈治宏、王蓉贵，四川辞书出版社1997年）、《中国地方志宋代人物资料索引续编》（王蓉贵、沈治宏，四川辞书出版社2002年）、《中国人名大辞典》（臧励龢等，商务印书馆1933年）、《中国历代人名大辞典》（张撝之、沈起伟、刘德重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等等相关诸书，仍然一无所获、不见有高应乾其人其诗的丝毫记载的情况下，笔者循由同治《涪州志》卷二“高应乾诗镌白鹤梁”一句提供的线索最后对原始文献——白鹤梁石刻的该诗碑文或碑文拓片、拓片图录作了查勘。虽然，由于白鹤梁题刻在三峡工程建成后将被淹没在30多米的江水之下，目前正采用“无压容器”方案对其进行原址水下保护，处于封闭施工状态，根本无法实地勘验。但从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清代缪荃孙艺风堂碑文拓片涪州石魚题刻《高应乾诗》[8]和《长江三峡工程水库水文题刻文物图集》、《水下碑林白鹤梁》等公开出版物中所载高诗的碑文拓图及相应文字资料[9]来看，石刻内容原本非常简单：除了刻录诗歌（同前），就是落款“西陵人高应乾侣叔氏题”，并无任何可以判断赋诗留题年代的时间信息。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对《高应乾诗》这同一件作品的断代上，《图集》和《白鹤梁》却是将其归入清代。这就更加显示出《八琼室金石补正》、同治《涪州志》存在误判误收的可能性。

三、关于诗人年代的明确记载

鉴于高应乾其人其诗在断代上实际存在或宋或清的两歧现象，而宋代说又存在疑点、晚而无据，不足以让人采信，笔者遂将查阅重点转而指向清代。虽然，和宋代一样，在有关清人的史传杂著、地方书志乃至诗歌总集如徐世昌《晚晴簃诗汇》中依然不见有高应乾侣叔氏的任何记载，笔者却在一则素以水文价值高而著称的白鹤梁清人题刻——《萧星拱重镌石鱼记》[10]中有了一点发现。萧氏记云：

涪江石鱼，镌于波底，现则岁丰，数千年来传为盛事。康熙乙丑春，五水落而鱼复出。望前二日，偕同人往观之，仿佛双鱼蕖莲隐跃。盖因岁久剥落，形质模糊几不可问，遂命石工刻而新之，俾不至湮没无传，且以望丰亨之永兆云尔。时同游者旧黔令云间杜同春悔川，州佐四明王运亨元公，盱江吴天蘅口口、何谦文奇，西陵高应乾侣叔，郡人刘之益四仙、文珂奚仲。

涪州牧盱江萧星拱薇翰氏记略

题记不仅有明确的年代信息："康熙乙丑（按：二十四年，1685）春"，而且也明确记载了"西陵人高应乾侣叔"为"时同游者"之一。为慎重起见，笔者又查找了题记所载当时同游诸人中高氏之外其余数人的有关材料，兹将所获胪列于后，以为辅证：

1.《大清一统志》卷三七五《东川府·名宦》："本朝萧星拱，南城人，康熙四十一年任知东川府，勤于政事，整顿地方。以东川土地空旷难守，乃于东门截筑土城约退三十余丈，捍卫赖之。"（和珅等撰，《四库全书》本，史部第483册第65页）

2.《四川通志》卷三一《皇清职官》载：萧星拱，江西吏员，康熙十九年、二十三年二任涪州知州，康熙二十一年任忠州知州，三十年任重庆府知府；又，杜同春，江南拔贡，康熙五年任黔江县（按：时属酉阳州，与涪州、忠州同隶重庆府）知县。（黄廷桂、张晋生等纂修，《四库全书》本，史部第560册第666、669－671页）

3. 同治《涪州志》卷首《附录旧志纂修姓氏》：康熙庚子（按：当为"癸亥"，详下条）年纂修邑人刘之益、何詵虞、文珂、陈命世、夏道硕、向牖螭；卷五《秩官志·国朝秩官·知州》：萧星拱，江西人，康熙十九年任，重修学宫补修官署；卷

五《秩官志·国朝秩官·吏目》：王运亨，吏员，浙江人。（吕绍衣、王应元纂，《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第46集，巴蜀书社1992年影清同治九年<1870>刻本，第481、502、508页）

4.《民国涪陵县续修涪州志》卷二七《序录·旧序》载：《康熙癸亥年（按：二十二年，1683）续修州人刘之益序》、《康熙癸亥年续修州人文珂序》。（王鑑清、施纪云纂，《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第47集，巴蜀书社1992年影民国十七<1928>年铅印本，第193－194页）

5. 涪陵白鹤梁题刻碑文拓图《萧星拱（观）石鱼记》："涪江之心有石鱼，春初鱼见，可卜丰稔。州之八景云'石鱼兆丰'者，即其所也。甲子春正月，忠州守朱世兄自巴渝返舟过此。其尊人与余谊属师弟，而其叔朱羽公讳麟祯者[11]，初官于涪，士民德之，亦尝来此。余因携觞偕往，以续旧游。见石鱼复出，则是年之稔可知，因举觞相庆曰：国之重在民，民之重在食；而食之足，又在乐岁之有余。则吾侪之此一游也，非但以游观为乐，直乐民之乐也云尔。于是乎记。大清康熙二十三年甲子春正月二十九日，同游知忠州事三韩商玉朱囗囗、浙江慈溪寅囗周囗囗。郡守盱江萧星拱题"[12]。

综合上述，足够断明：高应乾实为清人，而其《白鹤梁观石鱼》诗，亦当是赋于"康熙乙丑"与萧氏等同游之时。要之，晚清迄今《八琼室金石补正》、同治《涪州志》、《全宋诗》、《宋代蜀诗辑存》诸书相沿已久的以高应乾《白鹤梁观石鱼》为宋人宋诗的错误观点应予澄清。

注释：

① 傅璇琮等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5613页。

② 许吟雪、许孟青编著，四川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50页。

③（清）陆增祥编撰，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第587页。
④ 商务印书馆1957年增订本，第474页。
⑤（清）吕绍衣、王应元等修纂，《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第46集，巴蜀书社1992年影同治九年（1870）刊本，第678页。
⑥ 同注⑤，第466页。
⑦ 详《长江上游宜渝段历史枯水调查——水文专题之一》："白鹤梁石鱼枯水水位标志的辨识"，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等《水文、沙漠、火山考古》，文物出版社1977年版，第15－17页；《白鹤梁题刻》，蒲国树等《涪陵市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95页。
⑧ 典藏编号：21595a：113，钤有"荃孙所得金石"阳文朱印。
⑨ 见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编《长江三峡工程水库水文题刻文物图集》，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05页，拓图编号：123；陈曦震主编《水下碑林白鹤梁》，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1页，拓图编号：146，题作"高应乾题记"。
⑩ 见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等《水文、沙漠、火山考古》，文物出版社1977年版，第19页；陈曦震《水下碑林白鹤梁》，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4页，拓图编号：129；重庆市涪陵区政协《世界第一古代水文站——白鹤梁》，中国三峡出版社1995年版，第18－19页；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编《长江三峡工程水库水文题刻文物图集》，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04页，拓图编号：122；重庆市博物馆编《中国西南地区历代石刻汇编·四川重庆卷》第二册，天津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63页。
⑪ 按，《四川通志》卷三一：朱麟贞（祯），辽东荫生，康熙三年任涪州知州。见《四库全书》本，史部第560册第671页。
⑫见陈曦震《水下碑林白鹤梁》，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1－132页，拓图编号：127；重庆市涪陵区政协《世界第一古代水文站——白鹤梁》，中国三峡出版社1995年版，第57页；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编《长江三峡工程水库水文题刻文物图集》，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04页，拓图编号：121；重庆市博物馆编《中国西南地区历代石刻汇编·四川重庆卷》第二册，天津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62页。

（原载2006年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辑刊》）

冯镇峦的“涪陵”籍贯与《聊斋》评点

冯镇峦是清代著名的《聊斋》批评家，在中国小说批评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但人们对他的研究却很不够。本文试图就其籍贯和小说批评做一些探索性的工作，以就教于方家。

冯镇峦；籍贯；《聊斋》评点

一、冯氏籍贯志疑

冯镇峦，字远村，约生活于乾隆道光年间，清代著名小说评点家。其《聊斋志异》评点，向为论者所重，是该书众多评本中最为驰名者之一，在中国古代小说理论和小说批评中有着极其特殊的意义。然笔者发现，时至今日，人们对冯氏籍贯之认定可能存在着以讹传讹的重大偏差。

关于冯氏的籍贯，并无歧说。只是通常情况下人们少有提及。如：敏泽《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一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聊斋志异鉴赏集》（本社一九八三年）、黄葆真蔡钟翔等《中国文学理论史》（北京出版社一九八七年）、于天池《明清小说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王镇远《清代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王增斌《中国古代小说通论综解》（中国文联出版公司一九九九年）等书，在评价冯氏或引其妙语时，均未及其籍

贯。偶有述及者，则率称其"涪陵人"也。如：陈乃乾《室名别号索引》（中华书局一九八二年）页七七"晴云山房"条，著录其主人为"清涪陵·冯镇峦"。又，朱一玄等《聊斋志异辞典》（天津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一年）页六八三《附录》引冯氏语评王士祯之《聊斋》批评时称"涪陵冯镇峦说"，并在著录四川图书馆藏《聊斋志异》"光绪十七年合阳喻焜刻四家合评三色套印本"之题解中特别推介冯氏云："冯镇峦，字远村，四川涪陵人，据喻焜序介绍，他曾经'一官沈黎，寒毡终老'，大概也是个终身不得志的文人，曾著有《晴云山房诗文集》、《红椒山房笔记》、《片云诗话》等刊行于世"。今人近作孙琴安《中国评点文学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一九九九年）页二九〇在叙论冯氏之《聊斋》评点时仍谓"冯镇峦字远村，涪陵（今四川涪陵）人，约生活于清嘉庆年间。"（按：一九九六年九月，经国务院批准，四川省已将涪陵市、万县市、黔江地区委托重庆市代管；一九九七年三月十八日，八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批准设立重庆直辖市。孙著脱稿于此后，括号内今地名注当作"今重庆涪陵"。）然通检冯氏后之涪陵方志，无论是清同治九年（1870）吕绍衣等所修《涪州志》（巴蜀书社影印本《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集四六，一九九二年），还是现今涪陵方志办编纂的《涪陵市志》（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五年），均不见有关冯氏的任何记载。

《涪陵市志》页九二"总论"云："以涪陵名县，始于两汉，其县治之地在今四川彭水县郁山镇……今涪陵得名则因政区建置演变而沿袭旧称而已。"页九四"建置沿革"又云："清置涪州，隶川东重庆府，治今涪陵市城区。涪陵初领武隆、彭水两县。圣主康熙七年（1668）省武隆县为镇入涪州，于武隆县置武隆巡检司。"鉴于历史上武隆、彭水曾隶涪州，而涪陵县治亦曾置于彭水等记载，笔者遂又查阅由武、彭两县县志办编纂、四川人民

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出版的《彭水县志》和《武隆县志》（按：据本志页六二一述，武隆县历史上未曾修志）及清光绪元年（1875）庄定域修《彭水县志》（巴蜀书社影印本《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集四九，一九九二年），亦不见有关于冯氏之记载。又疑冯氏或为在历史的建置沿革上与涪陵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涪陵周边其它县籍而误入涪陵籍，遂又进一步扩大范围，翻检垫江、南川、长寿、丰都诸《志》，俱无记载。而函告近曾赴渝、今尚健在的上海社科院孙琴安先生，望能具道所以以补粗漏，亦是泥牛如海。

由是，愈疑。想昔前人素有以古地名称籍之习，如梅尧臣籍世称宛陵非曰宣城、萨都剌称籍雁门非曰代州者，冯镇峦远村之“涪陵”籍贯亦或本为某地古称，后人疏忽，遽以为即当下与其相同的“今地名”而以今冠贯古乃致错讹亦未可知。

臧励龢编《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一九三一年）页八二〇“涪陵县”条云：“汉置。晋废。故城在今四川彭水县治。……战国楚枳邑。汉置枳县。北周废。隋改曰涪陵县。唐于县置涪州。寻曰涪陵郡。又曰涪州。宋曰涪州涪陵郡。元以州治涪陵县省入。明属四川重庆府。清因之。民国改州为涪陵县。属四川东川道。”同页“涪陵郡”条云：“三国蜀置。治涪陵县。晋徙废。即今四川彭水县治。⊙晋徙置。在今四川涪陵县西。北周徙治汉平。在今四川涪陵县东南。唐废。改置涪州。寻曰涪陵郡。治今涪陵县。宋曰涪州涪陵郡。元为涪州。今废。⊙隋置。治石镜。唐废。即今四川合川县治。”同书页二九〇“合川县”条云：“汉置垫江县。西魏改曰石镜。于县置合州。隋改合州曰涪州。又改州曰涪陵郡。唐复曰合州。又改曰巴川郡。复改合州。宋改县曰石照。仍曰合州巴川郡。元复为合州。明初以州治石照县省入。属四川重庆府。清因之。民国改州为合川县。属四川东川道。”同页“合州”条云：“西魏置。取

涪汉二水合于此。故名。”又，清嘉庆道光间王梦庚、寇宗修纂《道光重庆府志》（成都巴蜀书社影印 本《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集五，一九九二年）卷一舆地志载：涪州“战国时楚枳地。汉置枳县，属巴郡，后汉仍之。蜀汉置涪陵郡。晋永和中徙涪陵郡至汉复城，宋齐因之。周废枳县，移郡治汉平。隋开皇初郡废，十三年仍移汉平县于涪陵镇，改曰涪陵县，属巴郡。唐武德元年改州省陵字，属江南西道。天宝初曰涪陵郡。乾元初复曰涪州。宋仍曰涪州涪陵郡，属夔州路。元至元二十年以州治涪陵县省人，二十一年改属重庆路。明属重庆路。今因之。”据同《志》，合州“古巴子故都。秦为巴郡地，汉置垫江县，属巴郡。后汉因之。建安六年改属巴郡。蜀汉建兴十五年还属巴郡，晋因之。宋元嘉中置东宕渠郡。西魏恭帝三年改郡曰垫江县曰石镜，又于郡置合州。隋初郡废，开皇末改州曰涪州，大业初又改州曰涪陵郡。”此外，明曹学佺《蜀中名胜记》（重庆出版社一九八四年）卷之十九上川东道“合州”条引《图经》云：“魏之合州石镜县，隋之涪州涪陵郡，唐之合州巴川郡，宋之合州石照县，皆理此。”暨“垫江县”条下引蔡松年《南史补》曰“汉之垫江，今之合州也。合州置自西魏，及隋炀帝，改合州为涪陵郡，于是移垫江之名于桂溪县。”并引孟康注《地理志》曰：“垫江之垫，音重迭之迭。”等，亦可参证。可见，“涪陵”古称，既可指清之涪州即今重庆涪陵，亦可指清之合州即今重庆之合川。冯氏之籍贯“涪陵”，相沿已久，当自有来历，必为两地之一。今既不能证其为涪陵，则极有可能便是合川。

查合川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合川县志》（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五年），虽无冯氏传介及文存，然页六七三“喻家书房”条记载：“民国时期东渡乡喻家（按：今重庆合川市官渡镇喻家乡），选天下书目判为精者刻板印刷，于县城柏树街门市部

出售。如所刻的《聊斋志异冯但合评》、《东周列国志》套红版，为其佳品，今人视为善本。其最富特色的是刻板印刷县人著作，有：张乃孚《小白桦山馆诗钞》、《问宾余草》，皆以手写本木刻，颇具明代人小集风格；冯镇峦《晴云山房集》、《晴云山房笔记》、《红椒山房笔记》，用宋体字刻板；蒋壁芳《见所见斋文抄》、《史论》以坊间体刻板。”查《聊斋志异》汇校汇注汇评本（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七八年）“各本序跋题辞”，合阳喻焜序中正有“吾合冯远村先生手评是书”之语。再查《道光重庆府志》，卷七《选举志》载云：“冯镇峦，合州人。清溪（按：今四川汉源[①]）教谕，乾隆五十七年（1792）壬子科举人。”卷九艺文志著录《远村诗文集十八卷》曰：“合州冯镇峦著。余（按：即修志人王梦庚）入蜀即耳熟合阳（按：合阳即合阳镇，位于合州中南部，城邑始建于春秋时期，秦灭巴蜀置巴郡垫江县后重建，历代均为郡、州、县、市治所驻地。杜子美《送祁录安归合州寄苏使君》诗、《万历合州志》、《嘉庆一统志》、《舆地纪胜》、《合川县志》等资料文献有载。）冯远村名，知其好学深思，沈博淹贯。尤善为诗、古文词，力志于古，不屑务涂泽钩棘之习，而苦未之见也。洎道光丁亥分守打箭炉道出清溪，适远村司铎其地，急造访焉，挹其言论丰采，慰藉平昔钦迟之念，乃得读其近作并晴云山房杂录数卷，其全豹则未之窥也。自是彼此唱酬之作，邮递往来，无虚旬日。暨遽归道山，途（按：当作“余”）亦调任。”据上，冯氏之籍贯“合州”（今重庆合川）当是明矣。

要之，冯镇峦之籍贯“涪陵”，盖用隋季古称，实为当时之合州即今日之重庆合川。近世以来，陈乃乾谓为“清涪陵”、朱一玄并孙琴安等又署为今之“四川涪陵”云云，皆误。

二、冯评《聊斋》读识

冯镇峦自谓“平生喜读《史》、《汉》，消闷则唯《聊

斋》"[1]，故对《聊斋》一书相当精熟，觉得《聊斋志异》的最早评点者王士祯的评点"亦只循常，未甚搔着痛痒处"[1]，不惟太过简略，且少画龙点睛之笔，多一般性套语，不无"率笔应酬"[1]之嫌，因而重加评点。

冯氏评点作于清嘉庆二十三年（1818），是王士祯之后何守奇、但明伦、王金范等《聊斋》十一家评点中最早也最具有代表性的一家。其自称："予尝评阅数过，每多有会心别解，不作泛泛语，自谓能抓着作者痛痒处。"[1]冯镇峦的《聊斋》评点，除了一部分尾批和双行夹评之外，还写有《读聊斋杂说》一文，对《聊斋》其书作了全面概括的论述，有类于金圣叹的《读第五才子书水浒传法》，可谓对全书的总评。他作评的方法也很奇特，"每饭后，酒后，梦后，雨天，晴天，花天，或好友谈后，或远游初归，辄随手又笔数行。"[1]据四川图书馆藏《聊斋》四家合评三色套印本喻焜序介绍，冯氏作评后，"建南黄观察见而称之，谋付梓未果"，后仅以抄本形式在四川一带广为流传，"尚多副本"。直到光绪十七年（1891），合阳喻焜"于亲串中偶得一部阅之"，"爱其随处指点，或一二字揭出文字精神，或数十言发明作者宗旨，不作公家言、模棱语，自出手眼，别具会心"，认为"洵可与但氏新评并行不悖"，始汇王士祯、冯镇峦、何守奇、但明伦四家评于一本而刊行之。

冯镇峦的批评首先针对当时袁枚、纪昀等文化名人兼志怪小说作者对《聊斋志异》的指责非议而发。袁枚《子不语·序》曰："文史外无以自娱，乃广采游心骇耳之事。妄言妄听，纪而存之，非有所惑。"自称其写作志怪小说当以纪事为主，只为游戏消遣。纪昀则不但强调客观叙事的重要，把小说中的虚构故事斥为"诬谩失真，妖妄荧听"[2]，把小说的范围局限于"博采旁搜"地"叙述杂事"、"记录异文"、"缀辑琐语"[2]，而且进一步把小说的作用归结为"寓劝戒、广见闻、资考证"[2]，强调写

作当“不乖于风教”[3]（《姑妄言之序》），“有益于劝惩”[3]（《滦阳消夏录序》），遂对蒲松龄在谈狐说鬼的虚构故事中揭露现实、寄寓“孤愤”[4]大为不满，把《聊斋》斥为“诬谩失真，妖妄荧听”、“猥鄙荒诞，徒乱耳目”[2]，并在其总纂的《四库总目提要》中对该书置若罔闻，黜而不载。对此，冯镇峦尖锐指出：“柳泉《志异》一书，风行天下，万口传诵，而袁简斋议其繁衍，纪晓岚称为才子之笔，而非著述之体，皆訾言也。先生此书，议论纯正，笔端变化，一生精力所聚，有意作文，非徒纪事。”[1]他肯定《聊斋志异》是蒲松龄自觉的文学创作，而不是仅仅以文纪事。并批驳纪昀的错误观点道：“《聊斋》以传记体叙小说事，仿史、汉遗法，一书兼二体，弊实有之，然非此精神不出，所以通人爱之，俗人亦爱之，竟传矣。虽有乖体例可也。纪公《阅微草堂》四种，颇无二者之病，然文字力量精神，别是一种，其生趣不逮矣。”在此基础上，冯镇峦进一步认为，《子不语》、《阅微草堂笔记》等无法同《聊斋志异》相比，《聊斋志异》“人竞传写，远迩借求”[1]，乃是当代最杰出的小说，“是书传后，效颦者纷如牛毛，真不自分量矣。无《聊斋》本领，而但说鬼说狐，侈陈怪异，笔墨既无可观，命意不解所谓。臃肿拳曲，徒多铺陈；道理晦涩，义无足称。不转瞬而弃如敝屣，厌同屎橛，并覆瓿之役，俗人亦不屑用之，比似《聊斋》，岂不相悬万万哉！是之谓自寻苦恼。予谓当代小说家言，定以此书第一，而其他比之，自桧以下。”显然，纪昀、袁枚等人囿于传统的史学观点浓厚的封建正统思想，排斥小说创作中应有的艺术虚构和典型化，而又硬塞了许多封建说教，代表了文言志怪小说创作中的一种保守、落后倾向。他们对《聊斋志异》的非议，不是简单的文字之争，而实际上反映了不同的志怪小说创作思想的斗争。冯镇峦敢于起来反对这些大人物的意见，这不仅对维护《聊斋志异》的地位十分重要，而且对保证我国志怪小说能沿着

健康的道路前进也具有重要意义。

冯镇峦在肯定《聊斋志异》时，对其艺术成就作了比较全面的分析。首先，冯镇峦抛弃正统文言小说观的落后成分，积极肯定了《聊斋》“似真似幻，诞而近情”[1]的非功利性艺术虚构的价值。他指出，《聊斋志异》“说鬼说狐，如华严楼阁，弹指即现；如未央宫阙，实地造成。”[1]一方面是幻想的天地，如弹指即现的华严楼阁，奇极幻极；一方面是现实的人生，似建造在实地上的未央宫阙，真境真情：两种成分相映成趣，合二为一，构成极浪漫又极富现实感的奇妙艺术世界。虽然，该小说所述的“时代人物，不尽凿空”，内容有一定的现实依据，但它主要是一部虚构小说，“意在作文，镜花水月”，因此读它“不必泥于实事”、“不作文章看，但作故事看，便是呆汉。”[1]其次，冯镇峦非常重视《聊斋志异》善于状人摹情、“描写刻画，似真似幻，实一一如乎人人意中所欲出”[1]的创作经验，对这部小说塑造形象的优点作了总结，并将刻画性格放在志怪小说创作的首位。《读〈聊斋〉杂说》云：“《聊斋》之妙，同于化工赋物，人各面目，每篇各具局面，排场不一，意境翻新，令读者每至一篇，另长一篇精神。如福地洞天，别开世界；如太池未央，万户千门；如武陵桃源，自辟村落。不似他手，黄茅白苇，令人一览而尽。”认为蒲松龄在形象创造上是“化工”，笔下人物各有自己独特的性格特点。《读〈聊斋〉杂说》又云：“昔人（按：此指金圣叹）谓：莫易于说鬼，莫难于说虎。鬼无伦次，虎有性情也。说鬼到说不来处，可以意为补接；若说虎到说不来处，大段著力不得。予谓不然。说鬼亦要有伦次，说鬼亦要得性情。谚语有之：‘说谎亦须说得圆。’此即性情伦次之谓也。试观《聊斋》说鬼狐，即以人事之伦次，百物之性情说之。说得极圆，不出情理之外；说得极巧，恰在人意愿之中。虽其间亦有意为补接、凭空捏造处，亦有大段吃力处，然却喜其不甚露痕迹牵强之

形，故所以能令人人首肯也。”所谓“说谎亦须说得圆”，就是说小说的虚构性必须合情合理，即使是描写神仙鬼魅也要符合情理。这实际上又接触了浪漫主义作品的真实性问题。它比起明末袁于令在《西游记题词》中所说的“天下极幻之事，乃极真之事；极幻之理，乃极真之理”来，显然切实细致得多了。再次，推崇蒲松龄“叙事变化，无法不备；刻划尽致，无妙不臻”[1]的高超创作技巧。冯镇峦通过深切详细的分析，肯定了《聊斋》文笔的准确高妙：“《聊斋》吐属，锦心绣口，佳处难尽言。如《邵女》篇媒妁之言，《司文郎》篇宋生之言，其他所在多有，不能一一详也。”[1]描写的生动妥贴：“写景如在目前，叙事节次分明，铺排安放，变化不测”[1]境界的新异变幻：“《史记》气盛，《聊斋》气幽”；“《聊斋》说鬼说狐，层现叠出，各极变化。如初春食河豚，不信复有深秋蟹螯之乐。及至持蟹引白，然后又疑梅圣俞不数鱼虾之语徒虚语也。”[1]并赞美其行文的整散、疏密、详略有度：“俗手作文，如小儿舞鲍老，只有一副面具。文有妙于骇紧者，妙于整丽者；又有变骇紧为疏奇，化整丽为历落，现出各种笔法。左、史之文，无所不有，《聊斋》仿佛遇之”；“作文有前暗后明之法，先不说出，至后方露，此与伏笔相似不同，左氏多此种，《聊斋》亦往往用之。”[1]而在各篇的尾批和夹评中，我们也同样可以类似的肯定性意见。如评《娇娜》中孔生形象的塑造：“仿佛《史记》荆轲刺秦王一段笔力”，“文字亦是闻霹雳手段”[4]。由上可见，冯镇峦的评点（尤其是总评之语）虽然也像金圣叹、毛宗岗等人一样，颇有发挥撒泼之处，但却非常符合《聊斋志异》这部短篇小说集的总体情况，与王氏评点味道显然不同，而且也都从小说的人物、布局、章法等处来评，通过积极肯定其杰出的艺术成就，将志怪小说理论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对于《聊斋志异》的思想内容，冯镇峦虽然有时也能点出

作者批判现实、背弃名教的某些方面，如《劳道士山》王生碰壁后“惭忿，骂老道士之无良”，冯氏夹评曰“墙壁能人，奸盗可为，头触而剖踣，道士所以全之也，何骂为？”[4]再如《阿宝》尾批，称孙子楚之于阿宝“与杜丽娘之于柳梦梅，一女悦男，一男悦女，皆以梦感，俱千古一对情痴。”[4]但大多是以正统儒家的道德观念为标准来衡量解释作品的意义，很少有一种新的发展的观念来对待小说中的人和事。诚如他在书前的《读〈聊斋〉杂说》中所说：“《聊斋》非独文笔之佳，独有千古。第一议论醇正，准理酌情，毫无可驳。如名儒讲学，如老僧谈禅，如乡曲长者读诵劝世文，观之实有益于身心，警戒愚顽。至说到忠孝节义，令人雪涕，令人猛醒，更为有关世教之书。”正是在这种观念的指导下，冯镇峦对《聊斋》中众多的艺术形象加评时，多有他心中的一种尺度，衡量起来未必完全标准，更难以使一些对儒家传统道德观念持不同意见的人心服。如他在《罗祖》的双行夹评中就写道：“抽刀是壮士，放刀成佛祖。菩萨开口笑，壮士色如土。寄语床第人，恩义漫轻许。”[4]这固然与《聊斋志异》本身掺杂着不少封建糟粕有关，但恐怕主要还是由批评家世界观的局限所决定的。

冯镇峦对自己的小说评点颇为自负，甚至认为李卓吾、冯梦龙、金人瑞均不足道，而论自己的批评则曰：“往予评《聊斋》，有五大例：一论文，二论事，三考据，四旁证，五游戏。皆其平日读书有得之言，浅人或不尽解。至其随手记注，平常率笔，无关紧要，盖亦有之，然已十得八九矣。”[1]他在这里谈到小说批评的体例、格式的同时，强调要批“有得之言”。在这同一篇《读聊斋杂说》中，他还表示坚决反对批评者“毫无别见，只顺文演说，如周静轩读史诗，人云亦云，令观者欲呕”，而主张要“眼明手快”，“从书缝中看出”问题。这对于当时纷如牛毛的小说评点来说，是有一定针砭意义的。然而，他同时又强调批评者

“不特具有别眼，方能着语，亦须具有正大胸襟，理明义熟，方识得作者头脑出处”，发表“醇正”的议论，不违背统治阶级的思想。这里就暴露了他的小说批评论的局限性[5]。但无论怎样，冯镇峦关于《聊斋志异》的评论，丰富了志怪小说的理论，对《聊斋》的传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其作为清代文言小说批评的重要部分和巴渝古典文学的重点内容，大有进一步研究之必要。

注释：

①原文发表时此处为“清溪”一名所加按语误为“今四川犍为”。梁晨美先生在《文献》2003年第2期曾就此发表专文《“清溪”不是“犍为”》（见该刊24页）指出：《文献》2002年第2期所载李胜《冯镇峦“涪陵”籍贯质疑》一文，引《道光重庆府志》卷七《科举志》载云：“冯镇峦，合州人。清溪（按：今四川犍为）教谕，乾隆五十七年（1792）壬子科举人。”（见该刊287页）《道光重庆府志》所载“清溪教谕”不误，但作者李胜给“清溪”一名加的按语“今四川犍为”是不确的。关于冯镇峦的籍贯，比《道光重庆府志》更早的嘉庆二十一年（1816）版《四川通志》卷一百二十九《选举志》“乾隆五十七年壬子科举人名单”中已载：“冯镇恋，合州人。”犍为县确实有个“清溪镇”，原名清水溪，当地人简称“清溪”，离犍为县城10公里，清溪决不是犍为的异名。而“清溪教谕”的“清溪”指今四川省汉源县。《清史稿》卷六十九《地理志》载：清溪县属雅州府，而犍为县属嘉定府。两个县相距二百多公里。商务印书馆1931年出版的《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载：“清溪县，明黎州安抚司地，清置县，以城南清溪关名，属四川雅州府，民国改为汉源县。”此乃清溪县的沿革。四川文艺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四川历代文化名人辞典》收有“冯镇峦”条。其中记述：“冯镇峦（？-1830）字远村。合州（今合川县）人。少从其舅荀恒学，究心经史，遂以诗古文见称于世。与同邑张乃孚、杨士鑅、彭世仪齐名，彼此唱和颇多，号为‘合州四子’。乾隆五十七年（1792）举人，大挑二等，以教职用，初选华阳教谕，继选广安，后选清溪县。清溪地瘠民贫，镇峦至则创建

书院，招集生徒，殷勤劝学，文风丕振。……”今据从。

参考文献：

[1] 冯镇峦. 读聊斋杂说 [A]. 聊斋志异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张友鹤辑校本，1978.
[2] 永瑢，纪昀. 小说家类序 [A].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M]. 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65.
[3] 纪昀. 阅微草堂笔记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4] 蒲松龄. 聊斋自志 [A]. 聊斋志异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张友鹤辑校本，1978.
[5] 王运熙，顾易生. 中国文学批评通史：清代卷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原载《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 2001 年第 9 期，部分内容又载《文献》2002 年第 2 期，收入本书时有修改）

《八琼室金石补正》石鱼朱子诗辨伪

本文认为，《八琼室金石补正》一书作为宋代涪州石鱼题刻收录的"朱子诗"，虽确为朱熹《观澜》绝句，但既非宋刻抑或朱子真迹，也不在石鱼所在地白鹤梁，而是大约在清代中期才镌刻于北岩石壁上的作品，当地人称作《北岩题壁》。

《八琼室金石补正》；涪州（涪陵）；石鱼题刻；朱熹；《观澜》；《北岩题壁》

一

清代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分两部分共收录有宋代涪州（今重庆市涪陵区）题刻一百零七段：一为卷八三（宋二）之"石鱼题刻一百段"，一为卷一一二（宋三十一）之"涪州北岩题刻七段"。其中，"石鱼题刻一百段"第七十八段标题为《朱子诗》，题下有双行小字注云："高四尺四寸，广二尺四寸，四行，行七八字，字径四寸余，正书。"诗文如下："眇愁方寸神明舍，天下经纶具此中。每向（扗）澜观不足，正如有本出无穷。"落款："晦翁"。[①]杨殿珣先生在其《石刻题跋索引·诗词部》中径称为"石鱼朱子诗"，系年附于"淳祐"[②]。《全宋诗》卷二三九四在收入朱熹《训蒙绝句》九十八首时，充分利用了这一石刻史料，不仅用以校勘其中第五十一首《观澜》，谓"眇然方

寸神明舍"之"然","《金石补正》卷八三作'愁'"[③],而且在卷首的编者按语中说:"朱熹训蒙诗,世人多以为伪。然《宋人集》甲编收有徐经孙《徐文惠存稿》,其卷三《黄季清注朱文公训蒙诗跋》引熹自序称:乃病中默诵四书有所思之作。证诸《朱文公文集》卷二已收《困学》等六首,《永乐大典》卷五四一有《中庸》一首,《八琼室金石补正》卷八三有《观澜》真迹一首,足证非伪。……"[④],将其作为证明《训蒙绝句》非为伪作的重要支撑材料。可见,自《金石补正》以来,所谓"石鱼朱子诗"一向是被人们看作"《观澜》真迹",即出自朱熹本人手笔的。

诚如《全宋诗》编者所言以及束景南、王利民等其他学者对朱熹训蒙诗所做专门研究得出的结论,笔者同样相信:《观澜》诗等近百首绝句,确系朱熹"为其家塾训蒙之用而作"[⑤],"是一组结合《太极图》的义理通解四书主要命题的性理诗",也是"他的理学体系的椎轮"[⑥],大约写就于隆兴元年(1163)[⑦]或者隆兴二年(1164)[⑧],时朱子年三十四、五,在福建延平(今崇安)。而且,若单就《观澜》诗而言,笔者至少还可举出如下方面的材料和理由以证其真:

(一)有朱子自谓曾经有作的多起记载

宋代真德秀在其《西山读书记》卷十五、《论语集编》卷五中记载:"朱子曰:天地之化,往者过来者续,无一息之停,乃道体之本然也。然其可指而易见者,莫如川流。故于此发以示人,欲学者时时省察而无毫发之间断也……因云旧曾作观澜阁词,有曰:因常流之不息,悟有本之无穷。"[⑨]又,宋代黎靖德《朱子语类》卷三十六《论语十八·子在川上曰章》也有"丁巳(1197)所闻"曾道祖(择之)记录的朱子语录:"某尝为人作观澜词,其中有二句云:观川流之不息兮,悟有本之无穷。"[⑩]此外,相同的记载还见于元代刘壎的《隐居通义》卷一《理学一·论子在川上章》(《四库全书》本,子部第866册,第25页)、

明代胡广的《论语集注大全》卷九（《四库全书》本，经部第205册，第176页）、清代李光地、熊赐履的《御纂朱子全书》卷十六《论语七》（《四库全书》本，史部第720册，第385页）等。

（二）有可靠的早期文本一直流传

宋宝庆绍定年间（1225－1232）陈思编刻、元至正（1341－1368）末陈世隆补刊的《两宋名贤小集》卷二百九《朱子一·性理吟（上）》就收录有朱熹《观阑（澜）》诗："眇然方寸神明舍，天下经纶尽此中。每向狂澜观不足，正如有本出无穷。"[11]而且，按照清代朱彝尊"思所编群贤小集，皆其同时不甚显贵之人"[12]的看法，是集所收诗歌——包括朱子《观阑（澜）》在内应该具有较高的真实可靠性。

（三）与组诗中其它诗歌的关联、互证

在《全宋诗》整理本朱熹《训蒙绝句》九十八首里，第六十三、六十四为《逝者如斯》二首。其一云："如何物却能形道，只为皆存理一端。偶感斯川存动理，故言逝者可同观。"其二云："岷源（原注：朱本作渊流。胜按：注误，朱本作渊源。见朱玉《朱子文集大全类编·诗赋·补遗·训蒙诗》，《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集部第16册，第565页。又，《两宋名贤小集》卷二百九'岷源'作'岷原'，见《四库全书》本，集部第1363册，第675页。）万古只如斯，东注（原注：朱本作江。胜按：注误，朱本亦是'东注'，与《全宋诗》据以录入的郑端《朱子学归》本同，此处毋需出校。又，'注'字作'江'，见于郭齐、尹波点校本《朱熹集》之《外集卷一·诗书》，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9册，第5738页）曾无间断时。后学不因川上叹，安行体用亦难窥。"[13]这两首诗，无论诗思涵容还是语气口吻，均与《观澜》诗如出一辙，有着深刻的内在一致性，可以互为证明。

二

然而，判定《观澜》一诗的著作权归属与《八琼室金石补正》所录"石鱼朱子诗"是否"《观澜》真迹"毕竟还不是一回事，即：《观澜》诗为朱熹所作并不等于说"石鱼朱子诗"便是出自朱熹亲笔。恰好相反，笔者在试图力证其"真"的过程中，找到的却是一些在相当大程度上足够判其为伪的否定性材料，兹略述如下：

（一）《金石补正》收录有误，不足采信

陆增祥在《八琼室金石补正》附录的《元金石偶存》中曾说："石鱼宋刻百余段，姚彦士始搜拓之。己巳（按：同治八年，1869年）冬，悉数赠予。内有元人题记两段……"[14]据此段文字，结合书中将朱子诗首句"耿然方寸神明舍"的"然"误读为"愁"，而"每向狂澜观不足"句之"狂"字可能由于拓片的局部不到位丢脱了一横，陆氏照录讹作"扗"即"在"字，感觉不通又无法补正，遂加括弧以示存疑的情况看，陆增祥编入《金石补正》的"石鱼朱子诗"仅仅是来自于姚彦士（觐元）所赠"石鱼宋刻百余段"拓片，其未曾作过实地考察，亦不了解当时涪陵方志中已有的相关资料（详下文）显而易见。所以，经过仔细的考辨类分，陆氏虽然发现了"内有元人题记两段"，却始终没能发现朱子诗刻其实根本不在石鱼所在地——白鹤梁这一简单事实，错误地将其归入"石鱼题刻一百段"。这不得不让人对他把《朱子诗》断为宋刻的相关结论产生怀疑。而这种怀疑，从当时与姚觐元一同搜集整理石鱼文字的钱保塘在《石鱼题刻九十八段》编目核抄本"朱子诗"条目下所批的覆校按语："此在点易洞，近人刻，不足存"[15]，以及光绪三年（1877）姚、钱同撰的《涪州石鱼文字所见录》[16]最终并没有收录该诗，而1995年新修

的《涪陵市志》经实测将"朱熹诗刻"列人"北岩名胜"（详下文）等，均可得到证实。

（二）涪州方志离奇标题，特意作伪

涪州方志，以明季兵燹毁没之故，今仅存清代以来七种。除最早的一部即康熙五十四年（1715）董维祺、冯懋柱等纂修的《重庆府涪州志》四卷和光绪三十一年（1905）由邹宪章、熊鸿谟等纂修的具有乡土志性质而"稍异于州志"[17]的《涪乘启新》三卷之外，其余五部：乾隆五十年（1785）多泽厚、陈于宣等纂修的《涪州志》十二卷，道光二十五年（1845）德恩、石彦恬等纂修的《涪州志》十二卷，同治九年（1870）吕绍衣、王应元等纂修的《重修涪州志》十六卷，民国十七年（1928）刘湘、王鑑清、施纪云等纂修的《涪陵县续修涪州志》二十七卷，1995年蒲国树等人新修的《涪陵市志》，在艺文门中均相沿录选了朱子《观澜》一诗，但均标为《北岩题壁》。按题义，北岩"朱熹诗刻"应是由朱子在涪州亲自题写，或在别处受人请托专此题写、然后由人携至涪州翻刻的。而且，基于涪州北岩在程朱理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和朱熹与北岩人事上的联系来理解，这也是很有可能的。宋哲宗绍圣四年（1097）十一月，程颐以党论削籍、"编管"涪州，至元符三年（1100）正月解除管制、移往峡州（今湖北宜昌）"任便居住"，在涪州总共生活了两年有余。其间，程一直住在长江北岸北岩的普净院，并在这里完成了他最重要的学术著作《周易程氏传》（或称《程氏易传》、《伊川易传》）[18]，北岩也因此在南宋庆元党禁以后成为程朱理学的发祥地之一而闻名朝野。以远续孔孟、近接周程自命的朱熹前往先师遗址瞻仰凭吊、题壁留念也就自在情理之中。另外，据朱玉《朱子文集大全类编·文公门人》所列"及门受业四百二十人"，朱子共有宋之源、宋之润、宋之汪、度正、虞渊等川籍门人五人。其中和涪州北岩有密切关系的，是重庆府的虞渊和度正[19]。

冕渊，字亚夫，号莲塘（一作荡），涪州人，《朱子语类姓氏》列为“癸丑（绍熙四年，1193年）所闻”[20]，“为《池录》第二十八卷，……从朱子学于建阳考亭”。[21]度正，字周卿，号性善，合州巴川（今重庆市铜梁县）人，“曾于庆元三年（1197）问学于考亭”。[22]二人学归后都曾主教于涪州北岩书院，传布发扬理学，深得朱熹器重。由他们出面函请朱熹为北岩书院题写诗句训示勉励，也是可能而且能够办到的事情。

但是，上述推想并不能得到历史文献材料的支持。查考朱子一生行迹，无论是宋代黄榦的《朱文公行状》（清同治二年<1863>长沙明辨斋刻本）、李方子的《朱文公年谱》（清雍正八年<1730>刻本），还是明代何可化的《紫阳朱夫子年谱》（清康熙二年<1663>刻本）、清代朱钦绅的《朱夫子年谱》（清乾隆二年<1737>刻本）、王懋竑的《朱子年谱》（清道光光绪年间<1767－1908>刻本）、褚寅亮的《重订朱子年谱》（清乾隆四十七年<1782>刻本），乃至今人新著如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朱子大传》（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等等，都没有他曾经到过巴蜀大地，到过当时四川重庆府辖下的涪州，和他曾经于何时何地为谁题写过该诗的记载。翻检有关各方的文集、语录，如《朱熹集》、《朱子语类》、《性善堂稿》等，特别是其中彼此往复的遗留书札、序跋以及其他人的一些相关信件，如：朱熹的《与冕亚夫》三书[23]、《答度周卿》[24]、《跋度正家藏伊川先生帖后》[25]、《（与）刘德修》[26]等，也不见提及有过此事。而涪州方志，除了前述的五部在艺文门中收录所谓《北岩题壁》诗，其中一、二并在古迹或石刻等目偶尔提及一下诗名之外，也再找不出关于此诗——特别是其来历的任何记载，尤似空穴来风，显得可疑。正如道光《涪州志》凡例所说：“程（颐）黄（庭坚）二夫子为理学名儒，足迹所经，诚堪向往。故既列《职官》，复详《流寓》，亦

高山仰止之意云尔。"[27]涪陵方志自乾隆州志开始，即列有涪州"四贤"（程颐、黄庭坚、谯定、尹焞）或"五贤"（"四贤"增入晏亚夫）的名目，于程、黄诸人谪涪事迹、遗迹如程子"点易洞"、黄庭坚"洗墨池"、尹焞"三畏斋"等等，莫不详载。连朱门弟子晏渊，也被奉为"五贤"之一，于古迹、山川、津梁诸目一切可能之处备载与其相关的"夫子坪"、"晏溪"、"晏溪堂"、"晏溪桥"等遗迹。依此类推，亦可反证朱熹与涪州及其北岩诗刻实无牵连。否则，涪州方志必将其列入四贤五贤，为此广罗张事。

三

与此相关的问题是，既然"石鱼朱子诗"不是真迹，那么它又是刻石于何时呢？笔者以为，通过综合考察朱熹《观澜》诗不同传本的异文情况和涪陵地方志中所录《北岩题壁》及与之关联的点滴记载，应该可以推断出其形成的大致时间。

（一）朱熹《观澜》一诗的三种不同传本

笔者对朱熹《观澜》一诗的传世文本作了全面清理，得到三种不同传本。除开上文已经提到的宋元间陈思、陈世隆《两宋名贤小集》作"耿然方寸神明舍，天下经纶尽此中。每向狂澜观不足，正如有本出无穷。"，其余两种均出现在对朱熹诗文进行大规模整理刊刻的清代。一是康熙癸亥年（二十二年，1683）郑端《朱子学归》二十三卷，其末卷《诗教・观澜》诗作："耿然方寸神明舍，天下经纶具此中。每向狂澜观不足，正如有本出无穷。"[28]一是雍正庚戌年（八年，1730）朱玉《朱子文集大全类编》一百十一卷，其《诗赋・补遗・训蒙诗九十六首・观澜》诗作："耿焉方寸神明舍，天下经纶此处看。尝向狂澜观至理，只是工夫欲顺难。"[29]其中，朱本烦琐割裂，此首与二陈

本不同者凡一十一字；而郑本简明扼要，此首与二陈本仅异一字，且较前者及二陈本字、义略胜，应是当时《观澜》诗最为流行的本子。

（二）涪陵北岩“朱熹诗刻”和历代涪陵地方志中收录的朱熹《北岩题壁》诗

1. 今存于涪陵北岩崖壁的“朱熹诗刻”

《八琼室金石补正》收录的石鱼朱子诗，至今仍存。1995 年新修《涪陵市志》在第二十六篇第四章第二节《北岩题刻》中说：“南宋至民国年间，钩深堂及北岩崖壁上留下题刻甚多，但由于崖壁砂岩易风化，字迹多漫灭，崖壁现存题刻和有痕迹可辨者 70 余幅……可辨、可定为宋代题刻的有 7 幅”。其中“朱熹诗刻”：“85（幅宽）×142（高）厘米。行楷，4 行。正文：‘眇然方寸神明舍，天下经纶具此中。每向狂澜观不足，正如有本出无穷。’落款：‘晦翁’。”[30]，无标题。如前所述，由于北岩崖壁为比较粗糙的砂石，又年久风化形成不少凹点，致使诗刻中个别“、”划漫漶尤甚，极难察辨。从重庆市涪陵区政府公众信息网上最新发布的诗刻图片[31]来看，“眇然”应是“渺然”，二者此处同义。

2. 涪陵地方志中收录的朱熹《北岩题壁》诗

乾隆《涪州志》卷十一《诗选》、道光《涪州志》卷十一《艺文志·诗选》、同治《重修涪州志》卷十五《艺文志·古今体诗》、民国《涪陵县续修涪州志》卷二十二《艺文志四·诗选一》、新修《涪陵市志》第二十五篇第七章《艺文一·诗歌》[32]收录的朱熹《北岩题壁》（《观澜》）诗为：“渺（胜按：道光、同治《重修涪州志》异作‘渺’）然方寸神明舍，天下经纶具此中。每向狂澜观不足，正（胜按：道光《涪州志》作‘恰’）如有本出无穷”。

（三）历代涪陵地方志中与《北岩题壁》（《观澜》）有关的

记载

1. 道光《涪州志》卷一《古迹》“点易洞”条：“北岩石壁有洞，宋程伊川滴露研朱注《易》于内。前牧张晴湖傍壁为楼，颜曰‘观澜’。”卷十一《诗选》张师范《北岩十咏·观澜阁》（题下双行小字原注：阁峙岩颠，俯视一切。）：“杰阁拏云据上遊，鱼龙嘘沫互沉浮。聒天崩浪轰霹雳，漾日轻漪狎鹭鸥。惊喜世途翻局异，观摩物理至虚侔。棹讴朝暮响空际，捲起澜光澹若秋。”又，陈昉（字午垣）《涪陵北岩十景》诗序：“涪陵北山之阳有岩焉，曰北岩……（碧云）亭之西曰观澜阁。高碑峭壁，俯瞰长流。每登阁旷览间，令人有河伯之叹。故晦翁题壁句云：‘每向狂澜观不足，恰如有本出无穷’。阁之得名殆亦以此……”，以及其中《观澜阁》诗：“峻阁峥嵘气象超，下临无地上干霄。开轩风雨来松壑，到眼波澜学海潮。坐对南山依汉案，依凭北斗望星轺。晦翁独有澄观意，高咏于今未寂寥。”

2. 同治《重修涪州志》卷十《人物志·文苑》“贾元”条：“字长卿，涪州人。有文学，凡使蜀还京者，必问曰‘得贾先生文章否’。题《观澜阁歌》，撰《文庙御碑亭记》，乡人重之。”小字注：“见《通志》及《蜀中著作记》”[33]。

3. 民国《涪陵县续修涪州志》卷三《疆域志三·古迹》“北岩”条：“州城大江之北，上有注易洞，为宋程伊川先生谪涪时注《易》之所，又有三畏斋及尹子读书处、黄涪翁洗墨池。岩壁多宋以来名人留题，多漫灭不可识，惟山谷书‘钩深堂’与朱子七绝一首刻石尚存。”[34]

4. 新修《涪陵市志》第二十六篇之《北岩名胜》“观澜阁”：“在点易洞前，首建于元代。以朱熹《北岩题壁》诗意命名。阁名为元代文史学家、涪州人贾长卿题写，并作《观澜阁歌》（原注：已佚）。阁之上有‘江天独坐轩’，仅容坐一人。阁轩前临悬岩峭壁，可俯瞰长江波澜。”[35]

上述材料，可以据以进行如下的分析并得出相应结论：

第一，《八琼室金石补正》收录的石鱼“朱子诗”即今存于涪陵北岩崖壁的“朱熹诗刻”，在字句、内容上与清代郑端《朱子学归》中的《观澜》一诗都是完全一致的（按：玅、眇、渺三字此中为异体字）。由此，可以得出“诗刻”出现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郑本编成之后的结论。

第二，从涪陵地方志收录《观澜》一诗均标为《北岩题壁》来看，应该是先有该诗的题壁，然后才有方志的收录。方志的收录以乾隆州志为最早，却不见于此前的康熙州志。由此，又可进一步大致得出“诗刻”的形成在这两部州志的纂修之间，即康熙五十四年（1715）以后、乾隆五十年（1785）之前的结论。

第三，按道光州志所记，观澜阁为前州守张师范首建，以当时北岩崖壁已有的“朱熹诗刻”——《观澜》绝句诗意命名，并与点易洞、碧云亭、致远亭等共同形成了“北岩十景”。而张师范之守涪州，又可从后来同治《重修涪州志》卷五《秩官志·国朝秩官》“张师范”条、卷十四《艺文志·散体文》所收陈廷璠《州牧晴湖张公祠碑记》得知其详：张公字晴湖，阳湖（今江苏武进）人。嘉庆十六年辛未（1811）除知涪州，二十二年丁丑（1817）以年逾七旬、多疾体衰解组还乡。任内悉心赈济，兴办义学，曾重修尹焞三畏斋、程颐点易洞等[39]。据此，观澜阁之建当在嘉庆十六年至二十二年（1811－1817）之间，这与康熙州志既无题壁诗亦不载观澜阁、乾隆州志有题壁诗仍无观澜阁记载的情况正相吻合。

第四，民国《续修涪州志》说，北岩“岩壁多宋以来名人留题，多漫灭不可识，惟山谷书‘钩深堂’与朱子七绝一首刻石尚存”。其中，“朱子七绝”并未称“朱子书”，而山谷辞世时朱子尚未出生。因此，“山谷书‘钩深堂’与朱子七绝一首刻石”只能理解为朱子七绝不署书刻人。又，考《涪州石鱼文字

所见录》在《涪翁题名》"元符庚辰涪翁来"（题下双行小字原注：正书，径二寸，凡三行，行三字。）下所系按语："《舆地纪胜》：绍圣丁丑（1097），伊川先生来涪于北岩普静院辟堂传《易》，阅再岁而成。元符庚辰（1100），徙夷陵。会太史黄公自涪移戎，过其堂，因榜曰'钩深堂'。按，此题名七字盖同时所书也。"[37]、民国《续修涪州志》卷三《疆域志三·古迹》"钩深堂"条："宋程伊川谪涪，即旧普静院辟堂，黄山谷为题'钩深堂'……光绪壬寅（二十八年，1902），改为师范中学堂，'钩深堂'三字移刻于岩石"。[38]北岩岩壁"钩深堂"三字虽确为黄山谷原书，但是晚近移刻。"朱子七绝"能够与之仅存，表明其镌刻时间亦不久远。

第五，查《蜀中著作记》，确有涪州当地人贾元曾经"题《观澜阁歌》"[39]，同治《重修涪州志》记录如实。但该作既已不存，又找不出其它任何相关的记载，何况依孔子泗水观澜时"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孟子"观水有术，必观其澜。"（《孟子·尽心上》）的圣训和朱子《观澜》绝句诗意建修观澜阁并为之题诗撰记在全国各地蔚为风气，古已有之：宋元祐八年（1093），福建武夷山真隐峰下曾建观澜阁（《福建通志》卷六十三）；宋崇宁间（1101－1106），孙乔年在江西也建过观澜阁（《江西通志》卷四十一）；今江苏省镇江市焦山，还有清代作为乾隆皇帝南巡时逗留的行宫的观澜阁。至于写观澜阁的文学作品，单宋代就有胡寅（1098－1156）的《观澜阁记》（《斐然集》卷二十一）、周必大（1126－1204）的《寄题新居罗长卿观澜阁兰堂二首》（《周益文忠公集》卷七）、项安世（1129－1208）的七律《观澜阁》（《平庵悔稿》卷五）等。所以，新修《涪陵市志》仅凭同治州志一句"题《观澜阁歌》"的记载，就生发出涪州观澜阁建自元代，贾元题写阁名等等，是颇为牵强的。即便事实果真如此，最多也只能说明那时曾

经依照《观澜》绝句诗意等命名建造过观澜阁，和“朱熹诗刻”、《北岩题壁》没有直接关系。

综上所述，《八琼室金石补正》收录的宋代石鱼朱子诗，即涪陵地方志中所谓《北岩题壁》者，实清代中期无名氏取美前贤文字，附会于乡里风物之作。其虽确为朱熹《观澜》绝句，但既非宋刻，亦与石鱼无关，更不是朱子的真迹。不过，在今天看来，它毕竟是二百多年前的文物，荷载着独特的历史文化信息，仍然是值得我们宝贵和珍惜的。

注释：

①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吴兴刘氏古稀楼断句缩印本，北京：文物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586 页。

② 杨殿珣《石刻题跋索引》，上海：商务印书馆 1957 年版，第 472 页。胜按：“淳祐”为 1241 – 1253 年，时朱子已卒（庆元六年，1200 年）数十载，由此或可推断杨氏虽然仍以“石鱼朱子诗”为宋刻，并不认为是朱子亲笔，即真迹。

③《全宋诗》，傅璇琮等主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44 册，第 27677 页。胜按：“眇”、“耖”异体；“愁”，当为“然”字手写误读。

④《全宋诗》，傅璇琮等主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44 册，第 27671 页。胜按：徐经孙《黄季清注朱文公训蒙诗跋》，亦见《矩山存稿》卷三，《四库全书》本，集部第 1181 册，第 31 – 32 页。

⑤ 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卷上，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316 页。

⑥ 王利民《从〈训蒙绝句〉看朱子学的发生过程》，南京：《南京化工大学学报》（哲社版），2002 年第 2 期，第 70 页。

⑦ 同注⑤。

⑧ 王利民《〈朱熹集·训蒙绝句〉辨正》，南京：《江海学刊》，1999 年第 6 期，第 20 页。

⑨ 真德秀《西山读书记》，《四库全书》本，子部第 705 册，第 444 – 445 页；真德秀《论语集编》，《四库全书》本，经部第 200 册，第 165 页。

⑩ 黎靖德《朱子语类》,《四库全书》本,史部第700册,第809页。
⑪ 陈思、陈世隆《两宋名贤小集》,《四库全书》本,集部第1363册,第673－674页。
⑫ 朱彝尊《两宋名贤小集·跋》,《四库全书》本,集部第1362册,第329页。
⑬《全宋诗》,傅璇琮等主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4册,第27678页。
⑭ 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吴兴刘氏古稀楼断句缩印本,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965页。
⑮ 钱保塘《石鱼题刻九十八段》,《涪州石鱼题刻》,《石刻史料新编》本,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民国六十六年(1977)版,第十五册,第325页。
⑯姚觐元、钱保塘《涪州石鱼文字所见录》,《涪州石鱼题刻》,《石刻史料新编》本,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民国六十六年(1977)版,第十五册,第330－352页。
⑰《涪乘启新》卷首《编辑大意》,涪陵:涪陵小学堂光绪乙巳(1905年)刊本。
⑱卢连章《二程学谱》,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40－43页;徐洪兴《旷世大儒——二程》,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76－77页。
⑲ 朱玉《朱子文集大全类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集部第16册,第441页。
⑳ 黎靖德《朱子语类》,《四库全书》本,史部第700册,第13页。
㉑方彦寿《朱熹书院与门人考》,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89页。
㉒方彦寿《朱熹书院与门人考》,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10页。
㉓《朱熹集》卷六三,郭齐、尹波点校本,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6册,第3289－3291页。
㉔《朱熹集》卷六十,郭齐、尹波点校本,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6册,第3116页。
㉕《朱熹集》卷八四,郭齐、尹波点校本,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

版，第6册，第4318－4319页。
㉖《朱熹集》别集卷一，郭齐、尹波点校本，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9册，第5357－5358页。
㉗道光《涪州志》卷首，涪陵：涪州州署道光二十五年（1845）刻本。
㉘郑端《朱子学归》，《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版，子部第21册，第641页；又，《丛书集成新编》本，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民国七十五年（1986）版，第22册，第393页。
㉙朱玉《朱子文集大全类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集部第16册，第567－568页。
㉚《涪陵市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98页。
㉛参看网页：http：//www. fl. gov. cn/xwlr. asp? newid = 2&mlm = 57&mxh =9492（2005－3－31）。
㉜《涪陵市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65页。
㉝同治《重修涪州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影印本，成都：巴蜀书社1992年版，第46册，第572页。
㉞民国《涪陵县续修涪州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影印本，成都：巴蜀书社1992年版，第47册，第17页。
㉟《涪陵市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08－1409页。
㊱详参同治《重修涪州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影印本，成都：巴蜀书社1992年版，第46册，第503、669页。
㊲姚觐元、钱保塘《涪州石鱼文字所见录》，《石刻史料新编》本，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民国六十六年（1977）版，第十五册，第334页。
㊳同注㉞。
㊴曹学佺《蜀中广记》卷九九《著作记第九·贾先生集》，《四库全书》本，史部第592册，第607页。

（原载《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06年国内访问学者、进修教师论文专刊）

白鹤梁石刻题名人考按一百二十二则

本文辑录前人相关成果，广采传世文献，对白鹤梁石刻中题记姓名者的行实、著述等做了进一步的考索。并仿《涪州石鱼文字所见录》之例略为按语，以年代次第系于今人较为习见的《水下碑林白鹤梁》一书所录相应题刻的编号、名称之下，以利阅读和研究。

白鹤梁；石鱼题刻；题名人

白鹤梁题刻，按陈曦震主编《水下碑林白鹤梁》（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以下简称《碑林》）所提供的拓片、文字资料统计，共有174段3万余言。笔者逐一审读清点，得题记姓名今存完整者四百九十六人。加上该书失收而清人著作早有收录的《晁公遡题记》（后详）所列八人中不曾见于其他题刻而新增的晁公遡（子西）、张度（伯受）、杨侃（和甫）、任大受（虚中）等四人，整个白鹤梁上共有留题姓名者正好五百人。考明这些题名人的生平行实，必将有助于石鱼文字的正确解读，促进相关研究的进一步深入，甚或开拓出新的学术领域。惜乎自唐迄今，时逾千载；题名人中又多偏处一方之士，“史有传者”、“史无传而其书行世者”以及“间有见于他书可考者”究属少数，往往“十不得二三”（光绪三年钱保塘《涪州石鱼文字所见录》跋）。有感于此，笔者遂作意辑录《八琼室金石补正》（陆增祥，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影印本）、《涪州石鱼文字所见录》（姚觐元、

钱保塘，上海国粹学报社1912年古学汇刊本）二书的此项研究成果和《四川通志》（黄廷桂等，《四库全书》本）、《同治重修涪州志》（吕绍衣、王应元，巴蜀书社1992年《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第46辑影同治九年刻本）、《民国涪陵县续修涪州志》（王鑑清、施纪云，巴蜀书社1992年《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第47辑影民国十七年铅印本）登载的相关材料，并参考宋元明清各代正史杂著重做考校，或详明出处，或匡规讹错，乃至探幽发微，撰成考按五十六则，冀于以往有所进展于今日可以补贴。兹以《碑林》所列编号、名目相系，都为一编，聊酬首唱及同方朋从云尔。

一、朱昂题诗（《碑林》编号2）

1. 朱昂（九二五～一〇〇七），字举之，号退叟，荆南人。以端介厚重、清节笃学，与宗人“朱万卷”遵度并名，人称“小万卷”。先世家渼陂（今陕西户县），其父于唐末南渡，寓潭州（今湖南长沙）。昂仕后周。宋初，历宜城令。太祖开宝六年（九七三），知蓬州，徙知广安军（《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四）、泗州，迁监察御史。太宗太平兴国二年（九七七），知鄂州。真宗即位，迁知制诰，判史馆，与杨亿、梁周翰同在禁掖。咸平二年（九九九），为翰林学士。四年，以工部侍郎致仕（同上书卷四八），献所著《资理论》三卷，论时政赏罚得失（同上书卷五十）。景德四年卒，年八十三。门人谥曰正裕先生。尝撰《莫节妇传》，大为人伦之劝（《玉壶清话》卷五）。有集三十卷，已佚。事见陆友仁《研北杂志》卷上，李贤等《明一统志》卷六二、卷六八，和珅等《大清一统志》卷二六九。曾巩《隆平集》卷一三、脱脱等《宋史》卷四三九有传。

二、刘忠顺唱和诗（《碑林》编号3）

2. 刘忠顺（九八七～一〇六一），以明经赐第，为潭州攸

县尉、江宁句容尉，改知江州德安，通判袁州，历知建昌、解、坊、邢等州军。人为度支判官，出为夔州路转运使，徙两浙路，迁知蔡州、泉州、福州。仁宗嘉祐六年卒，年七十五（《郧溪集》卷二一《刘公墓志铭》、《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五六“仁宗庆历五年”、郝玉麟等《福建通志》卷二二职官三、卷二三职官四)。张方平《乐全集》卷二有《谢浙漕刘忠顺郎中送簟》七律诗一首。

3. 水丘无逸，一作丘无逸。仁宗皇祐初为屯田员外郎、知梁山军（江休复《嘉祐杂志》、《八琼室金石补正》卷八三)。嘉祐中为成都府路转运使（《宋诗纪事补遗》卷一六)。终知随州（《伐檀集》卷上《哭丘随州无逸》)。

三、刘仲立等题记（《碑林》编号4）

4. 徐爽，字口（按：石刻缺字，下同）之，仁宗嘉祐中任涪州州学教授，哲宗时知博州（今山东聊城)。尝出已俸以养寒士，惠政亦多（岳濬等《山东通志》卷二七宦绩志)。

四、武陶等题记（《碑林》编号5）

5. 武陶，字熙古。曾任宁化军通判、大理寺丞，为人勤干（《欧阳修集》卷一一六《河东奉使奏草》下)。嘉祐二年（一〇五七）知涪州（《涪州石鱼文字所见录·武陶等题记》按语)。

6. 侍其瓘，字纯甫，历涪州、忠州（今重庆忠县）巡检殿直，权邵州邵阳县（今湖南邵阳)、供备库使知祁州（今河北安国)。事见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九〇、刘攽《彭城集》卷二一。

五、冯口题记（《碑林》编号6）

7. 高槩，字秉节，英宗治平间任涪陵督邮。王迈《臞轩集》卷一二有《父执德化陈宰叔高槩寄诗和之》古体诗一首。

六、李袭题记、徐庄题记（《碑林》编号7、8。按：经考，

二题记实为一则。详见拙文《<水下碑林白鹤梁>题刻释文校读记》，《重庆社会科学》2005 年第 10 期，第 39 页)

8. 钟渚，熙宁元年（一〇六八）知涪州乐温（今重庆长寿）县事，熙宁三年（一〇七〇）以治状考课优等迁秘书省著作佐郎（《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一〇、苏颂《苏魏公文集》卷三三），元丰六年（一〇八三）为将作少监（《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三八、曾巩《元丰类稿》卷二一），元祐六年（一〇九一）迁淮南提刑（《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六七）。

9. 李袠，奉节县人，神宗熙宁元年（一〇六八）涪陵县司理参军，徽宗政和进士（黄廷桂等《四川通志》卷三三选举）。

10. 郑阶平，治平、熙宁间涪陵县尉。治平乙巳（二年，一〇六五）六月五日，曾与钟渚同游云阳县下岩古寺（亦名燕子龛），住持僧法能刻石以记（曹学佺《蜀中广记》卷二三）。

七、黄觉等题记（《碑林》编号 9）

11. 黄觉，字莘老，通川（今四川达州）人，治平进士（《四川通志》卷三三选举），熙宁七年（一〇七四）以奉节县令权幕夔州事。

八、韩震等题记（《碑林》编号 11）

12. 韩震，字静翁，井研（今属四川）人，庆历进士。熙宁七年任涪陵令（《同治重修涪州志》卷四《秩官志·历代秩官》），后官朝议大夫。其名亦见于《山谷集》（《涪州石鱼文字所见录·韩震等题名》按语）。

13. 费琦（一〇二七～一〇八〇），字孝琰，四川成都人，仁宗皇祐进士。初仕兴元府户曹参军，迁知合州赤水县、定州安喜县。神宗熙宁中通判蜀州、绵州，官至朝散郎。元丰三年卒，年五十四。事见《净德集》卷二四《朝散郎费君墓志铭》、《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一四"神宗元丰四年"。《宋史翼》卷一九

有传。

九、韩震等题记（《碑林》编号11）

14. 冯造，字深道，四川遂州（今遂宁）人，景祐进士（《四川通志》卷三三选举。按：吕绍衣、王应元等《同治重修涪州志》卷七选举志以石刻题记时间列为“熙宁甲寅<七年，一〇七四>进士”，误）。

十、郑顗题记（《碑林》编号12）

15. 郑顗，字愿叟，河南荥阳人，历官屯田员外郎、都官员外郎（苏颂《苏魏公文集》卷三〇）、岭南节度副使（金鉷等《广西通志》卷五〇秩官）。元祐元年（一〇八六）以朝请大夫权知涪州。有子名知常、知荣。

十一、吴缜题记（《碑林》编号13）

16. 吴缜，字廷珍，四川成都人，仁宗朝进士。以博通古今见知于同乡范镇，推荐参与修撰《新唐书》、《五代史》，被欧阳修以年少轻佻拒绝。后以朝请大夫出知蜀州成都、通判黔州，历典数郡，皆有惠政。并发愤史学，撰成《新唐书纠谬》（一名《新唐书辨证》）二十卷凡八类四百馀事、《五代史纂误》五卷二百馀事专以指摘瑕疵。（《直斋书录解题》卷四、《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四六）

17. 石谅，字信道，鹿泉（今河北获鹿）人。黄山谷子相岳丈，数学家。哲宗元祐初为涪州判官，徽宗建中靖国元年（一一〇一）任泸州江安令。撰有《钤经》，是中国版线性代数天元术的先驱。

十二、杨嘉言题记（《碑林》编号16）

18. 张微，字明仲，湖广竟陵人，元祐六年（一〇九一）涪陵县主簿，绍圣四年（一〇九七）临江（今重庆忠县）县令（曹学佺《蜀中广记》卷一九名胜记引王象之《舆地碑记目》载

“汉丁房双石阙”阙阴镌文：“绍圣丁丑五月戊午，知忠州军州事齐国王辟之、军事推官荆南李鑑……临江县令竟陵张微、司户参军杨安文同、司理参军云安常彦……同游”）。

19. 蒲昌龄，字寿朋，顺庆（今四川南充）人，元祐进士（《四川通志》卷三三、《涪州石鱼文字所见录·杨嘉言题名》按语）。

20. 杨嘉言，字令绪。元祐六年（一〇九一）知涪州军州事，绍圣间任知漳州事（郝玉麟等《福建通志》卷二四职官五），崇宁三年（一一〇四）为处州守（《读史方舆纪要》卷九四，嵇曾筠等《浙江通志》卷五一、卷一一五），建烟雨楼（按：在今浙江丽水，该楼后由范成大书额）。

十三、姚珏题记（《碑林》编号17）

21. 杜致明，元丰进士（《四川通志》卷三三选举），元祐八年（一〇九三）涪陵令。

十四、黄庭坚题记（《碑林》编号18）

22. 黄庭坚（一〇四五～一一〇五），字鲁直，号山谷、涪翁、黔安居士、八桂老人等，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人，北宋著名诗人、书法家。治平四年（一〇六七）进士，历官实录院检讨官、集贤校理、起居舍人、秘书丞、兼国史院编修。后坐党争，连续外贬。曾于绍圣元年（一〇九四）贬涪州（治今重庆涪陵区）别驾、黔州（治今重庆彭水县）安置，元符元年（一〇九八）以避外兄张向嫌移赴戎州。元符三年（一一〇〇），起为宣德郎添差鄂州在城盐税，路经涪州过伊川程颐于北岩普静院，榜曰“钩深堂”，游白鹤梁题“元符庚辰涪翁来”七字（《涪州石鱼文字所见录·涪翁题名》按语）。崇宁四年（一一〇五）死于宜州。《宋史》卷四四四、《东都事略》卷一一六有传。

十五、符直夫等题记（《碑林》编号19）

23. 孙羲叟，徽州人，历刑部员外郎、除直秘阁知夔州（翟汝文《忠惠集》卷二外制）。神宗时节制绵茂军（脱脱等《宋史》卷四九六列传第二百五十五、《四川通志》卷七上），政和初由徽猷阁直学士任泸南安抚使，筑城有功（《宋史》卷一九一兵志第一百四十四、《四川通志》卷二二、《蜀中广记》卷一六《孙羲叟修城记》），徽宗赐书奖谕（《四川通志》卷四、卷七上）。事迹见李新《跨鳌集》卷一六《更生阁记》、李攸《宋朝事实》卷末、李心传《建炎杂记》乙集卷一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五六兵考八等。

十六、贺致中题记（《碑林》编号21）

24. 杨元永，字刚中，右通直郎（吕陶《净德集》卷九），元祐六年（一〇九一）知费县建颜鲁公祠新庙（于钦《齐乘》卷四古迹）。

25. 王正卿，字良弼，太原人，徽宗大观中任左班殿直兵马监押（《碑林》编号22《庞恭孙题记》）、儒林郎。李流谦《澹斋集》卷二、卷三、卷八有《题宇文叔昭阅斋斋名予所榜也有王正卿画四时小景》、《王正卿为作山水小轴作此促之》、《予客三池王正卿以四绝见寄次其韵》等诗，未知是否其人。

26. 贺致中，字□发，会稽（今绍兴）人，承议郎（何薳《春渚纪闻》卷一〇《瓢内出汞成宝》），崇宁间任乐温县令。

27. 杨纬，字文叔，祥符（今河南开封）人（按：一说济州任城即今安徽阜阳人），崇宁间任乐温县理掾，皇祐五年（一〇五三）以明经中第，徙凤州梁泉（今陕西凤县）县令，教民以孝弟力田为先，卓有循声。后累任阆州（陈傅良《止斋集》卷一八《杨纬引嫌改知阆州》）、果州（程公许《沧洲尘缶编》卷一三《送果州使君杨文叔赴召序》）等州县，皆有能称，仕至

广州观察推官。元祐二年（一〇八七）正月，以疾卒于官，民为塑像立祠祀之（刘於义等《陕西通志》卷五三名宦四引《鸡肋集》、张邦基《墨庄漫录》卷一〇）。

十七、庞恭孙题记（《碑林》编号22）

28. 庞恭孙，字德孺，武城（今属山东）人。官施州通判。崇宁中以斩叛蛮向文疆功擢知涪州（《续资治通鉴》卷九〇）。政和二年（一一一二），徙知成都，以开边为己任（《读史方舆纪要》卷六七）。每开一城，辄褒迁。五年间升至中奉大夫、徽猷阁待制（《容斋四笔》卷一五"蔡京轻用官职"）。缮治转饷，前后在西南二十年，为蜀人病。

29. 李贲，四川金堂县人，大观中将仕郎、涪州州学教授，高宗绍兴进士（《四川通志》卷三三选举）。

30. 张永年，字时发，小名念（廿）十一，小字一郎，忠州临江县宜君乡太平里人，父名安民。宣和五年（一一二三）十一月初五日生，绍兴十八年（一一四八）王佐榜进士及第，五甲第一百三名（宋元间《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大观中曾以通仕郎任涪陵县令权签判。

十八、王蕃题记（《碑林》编号25）

31. 王蕃，字观复（《眉山唐先生集》卷二七《送王观复序》），一字子宣（《宋诗纪事补遗》卷三七），益都（今山东青州）人（按：一作营丘人），沂公之裔。"居今而好古，抱质而学文"（《山谷集》卷三〇《跋砥柱铭后》），为诗"兴寄高远"，但"语生硬不谐律吕，或词气不逮"（祝穆《古今事文类聚》别集卷五黄鲁直《答王观复书》）。官阆中时，多以书尺至戎州从山谷问学，黄山谷有《以古铜壶送王观复》（《山谷集》卷七）、《王蕃字观复》（《山谷外集》卷九）、《戏答王观复酴醾菊》二首（史铸《百菊集谱》卷四）等。建中靖国元年辛巳（一一〇

一），观复自京师改官，复入蜀，来会山谷于荆州（任渊《山谷内集诗注》卷一四、黄罃《山谷年谱》卷二八《和王观复洪驹父谒陈无已长句》注）。政和中，观复守达州，在州西以白乐天寄元微之诗句“达州犹似胜江州”命名建胜江亭，在州南取杜甫诗“心迹喜双清”句为名建双清阁（《四川通志》卷二七、《蜀中广记》卷二三）。八年（一一一八），任广西转运副使（《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四一）。宣和二年（一一二〇），任夔州路运判（同上书选举二九之一四）。撰有《褒善录》一卷，记嘉祐中巴县簿黄靖国死而复苏，道其冥中所见（赵希弁《郡斋读书后志》卷二、《蜀中广记》卷九五著作记第五）。

十九、吴革题记（《碑林》编号26）

32. 常彦，云安人，绍圣丁丑（四年，一〇九七）任忠州司理参军（《蜀中广记》卷一九名胜记第十九忠州忠贞祠左阙阙阴镌文），宣和四年（一一二二）朝散大夫通判涪州军州事。

33. 李全，富顺监（今四川富顺）人（一说郫县人），崇宁五年（一一〇六）进士（《涪州石鱼文字所见录·吴革题记》按语）。任南大理评事、奉议郎通判达州，谦恭慎密，达于政体，断狱平恕，时以正人称之（《四川通志》卷八、卷三三）。

34. 吴革，字义夫，华州华阳（今四川双流）人，一说华阴（今属陕西）人（《涪州石鱼文字所见录·吴革题记》按语）。宋初勋臣吴延祚七世孙。少好学，喜谈兵。再试礼部不中，乃从泾原军镇守西北，以秉义郎干办经略司公事。金人南牧，曾率部解辽州之围。使粘罕军庭，揖而不拜，责其贪利败约，词直气劲，坚贞忠烈。后被叛臣党羽抓捕就义。《宋史》卷四五二有传。

二十、陈似题记（《碑林》编号29）

35. 陈似，字袭卿，嘉阳（今四川乐山）人。徽宗宣和间

官云安军司法参军。事见民国《云阳县志》卷二二。

36. 王拱，字应辰，大昌县（今重庆巫山）人，光宗绍熙进士（《四川通志》卷三三选举），摄涪陵郡事。

37. 刘大全，名纯常，四川眉山人，宣和进士（《四川通志》卷三三、《涪州石鱼文字所见录·陈袭卿题记》按语）。

38. 孙伯达，名之才，四川眉山人，政和进士（《涪州石鱼文字所见录·陈袭卿题记》按语），一说宣和六年（1124）进士及第（彭百川《太平治迹统类》卷二七）。

二十一、文悦题记（《碑林》编号30）

39. 文悦，字理之，成都府人，宣和进士（《四川通志》卷三三选举）。

二十二、观石鱼题名（《碑林》编号31）

40. 李去病，字仲霍，缗城（今山东金乡）人，知书多艺，爱主忧民（晁补之《鸡肋集》卷三五《李去病字仲霍序》、郭印《云溪集》卷六《送李去病赴召》）。崇宁间任成都府路转运判官，给饷有功（张扩《东窗集》卷四《送李去病驾部成都府路转运判官》、强至《祠部集》卷三《送李去病杨元老》）。魏齐贤、叶棻《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收录有其《贺邓内翰启》（卷一一）、《观音道场设罗汉斋疏》（卷八〇）、《荐母设罗汉斋疏》、《追荐考妣道场疏》、《追荐冯大学疏》（卷八二）等。

41. 董天成，字常道，四川达州人，建炎二年（一一二八）进士（《涪州石鱼文字所见录·赵子遹等题名》按语）。

二十三、种慎思题记（《碑林》编号32）

42. 刘意，字彦至，绍兴中涪陵郡守（《同治重修涪州志》卷四《秩官志·历代秩官》）。光宗绍熙间（一一九〇～一一九四）画院待诏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刘松年有曾孙名意（《式古堂书画汇考》卷四四）。然题记作于六十年前的绍兴二年（一一

三二)，当别为一人。

二十四、王择仁题记(《碑林》编号35)

43. 王择仁，字智甫，平阳(今山西临汾)人。建炎二年(一一二八)，为经制司僚属抗金复永兴军。四年，以御营司参议官权河东制置使平陈万信余党雷进乱。绍兴二年(一一三二)为涪州守。《宋史》无传，事见卷二五、卷二六《高宗本纪》及《续资治通鉴》卷一〇二。

二十五、王择仁题记(《碑林》编号35)

44. 蔡惇，字元道(一作符道)，山东东莱人，文忠公、参政蔡齐侄孙，翰林学士蔡延庆之子，任太平散吏直龙图阁。后渡江卒于涪陵，尹和靖焞尝题其墓。撰有《祖宗官制旧典》三卷，大略以为元丰间用官阶寄禄，虽号正名而流品混淆、爵位轻滥，故以祖宗旧典与新制参稽互考而论其得失。(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〇二经籍考二九、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六职官类、岳濬等《山东通志》卷三四经籍志)

二十六、贾公哲等题记(《碑林》编号36)

45. 贾公哲，公杰弟，侍郎炎之子，文元公昌朝诸孙，仕履不详。魏齐贤、叶棻《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九六录有其《祭崔正言文》。

46. 田孝孙，绍兴二十六年(一一五六)左朝奉大夫知随州直秘阁，公廉俭素(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七五、无名氏《宋史全文》卷二二下)。

47. 蔡兴宗，山东东莱人，右朝奉郎(吕祖谦《东莱集》卷一四《东莱公家传》)。重编少陵先生集并正异(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八)，刊《朱子语录》(《四库全书考证》卷四三文献通考史部)。宣和元年(一一一九)书刻有《祭淮渎祠记》(嵇璜、刘墉等《钦定续通志》卷一七〇金石略四)，今不

存。

48．张稷，四川仁寿县人，进士（《四川通志》卷三三），任陕州通判、三司判官转运使（江少虞《事实类苑》卷一四、司马光《涑水记闻》卷七）。

二十七、李宜仲等题记（《碑林》编号37）、又：种慎思题记（《碑林》编号32）

49．李宜仲，名尚义，固陵（今属浙江萧山）人（按：谢旻等《江西通志》卷四九作“吉水人”，此据《碑林》编号32《种慎思题记》），宣和六年甲辰（一一二四）沈晦榜进士（谢旻等《江西通志》卷四九）。绍兴二年（一一三二）为涪州僚属（《涪州石鱼文字所见录·刘意等题名》），四年为左承事郎通判襄阳府事（《鄂国金佗稡编》卷九、《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七九）。王之道《玉楼春·和李宜仲》（《全宋词》第二册一一三六页）与王庭珪《李宜仲见怀朱崖夜郎二逐客》（《全宋诗》卷一四六七，第二十五册一六八一六页）、《次韵李宜仲以诗寄龙涎三首》（同上书卷一四七五，第二十五册一六八五八页）均及其名。

二十八、宋艾等题记（《碑林》编号39）

50．邢纯，武信（今四川遂宁）人，尹焞婿，靖康（一一二六）初为焞多方求获程颐《易传》全本为生日之礼（尹焞《和靖集》卷三《书易传后序》）。绍兴四年（一一三四）监涪陵酒税，十年（一一四〇）为浙东抚属（《和靖集》卷八年谱），后任安抚使（嵇曾筠等《浙江通志》卷一一三职官三）。

二十九、贾思诚等游记（《碑林》编号40）

51．贾思诚，字彦孚，澶渊（今属河南）人，绍兴九年（一一三九）左朝请郎荆湖北路提举茶盐公事，绍兴十二年迁左朝散大夫夔州路转运判官，十四年任左朝请大夫（李心传《建

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三三、一四五、一四八，张扩《东窗集》卷一三）。

52. 贾公杰，字千之，文元公昌朝诸孙，侍郎炎之子。家世贵显，作画亦不寒俭：学马贲，而标格过之；又作佛像极精细，衣缕皆描金而不俗。官至半刺而终（邓椿《画继》卷五、孙岳颁等《御定佩文斋书画谱》卷五一）。

三十、孙仁宅题记（《碑林》编号44）

53. 晁公退，公武之弟，淳熙元年（一一七四）崇道观主管（无名氏《宋史全文》卷二六上）。

三十一、潘居实等题记（《碑林》编号46）

54. 王良，字子善，绍兴间任江津酒官（冯时行《缙云文集》卷三《送王子善移江津酒官一首》）。

三十二、晁公武题记（《碑林》编号47）、又：张仲通等题记（《碑林》编号43）

55. 晁公武，字子止（《南宋馆阁录》卷八），号昭德先生，济州钜野（今属山东）人。冲之子。靖康之乱入蜀。高宗绍兴中进士，调荣州司户（清嘉庆《四川通志》卷一六五）。十七年（一一四七），辟为四川宣抚司钱粮所主管文字。历知恭州（《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五六）、荣州（《郡斋读书志》附黎安朝跋）、合州（清嘉庆《四川通志》卷五一附晁公武《清华楼记》）。为潼川府路转运判官，二十七年为言官论罢。孝宗隆兴二年（一一六四），除枢密院检详诸房文字，寻为殿中侍御史（《宋会要辑稿》职官一七之二一、七八之四九）。乾道元年（一一六五），出知泸州，三年，知兴元府，充利州东路安抚使（同上书选举三四之一五、二〇）。四年，为四川安抚制置使（《宋史》卷三四《孝宗本纪》）。六年，改淮南东路安抚使（《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五之二九），七年，知扬州（同上书食货一之四

五)。除临安府少尹，旋罢（《咸淳临安志》卷四七)。卒于嘉州。《宋史·艺文志》载其著述甚富，多散佚，唯存《郡斋读书志》四卷（一本作二十卷）及诗十三首。

三十三、冯忠恕等题记（《碑林》编号48)

56. 冯忠恕，字贯通，一字祈宽（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九《尹和靖语录四卷》)，临汝（治今河南汝州）人。绍兴初官黔州节度判官，十八年（一一四八）任左朝请郎知巴州提点成都府路刑狱公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録》卷一五八)。其父理，师事伊川程颐，与尹焞为同门友。忠恕又师事尹焞。尹焞自金人围洛，脱身奔蜀，绍兴四年（一一三四）止于涪。时忠恕官峡中，及迁黔州，往来必过涪。绍兴六年，尹焞被召赴都。明年，忠恕以鞫狱来涪，因紬绎旧闻，辑录成编。以忠恕之侍尹焞多在涪，涪为程子谪居之地，而是书之成又在涪，故以《涪陵纪善录》（一卷）为名。《宋史·尹焞传》称，尹焞言行见于《涪陵纪善录》为详，修史时多采此书（《涪陵纪善录·自序》、《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五九史部十五传记类存目一)。

三十四、李景嗣题记（《碑林》编号51)

57. 李景嗣，字绍祖，开封人（《涪州石鱼文字所见录·晁公遡题记》)，遵景之后。熙宁、元丰间任资州太守，除无名之敛，增养士之田，瘗久暴之骨，申放生之禁，兵荒之后人皆歌舞颂德（《四川通志》卷七上、《蜀中广记》卷四七)。后以直秘阁知夔州，恃援贪虐（李心传《建炎杂记》甲集卷一五，周必大《文忠集》卷六五、卷六七，《宋史》卷三八五萧燧传)。

58. 赵子澄，字处度，开封人（《涪州石鱼文字所见录·晁公遡题记》)，宋宗室。廉介修洁，流落巴峡四十年，藉添差禄以自给。善草隶，长歌诗，能画。绍兴末官秭乡，士子重其风度，每载酒从之游。一日乘醉入小肆，见素壁可爱，拈案上秃笔

作溅瀑，笔力遒壮，势欲动屋（夏文彦《图绘宝鉴》卷四、陶宗仪《书史会要》卷六、《蜀中广记》卷一〇八）。

59. 赵公曦，字景初，开封人（《涪州石鱼文字所见录·晁公遡题记》）。

三十五、杜肇等题记（《碑林》编号53）

60. 杜肇，绍兴乙亥（二十五年，一一五五）阶州（今甘肃武都）统领（《宋史》卷二六、徐乾学《资治通鉴后编》卷一〇八），绍兴二十六年涪州太守。

三十六、张宝等题（《碑林》编号54）

61. 张宝，字廷镇，唐安（今四川崇州）人（《涪州石鱼文字所见录·晁公遡题记》）。

三十七、晁公遡题记（《碑林》失收。《同治重修涪州志》卷一四艺文志散体文四题作《观石鱼记》。《涪州石鱼文字所见录》作今名，列于《李景嗣等题名》之后《杨谔等题名》之前。题记云"是岁绍兴十五年正月廿八日也"，《碑林》当编于第54号绍兴甲子《张宝等题》、第55号《杨谔等题记》之间。）

62. 晁公遡，字子西，济州钜野（今山东巨野）人，晁公武之弟。高宗绍兴八年（一一三八）进士（凌迪知《万姓统谱》卷三〇、康熙《清丰县志》卷四），绍兴十五年任涪陵令（《同治重修涪州志》卷四《秩官志·历代秩官》）。史籍无传，仕履不详。据本集诗文如《上周通判书》、《程氏经史阁记》等，知其举进士后历官左迪功郎知梁山军梁山县尉、涪州军事判官、施州通判，绍兴末知梁山军（影文渊阁四库全书《嵩山居士文集》）。孝宗乾道初知眉州，后为提点潼川府路刑狱，累迁兵部员外郎（《宋会要辑稿》选举二〇之二〇），以文学擅名于时。著有《抱经堂稿》、《箕山日记》，已佚。今仅存《嵩山（居士）集》五十四卷，刊于乾道四年（一一六八）。王士祯诸家评云，

其诗虽体格稍卑，无复前人笔力，然颇有警策；古赋一卷，《神女庙赋》最称奇丽；文章承五世文献之传，凭厚积深，故雄深雅健，钜丽俊伟，劲气直达，颇有崟崎历落之致，表现出绝人之资（四库全书集部四别集类三《嵩山集》提要、厉鹗《宋诗纪事》卷四八、王士祯《居易录》卷一）。

三十八、杨谔等题记（《碑林》编号55）

63．杨谔，梓州（今四川三台）人，天圣中以诗著称，《题骊山》最为警策（《尧山堂外纪》卷四五）。仁宗景祐元年（一〇三四）进士（《温公续诗话》），嘉祐间为泸州军事推官（《西溪集》卷一〇《洛苑使英州刺史裴公墓志铭》），未几而卒。有《水陆仪》二卷、《潼川唱和集》一卷，今佚。然题记作于绍兴乙丑（十五年，一一四五），别是一人无疑。

三十九、杜与可等题记（《碑林》编号56）

64．杨彦广，涪州人，冯时行《缙云文集》卷一有《题涪陵杨彦广薰风亭》五言古诗一首。

附王仲淹考按（记云："因思王仲淹'时和岁丰，通受其赐'之语"）：王仲淹（584？~617），名通，字仲淹，河东龙门人，世称文中子。著有《元经》十五卷、《中说》十篇。隋文帝仁寿三年（六〇三）秋，仲淹诣阙，献《太平十二策》，不用。罢归，遂教授于河汾之间。弟子自远至者甚众，累征不起。杨素甚重之，劝之仕。通曰："通有先人之敝庐足以庇风雨，薄田足以供饘粥，读书谈道足以自乐。愿明公正身以治天下，使时和年丰，通也受赐多矣。"终不仕（傅恒等《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卷四七）。

四十、何宪、盛辛倡和诗（《碑林》编号58）

65．何宪，字子应（《梅溪后集》卷八）。高宗绍兴十八年（一一四八）知涪州军州事。与王十朋有交往。事见《八琼室金

石补正》卷八三。

66. 盛辛，高宗绍兴十八年（一一四八）权涪州通判。事见《八琼室金石补正》卷八三。

四十一、高克舒题记（《碑林》编号59）

67. 高克舒，汴阳（今河南开封）人。《涪州石鱼文字所见录》作“吴克舒”，而标题仍作“高克舒题名”。该题刻今虽不存，然据《蜀中广记》卷一九名胜记第十九“涪陵江北普净院有‘汴阳吴克舒以绍兴癸未（按：一一六三）书云日举家来游，跰掾侍行’诸刻”，高克舒当为吴克舒之误。

四十二、张维等题记（《碑林》编号60）

68. 张维，字持国，绍兴中涪陵令（《涪州石鱼文字所见录·高祁等题名》）。与宋代著名词人张先父亲同名。先父张维（九五六～一〇四六），浙江乌程（今湖州）人。仁宗朝官卫尉寺丞。以子贵，赠尚书刑部侍郎。有《曾乐轩集》，佚。事见《齐东野语》卷一五《张氏十咏图》及清光绪《乌程县志》卷一〇、一三。

四十三、张松兑等题记（《碑林》编号63）

69. 王定国，四川金堂县人，绍兴进士（《四川通志》卷三三选举）。

四十四、黄仲武等题记（《碑林》编号65）

70. 黄仲武，濮国（治今河南濮阳）人，青城县尉（李流谦《澹斋集》卷三《送黄仲武尉青城》）。

四十五、姚邦孚题记（《碑林》编号67）

71. 宋元，四川华阳人（《四川通志》卷一一列女），哲宗元祐进士（《四川通志》卷三三选举）。

附按：该题记虽仅“宋元、高匪懈、姚邦孚继至”十字，

并未标明具体时间，但据《孙仁宅题记》“绍兴庚申首春乙未”姚邦孚从游（《碑林》编号44）、《张宗悫题记》“东平姚邦荣、邦孚……绍兴庚申二月癸丑来观”（《碑林》编号45）、《周诩题记》“姚邦荣、邦孚……绍兴庚申岁二月丙午来”（《碑林》编号49）可知，宋元等三人观石鱼题记亦当在“绍兴庚申（十年，一一四〇）”。《碑林》断其年代为“南宋绍兴年间（公元1131－1162年）”，不确。

四十六、赵彦球题记（《碑林》编号70）

72. 宋中和，四川眉山人，孝宗隆兴进士。庆元初守荣州，廉勤节俭为西蜀循吏第一（《四川通志》卷七上名宦直隶嘉定州、卷三三选举）。

73. 王浩，苍溪人，失其年。进士，官监簿（《涪州石鱼文字所见录·赵彦球题记》按语）、大安（今四川仁寿南）统制。绍定辛卯（四年，一二三一）冬十月元兵攻大安，守城死（无名氏《昭忠录》）。

四十七、贾振文题记（《碑林》编号71）

74. 李从周（生卒不详），字肩吾，又字子我，号蟥洲，四川眉州人（按：一说彭山人），魏了翁门客。博见强识，能书，尤精六书之学，有《字通》一卷行世（陈振孙《直斋书録解题》卷三、《宋史》卷二〇二艺文志第一百五十五、倪涛《六艺之一録》卷三四九）。虽“破碎冗杂，殊无端绪……亦可备检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四一）。善填词，有赵万里辑《蟥洲词》，《全宋词》第四册二四〇二～二四〇四页收其《玲珑四犯》（初拨琵琶）等十首。

四十八、卢棠题记（《碑林》编号73）

75. 邓椿，字公寿，汉嘉（今四川雅安）人（按：一作双流人），政和中知枢密院邓洵武之孙，孝宗乾道间进士，官至知

州，有《画继》十卷传世。是书以家世闻见缀成，用续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故名。书以高雅为宗尚，录熙宁七年至乾道三年九十四年间上而帝王下而工技凡二百十九人，网罗赅备，持论平允（《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一二子部二十二、《金石苑》册四）。

四十九、刘师文等题记（《碑林》编号74）

76. 刘甲（一一四二～一二一四），字师文，其先永静军东光人，元祐宰相挚之后。父著，为成都漕幕，葬龙游（今四川乐山），因家焉。孝宗淳熙二年（一一七五）进士。使金还，除知江陵府兼湖北安抚使，移知庐州。迁知兴元府兼利东安抚使，未至镇，金立吴曦为蜀王，上书告变。曦诛，进宝谟阁学士、权四川制置司事。宁宗嘉定七年卒于官，谥清惠，年七十三。甲幼孤多难，母病，刲股以进。生平常谓：“吾无他长，惟足履实地。”昼所为，夜必书之，名曰“自监”。为文平澹，著有《奏议》十卷、《蜀人物志》、《新潼川志》等，多佚。《宋史》卷三九七有传。题记中称“东平刘甲”，乃书其先世所居之地（《涪州石鱼文字所见录·冯和叔等题记》按语）。

五十、冯和叔题记（《碑林》编号75）

77. 冯和叔，字季成，剑浦（今福建南平）人，右承事郎，绍兴二十年至二十三年（一一五〇～一一五三）任上元（今属南京）县令（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二七官守志四），淳熙五年（一一七八）任涪陵郡守。

78. 向士价，字邦辅，河内（今河南沁阳）人，故忠州太守。晁公遡《嵩山集》卷四四有与向邦辅劄子一通。

79. 胥挺（生卒不详），字绍祖，武信（今四川遂宁）人，乾道五年（一一六九）进士（《四川通志》卷三三、《涪州石鱼文字所见录·冯和叔等题记》按语），淳熙间任涪陵县令（《碑

林》编号 76《朱永裔题记》)。

五十一、朱永裔题记(《碑林》编号 76)

80. 朱永裔，字光叔，小名信哥，小字冠先，阆州阆中县新安里人(按:《四川通志》卷三三作南部县人)，故左廸功郎朱骥之子。建炎元年(一一二七)六月十六日生，绍兴十八年(一一四八)进士，五甲第六十四名(《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淳熙七年(一一八〇)假涪州守。

五十二、徐嘉言题记(《碑林》编号 78)

81. 冯愉，字端和，临汝人，绍熙五年(一一九四)五月乙未以通判遂宁府权州事(无名氏《两朝纲目备要》卷九)，庆元二年(一一九六)涪陵郡守。

五十三、赵时僾题记(《碑林》编号 79)

82. 王倬，四川仁寿县人，宣和进士(《四川通志》卷三三选举)，玉牒赵时僾妹夫。著有《班史名物编》十卷(《宋史》卷二〇七艺文志第一百六十)。

附按:《碑林》仅据题记“壬戌仲春”数字将其年代断为“南宋嘉泰壬戌年(公元 1202 年)”，疑误。考王倬既为宣和(一一一九～一一二五)进士，至嘉泰壬戌时已年约八旬，而其内兄赵时僾却尚在职郡丞，有违情理。故，该题记之标年“壬戌”似当为绍兴壬戌(十二年，一一四二)，其在《碑林》一书中的编号亦应相应提前。

五十四、禄几复等游记(《碑林》编号 80)

83. 王世昌，度宗咸淳三年(一二六七)合州(今重庆合川)监军，与知州张珏、统制史炤等复广安大梁城(《宋史》卷四六本纪第四十六)。后权泸州安抚使，元兵迫城，誓不屈节。及城破，自经死(《宋史》卷四五一列传第二百一十张珏传、《四川通志》卷一二忠义)。

附按：《碑林》据记中“岁戊辰上元”断其年代为“南宋嘉定元年（公元1208年）”，则世昌咸淳三年为合州监军时已年约八旬，恐误。疑此戊辰岁当为咸淳戊辰（四年，一二六八），即该记题于王氏与张珏、史炤等收复广安大梁城次年。且观其字体，一派戎马倥偬之气，亦合。

84. 杨灼，阆中人，宁宗庆元中（一一九五～一二〇〇）进士（《四川通志》卷三三选举、《涪州石鱼文字所见录·禄几复等题名》按语）。

85. 李国纬，咸淳间涪陵县司户，编有《夔州（旧）图经》（王象之《舆地碑记目》卷四、周复俊《全蜀艺文志》卷五二）。

五十五、贾渔题记（《碑林》编号81。按，渔为復字误读，当作：贾復题记）

86. 贾復（复），澶渊人，乾道六年（一一七〇）成都历学进士（《宋史》卷八二律历志第三十三）。

五十六、曹士中题记（《碑林》编号82）

87. 曹士中，江东（今江苏芜湖、南京等地）人（一说江西都昌人），嘉定四年辛未（一二一一）赵建大榜进士，泉州佥判（谢旻等《江西通志》卷五〇选举宋二）。

五十七、李公玉题记（《碑林》编号84）

88. 秦季槱，字宏父，普州安岳（今属四川）人，绍熙四年（一一九三）陈亮榜同进士出身，治《春秋》十七年。宝庆元年（一二二五）正月以秘书少监兼实录院检讨、国史院编修官，六月除直显谟阁知潼川府（今四川三台）（《馆阁续录》卷七、卷九）。

89. 秦九韶（一二〇二～一二六一），字道古，普州安岳人，季槱子。性极机巧，学识渊博，多交豪富，唯利是图。曾先

后在湖北、安徽、江苏、浙江等地任官，后受贾似道打击，贬死梅州任所。所著《数书九章》（南宋时称为《数学大略》或《数术大略》），对大衍求一术和正负开方术（今称“秦九韶程序”）的研究邮杰出贡献。宝庆元年（一二二五）六月，秦季槱新任潼川（今四川三台）知府。次年正月十二日，秦氏父子来涪，与州守李瑞（字公玉）及子游赏长江石鱼，并刻石题名。事见《数书九章·自序》、周密《癸辛杂识·续集》。

90. 李泽民，字志可，宝庆间涪陵郡守李公玉子，唐安（时称江源，今四川崇州）人。理宗淳祐初知宁德县事。八年（一二四八），移长溪令，新庙学，筑东湖（筑堤长百丈，周九百七十五步，邑民便之，号曰“李公堤”），士民德之（郝玉麟、卢焯等《福建通志》卷七水利、卷二六职官七、卷三二名宦四福宁府）。

五十八、谢兴甫题记（《碑林》编号 87）

91. 谢兴甫，字起口，长沙人。文行华美，气质粹和，谨重好修，学术甚正，以殿试第五名及第，授从事郎全州州学教授（卫泾《后乐集》卷一二《奏举萧遵施椅姜注谢孙复谢兴甫郄梦祥乞加录用状》、杨士奇等《历代名臣奏议》卷一四九），绍定二年（一二二九）任涪州太守（魏了翁《鹤山集》卷四八《涪州太守题名石记》）。著有《中庸大学讲义》三卷（《宋史》卷二〇二艺文志第一百五十五）。

92. 杨坤之，字东叔（石刻题记东似为夷字），资中人。魏了翁《鹤山集》卷六一《跋杨参议（兴）家书后》云：“资中杨侯东叔自涪陵罢归，携其先君子参议公手泽以示余，为之怃然。”按：杨兴撰有《龟陵志序》（《四川通志》卷二六）。

五十九、张霁题记（《碑林》编号 88）

93. 王槱，字钧卿，古通（今四川达州）人，淳祐三年

（一二四三）涪陵郡教授（《四川通志》卷三三选举）。

94．张应有，字嗣行，资中人（一说绵州人），绍定进士（《四川通志》卷三三），淳祐三年（一二四三）涪陵郡监税。

六十、邓刚等题记（《碑林》编号91）

95．邓刚，字季中，庐陵人（一说吉水人），嘉定十六年癸未（一二二三）蒋重珍榜进士（谢旻等《江西通志》卷五〇选举宋二），淳祐八年（一二四八）涪陵郡守。

六十一、赵汝廪观石鱼诗（《碑林》编号92）

96．赵汝廪，祖籍河南开封。理宗淳祐庚戌（十年，一二五〇）知涪州（《八琼室金石补正》卷八三。按：《碑林》注其"淳祐九年任涪陵郡守"，误。），劝农兴学，轸念民瘼，歉则贷公，丰则收贮义仓，颇有政声。民为立生祠于学宫以配程（颐）、黄（庭坚）、尹（焞）、谯（定）四贤（李贤等《明一统志》卷六九、《四川通志》卷六名宦、《同治重修涪州志》卷四《秩官志·历代秩官》）。

六十二、刘叔子诗（《碑林》编号93）

97．刘叔子，字君举，四川长宁人。理宗宝祐二年（一二五四）知涪州（《八琼室金石补正》卷八三）。阳枋有《谢涪陵刘君举使君见委北岩堂长诗》五言古诗一首（《字溪集》卷一〇）。

六十三、蹇材望题记（《碑林》编号94）、又：刘叔子诗（《碑林》编号93）

98．蹇材望，字君厚，潼川（今四川三台）人。理宗宝祐二年（一二五四）通判涪州，恭宗德祐间通判湖州（《八琼室金石补正》卷八三）。周密《癸辛杂识》续集卷上载：其为湖州倅时，北兵将至，蹇毅然自誓必死，乃作大锡牌镌其上曰"大宋

忠臣蹇材望”，且以银二笏凿窍并书其上曰：“有人获吾尸者，望为埋瘗，仍见祀题云‘大宋忠臣蹇材望’，此银所以为埋瘗之费也。”日系牌与银于腰间，只伺北军临城，则自投水中。且遍祝乡人及常所往来者，人皆怜之。丙子正月旦日，北军入城，蹇已莫知所之，人皆谓之溺死。既而，北装乘骑而归，则知先一日出城迎拜矣。遂得本州同知，乡曲人皆能言之。

六十四、徐朝卿题记（《碑林》编号97）

99. 徐朝卿，铜鞮（今山西沁县）人，为性静慎，精易理象数（汪应辰《文定集》卷九《赠徐朝卿序》、《徐寿卿集序》），建炎三年（一一二九）涪州太守。

六十五、王汉老题记（《碑林》编号101）

100. 王汉老，号无诤居士，度宗时临安县令（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五一秩官九）。

六十六、刘冲霄诗并序（《碑林》编号109）

101. 刘冲霄，四川内江人，举人。历官松溪知县（郝玉麟等《福建通志》卷二五职官六）、南阳府同知（王士俊等《河南通志》卷三二职官三）。洪武十七年（一三八四）奉训大夫知涪州。

102. 黄思诚，徽州休宁人，贡生。历官海盐训导（郝玉麟《福建通志》卷三九）、潮州府通判（郝玉麟等《广东通志》卷二七）。洪武十七年（一三八四）涪州学正。

六十七、黄寿题记（《碑林》编号118）

103. 黄寿（一四六四～一五三四），字纯仁，号松崖，南城（今属江西）人。弘治二年（一一八九）进士。万历中由黄州判以异政擢涪州守，尚俭革弊，期年而六事孔修。朝暮焚香危坐，凡百念虑动处事皆符应，世人号为神官（《同治重修涪州志》卷四《秩官志·历代秩官》、《碑林》编号一二一《联句和

黄寿诗》题刻）。

六十八、联句和黄寿诗（《碑林》编号121）

104. 刘用良，涪州人，正德丁卯（二年，一五〇七）举人（《四川通志》卷三五选举）。

105. 文行，涪州人，岁贡生，湖南辰州府通判（王鑑清等《民国涪陵县续修涪州志》卷一〇选举志、卷一五人物志仕进）。

六十九、江应晓诗记（《碑林》编号123）

106. 江应晓，字觉卿，新安（今安徽歙县）人，一称徽州人。嘉靖末官涪州州判，筑室山麓，躭于吟咏，博览群籍（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二七子部三七）。后以文林郎山西道监察御史致仕，为明末著名直臣，名重一时。著有《对问编》八卷（剌取史籍所载天文地理人物杂事，分条立说议谕。见四库存目丛书子部第一〇四册）、《嚣嚣集》等，学者称“山城先生”（赵宏恩等《江南通志》卷一六七人物志文苑三、嵇璜等《钦定续文献通考》卷一七七经籍考）。

七十、陈廷璠书王士祯诗（《碑林》编号126）

107. 陈廷璠（一七四七～一八二九），字六斋，涪州（今重庆涪陵）人。乾隆庚子举人，嘉庆辛酉大挑一等，分发广西荔圃，历任知县（民国《涪陵县续修涪州志》卷一二《人物志·笃行》）。

108. 王士祯（一六三四～一七一一），本名士禛，字子贞，一字贻上，号阮亭，又号渔洋山人，新城（今山东桓台）人。顺治十五年进士，官至刑部尚书。谥文简。兼善古文及词，论诗创神韵说，诗负一时盛名。曾两次使蜀，沿途赋诗颇多。康熙十一年（一六七二）典四川乡试，作《题涪州石鱼》（《渔洋诗话》卷下）诗。有《带经堂集》九十二卷，《居易录》、《池北偶谈》等笔记多种。《清史稿》、《清史列传》有传。

七十一、萧星拱观石鱼记（《碑林》编号127）

109. 朱羽，字麟祯（一作正），辽东人，荫生，忠州守朱世叔父。康熙三年（一六六四）任涪州知州，六年建修州署（《四川通志》卷二八公署、卷三一皇清职官）。

110. 萧星拱，盱江（今江西南城）人，吏员。康熙十九年（一六八〇）任涪州知州，重修学宫，补修州署。二十一年，移知忠州。二十二年，复知涪州，复建州署。二十四年（一六八五），以广德石鱼（简称唐鱼）“岁久剥落，形质模糊”命工新刻双鲤（简称清鱼或萧鱼），并作《重镌双鱼记》勒于其下，极具水文、人文价值。三十年，任重庆府知府。四十一年知东川府，勤于政事，整顿地方。以东川土地空旷难守，乃于东门截筑土城，约退三十余丈，捍卫赖之。事见和珅等《钦定大清一统志》卷三七五东川府，《四川通志》二八公署、卷三一皇清职官，《同治重修涪州志》卷五《秩官志·国朝秩官》。

七十二、萧星拱重镌双鱼记（《碑林》编号129）

111. 杜同春，字悔川，云间（今上海松江）人，拔贡。康熙五年（一六六六）任黔江县知县（《四川通志》卷三一皇清职官）。

112. 刘之益，字四仙，涪州人，康熙二十二年（一六八三）纂修州志（《民国涪陵县续修涪州志》卷二七旧序《康熙癸亥年续修州人刘之益序》）。

113. 文珂，字奚仲，涪州人，岁贡生，康熙二十二年（一六八三）纂修州志（《民国涪陵县续修涪州志》卷一〇选举志、卷二七《康熙癸亥年续修州人文珂序》）。

七十三、徐上升、杨名时诗记（《碑林》编号130）

114. 杨名时，涪州人，四川绵竹县训导。卒葬涪州洗墨溪（吕绍衣等《同治重修涪州志》卷二舆地志茔墓）。

七十四、董维祺题记（《碑林》编号131）

115. 董维祺（一六七一～一七三九），满族，千山（今辽宁鞍山）人，镶白旗监生。康熙四十二年（一七〇三）任涪州知州（按：一说为康熙四十三年知涪州，见《四川通志》卷三一皇清职官），留心教养，能文善书，主持续修州志（《同治重修涪州志》卷五《秩官志·国朝秩官》）。

七十五、罗克昌题记（《碑林》编号132）

116. 罗克昌，高邮（今属江苏）人，康熙间进士。乾隆初官知涪州，建书院课农桑，实心为政，有贤名。尝手书“诚”字于钩深书院讲堂，结体遒劲（《同治重修涪州志》卷五《秩官志·国朝秩官》）。

七十六、张师范题诗（《碑林》编号133）

117. 张师范（一七四六？～一八一八?），阳湖（今江苏武进）人。嘉庆十六年（一八一一）除知涪州，听断明敏，悉心赈济，兴办义学，纂修州志。民为立生祠于北岩祀之（《同治重修涪州志》卷五《秩官志·国朝秩官》）。

七十七、姚觐元题记（《碑林》编号135）

118. 姚觐元，字彦侍，归安（今浙江吴兴）人。道光癸卯举人，历官广东布政使。有《大迭山房诗存》（《晚晴簃诗汇》卷一四四、《安乐康平室随笔》卷三）、《涪州石鱼文字所见录》（与钱保塘合编）。

七十八、“白鹤梁”题记（《碑林》编号137）

119. 孙海，字吟帆，秦安（今甘肃天水）人。咸丰辛酉拔贡，官遂宁知县。有《欲未能斋诗存》（《晚晴簃诗汇》卷一五七）。

七十九、濮文升题记（《碑林》编号141）

120. 濮文升（一八四八～一九一〇），江苏溧水人，进士，濮瑗次子。多情任性，重世谊。凡其父门生，不问贤否，虚心听受，往往混淆曲直。同治十年、十二年、光绪三年三知涪州，富人多有投其所好重贽拜于门下而在外威福者，始终庇之（《涪陵县续修涪州志》卷九《秩官志・文职十》）。

八十、施纪云题记（《碑林》编号150）

121. 邹增祜，字受丞，涪州人，淹通经史，词章典雅。光绪乙未（二十一年，一八九五）骆成骧榜进士，以即用知县分发广东新兴，升嘉应直隶州知州加知府衔，两次奏保循良，传旨嘉奖。晚年承祖棉旧业，尤精医学。著有《天风海水楼诗文集》、《蘐言》、《医学丛钞》等。

122. 施纪云，原名缙云，字崔生，涪州人。光绪癸未（九年，一八八三）陈冕榜进士，历任施南知府、湖北提法使。总纂《涪陵县续修涪州志》二十七卷附民国纪事一卷。

（原载《三峡大学学报》哲社版2006年第1期，收入本书时有大幅增补）

《水下碑林白鹤梁》题刻释文校读记

本文主要以白鹤梁题刻拓片影本及《涪州石鱼文字所见录》》等前人整理研究成果，对陈曦震编纂《水下碑林白鹤梁》一书题刻“释文”部分所存在的移录不全、臆录误校、句读舛讹及补注不得要领等问题，进行较为详细的辨析，并做补正。

涪州（涪陵）；石鱼文字；《水下碑林白鹤梁》

陈曦震等人编写的《水下碑林白鹤梁》（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3月版，以下简称《碑林》）一书，采用纵横交错的编写方法，“以白鹤梁题刻的年代为纵延伸发展，以现存题刻的内容介绍为横铺陈展开”（第118页编者《后记》），将其利用拓片资料、实拍照片和其它传世文献所辑录的宋以来题刻文字共174段，图文并茂地呈现出来。作为自清光绪三年（1877）钱保塘、姚觐元纂撰《涪州石鱼文字所见录》以来百余年间对题刻文字有过全面系统整理的惟一文本，其问世十年来，不仅极大地方便了一般人对白鹤梁全貌的认识了解，也为一些专家、学者研究和保护白鹤梁题刻提供了一套翔实、系统、有参考价值的资料。然而，笔者在阅读其中“题刻和释文”这一核心部分时也注意到，该书除了“题刻”打本图片印制质量欠佳外，“释文”对题刻原文的逐录标校及附注还存在着不少舛讹。如果不及时做出辨析匡正，势必继续造成人们对题刻文字的误读误解，甚至影响到相关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及其结论的正确性。今据《八琼室金石补正》

（清陆增祥撰，北京文物出版社 1985 年影印本，以下简称《补正》）、《涪州石鱼文字所见录》（姚觐元、钱保塘，上海国粹学报社 1912 年古学汇刊本，以下简称《所见录》）、《同治重修涪州志》（清吕绍衣、王应元纂，巴蜀书社 1992 年版《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第 46 册影同治九年刻本，以下简称《同治志》）、《民国涪陵县续修涪州志》（王鑑清、施纪云纂，巴蜀书社 1992 年版《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第 47 册影民国十七年铅印本，以下简称《民国志》）等书登载题刻文字和《世界第一古代水文站——白鹤梁》（中国三峡出版社 1995 年版，以下简称《水文站》）及《碑林》本身所录石刻拓片影本（以下径称石刻），对《碑林》一些释文及附注作一对校比勘，并依其在原书中的顺序，将查核结果胪列于次。个人拙见，亦随便一概系附于相关条目。

一、谢口口题记

1. 口口古记及水标，有所镌石鱼两枚。古记云：唐广德口口春二月岁次甲辰

标，形近误读，石刻、《所见录》均作“際”；石鱼两枚，《所见录》作“石鱼两古”后接“枚记云”，显系手民误乙；广德口口，据题记下文“时刺史州团练史郑令珪记自广德元年甲辰岁至开宝四年岁次辛未”暨《太平寰宇记》“古记云广德元年二月江水退石鱼见，部民相传丰稔之兆”，所缺当为“元年”二字，可补。又，唐代宗李豫于宝应二年（762）四月继位，次年（763）七月始改号“广德”，即广德元年仅有下半年，不当有题记中的“春二月”和《太平寰宇记》中的“二月”；且该年干支字为“癸卯”，并非“甲辰”；而一般论之，古人纪干支往往较为可靠，不易出错。凡此数端，可推题记“广德元年甲辰岁”及《寰宇记》“广德元年二月”之“元年”应为“二年（甲辰）”误记。

2. 邀请通判口口口徒巡检司军州官吏等

邀，石刻、《所见录》作“遂”。判，石刻同；《所见录》作“刺”，误。

二、朱昂题诗

1. 石旁刻二鱼

旁，石刻、《所见录》本作“傍”，通“旁”，但不宜径改作“旁”。

2. 知琅琊公口云：“石鱼再出水，岁复稔。”

知，据石刻、《所见录》，释文此字后脱一“郡”字；水，石刻、《所见录》作“来”。句当读作：石鱼再出，来岁复稔。

三、刘忠顺唱和诗

1. 出来非自贪芳饵

自，误。石刻、《所见录》作“共”，言二鱼偕往。

2. 圣宋皇祐元年正月十二日口口口军州事郐霖命工刻石

正月，石刻同；《所见录》作“五月”，误。刻，石刻、《所见录》作“刊”，《碑林》误。

四、刘仲立等题记

1. 民掾刘仲立正臣……涪陵宰口口口良辅、嘉祐二年仲春同游此，谨志。

正，石刻崩泐不清，《所见录》作“王”，《碑林》释文补字疑是。良辅，字后顿号宜去。同，石刻崩泐不清，《所见录》作“月”。

五、武陶等题记

1. 观石鱼题名

观，石刻、《所见录》作“遊”。题名，据石刻、《所见录》，其后脱一“记”字。题款应为：游石鱼题名记。

2. 郡从事傅颇布圣嘉祐二年正月八日谨识

布圣，石刻二字残缺，《所见录》作“希圣”，疑《碑林》误。

六、冯□题记

1. 都邮高概秉节，涪陵令黄君□□□□□□□[耆] □□□□□。□□□……

都邮，石刻、《所见录》作“督邮”。“□□□。□□□”，既前后缺脱，不得知晓其义，句号无以下。宜删。

七、李袭题记

1. 李袭观石鱼题名，涪陵尉郑阶平书。二石鱼在江心石梁上，古记云：出水四尺，岁必大稔。袁能刻。

该题记《所见录》无。《碑林》注：“此题已不存，原文摘自［清］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今按：考题记全文，其首“李袭观石鱼题名，涪陵尉郑阶平书。”十四字，实为下则“徐庄题记”（编号8：共9行，行7字，篆书径4寸）正文之末二行，与前七行首尾相接，格式、书风、刻工同出一手。“二石鱼在江心石梁上，古记云：出水四尺，岁必大稔。袁能刻。”云云，则为徐庄题记正文后刻工袁能之二行行十二字径一寸小字题署。故，所谓“李袭题记”者，乃由陆氏错误割裂徐庄题记而得，《碑林》传误。

八、徐庄题记

1. 监税殿直王令岐，知乐温县钟浚

令，《同治志》同，《所见录》作“克”。石刻原书“亨”，即克字。

九、黄觉题记

1. 夔州奉节县令权幕通州黄觉莘老

通州，石刻、《所见录》作“通川”。《碑林》“蒲蒙亨再题”（编号24）中“通川牟天成”亦可参证。按：通川、通州、其实一也，即今四川达州。据《太平寰宇记》，通州始置于后魏废帝二年（553），隋改曰通川郡，唐复为通州、通川郡，宋太祖乾德二年（964）改为达州。此题记留于熙宁七年（1074），曰“通州”，系用隋唐旧称。

2. 户掾平原李缓公敏

李缓，石刻、《所见录》同。《同治志》作“李绂”，误。

十、韩震题记

1. 都官郎中韩震静翁、屯田外郎费琦孝琰、侄伯叔景先、进士冯造深道、卢遘彦通

费琦，《所见录》据《嘉庆四川通志》按云金堂人，皇祐中进士。伯叔，石刻、《所见录》作“伯升”，震侄韩景先之名。《同治志》作“伯外”，亦误。遘，石刻同，《所见录》异作“觏”。

2. 按旧记大和泊广德年，鱼去水四尺，是岁稔熟。

泊，石刻、《所见录》作“洎”。

附《碑林》“韩震”注补

《所见录》据《嘉庆四川通志》考按：韩震，井研人，庆历中进士，官朝议大夫，其名亦见于《山谷集》。

十一、吴缜题记

1. 元丰九年岁次丙寅二月七日

元丰九年，《同治志》作“元丰元年”，误。哲宗元丰八年三月即位，次年正月改元元祐。《所见录》按云：“是年为元祐元年。正月朔改元，蜀中未闻改元之诏，故犹书元丰九年。”

《碑林》注"此题记年代应为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元丰只有八年。虽已改元，因涪州路遥而继续使用元丰年号。"云云，以此。

附《碑林》"吴缜"注补

《所见录》按：吴缜，宋史无传，或以其先世所居之地称"咸林吴缜"，或举其最后之官（朝议大夫知蜀州）称"成都吴缜"。有《新唐书纠谬》20卷、《五代史记纂误》5卷行世。

十二、杨嘉言题记

1. 县尉蒲昌龄寿朋

蒲昌龄，《所见录》据《嘉庆四川通志》：顺庆人，元祐中进士。

2. 朝奉郎知军州事杨嘉言令绪题

杨嘉言，元祐五年（1090）知涪州军州事，亦称杨军州。故《同治志》该题记作"杨军州题名"。

十三、姚珏题记

1. 郡守姚珏率幕宾钱宗奇、涪陵令杜致明、主簿张徵

珏，《同治志》误作"班"，题名为"郡守姚班游记"。徵，石刻、《所见录》同；《同治志》作"徵"，误。

十四、黄庭坚题记

1. 元符庚辰，涪翁来

涪翁，山谷晚号，《所见录》题为"涪翁题名"，似更恰切。元符庚辰，即元符三年（1100），时山谷五十六岁，已入其所谓"平淡而山高水深"之境。故题记虽仅廖廖七言，淡泊、平常至极却又有着诗一般的天然韵味与节奏。《碑林》将其点断，甚嫌拙恶。

附《碑林》"黄庭坚"注补

《碑林》注"黄庭坚"一条最详，共170余字。然皆泛言不

得要领，几无一字关乎题记。《所见录》引《舆地纪胜》云："绍圣丁丑，伊川先生来涪于北岩普静院辟堂传易，阅再岁而成。元符庚辰，徙夷陵。会太史黄公自涪移戎，过其堂，因榜曰'钩深'。按此题名七字，盖同时所书也。"可补。

十五、符直夫等题记

1. 崇宁元年正月二十四日

二十四日，石刻、《所见录》作"廿四日"。附按：该题记共七直行，如颜真卿第一遗墨《大唐中兴颂碑》自左至右书写，其时较为少见，也是白鹤梁碑林中此种格式时间最早之作。

十六、太守杨公留题

1. 不才叨郡寄，燕喜愧萧迹。

萧迹，不词，石刻、《所见录》作"萧疎"。疎：疏，与诗第二、六、八句"初"、"书"、"舒"同韵。

十七、贺致中题记

1. 尉赵郡宇文湛深之，是月中于后一日致中口命书。

宇文，石刻、《所见录》作"宇文"，复姓。中于，石刻、《所见录》作"中澣"，即中浣，指农历每月十一、二日。又，题记名称，《所见录》作"杨元永题记"。

十八、庞恭孙题记

1. 朝散大夫和涪州军州事庞恭孙记

和，石刻、《所见录》作"知"。宋命朝臣出任列郡长官，称为（权）知某州事，简称知州。

十九、王蕃题记

1. 司马机才聘为涪陵督邮

聘，《所见录》作"孺"，石刻漫漶难辨，似"骋"字。

2. 滋濡春遂足，狼泪岁将口。

泪，石刻、《所见录》作“戾”。

二十、吴革题记

1. 奉议郎前通判达州权司录事李全修、武郎兵马都监曹绾

《所见录》据《嘉庆四川通志》按：李全，富顺监人，崇宁五年进士。《碑林》以职官名“修武郎”之“修”字属上读作“李全修”，误。

附《碑林》“吴革”注补

吴革，《碑林》注“华阳人”，《宋史·忠义传》同。《所见录》考“阳”乃“阴”字之误，其实为华阴人。

二十一、毋丘兼孺题记

1. 南荣句惇夫

南荣，即唐代荣州，今四川荣县。《所见录》考曰：“荣州一称荣南，盖为汉南安县地。唐为荣州，取荣德山为名，兼取汉唐地名，故可称荣南，亦可称南荣也。”

2. 毋丘光宗、孙若纳、若诎侍行

纳、诎，误。石刻、《所见录》、《同治志》等均分别作“讷”、“拙”。

二十二、陈似题记

1. 宪属陈似龚卿还恭

龚卿，石刻、《所见录》作“袭卿”，陈似字。《所见录》题作：陈袭卿题记。

2. 孙之才伯达、林琪子美同观石鱼

孙之才伯达，亦见下则“文悦题记”（编号30）。《所见录》按：“《嘉庆四川通志》云：孙之才眉山人，政和中进士；孙伯达眉山人，宣和中进士。盖误以名字分为二人，当以此刻正之。”

二十三、文悦题记

1. 成都文悦理之、周祉受卿、唐安周南廷、向文登、刘蒙公亨、眉山刘纯常大全

周南廷、向文登，石刻同，《所见录》作“周南廷登向文登”，“廷”、“向”间衍“登”字。又，考其前后“成都文悦理之、(成都)周祉受卿”、“眉山刘纯常大全”等，均列籍地、姓名和字号，疑“文登”为地名标刘公亨籍里，当属下断为：唐安周南廷向、文登刘蒙公亨、眉山刘纯常大全。

二十四、观石鱼题名

1. 陈革子正、王淑德初、虞中立和甫、王骏德先、邓奇颖伯、董天成常道

王淑，石刻、《所见录》作“王俶”。董天成常道，《所见录》据《嘉庆四川通志》按：达州人，建炎二年进士。又，该题记名称，《所见录》作“赵子遹等题名”。《碑林》命名虽取题记正文上方自右至左横批五字，但与它处标名首列记中第一人名不类，所指亦不明确。

二十五、种慎思题记

1. 口口刘意彦至、豹林种[佚][慎][思]，皆以职事。趋郡遇故人，江西李尚义宜仲还自固陵，[种]法平叔来自南宾。

豹林，即豹林谷，在陕西长安终南山，内有东蒙峰。宋种放曾隐于此，种慎思或为其后。《碑林》注“豹林”为种慎思号，误。种[佚][慎][思]，《所见录》作“种口进慎思”，石刻“种”与“慎思”间亦有一、二字位置，疑《碑林》脱“进”字。又，该句逗断有误，应作：口口刘意彦至、豹林种[佚][进][慎][思]皆以职事趋郡，遇故人江西李尚义宜仲还自固陵，[种]法平叔来

自南宾。

2. 相率[拿]舟，载酒游北崖及观石鱼，[竟]日忘归

[拿]，石刻、《所见录》作“挐”。挐，引也。[竟]，石刻、《所见录》作“竟”，《碑林》误。又，题记名称，《所见录》作“刘意等题名”。

二十六、何梦与题记

1. 泉山王德叔

叔，石刻、《所见录》作“升”。

二十七、王择仁题记

1. 是以隐于数季而见

季，石刻作“秊”，《所见录》作“年”。《碑林》以形近误读。

二十八、[宋]艾等题记

1. [宋]艾、邢纯、刘□

[宋]，石刻缺字，《所见录》因此取第二人姓名标题，作“邢纯等题名”。

二十九、贾思诚题记

1. 赵子仪景温

仪，石刻作“孅”，同。《所见录》作“蟻”，即简体“蚁”字，误。又，《所见录》一作“孅”，其按引《宋史·宗室世系表》云：“秦王德芳五世孙有武节郎子孅”。

三十、潘居实题记

1. 潘居实去华、袁颜睹之，王良子善、金湜德源

睹，石刻作“睎”，《所见录》作“晞”。《碑林》、《所见录》俱误。湜，石刻同。《所见录》作“湯”，误。

2. 绍兴庚申正月念三日也

念，石刻、《所见录》同，通“廿”。顾炎武《金石文字记》之三记《开业寺碑》云：“碑阴多宋人题名，有曰：‘……元祐辛未阴月念五日题。’以廿为念，始见于此。”

三十一、冯忠恕等题记

1. 张仲通、陈靖忠、冯忠恕同 观石鱼。绍兴庚申正月丙申。

该题记《所见录》作“张仲通等题名”。然《所见录》此前已有同名题刻一通（即《碑林》编号43“张仲通等题记”：二月初七日，张仲通、张修、晁公武、赵子仪来观。时宋兴一百八十年。），标目雷同，造成称指不明。《碑林》虽改作“冯忠恕等题记”，又未合别处以记中明确的第一人姓名字号标题的惯例，因此，适当采用扩展名，将其分别标为张仲通张修题记和张仲通陈靖忠题记，或张仲通绍兴己未题记和张仲通绍兴庚申题记，在循守通例的同时导入必要的差异因素以显示相互间区别，也就成为解决上述问题的一种有效办法。

三十二、周诩题记

1. 绍兴庚申岁二月丙午来，炎觉先书。

炎，石刻作“㷋”，《所见录》按：“㷋字字书不载”。疑误。

三十三、李景嗣题记

1. 古汴李景嗣、邓褒、赵子澄、赵公蒙

蒙，误，石刻、《所见录》作“曚”。又，该石刻有拓片见于《水文站》一书第26页，《碑林》注云其今已不存，亦误。

2. 绍兴十三除前二日偶来，鱼在水一尺。

除，小除，据《同治志》卷一《舆地志·风俗》、《民国志》卷七《风土志·节序》载：涪人以农历十二月二十三日为

小除，用果资糖豆等物祀灶，俗谓灶神上天；又，除或谓除残，指农历十二月二十七日洒扫屋尘，见袁宏道《袁中郎集》十四《记述岁时·纪异》。鱼在水一尺，《所见录》同，石刻作“鱼在水尚一尺”。

附《碑林》“李景嗣”注补正

据《所见录》“晁公遡题记”（《碑林》失收）：景嗣字绍祖，子澄字处度，公睐字景初。《碑林》注“李瞻：字景嗣”，误。

三十四、李景嗣题记

1. 李景嗣、邓褒、赵子澄载来

载，通“再”。附按：该题记与前一则重名，宜以扩展名标称别之，作：李景嗣绍兴甲子（十四年）题记和李景嗣绍兴癸亥（十三年）题记。

三十五、杜肇等题记

1. 任口宏、张文遇、张口……杜肇之子彦口侍行

口三缺字，《所见录》记为：师、携、攸。石刻依稀可辨，疑是。

三十六、张宝等题（记）

1. 唐安张宝、上邽崔庆、固陵冉彬

宝，石刻、《所见录》作“珤”，宝古字。《同治志》作“瑶”，误。又，据《所见录》“晁公遡题记”：张宝字廷镇。

三十七、杨谔题记

1. 使浣口口杨谔

使浣，不词。石刻、《所见录》作“使院”。按：使院，即节度观察使留后，政和七年（1117）后改称承宣使，位在节度使之次，仅备武官迁转。见《文献通考》五九《职官十三·承宣使》。

2. 杜峣孟宗厚、王口口、口朱继臣……继至。

王口口，二缺字《所见录》记为“注康”。句当标作：杜峣、孟宗厚、王注、康口、朱继臣……继至。

三十八、杜与可等题记

1. 五马以双鱼出水，率郡僚同观。

五马，出《乐府诗集》卷二八《陌上桑》“使君从南来，五马立踟蹰”，即使君、太守。

2. 绍兴十有八年[仲]春望日

[仲]，石刻泐没，《所见录》作“中”。中春：中为阴平调指农历二月十五日，居于春季正中，故名；中为去声调通“仲”，指春季第二个月即农历二月。此处既已标明“望日”，即作“中春”亦是仲春之义。

三十九、邓子华题记

1. 邓子华、种平叔、赵子经，绍兴戊辰中春。

《所见录》该题记全文作“邓子华种平叔赵子经绍兴戊辰中春十口口来”十九字，又按云“拓本高一尺三寸，宽二尺。凡七行，行三字。正书左行，径四寸。”计二十一字，其语有未周或录文不全固然。而《碑林》影印拓片仅整五行，疑脱第六行“十口口”三字和第七行一“来”字或“来”等三字。

四十、何宪、盛辛倡和诗

1. 何年天匠巧磨[龙]，巨尾横梁了莫穷。不是江鱼时隐见，要知田稼岁凶丰。四灵效瑞非臣分，一水安行属帝功。职课农桑表勤惰，信传三十六鳞中。(何宪诗)

[龙]，石刻崩泐莫辨，《所见录》作“磨礱（砻、礲）”之“礱”，非是。分，与下句“功”字不称，误。石刻、《所见录》均作“力”。

2. 巨浸浮空无路通，双鳞继瑞沓难穷，昔人刊石留山[趾]，今日呈祥表岁丰，众喜有年歌[善][改]，独惭无补助成功。[须]知显晦将千载，往哲摽名岁大中（唐立中年号也）。（盛辛诗）

继，误，石刻、《所见录》作“纪”。[善][改]，不词，《所见录》“改”字作“政”。摽，石刻同，通“檦（标）”，《所见录》径作“檦”，误。唐中立年号也，误。石刻“大中”原注为“唐宣宗年号也”，《所见录》同。此外，《碑林》标点亦误。

四十一、高克舒题记

1. 汴阳高克舒以绍兴癸酉书云日，挈家来游，枬梆侍行。

高克舒，《所见录》作“吴克舒”，而标题作“高克舒题名”。又《碑林》注云该题刻现已不存，其文字摘自《所见录》，故：高、吴孰是，一时无法确考。书云日，古人于春分、秋分、夏至、冬至之日，登台瞻望天象云气之色，刻记于简策以附会人事吉凶，谓之书云。宋人常称冬至日（农历十一月二十二）为书云日。

四十二、张维等题记

1. 是日，绾搦毫题石以记。岁时绍兴乙亥戊寅丙辰。

岁时，年月、时序义，为题石以记之对象，其具体内容即后“绍兴”等八字，属上读或较为妥贴。绍兴乙亥寅丙辰，《所见录》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考为绍兴二十五年（1155）正月初八日。

四十三、张维等题记

1. 宋绍兴乙亥人曰，前涪陵令张维持国挈家观石鱼。

曰，误，石刻、《所见录》作“日”。人日，农历正月初七，与前则题记同年月早一日。《碑林》自称“按题刻年代编码列号”（第 18 页），却将此则排列于前则之后，误。又，该题记与

前则重名，可仍以扩展名标示区别，分题为：张维丙辰日题记和张维人日题记；亦可例以《所见录》，依时次前后并系于同一题目下。

四十四、张松兑等题记

1. 濮国黄口口口此口泛舟迤逦来观

濮国黄囗囗，《碑林》编号65《黄仲武等题记》有“濮国黄仲武”，可据补。囗此囗，石刻“此”字泐去左半，其前后缺字：一似“自”字仅余右下，一隐约可辨为“巖”。参前《碑林》编号32《种慎思题记》“载酒游北崖（岩）及观石鱼”之句，《所见录》作“自北岩”三字当不误。

2. 石鱼去水无尺许，已具鳞口口口口

鳞囗，《所见录》缺字作“鬣”。已具鳞鬣，即鳞鬣隐约可见，故“石鱼去水无尺许”是云其快要出水但尚未出水。《碑林》理解为已经出水尺许（见第11页《白鹤梁题刻水位对照表》63号释文石刻水尺读数），误。又，该题记作于绍兴丙子（二十六年，1156），而乾道三年（1167）《赵彦球题记》（碑林编号70）云：“石鱼不出，十有八年矣。”亦可证此。

四十五、黄仲武等题记

1. 濮国黄仲武、梁公寿春明、宋子应小艇同来。

春明，《碑林》标点似作梁公寿字，误。按：春明，本唐都长安东面三城门居中者名，后因以为京都别称。此处指南宋都城临安（今杭州），系宋子应籍里，读属下。

四十六、绍兴水位题记

1. 绍兴仲春口口口石鱼出水，口口看记

由乾道三年（1167）《赵彦球题记》“石鱼不出，十有八年矣”上推，该题记作年当不晚于绍兴十八年（1148），而不早于绍兴元年（1130）。据此，《碑林》应将其提前安排于第58号绍

兴十八年《何宪、盛辛倡和诗》之后。

四十七、姚邦孚题记

1. 宋元高匪懈、姚邦孚继至

宋元高匪懈，不词。疑为二人，作“宋元、高匪懈”。标题亦可更作“宋元题记”，以求各处一致。

四十八、向之问题记

1. 童子八九人刺船来观，瘐元堂弟口口口

刺船，撑船，《所见录》作“刺舡”，义同。瘐元，《所见录》作“庚光”，石刻风化严重模糊不清，应以《所见录》为是。

四十九、王宏甫题记

1. 乾道丁亥二日

丁亥二日，仅有年、日而无月纪，脱误。石刻“丁”字下“二日”前泐去三字，《所见录》作“丁口口口二日”，是。考大宋乾道共计九年，惟有第三年“丁亥”干支带“丁”，《碑林》补“亥”无误。

2. 合阳王宏甫来观石鱼

合阳，《所见录》据《舆地纪胜》注为合州，即今重庆合川。《碑林》注为今山西安泽县，误。考《元和郡县志》十二“晋州”：今安泽县地后魏时确曾置过合阳县，但北齐即废；隋大业间又改置为岳阳县，唐宋仍旧。

五十、赵彦球题记

1. 是岁元日大晴，人日亦如之，率僚属游北崖。……涪人曰：一旬而三美，具此大有年之兆，而贤太守德化之所感也。在属吏安敢不书……口口口翊王浩。

崖，《所见录》作“巖”，同岩，《碑林》误。具，足、完备义，当属上读作“一旬而三美具，此大有年之兆”。安，《所

见录》作“其”，石刻漫漶不清。王浩，《所见录》据《嘉庆四川通志》云：进士，苍溪人，失其年，官监薄。

五十一、贾振文题记

1. 贾振文率邓和叔、李从周、孙养正、庚端卿，张口卿来观

庚，石刻、《所见录》作“庾”。

五十二、刘师文题记

1. 自唐广德间，刺史郑令珪已二载其事

已二载其事，《所见录》作“已三载其事”，石刻作“已载其事”。“二”、“三”均为衍文。

2. 口人舟揖往来，赏玩不绝，因书以识升平瑞庆云，向仲卿题记

舟揖，不词，《所见录》作“舟楫”，是。向，石刻、《所见录》作“陶”。《所见录》标题亦作“陶仲卿题记”。

五十三、冯和叔题记

1. 郡丞开封李拱德辅，率前忠守河内向士价邦辅、涪陵令武信胥挺绍祖，郡幕东平刘甲师文来观石鱼，以庆有年之兆。

李拱，石刻漫漶，《同治志》作“李耘”，《所见录》作“季口”。庆，石刻同。《所见录》作“誌”，误。又，《所见录》据《嘉庆四川通志》按：胥挺，武信（今四川遂宁）人，乾道五年进士；刘甲，龙游（今四川乐山）人，淳熙二年进士。记中称“东平（今山东郓城）刘甲”，乃书其先世所居也。

五十四、朱永裔题记

1. 今春出水四尺，乃以七日躬率同寮。口官相台李衎，郡幕七闽曾稷秋、官武信、胥挺、武龙薄东平刘甲来观，知今岁之复稔也。

七日，石刻、《所见录》作“人日”。口官，石刻、《所见

录》作“教官”。又，参其前后列述“教官相台李衎”、“武龙薄东平刘甲”及上则《冯和叔题记》中“涪陵令武信胥挺”等，“郡幕七闽曾稷秋、官武信、胥挺”当断为“郡幕七闽曾稷、秋官武信胥挺”。

2. 尉守阆中朱永裔书

尉守，不词，石刻、《所见录》作“假守”。假守：暂时代理之郡县长官。

五十五、徐嘉言题记

1. 属史从尉史君送别新宪使

属史，不词。石刻、《所见录》均作“属吏”。

2. 郡人每以鱼之出，兆年之丰事，即有验于口，可以卜今岁之稔无疑也。

事，指“郡人每以鱼之出兆年之丰”，当属下读为“事既有验于口”。又，口缺字石刻崩泐，《所见录》作“古”，是。

3. 涪陵宰临汝冯愉端和……前郡掾蕲春张庆延元祚、郡从事颍昌王邦基违坚。

愉，石刻同，《所见录》作“伦”，误。违，石刻、《所见录》作“廷”，《碑林》以形近误读。

4. 口守汉嘉瞿常明孺、口县佐汶江彭楠国、材征官上邽左延庆椿、是郡文学掾南郡徐嘉言公美识。

口守，石刻“守”字崩泐，其前一字似“判”，《所见录》作“判口”。口县佐，石刻、《所见录》“明孺”与“县佐”间无缺字，“口”衍。材征官，不词，“材”当属上读“国材”，为彭楠字；征官，管理贸易税收的官吏。如，《宋史》卷四〇一列传第一百六十《柴中行传》云：“天方旱，尽捐酒税，斥征官，黜务吏，甘澍随至。”

五十六、赵时僾题记

1. 壬戌仲春携属同妹夫王倬游

戌：石刻作“戌”，《所见录》作“戌”。

五十七、禄几复等游记

1. 县令杨灼、司理孙震之、司户李国纬

杨灼，《所见录》据《嘉庆四川通志》按：阆中人，庆元中进士。

五十八、贾渔题记

1. 潼渊贾复同侄衎之、徽之

复，石刻、《所见录》同。《所见录》题为“贾复等题名”，《碑林》标目误作“贾渔”。

2. 口口口判留题口迹，虽未目睹，口口口可竟窥以江痕，尚口口七时戊辰，开禧元宵前。

考石刻、《所见录》对应文字，此处当作：“承先人州判留题，遗迹虽未目睹，手泽或可意窥，以江痕尚口故也。时戊辰开禧元宵前。”又，《所见录》按云：“开禧三年之次年，戊辰改元嘉定。蜀中道远，未奉改元之诏，犹称开禧耳。绍兴十七年丁巳有知军州潼渊贾思诚题记（笔者按：见《碑林》编号41），疑即此所称先人州判留题遗迹也。距此年已七十二年。”

五十九、李公玉题记

1. 郡守李瑞公玉，新潼川守秦季口宏文

瑞，石刻、《同治志》同；《所见录》作“瑀”，误。口，石刻模糊，《同治志》、《所见录》作“櫄”，是。宏文，石刻、《同治志》、《所见录》均作“宏父”，《碑林》误。

2. 季樵之子九韶、道台，瑞之子泽民、志可同来游石鱼。

樵，《同治志》、《所见录》均作“樵”。道台，《同治志》、《所见录》作“道古”。九韶字道古，《碑林》分一为二，误。泽民、志可，同九韶道古，系瑞子之名与字，并非二人。

3. 阅八年不出，今方了然，大为丰年之祥，此不可不书。宝庆二年正月十二日，涪州太守题。

了然，误。石刻、《同治志》、《所见录》均作“瞭然”。又，该题记《同治志》题作“李玉新题名书”，误。推其缘由，盖以“新潼川守秦季□宏父”中之“新潼川”为地名无可稽查之故，遂令“新”字属上。按，以《同治志》之题名及题记“瑞之子泽民志可”之语，“李玉新”名瑞，“公”为对其尊称之词。然记末署“涪州太守题”，明示李瑞亲为记撰，绝无以他称敬词自谓之理。且石梁上该题记正北偏东李瑞又一题记（见碑林编号85《李公玉再题》）云：“郡太守唐安李公玉喜其为□年之兆”。以上可知，李守名瑞字公玉无疑。至于“新潼川守”，义当同潼川新守。秦季槱出任潼川（今四川三台）知府在宝庆元年（1225）六月，此时仅任事半年。

六十、李公玉再题

1. 宝庆丙戌榖日，涪陵石鱼出水面六尺。

榖，误。石刻作“穀”，《所见录》作“榖（谷）”。榖日，疑为《逸周书·时训》“榖雨之日（萍始生）”省称，即三月十二日农历谷雨。

六十一、绍定残刻

1. □镐星江□□，潼川马骥□钱释之浚仪□潮彦珍。绍定□□正月五□同观。

珍，石刻、《所见录》作“诊”。又，《所见录》标题为“□镐等题名”。

六十二、张霁题记

1. 通判开封李拱辰居中、教授古通王栖钧卿、判官古黔邓季寅东叔、录口长沙赵万春伯寿、司理凤集孙泽润之、司户口口赵与礽仲器

申、栖，石刻、《所见录》分别作“中”、“樝”。录口，缺字《所见录》作“参”。礽，石刻、《所见录》作“扔”。

2. 郡齐奉节王建报中可与焉

郡齐，不词。齐，石刻、《所见录》作“斋”，《碑林》以形近误读。报，石刻、《所见录》作“极”。建极，王中可名，见下则《王季和等题记》。

六十三、王季和等题记

1. 郡齐益昌张申之、奉节王建极侍

郡齐，“郡斋”误读，《碑林》编号90《赵广熹题记》释文误同。申，《同治志》作“田”，误。

六十四、赵汝廪观石鱼诗

1. 郡守开封赵汝廪观石鱼，赋五十六言

汝，石刻同。《所见录》作“以”，题为“赵以廪题记”，误。

2. 预喜今穰验石鳞……晓行鲧背占前梦

今、鲧，石刻、《所见录》作“金”、“鲸”。

六十五、刘叔子诗

1. 敬嗣韵以识盛事，尚庶几小雅，歌牧人之梦之意示尔

示，石刻、《所见录》作“云”，句当标作：尚庶几《小雅》歌牧人之梦之意云尔。又，《所见录》脱“之梦”二字。

2. 二年春王正月乙己；𠓗男贡士从龙书。

二年，石刻、《所见录》作“三年”。乙己，石刻、《所见录》作“乙巳”。𠓗男，石刻、《所见录》同，疑为“中男”即

次子，待考。

六十六、蹇材望题记

1. 涪以石鱼之出，占岁事之丰；以岁事之丰，彰太守之贤尚矣。……别驾潼川蹇材望赓皇祐刘转运诗，以记之。

尚，久远义。记，石刻、《所见录》作“纪”。句当作：涪以石鱼之出，占岁事之丰，以岁事之丰，彰太守之贤，尚矣。……别驾潼川蹇材望赓皇祐刘转运诗以纪之。”

2. 玉烛调和从可卜，金刀题咏文开先。浑如泼刺波心跃，感召还知太守贤。

文，石刻、《所见录》作“又”。泼刺，不词，《所见录》同误。据邵博《闻见后录》十七引宋仁宗诗“鱼跃纹波时泼刺，莺流深树久徘徊”句，“泼刺”应为“泼剌”，鱼跃声。《补正》卷八三作“泼剌”。

六十七、徐朝卿题记

1. 铜鍉徐朝卿、太原……

铜鍉，石刻同，《所见录》作“铜鞮”。宋有铜鞮，威胜军属地，治今山西沁县，或亦作铜鍉。

六十八、贾承福题记

1. 隋使孔目官贾承福书

隋，误，石刻作“随”。该题刻不见于《所见录》。

六十九、奥鲁题记

1. 奉训大夫夔路万州知州兼管本州诸军奥鲁。劝农事安固，奉省檄整治各路水站，赋役事毕。

奥鲁，指蒙古人征战时留在后方的家小辎重等。此言管理奥鲁与勉励农耕皆知州安固的职掌范围。《碑林》以为人名，题作“鲁奥题记”并注“生卒不详”云云，误。该题记《所见录》作“安固题记”。

2. 副尉涪州判官杨烨敬谒伊川无生祠因观石鱼

敬，石刻同；《所见录》作“敏”同“叩”，当係手民之误。无，石刻、《所见录》作“先”。

七十、宣侯爱题记

1. 监郡宣侯爰及同像泊邦人士游庆记耳

泊，石刻、《所见录》作“洎”。又，《所见录》该题记名“宣侯题记”，脱“爰”字，疑误。

七十一、刘冲霄诗并序

1. 学正黄思诚、[训][道][张]敬先、驿丞王青，因水落石鱼[呈]瑞，[游]观遂书于石，以记一时之盛世云。

[道]，石刻作“導”即导。训导：学官名，为学正之副职。记，石刻作“纪”。盛世，石刻作“盛事”。

七十二、雷谷题记

1. 朝使江右晏孟宣，涪州学正古邵欧阳士鳞训导西陵易口、义陵张致和古邵成礼同游。

宣、涪、鳞，石刻三字分别作：瑄、洎、麟。句读作：朝使江右晏孟瑄洎州学正古邵欧阳士麟，训导西陵易口、义陵张致和、古邵成礼同游。

七十三、戴良口诗

1. 行商往来停舟觑，节使周沉驻马镌。

周沉，石刻作“週廻”即周回，义同前句“往来”。

七十四、李宽观石鱼记

该题记石刻磨泐严重，《碑林》释文夺讹尤甚。今取拓片和《同治志》卷十四所录李宽《石鱼记》校标如下，以备稽核：

涪陵江心有石焉，层见叠出，矻然于万流之中。而其深，不

知几千万仞，固不可穷也。涪为西蜀岷江之汇，当春夏之交江水涨溢，其石湃没而不可见。至秋冬，或犹然。间或水落石出，其年必丰。昔之好事者因刻石鱼题咏于上，以为大有年之徵。自唐迄宋迄元以至我皇明，名公钜卿骚人墨客悉皆有诗有记，银勾铁画，琼章玉句，隐见江波之中，历数百年而不磨灭，盖天地间一奇迹也。正德丙寅，仲春既望，予偕叙州府同知陈旦，保宁府同知郭忿府、通判盛应期，德阳县知县吴琏，新繁县知县祁献，江安县知县徐崧，皆奉命于涪簿书狱讼。既倦，于勤郁不得畅时，州守袁宗夔来谓予曰："江中石鱼今复见，州民皆以为丰年之祥，盍往观之?"予于是泛舟逆流而上，众亦相继来观。石鱼果见，昔公卿文士雄文钜制累累可数。而隐伏于江波之中而未见者，不知其几也。呜呼，真天地间一奇迹哉，是不可以不记，口口乎书。

正德丙寅仲春既望四川按察司佥事怀口李宽记

七十五、口口题记

1. 口口奇造化，屈指几人同。

奇，误。石刻作"夺"。

七十六、联句和黄寿诗

1. 鱼出不节用（张献），年丰难为丰（刘用良）

献，石刻作"瓛"。

2. 登京榜并仕判黄州，以异政擢为涪守，尚俭羊弊，期年而六事孔修

并，石刻作"筮"。筮仕，本谓出仕前占卦吉凶，此指初次任官。羊弊，不词。石刻作"革弊"。

七十七、罗奎诗并序

1. 神鱼翠壁口口镌，不落池塘岂傍莲。

口口，缺字石刻作"托奇"。

七十八、江应晓诗记

1. 扁舟江上觅神镌，结灶何须访白莲。水讫影浮刚一尺，亩泉兆口已千年。

结灶，石刻作“徒社”。《广韵·质韵》：“徒，行也。”讫，石刻不清，《水文站》作“底”，非是；疑为“趋”，去也。口，缺字石刻作“協”。

2. 沉碑我识口元凯，|传|物谁同张茂先。别驾重来齐转远，风流太守是前贤。

口，《水文站》作“杨”，非是。据“元凯”、“沉碑”等，缺字当为“杜”。杜预，字元凯，博学多通，以平吴功封征南将军、当阳县侯，曾“铭功于二石，一置兹山之上，一投汉水之渊”（《欧阳修集》卷四十）。此取其沉碑汉水为后世名之意。|传|，石刻作“博”。张茂先：晋人张华，字茂先，以见识广博著称，有《博物志》。齐转远，石刻作“赓转运”。谓该诗乃次韵赓和宋皇祐间转运使刘忠顺《留题涪州石鱼》诗（见《碑林》第3号题刻）之作。

七十九、七叟游

1. 田口、刘昌作、陈文炜

作，石刻作“祚”。

八十、萧星拱观石鱼记

1. 涪江之心有石鱼，春初鱼见，可卜丰稔，州之八景；云：石鱼兆丰|稔|者，即其所也。

|稔|,衍文,石刻无。又,《同治志》卷十五有萧学旬题“八景”诗列名桂楼秋月、荔圃春风、铁櫃樵歌、鑑湖渔笛、群猪夜吼、白鹤时鸣、石鱼兆丰等可证。句当读作：涪江之心有石鱼，春初鱼见，可卜丰稔。州之八景云“石鱼兆丰”者，即其所也。

2. 甲子春正月，忠州守朱世兄自巴渝返，舟过此。其尊人与余谊属师弟，而其叔朱羽公瑞麟祯者，初官于涪，士民得之。当来此，余因携觞偕往，以续旧游。

瑞，石刻作“讳”。得，石刻作“德”。当来此，石刻作“亦尝来此”。句当读作：甲子春正月，忠州守朱世兄自巴渝返舟过此。其尊人与余谊属师弟，而其叔朱羽公讳麟祯者，初官于涪，士民德之，亦尝来此。余因携觞偕往，以续旧游。

3. 石鱼复出，……则吾侪之此一游也，非口游观为乐，直乐民之乐，云尔于乎记。

考石刻：“石鱼复出”前脱“见”字，“非口游观为乐”中缺“但以”二字，“于”后脱“是”字。句读作：见石鱼复出……则吾侪之此一游也，非但以游观为乐，直乐民之乐也云尔。于是乎记。

八十一、张天如镌石鱼题记

1. 郡人明德、张天如敬镌双鱼为志。同游邑人陈世道，门人吴珂、吴玫，工人黄俸朝。

据落款“门人吴珂吴玫”，“明德”必是张天如的同位指称：或其字，或民间对有德之士的敬称，或当时贡举之一种。《碑林》以为另人标读，恐误。

八十二、萧星拱重镌双鱼记

1. 时同游者旧黔令云间杜同春、梅川州佐四明王运亨口公、盱江吴天衡，口口何谦文奇，西陵高应乾侣叔，郡人刘之益，四仙文珂奚仲。

梅川，石刻作“悔川”，依下文“王运亨口公”等，悔川当是杜同春字。口公，缺字石刻似作“元”或“远”。句读应为：时同游者旧黔令云间杜同春悔川，州佐四明王运亨元（远）公，盱江吴天衡口口、何谦文奇，西陵高应乾侣叔，郡人刘之益四

仙、文珂奚仲。

八十三、娄槶题记

1. 大清光绪七年正月既望，偕兄枢中江蒋蘅、桐城姚茂清游此。

枢，槶兄名。字后当逗，读作：偕兄枢、中江蒋蘅、桐城姚茂清游此。

八十四、白鹤梁铭

1. 长江宛宛，来自汶昜

宛宛，回旋屈曲之状。汶，汶江，即四川岷江。汶读同“岷”。昜，古“陽”字，石刻作“昜”。据郭沫若《文史论集》中考证，昜乃益之简字，益乃溢之初文，引申为增益、赐予。

2. 田渝注夔，汇此崖疆……镜波冲容，埼石蔽映

田，石刻作“毌”，古“贯”字。崖，石刻作“巖”，同“岩”。埼，石刻作“碕”，义同。

3. 仙人邀芺，缅想云壑……我侨此土，驹累鸿泥

芺，石刻作“矣”。驹累，不词。累，石刻作“景”。驹景：犹“驹光”、“驹影”，言时间稍纵即逝。景，或音影。

八十五、濮文升题记

1. 三载于兹，颇穷搜访……让酒之暇，余兴未已，爰叙颠末，以老不忘。

搜，石刻作“蒐”，同。老，石刻作“誌”，《碑林》误。

2. 同游者……营山张元圭及余弟文曦子贤懋、贤忱、贤恭、贤怡、贤泌、犹子贤愈妹夫顺德张思源、甥室应朱学曾、顺德张元钰。

室应，不词，石刻作“宝应”。句读作：同游者……营山张元圭及余弟文曦、子贤懋贤忱贤恭贤怡贤泌、犹子贤愈、妹夫顺德张思源、甥宝应朱学曾、顺德张元钰。

八十六、观石鱼记

1. 其上者皆赝迹，顾欲求其真必伺乎。水极浅涸，然水又骤涨落，逾时靡完。

完，石刻作“定”。句读作：其上者皆赝迹，顾欲求其真，必伺乎水极浅涸。然水又骤涨落，逾时靡定。

2. 余督涪补之，明年适值。宣统建元闰二月之十有一日，遽闻鱼出……。

补，石刻作“権”。句读作：余督涪権之明年，适值宣统建元。闰二月之十有一日，遽闻鱼出……。

3. 阅自鱼寻没不可复睹，噫，何幸而及此一见也

自、辛：石刻作“日”、“幸”。句读作：阅日，鱼寻没不可复睹。噫！何幸而及此一见也。

4. 洪维。圣人御宇百物，口口彼冥顽蒲藩之伦者将跃。恩吱而思，呈露昭格所至，祥祉萃臻，行看额手而颂太平也！

口口，缺字石刻作“效灵”。藩，石刻作“藻”藻：俗“藻”字（《干禄字书·上声》：“藻，俗；藻，正。”）。者，石刻作“亦”。吱，石刻作“波”。行看，不词，疑为“行香”。行香：焚香叩拜。句读作：洪维圣人御宇，百物效灵。彼冥顽蒲藻之伦，亦将跃恩波而思呈露。昭格所至，祥祉萃臻，行香额手而颂太平也。

八十七、施纪云题记

1. 同游者邹进士增祜、刘孝廉子冶、张树菁、颜广恕、雨茂才，曹纯熙、上舍与其弟镛旧、史氏，施纪云记。

雨，形近误读，石刻作“两”。茂才：秀才之别称，非人名。上舍：清代对监生的别称。句当读作：同游者邹进士增祜、刘孝廉子冶、张树菁颜广恕两茂才、曹纯熙上舍与其弟镛旧。史氏施纪云记。

八十八、刘镜源题记

1. 鹤梁中白鹤游，窗听飞花几千秋。只今皓月还相照，终古长江自在流。

窗听，不词，石刻作“窅然”，寂寥义。

2. 铁樻峻嶒樵子路，鉴湖欸乃渔人舟。

峻嶒，不词。峻，石刻作“崚”。崚嶒，高峻突兀貌。

八十九、刘镜源题记

1. 大海刘镜源题

海，石刻作“悔”。大悔，镜源字。

九十、何耀萱题记

1. 民国二十六年三月，雨泽稀少，河流枯落泻卤。

二十六年，石刻原作“廿六年”。泻，石刻原作“舄”，治字。

2. 公余之暇，偕曾海清、刘升荣、王和欣、谭佑甫、蒋慎修、周国钧、周哲生、刘静禅诸君命舟渡梁眺览。口周果见鱼出。窃思涪陵亢旱六载，于兹民不聊生，哀鸿遍野。

口，缺字石刻作“大”。大周，当指前所列周氏二人中的周国钧。“亢旱六载”之“六”，石刻原作“亖”，即古文“四”字。故应为“亢旱四载”。

3. 今天显仁爱，示兆于石，斯亦吾民之大幸也。……邑人何耀萱记，方伯旻书。

显，石刻原作“心”，应为：天心仁爱，示兆于石。旻，石刻原作“殳”，即殳、殳。伯殳：取名以《诗经·卫风·伯兮》“伯也执殳，为王前驱”之义。

九十一、游白鹤梁

1. 民国丁丑仲春，至山老人刘镕径题，年七十六岁矣。邑人刘树培涂鸦同游，文君明盛、王君伯勋。

至，石刻为草书“玉”字。径，石刻作“经”。岁，衍文，石刻无。句读作：民国丁丑仲春，玉山老人刘镕经题，年七十六矣。邑人刘树培涂鸦，同游文君明盛、王君伯勋。

如上所示，《碑林》于白鹤梁石鱼文字的整理或未善承前人成果，自行其是；或对手民错置，审校不严；或因正俗讹写，识辨靡周；或由望文生义，臆录误标，以致有此诸多疏误，导致文本文献一定程度的流失和新的讹变。正如乾嘉巨臂钱大昕所说：“订讹规过，非以訾毁前贤，实以嘉惠后学。”（《潜研堂文集》卷三五《答王西庄（鸣盛）书》）笔者之所以不惮劳烦又冒狂妄胡驳之险指出这些疏误，不过是希望该书在将来有机会重版时编者能够加以修订，进一步提高质量以发挥更大的积极作用，并同时提醒读者特别是相关研究人员在阅读该书和运用其中提供的材料时能够有所警惕，审慎为之。倘若此，则本文庶几乎不废。

（原载《重庆社会科学》2005 年第 10 期，收入本书时有改动）

《四川书院史》人名辨误一例

胡昭曦先生著《四川书院史》（巴蜀书社2000年版，以下简称《书院史》），扎实严谨，材料丰备，可谓研究巴蜀书院文化的扛鼎之作，可惜仍有疏漏。例如，其中关于明代重庆府涪州白云书院的概况介绍，将该书院创始人署为“刘蕖”，笔者以为，勘校失严，尚可商榷补正。

《书院史》第76页注引《同治涪州志》卷二《舆地志》、卷九《人物志》称：“白云书院，在涪州（今重庆市涪陵区）治南120里凤凰山，‘前明刘司谏秋佩先生故里也……。’刘秋佩，即刘蕖，涪州人。清人周汝梅所作刘蕖《墓表》云：‘刘蕖字秋佩，谥忠愍，明正德中户科给事中也’，因劾刘瑾，受廷杖，后‘以杖疮成疾’，‘归隐白云山中。世宗（嘉靖帝）即位，遣使存问，明年（嘉靖二年、1523）以疾卒于家’。按以上记载，白云书院之建，当在刘蕖受廷杖归隐白云山后，即正德年间（1506~1522）”。又，从是书第91页所列《明代四川书院简表》亦将白云书院“设置人”题为“刘蕖”可知，“蕖”字当无排印之误。

今检《同治涪州志》（1992年巴蜀书社影印清同治九年刻本），卷二《舆地志·垄墓》（475页）作“给事中刘蒞墓”；卷七《选举志·进士》（页516）作“刘蒞，宏治己未伦文叙榜”；卷九《人物志·忠烈》（页561）引周汝梅《墓表》多次均作“刘蒞”，且胡著该处引文中“杖疮成疾”、“归隐”、“卒于家”

之“疾”、“归”、“卒”字，分别作“瘘”“辞”、“终”；卷十四《艺文志·散体文三十九首骈体文三首》所收《劾逆瑾刘瑾疏》（页641）、《荐兵部尚书刘大夏疏》（页643）、《乞谥宋景濂先生疏》（页645）、《白云书院记》（页645），作者均题署“州人刘澨”，并收有《谕祭刘澨文》。

续检《民国涪陵县续修涪州志》（1992年巴蜀书社影印民国十七年铅印本），除卷十九、二十《艺文志》收录刘澨明代谕祭文（页146）与其本人三篇疏文（页154～156）外，卷三《疆域志·古迹》“白云书院”条（页19）云：“州南百里，刘司谏秋佩之家塾，后为僧寺，同治间其裔孙与里中学子就梵宇修复之。”卷十一《人物志·乡贤》（页79）“刘澨”条并曰：“明史本传刘澨字惟馨，涪州人，宏治十二年进士，授户科给事中。”

考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明史》卷一八八、万斯同《明史》卷二五八、《明史稿》卷一七三本传及《中国人名大辞典》（上海书店1980年版）页1475、《二十四史纪传人名索引》（中华书局1980年版）页868、《二十五史纪传人名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页1049、《中文大辞典》（台北中国文化学院出版部民国五十七年〈1968〉版）页1802该条，均作“刘澨”，而不见“刘蕖”其人。仅《古今同姓名大辞典》（上海书店1983年版）页1125作“刘茝”，然曰：“一见《明史》卷一八八，字惟馨，涪州人，作‘澨’；一见《四川通志》卷一四八第十五页引《云南通志》，字文季，明富顺人，官翰林，按此恐与上为一人。”

又《汉语大辞典》（1992年版）注：“澨”同“茝”（第9册519页），音“Zhǐ，《广韵》诸市切，……即白芷”（第9册411页）；《王力古汉语字典》（中华书局2000年版）页1060：茝“字亦作‘芷’”。而“蕖”，《汉语大辞典》注为：“qú，《广韵》强鱼切。芙蕖，即荷花。”（第9册542页）；《王力古汉语

字典》引《广雅·释草》及王念孙疏证兼释为“芋头”（1098页）。参刘复等《宋元以来俗字谱》（文字改革出版社1957年版）、王力《同源字典》（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周盈科《通假字手册》（江西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马天祥等《古汉语常用通假字字典》（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滋”可作“莣”、“芷”，而与“蘪”则无繁简之别，亦无异体、通假关系，故不能替代使用。

综上，《书院史》将涪州白云书院创始人刘滋误作“刘蘪”，当作订正。

（原载《四川大学学报》哲社版2002年第4期）

《朱熹书院与门人考》补佚一则

方彦寿《朱熹书院与门人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中“书院考”部分考证了与朱子生平有关的书院67所：创建4所，修复3所，读书讲学47所，题诗题词13所（见卷首方氏《序言》）。以笔者管见所及，宋代涪州（今重庆市涪陵区）北岩书院亦当为朱熹题写诗词的书院之一。

北岩书院，“在州治大江北岸即伊川註易处，因山谷题‘钩深堂’以名。宋嘉定丁丑，范仲武请为北岩书院。”（1992年巴蜀书社影印清同治九年刻本《涪州志》卷3《建置志·学校》“钩深书院”条）清乾隆九年（1744），知州罗克昌复建时更名钩深书院。

按：绍圣间，程颐“以党论放归田里，四年十一月，送涪州编管。”（《伊川先生年谱》，中华书局1981年版《二程集·遗书附录》）在北岩普净院凿洞注《易》，辟堂讲学。时黄山谷因参预修撰《神宗实录》诬枉，早于绍圣二年（1095）责授涪州别驾、黔州（今彭水）安置。感伊川治学严毅精深，来涪会晤，并为其讲学地题铭“钩深堂”。嘉定丁丑（十年，1217年），知州范仲武于此倡建北岩书院，时为全国最早的官办书院之一。至南宋，理学地位提高，北岩复建伊川先生祠堂（见《同治涪州志》卷14《艺文志·散体文》之曹彦时《伊川先生祠堂记》），北岩书院也在朱熹嫡传夏渊、阳枋主教的绍定、淳祐年间，得与东湖、濂溪、象山等书院“并闻名于朝野”（魏了翁《鹤山集》

卷65《跋御书鹤山书院四大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成为远近闻名的游览胜地，盛极一时。官宦名流，文人学者路过涪州，大多频往瞻吊，游览题咏。

北岩崖壁现被辨定为宋代题刻的有7幅，其中“朱熹诗刻”：“（幅宽）85×（高）142厘米。行楷，4行。正文：‘渺然方寸神明舍，天下经伦具此中。每向狂澜观不足，正如有本出无穷。’落款：‘晦翁’”（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涪陵市志》1398页)。朱子该诗载见《同治涪州志》卷十五《艺文志·古今体诗》，题为《北岩题壁》。方著未收此条，可补。

（原载《四川大学学报》哲社版2002年第5期）

涪陵历代方志举要

本文叙录作者寓目的涪陵历代方志七种，概述其作者生平、全书内容及版本流传情况，并略评其得失与学术价值。

涪陵（涪州）；地方志；七种

地方之志，犹一国之史。予自数年前关注乡帮文化，即十分留意历代所修涪陵方志。四处访求，先后获见其现存全部七种。今参照古今著录暨时贤考证，撰作提要，汇辑成编，聊为治巴渝文化之一助。

一、康熙五十四年（乙未，1715）《重庆府涪州志》四卷

为现存最早的涪州（治今重庆市涪陵区）地方志。董维祺主修，冯懋柱编纂，罗云师、孙于朝参阅，夏景宣、刘衍均等8人校订，李文焕等3人分辑。董维祺，字尔介，直隶奉天（今沈阳市）人，康熙四十二年（1703）任涪州知州，留心教养。冯懋柱，字乔仙，涪州人，岁贡生。该志约3万余字，卷首有董维祺《重庆府涪州志序》，冯懋柱《附序》，文珂、刘之益、夏国孝等三篇旧序，凡例七则，康熙癸亥年（二十二年，1683）、康熙甲午年（五十三年，1714）二次修志姓氏以及目录；卷末有康熙五十四年（1715）涪州训导孙于朝《涪州志跋》。正文分为27目附7目，共四卷。卷之一：图考、星野、建置沿革（附城池塘铺）、公署、邮传、祠庙、村镇、形胜（附疆界）、山川（附八景）、古迹、贡赋、风俗（附时序、物产）；卷之二：官

制、官籍、学校（附祀典）、礼制、名宦、乡贤、选举（附武科）、兵制；卷之三：孝义、节烈、隐逸、流寓、仙释、祥异；卷之四：艺文。其中，艺文一门收载最富，近万字，占全书篇幅的三分之一，以本邑明代进士刘濩、举人陈计长、贡生夏道硕、刘之益等人所著诗文为多。所录刘濩《劾逆璫刘瑾疏》及元代文史家贾易岩《塗山古碑记》等文，具有较高史料价值。由于该志属明季兵燹以后，旧志仅存残帙背景下的首次编刊，甚少凭借，文献无征，故除艺文、职官、人物稍详外，其余门类均为简约，且不免偶有编次失当之处。如，卷一《古迹》记“致远亭”，仅云：“宋嘉定间州守范仲武建亭于点易洞侧”，寥寥十数字而已；卷四《艺文》末收录夏道硕旧序一篇，实应与其他旧序一同归人卷首为宜。此书原刻今存一部，藏日本内阁文库[①]。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四川大学图书馆等藏有胶卷。目前，在国内流传的主要是书目文献出版社 1992 年《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影印本（第 32 册 371－481 页）、中国书店 1992 年《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影印本（第 50 册 495－604 页）及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 1997 年制作的胶卷。

二、乾隆五十年（乙巳，1785）《涪州志》十二卷

多泽厚主修，王正策、陈于宣、彭宗古 3 人纂修，周煌、周兴岱父子等 17 人协修，陈廷蕃等 6 人编辑。多泽厚，直隶阜城举人，乾隆四十九年（1784）任涪州知州。王正策，四川大竹举人，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任涪州学政，工诗，擅书法。陈于宣，字宁敷，涪州人，雍正举人，历官湖南永定（今大庸）、会同、绥宁等县知县。彭宗古，忠州人，雍正十年（1732）壬子科举人。该志约 18 万字，卷首列董维祺、文珂、夏国孝、刘之益、冯懋柱、夏道硕、孙于朝、郭宪仪等 8 篇旧序，凡例十四则，康熙癸亥年、甲午年暨本次修志姓氏以及总目

数项。正文分12纲84目，共十二卷。卷之一，封域志：舆图、星野、沿革、山川、形胜、街市、里甲、古迹、茔墓；卷之二，营建志：城湟（隍）、公署、学校、仓廪、坊表、津梁、恤政；卷之三，秩官志：官制、知州、州判、学正、训导、吏目、巡检、武职；卷之四，武备志：驻防、兵制、塘房、铺司；卷之五，风土志：习俗、节序、四礼、方言、物产；卷之六，赋役志：户口、田赋、解支、盐政；卷之七，祀典志：文庙、崇圣、名宦、乡贤、忠义、四贤、节孝、关庙、社稷、神祇、先农、厉坛；卷之八，礼仪志：庆贺、开读、新任、迎春、救护、行香、封印、祈祷、讲约、乡饮、送学、宾兴、公车；卷之九，选举志：进士、举人、副榜、贡生、仕宦、封典、命妇；卷之十，人物志：贤达、孝友、忠烈、义举、寿考、文苑、隐逸、流寓、列女；卷之十一，艺文志：文选、诗选；卷之十二，见闻志：祥异、兵燹、仙释、寺观。该志以康熙旧志为基础，旁收博采，对旧志做了大幅补订增编。如艺文门，即增入苏轼《涪州得山胡次子由韵》、朱熹《北岩题壁》等与本邑有关的诗文及清代州进士周煌、举人陈于宣、李天鹏等人的著述；见闻门兵燹一目则较多记述明末张献忠等人率军攻打涪州战事，地方色彩更为浓厚。此外，封域门之山川、街市、里甲、古迹等，所载史料亦有较高价值。如《古迹》中载“李渡镇”云：“州西三十里。唐李青莲过此入夜郎，故名。”该志原刻，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四川大学图书馆各藏一部。四川省图书馆有1963年传抄本（共十册，缺第2-5页，有删改、增补多处）。国家图书馆等单位有1992年全国图书馆缩微文献复制中心据川图抄本拍摄的胶卷。

三、道光二十五年（乙巳，1845）《涪州志》十二卷

德恩修、石彦恬、李树滋、舒廷杰纂，周克恭等6人协修。德恩，镶黄旗满州人，道光二十三年（1843）任涪州知州。石彦恬，字麟士，晚号素翁，涪州人，嘉庆丙子（二十一年，

1816）举人，官福建海澄（今属龙海）知县，工诗，精书法，学问渊雅，著有《三君子堂文集》。李树滋，原名树勳，涪州人，拔贡。舒廷杰，生平不详。该志约20万字，卷首有道光二十五年德恩《重修涪州志序》、徐树楠《重修州志引》，道光二十三年周熙尧《重修州志序》，夏国孝、刘之益、夏道硕、文珂、董维祺、冯懋柱、孙于朝、郭宪仪、多泽厚、陈于宣、彭宗古等11人旧序，凡例十四则以及总目；卷末列有康熙癸亥年、甲午年、乾隆乙巳年三次旧志姓氏与本次修志姓氏。正文十二卷，分为12纲85目附2目，“纲内作大序以贯诸首，八十余目作小序以引其端”（《凡例》第七）。其门类设置，除卷七“厉坛”下增附“私祀”一目，卷九改增“命妇”为“武选”、“武绅”二目，卷十改“列女”为“节孝”并附“贞烈寿”一目外，余皆一仍乾隆旧志。此志乃依乾隆旧志增补并续纂嘉庆、道光数十年诸事而成，艺文中较多增入有清代“蜀中诗人之冠”美誉的著名性灵派诗人张问陶[②]和本邑书法名家石彦恬等人诗文，兵燹中增入嘉庆初白莲教首领王三槐、徐天德率军攻打涪州战事，山川古迹等亦较旧志记载更为详细。如卷一《古迹》“点易洞”条，在旧志已载之“北岩石壁有洞，宋程伊川滴露研朱注《易》于内”后，即补嘉庆事云：“前牧张晴湖傍壁为楼，颜曰‘观澜’”。但该志纸质粗糙，刻工率劣，字多讹错，卷十一《文选》七十八倪斯惠《邹刘合刻序》一文首页还有装订重复现象，刻印质量欠佳。故，今传本仍为道光二十五年（1845）涪州州署原刻，二函十册，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南京大学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研究所图书馆、武汉大学图书馆有藏。

四、同治九年（庚午，1870）《涪州志》十六卷

吕绍衣主修，王应元、傅炳墀总纂，谭孝达、周元龙修纂，李树滋、文人蔚等4人协纂。吕绍衣，字柳村，江西德化（今

九江）人，同治七年（1868）署涪州知州，吏才敏练。王应元，字春圃，涪州人，咸丰二年（1852）举人。傅炳墀，字紫卿（一作鹄），涪州人，同治乙丑（四年，1865）崇绮榜进士，授内阁中书，后历官云南邱北、元谋、陆凉、平彝（今富源）等县知县，总纂《云南通志》，著有《紫云仙馆杂存》。该志约26万字，卷首有同治九年（1870）王应元、傅炳墀、吕绍衣分别撰写的3篇序文[③]、凡例十则、重修姓氏、总目、旧志纂修姓氏、涪州图考（含星野图、全境图、城池图、州署图、学宫图及奎文阁、北岩、荔支（枝）园、望州关等涪陵十六景图共计21幅）；卷末附义勇汇编一卷、典礼备要八卷。正文分9纲62目附3目，共十六卷。第一卷，舆地志：星野、沿革、山川、疆域、户口、里甲（附场市）、物产、田赋、盐法、茶课、水利、风俗；第二卷，舆地志：古迹、碑目、茔墓、寺观；第三卷，建置志：城隍（附街市）、公署、学校、仓储、坊表、津梁、砦堡、邮政；第四卷，秩官志：历代秩官；第五卷，秩官志：国朝秩官；第六卷，典祀志：坛壝、文庙、各祠；第七卷，选举志：神童、进士、举人、拔贡、副榜、贡生、例贡、武科；第八卷，人物志：乡贤、仕宦、武职、封荫；第九卷，人物志：孝友、忠烈；第十卷，人物志：义举、文苑、隐逸、耆英（附女寿）；第十一卷，人物志：列女；第十二卷，人物志：列女、流寓、方技（附仙释）；第十三卷，武备志：营造、兵额、器械、邮驿、塘房、兵燹；第十四卷，艺文志：散体文、骈体文；第十五卷，艺文（志）：古今体诗；第十六卷，拾遗志：灾祥、轶事。该志图绘丰富，纲目赅简，而且艺文门较多增入宋代晁公遡《观石鱼记》、明代李宽《石鱼记》等涪陵名胜白鹤梁石鱼题刻诗文，舆地门中又专辟"碑目"一类，仿《金石粹编》之例摹刻古名贤手迹，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如碑目所载《朱子碑》拓文，即可用于校补古今朱熹集及《八琼室金石补正》之《与度周卿

（正）书》中缺字。该志除有原刻本（二函八册）藏于国家图书馆、重庆图书馆和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等31家藏书机构[⑨]之外，尚有巴蜀书社1992年《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影印本（第46册409－785页）。

五、光绪三十一年（乙巳，1905）《涪乘启新》三卷

邹宪章修，贺守典、熊鸿谟纂。邹宪章，字怀西，贵州桐梓人，拔贡，光绪二十九年（1903）任涪州知州。贺守典，涪州人，廪膳生。熊鸿谟，涪州人，民国改元后官四川南川、秀山等县征收局长。此书又名《涪州小学乡土地理》，系当时学堂改章、科举已废背景下为初等小学堂编写的一本乡土志蒙学教材。全书2万余字，卷首有《编辑大意》，云："是书稍异于州志"，"于历史则讲乡土大端故事，及本地古先名人事实；于地理则讲乡土道里建置，及本地先贤祠庙遗迹；于格致则讲乡土动、植、矿各物。凡关于日用所必需者，使知其作用及名称。……耳目所习，一经指示，便成学问，以启初学之知识。"正文三卷，分为3门98课。第一卷地理门，下列位置、疆界（附四至八到里数）、州志沿革、武隆省并、城池、街道、里甲场市（附户口）、学宫、庙宇、古迹、形胜、山脉、水道、关险、滩险、砦洞、历代用兵（含周秦汉、晋及六朝、唐及五代、宋元明统一上、下五课）、国初勘定、贼氛（含白莲教、刘汶礼、发逆滇逆、石达开犯蜀四课）、种族、农产、土货、树艺、盐卤、矿产（附沙金）等32课，实则史地两兼；第二卷政治门，下列官制、吏役、乡吏、贡赋、农政、盐法（附茶课）、烟课、关税、杂征、差役（附保正）、圜法、仓储、朝贺迎春、祀典、选举（附宾兴学田）、倡办学堂、营兵（附军械）、保甲（附水保甲）、团练（附渔团）、讼狱（附代书）、三费、监卡、邮政、津梁、邮政（附塘铺）、保险、交涉等27课，以记新学堂之倡办、保甲、团练、邮政、保险及外商入境之交涉等史料较有价值；第三卷风俗

门，下列中世民俗、士习、乡贤、孝友、忠烈、义烈贞节、睦嫺任卹之风未尽泯、女学宜兴（附缠足）、婚嫁过奢、葬祭不如礼、州人无尚武精神、卫婴养蒙法未讲求、田主苛待佃户、富室以厚利贷钱贫民、纺织之业渐衰、医术未普致其精（附稳婆）、市店作伪病商、教会歧出、游民之多、吸食洋烟之众、淫赌风炽、谣讹易起、淫书宜禁、演剧糜费、灯节端午中秋、香会之多、辨神道、城隍即水庸非阴官、醮禳无益、辨卜筮选择（附叩籤掷珓）、斋戒祈祷误用、天堂地狱错解、了凡派盛行、习玄功不如讲卫生、扶鸾请乩笔录传谕诸邪术为酿乱之阶、巫风宜革、忌讳及诅咒之陋、星相阻人进取、仇教之害等39课。其中，田主苛待佃户，禁烟、赌、淫、邪，仇视西方教会，摈弃落后愚昧，崇尚科学进步等方面反映中国封建末期社会现实的资料，尤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作为蒙学读物，该书还有语言通俗易懂，行文简洁明了，篇制精悍短小的特点，平均每课在250字左右，短则仅有一百余字。如第三卷第二课《士习》："涪士当科举未变时，多重科第，攻制科文间及词赋。近三十年风气稍更，或研究训诂考据之学。自中外多故，时局益变，学界亦日新。其俊异者，留心经世之务，或奋志远游，以拓学识而裨世用。前后由官资遣者，学管理学校法于东洋，学速成师范及理化科于湖北。而自备川赀游学者，亦赓续不绝。盖州地跨长江，文明输入较易，士类开通者亦占多数。他日宏彦辈出，可拭目期矣。"是书有光绪乙巳涪陵小学堂原刊本及1992年全国图书馆缩微文献复制中心拍摄的胶卷一卷藏于国家图书馆、重庆图书馆、四川大学图书馆等，四川省图书馆藏有抄本。

六、民国十七年（1928）《涪陵县续修涪州志》二十七卷

刘湘主修、王鑑清监修，施纪云总纂，刘子治、施愚、萧湘等分纂。民国十七年（1928）重庆都邮街德新公司铅印本。刘湘，字甫澄，四川大邑人，毕业于四川陆军讲武学堂，历任国民

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川军总司令、四川省主席等要职，1928年兼任重庆大学校长。王鑑清，成都人，民国十五年（1926）由合川县知事调任涪陵县知事。施纪云，原名缙云，涪州人，光绪九年（1883）进士，官翰林院编修、国史馆总纂。该志约30万字，卷首有凡例十八则、总目；卷末附专辑民国元年（1911）至十五年（1926）间史料的民国记事一卷及全书刊误表。正文分12纲70目附11目，共二十七卷。第一卷，疆域志一：涪州图、道里、星野、沿革一；第二卷，疆域志二：沿革二、山川一；第三卷，疆域志三：山川二、水利、古迹；第四卷，疆域志四：垄墓（附墓志）、义塚；第五卷，建置志：城图、城隍、廨署、学宫、坛庙、仓廪（附济田）、津梁、书院（附学堂学田）、塘铺、警察、城镇乡会、三费、善堂（附田产）；第六卷，赋课志：丁赋（附解运留支）、津贴、捐输、契税、盐课、茶课、杂税；第七卷，风土志：习俗、方言、节序、物产；第八卷，典礼志：文庙（附各祠）、坛庙、祈祷、宾兴（附田产）；第九卷，秩官志：名宦、良吏、文职、武职（附兵额）、民职；第十卷，选举志：贡举表（附武科表）、特试、学额、荫生；第十一卷，人物志一：乡贤、忠义孝友；第十二卷，人物志二：笃行；第十三卷，人物志三：义举、文苑；第十四卷，人物志四：仕进、义勇；第十五卷，人物志五：隐逸、流寓、封赠、耆寿；第十六卷，人物志六：列女一；第十七卷，人物志七：列女二、方技（附仙释）；第十八卷，食货志：卹谷、国币、输入品、输出品；第十九卷，艺文志一：存目、文征一；第二十卷，艺文志二：文征二；第二十一卷，艺文志三：文征三；第二十二卷，艺文志四：诗选一；第二十三卷，艺文志五：诗选二；第二十四卷，杂编一：祥异；第二十五卷，杂编二：兵燹；第二十六卷，杂编三：拾遗（附《何氏万户侯千户伯质疑》、《周氏册封虬正侯时代质疑》）；第二十七卷，叙录：旧序

（夏国孝、刘之益、文珂、董维祺、冯懋柱、多泽厚、陈于宣、王应元等八篇）、自序（附修志衔名）。该志记事续至清宣统三年（1911），除刊登旧志原载外，不少门类有所增补，较旧志更加详尽。如疆域一门，即增入水利资料3千余字，记述江、河、渠、堰等灌溉情况及范围；而在艺文门中，不仅补充了清末本州名士如傅炳墀、邹增祜等为数不少的诗文作品，还设立“存目”一类辑汇历代州人著书目录。此外，建置门中新学堂之开办、议会之建立、警察之建制，赋课门中各种税收，风土门之各类乡俗，杂编中之掌故遗闻亦有较高史料价值。是书藏于国家图书馆、北大图书馆（从泸州市图书馆提调）、复旦大学图书馆、重庆市图书馆、吉林省图书馆等48家单位⑤，近有台湾学生书局民国六十年（1971）《新修方志丛刊》影印本（四川方志之五十三），巴蜀书社1992年《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影印本（第47册1-208页）。

七、1995年新修《涪陵市志》

蒲国树主编，副主编为何建鸣、金家富二人，编辑有邹甚切等5人。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12月出版，1669页。该志约160万字，卷首有目录、序、凡例、概述、大事记；卷末附录旧方志序跋、考证、1986至1993年大事记、市领导人名录、主要市情数据及全书图表、人名索引。正文二十九篇，共127章429节。第一篇：建置沿革；第二篇：自然环境；第三篇：人口；第四篇：综合经济；第五篇：农业；第六篇：工业；第七篇：交通；第八篇：邮电；第九篇：商业；第十篇：榨菜；第十一篇：乡镇企业；第十二篇：财政税收；第十三篇：金融；第十四篇：城乡建设、环境保护；第十五篇：议会、人大、政府、政协；第十六篇：政党、社团；第十七篇：政治；第十八篇：军事；第十九篇：民政；第二十篇：劳动人事；第二十一篇：教育；第二十二篇：科技；第二十三篇：卫生；第二十四篇：体育；第二十五

篇：文化；第二十六篇：文物名胜；第二十七篇：宗教、民间组织、民俗；第二十八篇：方言；第二十九篇：人物。该志详细记述了涪陵市工业农业、交通邮电、商业贸易、科技文卫、城乡人民生活等各方面情况，着重介绍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涪陵的社会历史演变。为了凸显地方特色，该志在篇目安排上还做了“升格”处理，打破正常的逻辑和统属关系，将涪陵最具特色、誉驰中外的地方名产榨菜，从它所属的门类独立出来，单独成篇，从而增强了志书的“生度”[6]及深度。附录《考证》部分收入主编蒲国树本人撰写的《关于枳》、《涪陵考》两篇短文，从析名入手，对地方历史文化渊源作了深入探讨，笔墨简练而征引颇丰，理据充足而条贯明晰，相当程度上提高了志书的著述性和学术水平。而附录的图表、人名索引，亦通常志书所少见，极大地方便了读者，有利于提高志书存史资政的利用价值。据《涪陵市志编纂始末》（涪陵市地方志办公室 1995 年编印）介绍，该志的修纂，自 1981 年 4 月涪陵县（市）志编辑委员会成立至 1995 年 6 月清稿完成，前后历时 13 年多，收集整理资料 5800 余万字。正是由于有编修人员崇高的敬业精神和所付出的辛勤劳动，才使该志能够做到内容丰富，资料详实，文笔流畅，贴近现实，具有较高质量，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二轮普修方志中的上乘之作。

注释：

① 按：日本内阁文库藏本，今人多以为康熙五十三年（1714）刻。惟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编《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著录为康熙五十四年（1715）刻本。考卷末附孙于朝《涪州志跋》明标其作于“康熙五十四年”，当以《汇刊》说为是。至于该志卷首《修志姓氏》中所谓“康熙甲午年”云者，为纂修时间，而非刊行年份。

② 按：张问陶为邑人周兴岱女婿。兴岱，字冠三，号东屏，一作东坪，周

煌次子，乾隆三十六年（1771）进士，翰林院编修，善书法。

③ 王序为周元龙书，傅序为王柄书，吕序为金科朗书，三人均当地书法名手，有较高艺术造诣。

④ 详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主编《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中华书局 1985 年版，第 778 页。

⑤ 详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主编《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中华书局 1985 年版，第 778 页。

⑥ 来新夏先生曾说："所谓'生度'，即'详独略同'的'生疏度'，亦即存小同而求大异。志书如各有大异，则读者必有独特新鲜之感。"见郭凤歧《方志论评》序，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 页。

附录：

初唐史家文论特色检讨

以令狐德棻、魏徵为代表的初唐史家的文学见解，表面看来，像是折衷调和，论其实质，则表现了对文学发展规律的全面认识，较早、也较正确地为光辉灿烂的唐代文学指出了发展方向。

初唐史家；文学批评；特点

李唐开国后，为巩固政权以求久安长治，十分重视从各个朝代的治乱兴亡中总结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作为制定方针大计的借鉴。其重要措施之一，就是修史。武德四年（621 年）十一月，秘书丞令狐德棻上言倡议："窃见近代以来，多无正史，梁、陈及齐，犹有文籍；至周、隋，遭大业离乱，多有遗阙。当今耳目犹接，尚有可凭，如更数十年后，恐事迹湮没。……如文史不存，何以贻鉴今古？如臣愚见，并请修之。"[1]（《令狐德棻传》）唐高祖很快赞同了这一主张，于武德五年（622 年）十一月诏命中书令萧瑀等十七人分工撰写魏、周、隋、齐、梁、陈诸史，并提出了"史官记事，考论得失，究尽通变，所以裁成义类，惩恶劝善，多识前古，贻鉴将来"的修史目的和力求真实、"书法无隐"[2]（《苏绰传》）的具体要求，然"瑀等受诏绵历数年，竟不能就而罢"[3]（卷六三）。贞观三年（629 年），太宗复敕修撰，"乃令德棻与秘书郎岑文本修周史，中书舍人李百药

（继其父德林之业）修齐史，著作郎姚思廉（继其父察遗稿）修梁陈史，秘书监魏徵修隋史，与尚书左仆射房玄龄总监诸代史"[1]（《令狐德棻传》）。至贞观十年（636年）初，《北齐书》五十卷、《周书》五十卷、《梁书》五十六卷、《陈书》三十六卷、《隋书》八十五卷等五史相继告成。贞观十八年（644年），房玄龄又"与中书郎褚遂良，受诏重撰晋书……至二十年，晋书成，凡一百三十卷"[1]（《房玄龄传》）。而差不多同时，李延寿在其父李大师遗稿之基础上私家著述，删补"宋、齐、梁、陈及魏、齐、周、隋等八代史，谓之南北史，凡一百八十卷"[1]（《李延寿传》），并于高宗显庆四年（659年）获准流传，列为正史。通常人们所说的"初唐史家"，就是指上述在唐初撰定《周书》、《北齐书》、《梁书》、《陈书》、《隋书》、《晋书》、《南史》、《北史》这八部正史的主要编者。史书包罗万有，文学自在论叙之列。唐初史家沿承南朝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的做法，在其史著的文学家专传或合传（即文苑传或文学传）前后的序论中，评述历代文学，发表关于文学的意见。此外，《隋书·经籍志》集部和《梁书》、《陈书》中的帝纪总论也有关于文学批评的论述。各家言论，虽彼此不无小异，然大体相同，在几个重要问题上看法一致或接近，可归入同一思潮。而代表这一文学思潮的主要人物，《周书·王褒庾信传论》的作者令狐德棻和《隋书》序论及梁、陈、齐三史总论的作者魏徵[1]（《魏徵传》），既雅尚斯文，具有写作才能，于文艺颇为内行；又直接参与政事，是重要的决策人物，与李世民关系甚为密切，秉承了其"以史为鉴"的明确修史目的。因此，他们对于文学的见解，有鲜明的政治指向性、强烈的现实功利性、透彻的历史纵深感和严格的道德正统性，常常从政治角度立论，而就总体说来，又比较开明通达，不乏远见卓识，看问题比较全面，能注意到文学本身的发展和特点，实质上是唐

太宗对文学问题基本看法的进一步发挥和完善，代表着最高统治集团的观点，有直接的“资治”作用。其不仅影响着当时文风的变化，还为有唐一代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良好的思想基础，是初唐时期文学理论批评方面十分重要的文献。探其壶奥，论其大旨，盖如下述。

一、考论得失，强调文学裨助教化

史家历览成败兴衰，偏长经验总结而短于理论抽象，注重事功和致用。其论文亦率常如此。作《汉书》的班固称，赋的价值是“感物造端，材知深美，可与图事”[4]（《艺文志·诗赋略》）；作《宋略》的裴子野说，宋以后的诗赋“淫文破典，斐尔无功”[5]（《雕虫论》）；作《梁典》的何之元批评梁简文帝的妖艳文章是“政教之厚疵”、“非关政忽，壮夫不为”[6]（《梁典·总论》），并皆具有总结政教得失的意义。唐初的史家因其更兼政治家和文士等多重身份，尤其随时随地把文学问题和政治利益联系起来考虑。即使小而言之，他们也把文学看成是君子志士成人之美、襄益教化的一种“立身之道”[7]（《文学传论》）。《隋书·文学传论》云：“夫文学者，盖人伦之所基欤？是以君子异乎众庶。昔仲尼之论四科，始乎德行，终于文学。斯亦圣人所贵也。”又，同传之序说：“离谗放逐之臣，涂穷后门之士，道坎坷而未遇，志郁抑而不伸，愤激委约之中，飞文魏阙之下，奋迅泥滓，自致青云，振沈溺于一朝，流风声于千载，往往而有。”写作能力被视为“君子”必须的修养，文章被视为求取知遇、自致青云以至垂世不朽的一种手段。而当他们检阅历史，具体地总结历代文学的得失是非时，自然更加强调文学在“裨赞王道”[8]（《文学传序》），影响社会政治、人心风俗方面的巨大作用。《隋书·文学传序》云：“文之为用，其大矣哉！上所以敷德教于下，下所以达情志于上；大则经纬天地，作训垂范；次则风谣歌颂，匡主和民。”《晋书·文学传序》云：“移风俗于王

化，崇孝敬于人伦，经纬乾坤，弥纶中外，故知文之时义大哉远矣。”《梁书·文学传序》云：“经礼乐而纬国家，通古今而述美恶，非文莫可也，是以君临天下者，莫不敦悦其义；缙绅之学，咸贵尚其道。古往今来，未之能易。”又《周书·王褒庾信传论》亦云：“范围天地，纲纪人伦，穷神知化，称首于千古；经邦纬俗，藏用于百代。至矣哉，斯固圣人之述作也。”此外，《北齐书·文苑传序》和抄撮诸史相关序论而成的《北史·文苑传序》等亦有类似的意见，兹不赘复。这些论述虽详略有别，但都普遍一致地以儒家的思想和经典作为根据、归依，认为文学是关系到“经纬天地”和“匡主和民”的大事，不能等闲视之，听之任之。而且，绝大多数史家在强调文学为巩固中央集权制的政权需要服务的同时，大都十分强调正统的礼教观念。

显然，文学为政教服务，这是他们所共同强调的中心论题，其醒目特点是：考虑文学问题的是非得失，主要的并非从文学自身出发，而是着眼于政权的利益，过分看重文学对政治的影响。从而在理论上无可避免地表现为对魏晋文学自觉后二百余年间，特别是梁、陈之世，被抒写一己情怀、追求娱乐倾向的创作实践严重削弱了的儒家功利文学观的典型形态的高位复归，故变少而复多。但值得注意的是，唐初史家所说的“文”，是一个包笼自然万物、五经六艺、词赋风谣的大概念，故曰：“日月扬辉，天文彰矣”[2]（《王褒庾信传论》）；“尧曰则天，表文明之称”[9]（《文学传序》）；“八卦以陈，书契有作，人文详矣”[2]（《王褒庾信传论》）；“周云盛德，著焕乎之美”[9]（《文学传序》）；“小则文理清正，申纾性灵”[8]（《文学传序》）；“制礼作乐，腾实飞声”、“言之不文，岂能行远”[10]（《文苑传序》）。这些言论，认为大自然是文的本源，人的生活、实践、创造是文的另一本源，人的精神世界是“文”的表现对象之一，以及“文”不能脱离一定形式，必须是文与理，声与实的统一，从而对文学与自

然、政教及人的精神世界作出了较为全面的理论概括的高度抽象的哲学范畴。以此为基础，他们并不把文与道、文与德的问题当作文学的根本问题，而是把“经礼乐，综人伦，纬国家，通古今，述善恶”[8]（《文学传序》）当作文学的本质来论述。换言之，他们既不把“文”看作简单的“载道”、“明道”的工具，也不把“文”看作纯粹的经国治人的手段，而是把“文”的政治性，看作“文”的特殊本质。因而文学为政教服务就不是人为的要求，而是“文”的一种本质表现。“君临天下者”之“敦悦其义”，把它作为治国之术，只是对它的本质、规律的认识和应用。此外，唐初史家对儒家政教的理解，亦更为灵活宽泛，且更多指向现实的社会政治，与李谔、王通等人的狭隘复古教条鲜明对立。如，《周书·王褒庾信传论》称屈宋以来荀况、贾谊、司马迁、司马相如、王褒、扬雄、班固、傅毅、张衡、蔡邕、曹植、王粲、陈琳、阮瑀、潘岳、陆机、张华、左思等“斯并高视当世，连衡孔门”。上述表明，唐初史家对文学与政教关系的看法，固多承袭少创新，然其以现实政治为基点所作的理论发挥，仍显示出认识的深入，也反映出建立不久的唐帝国对文学的迫切要求。

二、贻鉴将来，指斥梁陈淫丽文风

唐初史家既视文学为政教之裨助，则用于纵欲、妨害政治、有碍治道，与腐败政治连在一起的文学自在摈斥之列。姚思廉《陈书》卷六《后主本纪》云：“自魏正始晋中朝以来，贵臣虽有识治者，皆以文学相处，罕关庶务，……不存国计，是以朝经堕废，祸生邻国。”并在《文学传》中称道褚介的“不好艳靡”，将为文“不尚浮华，而温雅博赡”的杜之伟列于传首，以资表彰。李百药《北齐书·文苑传序》云：“江左梁末，弥尚轻险，始自储宫，刑乎流俗。杂沾滞以成音，故虽悲而不雅。……原夫两朝（梁、北齐）叔世，俱肆淫声。而齐氏变风，属于弦管

（指齐后主高纬爱好哀婉动人的俗乐）；梁时变雅，在夫篇什。莫非易俗所致，并为亡国之音。”赞语中又说：“九流百氏，立言立德，不有斯文，宁资刊勒。乃眷淫靡，永言丽则，雅以正邦，哀以亡国。”令狐德棻《周书·王褒庾信传论》云：“子山（庾信）之文，发源于宋末，盛行于梁季，其体以淫放为本，其词以轻险为宗，故能夸目侈于红紫，荡心逾于郑卫。昔杨子云有言：‘诗人之赋丽以则，词人之赋丽以淫。’若以庾氏方之，斯又词赋之罪人也。”在所有这些批评中，对江左文风指斥得特别深切，并为别的史家广泛称引的是魏徵的批评。他在《梁书·帝纪论》中说：“太宗（萧纲）聪睿过人，神彩秀发，多闻博达，富赡词藻。然文艳用寡，华而不实，体穷淫丽，义罕疏通，哀思之音，遂移风俗……虽口诵六经，心通百氏，有仲尼之学，有公旦之才，适足以益其骄矜，增其祸患，何补金陵之复没，何救江陵之灭亡哉！”[11]（《敬帝纪》）又，《隋书·经籍志》四《集部总论》云：“梁简文之在东宫，亦好篇什。清辞巧制，止乎衽席之间；雕琢蔓藻，思极闺闱之内。后生好事，递相放习，朝野纷纷，号为宫体。流宕不已，讫于丧亡。陈氏因之，未能全变。”《隋书·文学传序》亦云：“梁自大同以后，雅道沦缺，渐乖典则，争驰新巧。简文、湘东，启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扬镳。其意浅而繁，其文匿而彩，词尚轻险，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听，盖亦亡国之音乎！”

魏晋以来，五言诗成熟、七言诗渐兴、山水诗产生、新体诗（永明体）出现，加之声律说的流行，文笔的区分，文学相对于学术的独立，《文选》、《文心雕龙》、《诗品》等著作的影响，凡此种种均刺激文学之士注重文学本身的特性，造成反动儒家诗教的纯文学观念的形成，造成文学思想、文学形式特别是诗歌体制的更新与改善，以及诗歌艺术上的创作经验的成熟与丰富，文风日趋绮丽。梁武帝萧衍天监（502－519年）末、普通（520－

526年）初，徐摛、庾肩吾等变本加厉追逐形式之美，内容由空虚而至于堕落，已存宫体之实。中大通三年（531年）萧纲入主东宫，遂有“宫体”之名。唐初的史家们认为，六朝文学之出现倾斜、发生偏差以致堕废朝经、助促亡国，主要是梁大同（535－546年）以后萧纲萧绎提倡宫体，徐陵、庾信等又大力加以发展。迄至于陈，后主因循，更是出于纵欲享乐的需要，引狎客对贵妃共赋新诗，采尤艳者被声歌之持以相乐（事见《陈书》卷七《后主沈皇后传》及下引《后主本纪后论》），在文学上追求淫丽。虽然，宫体之作在形式和技巧上“不拘旧体”[11]（《徐摛传》），巩固了永明以来在格律、声韵上取得的成绩并有所发展，而其内容上的“止乎衽席之间”、“思极闺闱之内”又古已有之——如屈原《招魂》、《大招》，宋玉《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司马相如《美人赋》等，其中都有侈陈女色以至男女情事之处。即如名儒蔡邕，亦有《协和婚赋》、《青衣赋》；高士陶潜，亦有《闲情赋》。虽然，梁朝之亡实系由于萧衍及重臣朱异之流的昏庸和宗室之间的倾轧残杀所致，萧氏兄弟和徐、庾二人并非不能作壮语、只知道纵情声色的荒淫之君和贵胄文士，他们亦并非风格单一、一成不变的作家，“宫体”一类诗文更不是其作品中的唯一内容——除“宫体”外，萧纲有气格流宕雄浑的《陇西行三首》及清新精致、流丽圆熟的《采莲曲》、《金闺思》、《夜望单飞雁》、《玩汉水》等；萧绎有幽怨婉丽、语浅意深、形式灵动的《荡妇秋思赋》；徐陵有清新自然的写景送别之作《新亭送别应令》，朴实苍老的闲适之作《山斋》，宛转雄劲的边塞乐府《关山月》（其一）；庾信更是“暮年诗赋动江关”[12]（《咏怀古迹》之一），“凌云健笔意纵横”[12]（《戏为六绝句》之一），有《哀江南赋》、《枯树赋》、《咏怀古迹二十七首》等抒写乡关之思、家国之恨的苍凉悲慨之作。但由正统的眼光看去，如萧氏兄弟那样，以“副君之重”、“皇子之豪”[7]（《梁武帝诸子传》）的特殊地位正面提倡，与臣下

此倡彼和，大量写作，如人称“跨灶之儿”的徐陵、庾信那样，在声韵格律、对偶用典方面踵事增华，趋于极致，青胜于蓝，以大其体，以至“春坊尽学”[11]（《徐摛传》），一时间蔚为风气，“且变朝野”[7]（《梁本纪总论》），却是史无前例、有伤风化的。至于萧纲写作此类作品如《见内人作卧具》、《咏内人昼眠》、《美人晨妆》、《倡妇情怨》乃至《娈童》这样的性变态色情诗时态度之大胆直率，且公然为之张目，在《诫当阳公大心书》中提出“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放荡”是不受拘检，任性而行的意思，和“形式主义”、“色情”等等了不相涉。单纯的理论意义上的“放荡”主张并无错误，但具体到萧纲本人来说，这种主张又建立在苍白的生活基础和脆弱的思想基础之上，提出这种主张，正在于为其提倡的宫体诗风作理论上的辩护），则更是前所未有，大乖典则。何况梁以后的陈后主既爱好艳诗，又荒淫放纵，其文学上的淫靡与政治的败亡如此广泛地长时间地紧密联系在一起，在文学思想史上也是第一次。历史以它活生生的事实，为唐初史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鉴戒。于是唐初史家在以共同的历史观来审视文学发展的过程、总结前朝覆亡的教训时，便自然想到“声音之道与政通”、“亡国之音哀以思”[13]（《乐记》）的儒家古训，将文运与世运结合起来，不约而同地对大肆煽动“宫体”之风的萧氏兄弟、徐陵、庾信和陈叔宝等大张挞伐，以示儆戒。

唐初史家对江左文风的批判，吸取了刘勰、钟嵘以来的主要意见，有效遏止了宫体的堕落与淫放，对中唐时期的古文运动和新乐府运动，在思想上有积极的启示意义。有三点值得注意。

1. 与政权得失紧密联系在一起

前朝覆亡的惊心动魄的历史事实，辅佐明主、建立万世基业的雄心壮志，决定了唐初史臣考虑问题的态度与方法。面对历史，以史为鉴，避免重蹈覆辙，这几乎是他们考虑一切问题的思

路。因此，他们在批评六朝绮丽文风时，更强调它和那些王朝覆灭的关系，特别是政治家魏徵对于这一点更是反复强调。五史正在修撰过程中的贞观五年，魏徵就在《〈群书治要〉序》中说："近古皇王，时有撰述，并皆包括天地，牢笼群有，竞采浮艳之词，争驰迂诞之说，骋末学之传闻，饰雕虫之小技，流荡忘返，殊途同致。虽辨周万物，逾失司契之源；术总百端，弥乖得一之旨。"[14]（卷首）这已经透露出了他将要在史书中阐述的对绮靡文风与政权得失关系的看法。在史书中，他更是反复征引前朝败亡的教训作为反对绮丽文风的历史依据，把这个问题表述得更为具体。除了前面提到的外，其《陈书·后主本纪后论》云："后主每引宾客对贵妃等游宴，则使诸贵人及女学士与狎客共赋新诗，互相赠答，采其尤艳者以为曲词，被以新声，选宫女有容色者以千百数，令习而歌之，分部迭进，持以相乐。……古人有言：亡国之主，多有才艺。考之梁、陈及隋，信非虚论。然则不崇教义之本，偏尚淫丽之文，徒长浇伪之风，无救乱亡之祸矣。"谈及文风，就谈及国家兴亡问题，把文风和政权的关系，概括得既生动明快、深刻空前，而又雄辩有力，充满哲理与睿智。与此同时，魏徵在《隋书·文学传序》中对六朝之外的隋代文学颇具策略性的批评，则从不同的角度表明了同样的态度。《传序》肯定了隋文帝"初统万机，每念斫雕为朴，发号施令，咸去浮华"的革除南朝文华的措施，对炀帝"初习艺文，有非轻侧之论，暨乎即位，一变其风"的实践加以赞扬，并特别指出其《拟饮马长城窟》等诗"并存雅体，归于典制"，"故当时缀文之士遂得依而取正焉"，对炀帝诗本身及其影响都给予了高度评价，一味阐扬其"词义贞刚"、"归于典制"的"雅音"特色，但对隋炀帝晚年的轻侧艳歌及隋代文学作为南北文风的初融时期"宫商发越，贵于清绮"的"郑声"风调，却有意避而不及，用意乃在于以隋代帝王为太宗皇帝重塑一个在文学方面最为

切近的典范。抑正抑反，目的都十分明确，就是为唐太宗政权得失提供有关文学的历史借鉴，希望他不要再蹈梁、陈文学的覆辙，不要再尚淫丽之文，长浇俗之风，以遭乱亡之祸。不独魏徵，令狐德棻、李百药和姚思廉等亦有同样的观点，只不过要表述得委婉些而已。由此可见，唐初史家们都是从政权的角度，即从皇祚永固的角度来考虑文风问题的。他们考虑文风，首先考虑的是刚刚建立的皇朝的利益。这正反映了唐王朝统治阶层对于前车之鉴的深深警惕，这也就是他们反对浮丽文风而要求文学为封建统治服务的根本原因，从而就使他们的反对六朝以来的浮丽文风，具有了鲜明的具体的历史内容和特点。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反对绮靡文风，实际上不仅是一个文学的问题，也是其国策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唐初史家的上述对于文学与政权得失关系的观点，具有独特的深刻性和新鲜感，比前此文学思想史上的类似观点是一种发展与创新。在他们之前，还没有人把淫放文风和政权得失的关系强调到这么重要的地步。孔子的诗"可以观"[15]（《阳货》）的观点，《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季札观乐的记载，都只说明从诗风可以看出政治的得失，是以文观政。刘勰提出"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暐烨之奇意，出乎纵横之诡俗"；"世积乱离，风衰俗怨"，为文则"志深而笔长，梗概而多气"[16]（《时序》）。他涉及到了文风与社会风貌的关系，十分精辟地论述了文学的时代风格问题。但是，他们都还没有把用文学于纵欲生活与国家的败亡这么紧密地联系起来。他们还没有梁、陈这样的历史教训可供总结。无疑，这是历史为唐初史家提出的独特课题。在文风和政权的得失的关系上，在文学对政权的影响上，初唐史家比他们之前的理论家们的感受要深切得多，认识也深刻得多。

2. 与李谔、王通等人对梁陈乃至整个六朝文学的全盘否定有原则区别

历史是复杂的，也是前进的。梁陈文学，一方面存在“舍意问辞，因辞觅态”①，“尚词而病于理”[17]（《诗评》），更无意兴，甚至内容贫乏、情调低下、风格柔靡和艺术上偏重词藻、典故、声律等具体技巧而忽视对审美意象的整体塑造等不良倾向，一贯被后人视为轻绮华靡文风之标本。但是，另一方面，作为中国古代文学发展重要阶段的六朝文学的一个关键环节，它的重视文学“缘情”本质、讲究艺术形式的华丽、注意多样化的表现方法的运用，又总结了魏晋以来三百余年文学艺术发展中的新成果和新经验，毫无疑问地对文学发展特别是对近体诗的形成、咏物诗的发展、艺术描写的细腻等起了积极促进作用。显然，同淫丽文风搅在一起的，是艺术表现手段和技巧的丰富与发展。而文学又有它自身的发展规律，任何力量也无法让它回到独立成科以前的状况去。所以，在反对淫丽文风时，无论是像宇文泰和苏绰、隋文帝和李谔那样采取简单的行政命令的办法，无视建安、正始文学的进步社会内容，置陶渊明、谢灵运、鲍照等许多优秀诗人于不顾，持否定一切的态度；还是像王通那样否定文学之审美特性，严重混淆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以政治、伦理道德观念去取代文学，都是以一种偏颇反对另一种偏颇的倒行逆施，都不能正确反映六朝文学发展的实际，只能使文学发展从一个极端走上另一个极端，重新成为经学的附庸。

唐初史家的难能可贵之处就在于，他们在面对和解决既要反对淫丽文风，又必须承认文学发展的事实、汲取艺术上的成就这样一个历史课题时，以实事求是、圆融通达的态度，对梁、陈文学采取了批判、净化、汲收和发展即扬弃的稳妥的方法，既坚决地反对六朝“夸目侈于红紫，荡心逾于郑卫”的淫丽文风，却又正确区分了重视艺术的形式技巧和片面追求形式美、忽视作品内容的形式主义倾向之不同，能恰当地估计到六朝文学中“缛采郁于云霞，逸响振金余石”的形式美的必要性，把对梁陈文

学的批判严格限制在梁大同之后以萧纲、萧绎、徐陵、庾信为代表的"宫体"一类创作内容上的"止乎衽席之间"、"思极闺闱之内"，从而一方面制止了淫丽文风的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又给文学艺术技巧的进一步发展留下了广阔的天地，顺应了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避免了李谔、王通否定一切的偏激片面。所以，唐初史家和李谔、王通们虽然同样都是从儒家的政教观点出发批判淫丽文风，但在理性把握的分寸上却不同，因而实质迥异，结果殊悬。

3. 与其创作实践和当时人的审美趣味存在矛盾

《新唐书·文艺传·杜甫传赞》曰："唐兴，诗人承陈、隋风流，浮靡相矜。"《新唐书·陈子昂传》又云："唐兴，文章承徐、庾余风，天下祖尚。"《陈书·江总传》云："（江总）于五言、七言尤善，然伤于浮艳，故为后王所爱幸。多有侧篇，好事者相传讽玩，于今（指唐初）不绝。"可知此类艳靡诗作在唐初仍为人们所爱赏，南朝文学创作的遗风，在那时势力仍很巨大。又，高士廉受诏与魏徵等集文学之士，撰类书《文思博要》一千二百卷[1]（《高士廉传》），褚亮"贞观中奉敕与诸学士撰《古文章巧言语》以为一卷"[8]（元兢《古今诗人秀句序》），为属文者提供饾饤獭祭之资；虞世南撰《北堂书钞》一七三卷[1]（《虞世南传》），许敬宗、上官仪等人"采摘古今文章英词丽句，以类相从，号《瑶山玉彩》"[19]（卷五四）五百卷，供当时作文吟诗采摭词藻之用。由这些规定各种题材惯例、汇集各种典故词藻的类书在唐初的勃然兴起，亦可窥见当时文坛之风尚。

唐初史家们虽然从思想上深知绮靡文风的危害，但能言者未必能行，自身却也未能摆脱南朝遗风延播的影响。于修史而言，诚如《旧唐书·房玄龄传》所云："史馆多文咏之士，好采诡谬碎事以广异闻；又所评论，竞为绮艳，不求笃实，由是颇为学者所讥。"八史的作者几乎无一不是文人，他们好尚词采，除

《梁》、《陈》二书纯用散体外，修史多用华美的骈体文字，故闻一多先生说："只把姚思廉除开，当时修史的人们谁不是借作史书的机会来叫卖他们的文藻——尤其是《晋书》的作者！"[20]（2页）不过，姚氏的著作同样是讲究文采的，他的史论也仍未脱尽四六骈文的气息，并对六朝文学颇多推崇。至于文学创作，史臣中也不乏与其超越个人趣味、立足于政治教化的高言谠论相悖者。何焯评云："郑公（魏徵）立论，虽颇裁大同之淫放（指《隋书·文学传序》批判梁简文帝等的宫体，其语见前），至连绝所长（指诗歌创作），未有不以南朝词人为尸盟耳。"[21]（《严氏纠谬》）而其他唐初史臣，写过宫体诗的亦大有人在。《北齐书》的作者李百药，即作有《少年行》、《妾薄命》、《火风词》、《寄杨公》、《戏赠潘徐城门迎两新妇》等宫体艳情诗，且屡屡出现"挂缨岂惮宿"[22]（《妾薄命》）、"自有横陈会"[22]（《火风词二首》之二）之类格调低下之语。其《笙赋》写吹笙女之姝丽，又写她奏毕事寝，也全然是宫体格调。赋中还为郑卫之音辩护，说雅郑各有攸宜："清庙象功，则《韶》、《武》播于金石；良辰欢宴，则郑卫流于管弦。岂无求于变俗，将区分而在焉。"此外，《隋书》诸志的监修之一长孙无忌也是其中之一。

刘师培在其《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第五课丁节"总论"中曾说："要而论之，南朝之文，当晋、宋之际，盖多隐秀之词，嗣则渐趋缛丽。齐、梁以降，虽多侈艳之作，然文词雅懿，文体清峻者，正自弗乏，斯时诗什，盖又由数典而趋琢句，然清丽秀逸，亦自可观。……至当时文格所以上变晋、宋而下启隋、唐者，厥有二因：一曰声律说之发明，二曰文笔之区别。"[23]（92页）明乎此，则知醉心形式之风既久既炽，积重难返，而艺术形式和表现技巧的进一步发展，又为绮艳文风的继续存在留下了一定空间。唐初虽有史家们理性批判的节制和魏徵《述怀》之类"笔力遒劲"[24]（徐增《而庵诗话》），"骨气高古，变从前

纤靡之习"[25]（卷一），亦不可能立变其势，移易风气。初唐文坛正忍受着产生新作和新风前的阵痛。

三、裁成义类，肯定文学审美价值

随着文学的发展，文学本身的特点和审美价值也逐渐被史家认识和承认。这主要反映在他们对历代文学的评价和对文学发展未来走向的论述中。如，魏徵《隋书·经籍志》集部《楚辞》类的评论，对屈原作品在指出其"冀君觉悟"的讽谏目的和"言己离别愁思，申抒其心"的舒泄愤懑作用的同时，所给予的"气质高丽、雅致清远"的评价；《隋书·经籍志》集部总论谓潘岳、陆机"清辞润乎金石"，以"高致之奇"称（谢）灵运山水兴会之标举，"错综之美"表（颜）延年综缉藻彩之丽密，以"辉焕斌蔚"赞谢玄晖之"藻丽"并沈休文之"富溢"；《隋书·文学传序》称江淹及"北地三才"刑劭辈"缛采郁于云霞，逸响振于金石，英华秀发，波澜浩荡，笔有余力，词无竭源"，等等，显然都是从审美角度出发的。至于令狐德棻《周书·王褒庾信传论》谓"曹、王、陈、阮，负宏衍之思"，"潘、陆、张、左，擅侈丽之才"，仍然是基于对他们作品审美性质的肯定。又如，令狐德棻提出文学应该"以气为主"、"调远"、"辞巧"[2]（《王褒庾信传论》），就包含着对魏晋六朝发展起来的文学的艺术特征的认识；在魏徵提出的合南北之两长的文学理想中，也要求"掇彼清音"[9]（《文学传序》），并没有摒弃清绮文辞。此外，由唐初史家对宫体诗的谨慎批评，也可间接求证他们对文学审美价值的肯定态度。如魏徵《隋书·经籍志》集部总论谓宫体"清辞巧制"云云，虽则意在贬斥其描写艳情、格调低下，但以"清"、"巧"概括其艺术表现，却颇为恰当。固然，宫体诗一类的作品文饰过甚、华艳至极，有"淫放"、"轻险"之弊，有庸俗低下者流，但在艺术上也并不是没有值得肯定的地方。有许多只是描绘女性服饰之美丽、歌舞之精妙、神态之动人

而已，它们“虽风兴或缺，而篇翰可观”[26]（《序》），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在文学史上有开拓意义。其由讲究声律、对偶，用典不多且避僻，不以使事逞博相高所形成的“清丽”的语言风格，较好地体现了齐、梁文学家如谢朓提出的“圆美流畅”[7]（《王昙首传》）、沈约提出的“易见事”、“易识字”、“易读诵”[27]（《文章》），以及“言尚易了”[7]（《文学传论》）的审美要求；其对人物的细致观察、体会和描绘，更是创造性地负载着齐梁诗歌理论描写自然风景要求“直寻”、“自然英旨”[28]（《序》），追求“不加雕饰（指雕饰藻彩），而曲写毫芥”[16]（《物色》）的审美追求。可见唐初史家对宫体诗语言运用的优点是有认识的，只是既斥之为亡国之音，对其艺术表现上的长处也就无暇顾及了。

唐初史家毕竟不是文学批评专家，他们对文学审美价值的肯定，固然不及《文心雕龙》系统深入，但比之刘勰时代持同见解的人还不多的状况，仍然显示出文学思想的发展。其侧重有二。

1. 重视“缘情”本质

唐初史家对文情关系、情的涵义及情与政治关系的解释，继承了秦汉儒家所阐明的“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不为道，则不能无乱，先王恶其乱也，故制雅颂之声以道之”[29]（《乐论》），“发乎情，止乎礼义”[13]（《毛诗序》）等情性与政教统一的原则性观点，并像刘勰、钟嵘那样，肯定、吸收并改造了六朝以来论文、情关系的理论成就。所以，他们固然强调文学的社会教育作用，却没有把文学同经史著作混为一谈，抹煞文学与“情性”（人的思想情感、精神世界）的关系。李延寿《南史·文学传论》引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云：“文章者，盖情性之风标，神明之律吕也。”又，魏徵在《隋书·经籍志》中解释“别集”之名时说：“自灵均已降，属文之士众矣。然其志尚不同，风流殊别，后之君子欲观其体势而见其心灵，故

别聚焉，名之为集。”在集部总论中又说：“文者，所以明言也。古者登高能赋，山川能祭，师旅能誓，丧纪能诔，作器能铭，则可以为大夫。言其因物骋辞，情灵无拥者也。”十分重视文学畅达情志、表现人心灵世界的特点。姚思廉也指出：“夫文者，妙发性灵，独拔怀抱。”[11]（《文学传后论》）强调文学是人内心感情的真实流露的抒情本质。其他各家论之尤详。例如：“原夫文章之作，本乎情性，覃思则变化无穷，形言则条流遂广。”[2]（《王褒庾信传论》）“夫赏好生于情，刚柔本于性。情之所适，发于咏歌，而感召无象，风律殊制。”[30]（《文苑传论》）“文之所起，情发于中。人有六情，禀五常之秀；情感六气，顺四时之序。”“斯固感英灵以特达，非劳心所能致也。”[10]（《文苑传序》）他们不仅认为文学以情为本，文学的风格、体制、艺术构思的情状、特点也都是由“情性”决定的，而且认为“情性”“禀五常之秀”、“顺四时之序”，无所不包，与理相通。从而把“达幽显之情”与“明天人之际”[10]（《文苑传序》）联系起来，在根本上赋予情性、性灵以鲜明的政治内容。因此，在唐初史家看来，人的情性的本质和表现情性的文学作品的本质，归根结底是为一定时代的政治所决定的。文学本于情性与文学为政教服务，不仅不相矛盾，而且前者是后者的补充和深化，只有把这两方面统一起来，才算全面掌握了文学的本质、规律。

2. 好尚文饰之美

唐初史家反对“轻险”、“淫放”的文学，反对文学的形式主义和“华诞”，但也好尚文采、反对忽视形式美的必要性，不赞成质俚无文。如，令狐德棻《周书·王褒庾信传论》虽对传主诋諆甚力，谓为“词赋之罪人”，但同时也指出：“然绰建言务存质朴，遂糠粃魏晋，宪章虞夏，虽属词有师古之美，矫枉非适时之用，故莫能常行焉。”[2]（《王褒庾信传论》）反对苏绰仿古制言的不合时宜和矫枉过正的质木无文。姚思廉虽不止一次指

出宫体诗伤于“轻艳”[11]（《简文帝纪》）、“浮艳”[8]（《江总传》），但在论及徐陵时，还是承认其“颇变旧体，缉裁巧密，多有新意”[8]（《徐陵传》）。可见，唐初史家虽然和苏绰等人一样，也把儒家的六经作为文学的源头、最高范本和理论准则，但他们并不认为六经以后文学日益退化，而是继承刘勰的观点认为文学在不断发展。“时运推移，质文屡变”[2]（《王褒庾信传论》），时代在变，社会风尚在变，个人遭遇不同，因而文学就不能不变。这是文学发展的客观依据。由尚质到尚文，踵事增华，文体日繁，词采日富，这是文学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文学进步的标志。汉魏以后，文体屡变，辞人才子，标能擅美，不仅没有妨碍文学发挥其政教作用，相反，“譬犹六代并凑，易俗之用无爽；九流竞逐，一致之理同归”[2]（《王褒庾信传论》），其精神实质同六经是一致的。因此，文体繁变，词采华茂，风格多样，如同“得玄珠于赤水”，“成万宝于秋实”[10]（《文苑传序》），是前无古人的重大收获。他们这样认识文学的历史，不仅得出了较全面的合乎实际的结论，而且其方法也是可取的。正是基于这样的历史观、方法论，他们才能够比较正确地指出文学改革的方向。

四、究尽通变，要求建立新文风

国家的复归统一和对梁、陈文学的批判，使文学革新开始成为一种客观的历史要求和普遍的社会要求。顺应这一要求，唐初史家对文学改革的历史经验加以总结，相互发明，提出了建立新文风，创造唐代新文学的意见。

1. 斟酌古今

在古今问题上，他们不但主张打破宗经、征圣的框框，“摭六经、百氏之英华，探屈、宋、卿、云之秘奥”[2]（《王褒庾信传论》），学习、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遗产，而且认为“文质因

其宜，繁约适其变，权衡轻重，斟酌古今"[2]（《王褒庾信传论》），认为继承不是模仿，而是要适应新的时代的要求，熔铸古今，创造新的文学。

2. *兼顾文质*

在内容与形式的关系问题上，他们抛弃了李谔、王通重质轻文、重道轻艺的观点，既重情志内容、反对淫靡文风，又接受六朝已经积累起来的艺术经验，追求文采风华。《南史·文学传论》"放言落纸，气韵天成"，以质文统一为高。《周书·王褒庾信传论》云："虽诗赋与奏议异轸，铭诔与书论殊途，而撮其旨要，举其大抵，莫若以气为主，以文传意。……其调也尚远，其旨也在深，其理也贵当，其辞也尚巧。然后……和而能壮，丽而能典，焕乎若五色之成章，纷乎犹八音之繁会。"不单指出文学创作"以气为主，以文传意"的正确途径和"和而能壮，丽而能典"的美好理想，更提出了调远、旨深、理当、辞巧的全面要求。这些要求，虽然主要的部分并没有超出魏晋六朝人之所论（以气为主的主张，始自曹丕，陆机有所论列；旨深、理当、辞巧、调远亦为刘勰所曾批述），但其文气、辞采、声律并重，则承继了文学自觉之后对文学特质的种种认识，几乎包举了六朝审美理论的全部精华，更显平妥周全。而且，仍不乏富有创意、颇可关注之处。如，"调远"，个中之"调"，本为声调、曲调。魏晋六朝由声中含情、听声察情而及于情调，指声气情貌，仅用于评人。《世说新语》谓"桓宣武平蜀"而"音调英发"[31]（《豪爽篇》）；《诗品》论鲍照"贵尚巧似，不避危仄，颇伤清雅之调"，又论郭泰机、顾恺之、谢世基、顾迈、戴凯五子"气调警拔"[28]（卷中）；《文心雕龙》称阮籍"响逸而调远"[16]（《体性篇》），皆是。令狐氏移之于文，作为对文学的要求提出来，以目前所见史料，似为最早。后殷璠《河岳英灵集序》论唐诗发展，即云"景云（710－711）中，颇通远调"[32]（卷四三

六)，以此为盛唐文学之一重要特征。

3. 融会南北

在风格问题上，他们提出了更具时代意义的刚柔相济、南北融合的主张。南、北朝文学，因社会政治状况及历史文化传统等的差别，而形成不同的风格和发展的不均衡，唐初史家首先对此进行了具体分析。他们认为，造成文学发展北不如南的原因主要是由“时运然也”[2]（《王褒庾信传论》）造成的“彼此好尚，互有异同”[9]（《文学传序》）。南朝社会相对稳定，经济较为发达，山水园林亦复秀美，贵族阶级绰有余裕以文学写作和欣赏满足其精神享受的需要。故“宋齐之世，下逮梁初”，有灵运、延年、玄晖、休文“辉焕斌蔚，辞义可观”[9]（《经籍志・集部总论》），江淹、任昉等“学穷书圃，思极人文”[9]（《文学传序》）。与此同时，北方则是“中州版荡，戎狄交侵，僭俗相属，士民涂炭”[2]（《王褒庾信传论》），兵乱积年，戎马倥偬。燕赵文士“迫于仓卒，牵于战争”[2]（《王褒庾信传论》），以写作实用性文字为当务之急，“风流文雅，我则未暇”[9]（《经籍志・集部总论》），少有余暇从事美的文学的创造，是以“竞奏符檄，则粲然可观；体物缘情，则寂寥于世”，“文章黜焉”[2]（《王褒庾信传论》），“道尽”[9]（《文学传序》）。加之北朝文学发展较迟，文人的审美修养、创作能力（包括文辞雕琢工夫）相对而言不如南朝，虽有“后魏文帝，颇效属辞”仍是“未能变俗，例皆淳古”[9]（《经籍志・集部总论》），其作品过于简直，尚处于初级阶段，“罕值良宝”[2]（《王褒庾信传论》），未可希风江左。但同时他们又指出了北朝文学的可肯定之处，以政治上的大一统实现之后人们观察、思考问题的新视角，首次对二百余年来南北朝文学的异同得失进行了合乎事实的分析比较：“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实用，文华者宜于歌咏，此南北词

人得失之大较也。"[9]（《文学传序》）认为南朝作品具有声律谐美、风格清丽的优点，北方文制则以坚确有力，爽直朴实见长，南北文学各有所长。而且，他们还深刻地认识到正是北朝文人或自以为是不足的是其雕琢功夫不如南朝，客观上却避免了过分的堆垛涂饰，形成了"词义贞刚，重乎气质"的特色，在一定的场合（尤其是写作公家文书时）反倒成了优点，于南朝某些文人文饰太过之弊有补偏救失的矫治作用。于是他们称赞由南朝进入北朝而"穷南北之胜"[33]（《庾子山集注题辞》）的王褒、庾信是"奇才秀出，牢笼于一代"[2]（《王褒庾信传论》），提出"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矣"[9]（《文学传序》）。即取南朝之华美清丽，加之北朝的意理气质，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统一起来，从而创造出一种文质半取、刚柔兼具、和而能壮、丽而能典的，与唐代政治、经济发展状况相适应的、前所未有的新文学的理想前景。无疑，这是一个洞悉文学发展趋势，符合文学发展规律的折衷的主张。"折衷也就是转变"[34]（110 页），合南北之两长发展起来的盛唐文学正好揭示了这一主张的正确性和预见性。

明人林鸿曰："上自苏、李，下迄六代、汉、魏，骨气虽雄而菁华不足。晋祖玄虚，宋尚条畅，齐、梁以下，但务春华，殊欠秋实。唯李唐作者可谓大成。"[35]（《凡例》）唐代文学发展历史表明，魏徵们提出的建立新文风的主张，虽然还只是在总结吸收前代理论成果的基础上产生的一般原则，对于行将到来的理想的新文学究竟是个什么样子，他们并不清楚；而进一步提出符合它的时代需要的具体要求，也有待于"四杰"和陈子昂等作家的创作实践提供经验，以及理论在发展过程中的逐步完善与成熟，但它确实反映了文学发展的趋势，有效地指导了有唐一代的文学创作。

要之，唐初史家既主张文学有益于政教，反对丽靡文风，遵

循儒家诗教传统；又反对对梁、陈文学的全盘否定，重视吸收魏晋以来文学发展、尤其是艺术技巧方面的新成果，尊重文学自身的特点，具有开创进取精神。他们在对待文学的教化作用与艺术特征的关系上，要求斟酌古今、兼重华实、融会南北，持一种比较积极、全面和稳妥的有利于以后文学发展的观点。

前辈先生有言：史家纵览古今，横观各派，他们的见解既注重作历史的变动的探讨，又是由成败兴衰的总结归纳得来，故往往“偏重事功”，“平淡是其所短，宏通是其所长”[36]（98、99页），“史家修史……不重在论文……可是，如果论到的时候，所论的倒是真的文学”[34]（110页）。甚是然也。事实业已证明，作为唐代文学的首次思想准备，唐初史家立足于现实、站在时代前锋位置，以其独到的观察深度、宏通眼光和辩证方法对文学创作中面临的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所作的理论探讨，以及对文学发展历史所作的总结、对新文学创作的要求，不仅为有唐一代文学的发展指明了正确方向，也给了唐代文学繁荣一个良好的开端。可以认为，没有初唐史家们建设性、先导性和卓有成效的努力，灿烂辉煌的盛、中唐文学的到来是不可想象的。因而，他们的历史功绩应该得到确切的评价和足够的尊重。

注释：

①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二一，转引自曹道衡、沈玉成《南北朝文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243页。

参考文献：

[1] 刘昫. 旧唐书 [M]. 北京：中华书局，1975.
[2] 令狐德棻. 周书 [M]. 北京：中华书局，1971.
[3] 王溥. 唐会要 [M]. 丛书集：成：初编 [Z]. 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
[4] 班固. 汉书 [M]. 北京：中华书局，1962.

[5] 全梁文 [M]. 严可均.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 [Z]. 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58.
[6] 全陈文 [M]. 严可均.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 [Z]. 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58.
[7] 李延寿. 南史 [M]. 北京：中华书局，1975.
[8] 姚思廉. 陈书 [M]. 北京：中华书局，1972.
[9] 魏徵. 隋书 [M]. 北京：中华书局，1973.
[10] 李百药. 北齐书 [M]. 北京：中华书局，1972.
[11] 姚思廉. 梁书 [M]. 北京：中华书局，1973.
[12] 仇兆鳌. 杜诗详注 [M]. 北京：中华书局，1979.
[13] 阮元. 十三经注疏 [Z]. 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0.
[14] 魏徵. 群书治要 [M]. 四部丛刊：初编 [Z]. 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15] 论语 [M]. 诸子集成 [Z]. 北京：中华书局，1954.
[16] 刘勰. 文心雕龙 [M]. 范文澜注.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17] 严羽. 沧浪诗话 [M]. 郭绍虞校释.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
[18] 遍照金刚. 文镜秘府论：南卷 [M]. 王利器校注.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19] 王应麟. 玉海 [Z]. 清光绪七年 (1881) 浙江书局重刊本.
[20] 闻一多. 类书与诗 [A]. 唐诗杂论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21] 何焯. 钝吟杂录 [M]. 丛书集成：初编 [Z]. 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
[22] 李百药集 [M]. 王安石. 唐百家诗选 [M]. 文渊阁四库全书 [Z].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本，1983.
[23] 刘师培. 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 [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24] 丁福保. 清诗话 [Z].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本，1978.
[25] 沈德潜. 唐诗别裁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本，1979.
[26] 姚铉. 唐文粹 [M]. 四部丛刊：初编 [Z]. 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27] 颜之推. 颜氏家训 [M]. 王利器集解.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28] 钟嵘. 诗品 [M]. 陈延杰注.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1.
[29] 荀子 [M]. 诸子集成 [Z]. 北京: 中华书局, 1954.
[30] 房玄龄. 晋书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31] 刘义庆. 世说新语 [M]. 余嘉锡笺疏.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32] 董诰, 阮元. 全唐文 [M]. 北京: 中华书局缩印清嘉庆刊本, 1983.
[33] 倪璠. 庾子山集注: 第一册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34] 郭绍虞. 中国文学批评史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
[35] 高棅. 唐诗品汇 [M]. 汪宗尼校订.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缩印本, 1981.
[36] 罗根泽. 中国文学批评史: 第二册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

（原载《四川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 2001 年第 3 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2001 年第 10 期全文转载）

"崒"音献疑

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诗"群冰从西下，极目高崒兀。"句中"崒兀"之"崒"（"危高"义）音，萧涤非《杜甫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9 年版）61 页注为"cù"；王力《同源字典》（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407 页此字"按"云："当依《广韵》读慈卹切"，不为无据。然而查阅现行各大辞书，并无此音。

一、《说文·山部》："崒，危高也。从山，卒声。"

二、《康熙字典》（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213 页："《广韵》慈卹切，《集韵》《韵会》《正韵》昨律切，并音谇（zú）。"

三、《中文大辞典》（台北中国文化学院出版部民国五十七年〈1968〉版）4399 页："音卒（质人声）"。

四、《大辞典》（台北三民书局民国七十四年〈1985〉版）1348 页："ㄗㄨ"。

五、《汉语大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3 卷 842 页、《汉语大字典》（四川、湖北辞书出版社 1986 年版）782 页、《辞源》（商务印书馆 1979 年版）1815 页、《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0 年版）955 页："zú"。

以上数例，俱作"zú"而非"cù"，与萧注、王著相抵牾，叫人无所适从。若萧、王有据，诸辞书应加注异读或旧读音

“cù”；不然，则萧注王著当作订正。

（原载《江海学刊》2003年第1期）

《骄儿诗》"或谑张飞胡"句"胡"字辨义

李商隐《骄儿诗》"或谑张飞胡"句"胡"字义，学者自朱鹤龄以来，或曰"多髯"，或曰"黑"，或曰"燕颔"，众说纷纭。但联系其下"或笑邓艾吃"之句，结合义山诗之总体特点，参以史传、小说的相关记述，释为"呼（喝）"即指张飞之大嗓门咋呼，似乎更为允当。

《骄儿诗》；张飞胡；呼（喝）

在唐人诗歌中，李商隐的《骄儿诗》（诗题或作《骄儿》）作为其晚期两大佳作之一①，素以"描写孩子极生动"[1]著称。而其中"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之句，又因提供了一则极其珍贵的当时三国故事民间流传情况的具体材料，具有独特的史料学价值②受到多方面关注，成为中国古典诗歌中被征引频次最高的句子之一。但笔者发现，在这看似明白的诗句中，各家对"胡"字的训释理解却一直存有重大歧见和误解，并且还可能已经影响到了人们对《三国演义》如何塑造张飞形象的评价以及张飞形象主要性格特征的把握这一重要问题。故此不揣谫陋而断断甄辨，略抒愚肊以就教于方家。

一、既往对"胡"字的种种训释及其不足

根据笔者普查清理的结果，对"或谑张飞胡"之"胡"字

作出了明确或较为明确的意义解说的，主要有李商隐诗集（含全集和选本）的注解笺评本、历代诗歌或唐诗或“童趣诗”之类的名篇选注读本和评赏辞典、各式大型字典词典、内容涉及《三国演义》源流考述和艺术分析的专著论文等四类成果。这些成果，为我们提供了如下三种讲法。

1. “胡”即胡须，指张飞多髯，为“大胡子”。例如，朱鹤龄《李义山诗集笺注》（卷1）：“胡，多髯也。”（四川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33页）；刘学锴《唐诗鉴赏辞典·李商隐<骄儿诗>》：“摹仿大胡子张飞的形象和邓艾口吃的神情”（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年版1233页）；周振甫《李商隐选集》注：“张飞胡：胡，颔下肉，指胡鬚。摹仿客人像张飞的胡鬚。”（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215页）。另外，叶葱奇《李商隐诗集疏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658页）、刘学锴等《李商隐诗歌集解》（中华书局1988年版867页）、吴庚舜等《唐诗名篇赏析》（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427页）、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编辑部《中国历代诗歌鉴赏辞典》（该社1988年版669页）、赵旭东等《中国古代童趣诗注评》（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175页）、周北新《三国演义考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177页）、［俄］李福清《三国演义与民间文学传统》（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32页）、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门化1955年级集体编著《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2册507页）、《汉语大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0年版第6册1206页）等，均持此说。

2. “胡”即黑，指张飞面目坳黑。例如，冯浩《玉溪生诗集笺注》：“按，《南史》：‘刘胡本以面坳黑似胡，故名坳胡，及长，单名胡焉。’‘张飞胡’义同，俗称黑张飞也。”（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416页）；中科院文研所《唐诗选注》：“胡：指面目坳黑。……这两句说，或者嘲笑客人象张飞一样脸黑，或

者打趣客人象邓艾一样口吃。"（北京出版社 1978 年版 517 页）。它如《大辞典》（台北市三民书局民国七十四年 <1985> 版 3853 页）、《汉语大字典》（四川、湖北辞书出版社 1986 年版 2057 页）、《辞源》（商务印书馆 1988 年版 1384 页）、《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9 年版 3945 页）、孙寿玮《唐诗字词大词典》（北京华龄出版社 1993 年版 244 页）等亦同。

3. "胡"即后来小说《三国演义》中所谓"燕颔"，指张飞下巴颏肥硕。例如，董每戡《<三国演义>试论》认为，李诗中的"胡"，指张飞的大颔，也就是"燕颔"（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7 年版 82 页）；郑铁生《三国演义艺术欣赏》也说："'胡'形容张飞下巴颏肥大，那垂肉将后脖子都包住了，上面再生上虎须，一副粗豪的面孔。"（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1992 年版 41 页）

除上所列举外，还有力图兼顾二义者，例如陈伯海释为"黑面大胡子"[2]，实则仍旧包含于其中。这些讲法，虽各有其据，但不足之处亦为显见，难以让人满意：

其一，释"胡"为胡须、多髯、大胡子等，约当始于清人朱鹤龄的《李义山诗集笺注》。虽然李诗原本用字为"胡"而非"鬍"，但若仅就字面看，释之为"髯"即"鬍"（胡须）并无不妥。因为"鬍鬚"之"鬍"最早见于黄缚《闲中今古録摘抄》"为官不用好文章，只要鬍鬚及胖长"[3]，为明代后起字。即：在李商隐时代，尽管髦、髮、髭、鬚、鬆、鬓、鬣等系列字均已出现[4]，但作为"胡何"之"胡"的分别字的"鬍（胡）须"之"鬍"尚未出现，"胡何"、"胡人"、"胡关"之"胡"与"鬍须"之"鬍"均统作"胡"。"张飞胡"既然作"胡"，就可以是其中的任何一种意思，即释之为"胡须"具有潜在可能性。但是，仅有这一点显然不够，还需要有别的理由来支持这种可能性而排除其它，方可成说。就诗歌本身而言，其所能提供

的相关信息已经尽在个中，根本无法证明“胡”字应讲为“胡须”，也就只好于诗外索求。在缺乏当时其它旁证材料的情况下，求诸诗外惟一的途径就是作纵向历史考察，即把《骄儿诗》的描写视为张飞形象历史流传过程中的一个环节，考察其来龙去脉，看看能否在其前后可能与诗歌中的描写存在某种联系的各种记载中找到张飞“多髯”的蛛迹。可以肯定，在李商隐之前的正史传注如《三国志·张飞传》以及裴松之注中并没有张飞相貌如何的记载。但据此仍可大致推断张飞是“大胡子”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因为《三国志》卷一二就写了崔琰“鬚长四尺”，卷三六又写了关羽“美鬚髯，故亮谓之髯”，设若张飞相貌特异多髯，史传中照例应当有所反映。李商隐之后，倒是确有人说过在元刊《三国志平话》这一现存最早也比较完整的关于三国故事的专书中，“果有呼张飞为‘髯汉’的”[3]。但一粟认为：“这是一种误会。在《三国志平话》里，文丑骂关羽‘髯汉’，张飞在古城会时也骂关羽‘髯汉’。此外，有一处说：‘张飞又与韩国忠对阵，髯汉又出马，张飞交马约斗十合，不分胜败’，这个‘髯汉’照文义恐怕还指韩国忠。全书未发现称张飞为‘髯汉’的，似乎不便与《骄儿诗》比拟。”[4]到小说《三国演义》，写张飞貌相每曰“豹头环眼，燕颔虎须”（第1回、第63回），又写他动辄“圆睁环眼，倒竖虎须”（第5回、第28回），似乎其胡须确实比较突出，惹人注目。然而，如果进一步追查这种形象描写的基础，我们就会发现，张飞所谓“虎须”者，当来源于《三国志》卷三六陈寿对他与关羽“为世虎臣”的赞评和卷五四周瑜把他与关羽称为“熊虎之将”的疏文，与写华雄“虎体狼腰，豹头猿臂”（第2回）、写崔琰“虎目虬髯”（第68回），写王双“熊腰虎背”（第71回）一样，乃古代小说对“武士型英雄”[5]的格套写法，状其威猛而已，非言其多。何况，据常识可知，一只成年大老虎也就五十根左右的胡须，以数量论，稀稀

拉拉几根，绝非所谓的“大胡子”。比起关公的“髯长二尺”（第1回）、“约数百根”（第25回），简直不值一道。恐怕连曹操的“（细眼）长髯”（第1回）、崔琰的“（虎目）虬髯”（第68回）也不如。所以，就张飞的相貌特征而言，“虎须”的描写不具有“多”的实质性意义，把《骄儿诗》中“胡”字释为“多髯”，也就有空中腾踔之嫌。

其二，释“胡”为“黑”，谓“张飞胡”指张飞面色坳黑之说最早见于清代冯浩注，后出诸说概源于此。然冯注不断受到强烈质疑。叶葱奇先生认为：“冯注引《南史》所云‘（刘胡）坳黑而似胡’。按胡谓胡人，并无黑义，安能强事迂曲，以解此‘胡’字。”[5]刘学锴、余恕诚二先生亦曰：“按《南史》谓其面色坳黑似胡人，未谓‘胡’即‘坳黑’之义。”[6]的确，“胡”本无“黑”义，冯注由《南史》谓刘胡名字得自其面色坳黑似胡人，得出“胡”含有面黑之义的结论，虽不可谓毫无道理，但这最多也只能是特殊语境中的临时意义，冯注在没有任何辅证的情况下，以为常义而移用于“张飞胡”，其“强事迂曲”自不待言。如此，后出之各种字词典如《汉语大字典》、《辞海》、《辞源》等在根源冯注释“胡”为“黑”时，也就只能例引出“张飞胡”这一孤证并以为确据，未免失于轻率。当然，也应该看到，这种失误是有一定原因的，即冯氏本人及冯注信从者的理解可能是牵合了清代及其以后戏曲表演方面的情况。众所周知，在戏曲舞台上，人物脸谱的色彩是具有一定社会意义并用来突出人物性格特征的。脸谱套语有云：黑脸刚直，绿脸凶残，白脸奸诈，红脸忠义。张飞性格刚直，故面色墨黑。而清代沈俦《交翠轩笔记》又云：“李义山《骄儿诗》：‘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似当时俳优已有以翼德为戏弄者。”[7]近世戏曲史名家任半塘先生在《唐戏弄》一书中更是引用了七个方面的例证，来证明“或谑张飞胡”是儿童模仿演戏的游戏，“为戏剧之表现”，

其中“所谓‘胡’，乃面部化装”，即“装面”、“假面”或“大面”；所画面容“古谓‘胡面子’，犹今曰‘鬼脸子’，乃谓面具。”面具再演变就成了后来的脸谱[6]。这样一来，戏曲舞台上张飞的黑脸与“张飞胡”之间似乎就有了一一对应的关系：“胡”即“黑”，“黑”即“胡”，冯注因此也就更加易于被人接受。但问题在于，沈俦的说法带着一个“似”字，表明连他自己也是没有把握的；而半塘先生用来证明“或谑张飞胡”为“戏剧之表现”的例证又无一直接证据，其结论只能让人信疑参半。再退一步，即使其结论成立，也仅谓“当时俳优已有以翼德为戏弄者”、“胡”是“面部化装”，至于当时到底怎样化装，张飞是画黑脸抑或白脸，也就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若以后来所形成的张飞黑脸的程式化脸谱去理解若干年前李商隐时代的“张飞胡”亦为当然，是绝对靠不住的。另外，李商隐之前的唐代诗人，诗中已常用“黑”字，如：“黑云压城城欲摧”（李贺《雁门太守行》）、“黑处巢幽鸟”（李频《夏日题盩至友人书斋》）、“侵黑飞行一两声”（王建《和门下武相公春晓闻莺》）等。《骄儿诗》乃五言古体，“张飞胡”之“胡”字，以所处位置论当无平仄格律要求；其义若为“黑”，则又不涉及隶事用典。在原本大可以直用“黑”字的情况下，李商隐偏偏用了一个与“黑”的意思几乎搭不上界的“胡”字，如果说不是释“胡”为“黑”存在着问题的话，始终叫人理解不好。还有，如果李商隐笔下的“张飞胡”就已经是后来俗称的“黑张飞”了，罗贯中的小说不可能不受到影响而言及。但在《三国演义》中，写到了关公的“赤面（长髯）”（第28回）、周仓的“黑面（长身）”（第28回）、庞统的“黑面（短髯）”（第57回）、王双的“面黑（睛黄）”（第97回），独独没有写到张飞！由此可以导出的结论是，迟至《三国演义》成书时，即便是在戏曲舞台上，黑脸张飞的形象也还没有形成。反倒极有可能的是，因为

《三国演义》的流行，其对关羽的忠义与“赤面”的描写所建立起来的二者之间的表里关系，影响到元代特别是明清时期的三国戏，遂使戏曲舞台人物脸谱逐渐形成“红脸忠义”之类的定式，刚猛的张飞被赋予一张黑脸大约应该也在这一时期。故，冯注释“胡”作“黑”，还存在着以今例古的偏颇。

其三，董每戡等谓“胡”指燕颔、下巴颏肥大的讲法，其来有自，在词源学意义上没有丝毫问题。《说文·肉部》云：“胡，牛顄垂也。”或谓指“颔下垂皮”，或谓指“颔下垂肉”、“颈下垂肉”⑦。段注云：“顄以包颈也。顄，颐也。牛自颐至颈下垂肥者也。引申之凡物皆曰胡。”[8]又：顄、颐即腮，俗称下巴颏。由此谓“张飞胡”指其“下巴颏肥大”，为“燕颔”，确似颇为贴切。然而，联系起句中之“谑”字来，却是不能贯通。《说文·言部》曰：“谑，戏也。从言，虐声。”《说文新附·口部》：“嘲，谑也。”《玉篇·口部》：“嘲，言相调也。”《资治通鉴·晋安帝隆安五年》胡注：“调，戏也”。“谑”拓展为双音节词即戏谑、嘲戏，指用言语相戏以取笑。句义当谓骄儿宄师以声口之技直观仿学模拟张飞之“胡”以调戏嘲弄。若是“胡”即“燕颔”，“谑”则需直接以声赋形，其断断乎不可能，已足见此讲法过于生硬强直。同理，“胡”字的前两种释义也存在一样的问题：因为直观地以声赋形、以声见色的不可能而导致“谑”字与之不能串合一气。

二、对“胡”字的新阐释及其依据

如前所述，由于已有的讲法每有不通，给人未中鹄的之感，这就为重新释说“张飞胡”提供了必要性和可能的空间。笔者认为，释此“胡”字为“呼（喝）”，即指张飞的大嗓门咋呼，较之以往似乎更加允当。这种想法，得意于王悠然先生一九五五年二月为任半塘《唐戏弄》所作书序。王《序》在引用了“张飞胡”、“邓艾吃”句之后说：“公元七〇〇年时，宫内儿童既早

已摹仿演出花脸戏的《兰陵王》了，经过了一百四五十年之久的进展，到达李商隐时，我们能说民间儿童，还不够条件去学扮张飞，‘喝断灞陵桥’的工架，甚至吼几声‘二花’的调门吗?”先生此论，本在说明“唐代宫廷与民间的戏剧活动已很进展”，“飞胡”、“艾吃”等“乃写儿童从当时社会上演出三国戏的戏台上学来的，并不是从说‘三分’的书场上学来的”[9]，不意却透露了解读“胡”字的重要信息——“摆个‘喝断灞陵桥’的工架，吼几声‘二花’的调门”。按：“二花”即二花脸，一名架子花脸，属传统戏曲角色行当中的净行，在舞台上大多扮演张飞这种勇猛刚烈豪爽粗犷的正面人物，表演注重身段架式，唱念中时而夹用炸音（突如其来、声如响雷）点染人物的性格威势，使之更加生动传神。甭管儿童学扮张飞究竟源自戏台还是书场，其所学扮的内容却是明确肯定的：学张飞拒水断桥的大喝，学张飞的大嗓门咋呼！窃以为这便是“张飞胡”的涵义。那么，释“胡”作“喝”义，于文字训诂、诗法句法、人物特征等方方面面能否讲得过去呢？回答应该是肯定的。

1. 训诂学依据

《太玄经》（卷8）“四为要（腰）五为腹六为肩七为暇咕”范望注：暇咕“谓唐湖（胡）也”；叶子奇释：“唐湖（胡）即颏颐之垂处”[11]即咽喉。《考工记·冶氏》“戈广二寸，内倍之，胡三之，援四之。”孙诒让《周礼正义》：“胡之言喉也”。[11]《正字通·肉部》：“胡，喉也。”[12]顾炎武《日知录》（卷32）：“古人读侯（喉）为胡。……咽，喉咙，即今人言胡咙耳。”[13]章炳麟《新方言·释形体》：“谓喉为胡乃近本义”[14]。故：“胡”即胡咙（亦称咙胡，如《后汉书·五行志》“童谣曰：吏买马，君具车，请为诸君鼓咙胡。”）、唐胡的节缩形式，与喉音转取近，为暇咕、喉咙（或谓咙喉，如《晋书·五行志》“昔年食白饭，今年食麦麸。天公诛谪汝，教汝捻咙喉。”）、嗓子之俗

称。又，由彭大翼《山堂肆考·羽集》（卷45）“山胡”条云“山胡，一名山呼……巧声之鸟。”[15]可见，“胡”字能引申指咙喉的动作状态即“呼”亦即“喝”。喉、呼、喝等字实乃一韵之转，“张飞胡”之“胡”自然也就可以释作呼、喝。

2. 诗歌本身的语言环境对“胡”字含义的多重限定

首先，在句式上，《骄儿诗》“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句与杜甫《北征》“或红如丹砂，或黑如点漆”、白居易《首夏病间》“或饮一欧（瓯）茗，或吟两句诗”、韩愈《南山》“或散若瓦解，或赴若辐凑”等同，都用了“或……或……”这样的表示并列对称关系的固定格式。在这种格式中，复式虚词“或”（不定代词）用在谓语动词或形容词之前时，其指代作用虚化，相当于时间副词，作状语，可译为“又（有时、时而、忽而、一会儿）……又（有时、时而、忽而、一会儿）……”，表示行为或状态的交替发生或同时存在，而且暗示所分嵌的两件事是对立相反的尽性交替关系或对举并列的不尽性交替关系⑧。那么，“谑”与“笑”，“张飞胡”与“邓艾吃”均应分别对应相称，能够对仗。其次，就动词“谑”、“笑”而言，谑即戏谑（前已述及）；笑为嗤、哂义，即讥笑、嘲笑、调笑。李白《陌上桑》有“不知谁家子，调笑来相谑”句可证二者在词义上具有一致性，均指用言语模仿嘲戏以取笑。相应地，谑、笑的对象“张飞胡”与“邓艾吃”也就应该同为对人物言动状态的描写。“吃”（《说文·口部》：“言蹇难也。从口，气声。”；《玉篇·口部》：“语难也”。）既然是指口吃，则“胡”字也就应该从言语动态方面取义，释为呼、喝之类。再说，“张飞胡”、“邓艾吃”这样的表达，在唐诗中亦不鲜见，且通常为事典的浓缩。如李白《赠崔侍御》：“笑为张仪舌，愁为庄舄吟。”其中的“张仪舌”、“庄舄吟”均含故实，有明确的事典出处（《史记·张仪列传》），且属同一内容范畴（写人物言动），形成对仗。按此，

“张飞胡”与“邓艾吃”亦应有所典据，并在同一范畴。“邓艾吃”写邓艾言语特征，出自《三国志·魏书（卷28）·邓艾传》“艾……为都尉学士，以口吃，不得作幹佐。”和《世说新语·言语》“邓艾口吃，语称艾艾”的记载；“张飞胡”也应是写张飞言语特征，而于此有据可查的，恐怕就应该是《三国志·蜀书（卷6）·张飞传》所记其据水断桥时“身是张益德也，可来共决死！”的一声大喝了。若再参以李商隐诗布局精微，属对严密，使事深僻，左右鳞次的特点且用典屡涉《三国志》、《后汉书》、《晋书》等[9]以及程梦星“《骄儿诗》按以史事得之”[9]的看法，则几乎可以断定“张飞胡”必当谓此。

3. 史传、小说提供的有力旁证

三国人物故事的流传，始见于正史《三国志》，盛极于小说《三国演义》。而李商隐“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所反映的，则为居于其间的中晚唐时期三国人物故事布于人口、童稚皆知的情况和当时人心目中的张飞、邓艾形象。作为一个中间环节，它既当根源于史传记载，又必然会成为再度创作的素材或多或少地影响到小说的描写。因而，梳理史传、小说中有关张飞的记述，找出这一人物形象独特的个性特征，于我们准确把握“胡”字的含义必将大有裨益。

《三国志·张飞传》载：“张飞字益德，涿郡人也，先主从曹公破吕布，随还许（昌），公拜飞为中郎将。先主背曹公依袁绍、刘表。表卒，曹公入荆州，先主奔江南。曹公追之，一日一夜，乃于当阳之长阪。先主闻曹公卒至，弃妻子走，使飞将二十骑拒后。飞据水断桥，瞋目横矛曰：‘身是张益德也，可来共决死！’敌皆无敢近者，故遂得免。”[16]通观史传全文，记张飞一生行状极为简约，更无一字相貌描写，却在寥寥百余字中用了近乎一半的篇幅备道其据水断桥时瞋目横矛的一声大喝，以突现其威武勇猛之核心性格。一详一略之际，张飞其人最富于个性特征和

传奇色彩、最足以感动人心传诸久远者不言自明。正如一提起邓艾，人们马上就会联想到他内藏机智的口吃一样，与张飞的名字首先联系在一起的，就是他那神勇毕现的一声巨喝。这种联系，由于较早地被以史传的形式明确固定下来，其在民间的流传形态也就不可能再有根本性的变化。因而，李商隐诗中的“张飞胡”、“邓艾吃”等等，应该也就是对这种来自史传的差不多一成不变的固定联系在唐代的民间流传形态的一种真实写照。

而通过检查《三国演义》中关于张飞的描写，上面的观点又会得到进一步的有力证明。在小说里，张飞的活动贯穿前81个章回。据笔者粗略统计，其中涉及到张飞的绝大多数章回（约20个）共计49处（正面描写33处，侧面描写16处）都着力描写到了他粗壮有力的大嗓门（大喝、大叫、大吒、怒曰、声如巨雷等），而且以声起以声结，略貌取神，离形得似，自始自终抓住其快人快语的大声叱喝反复烘托渲染，来展现其威武勇猛、豪放爽直的性格。小说第一回写张飞出场，便是未睹其人，先闻其声：“（刘玄德）当时见了榜文，慨然长叹。随后一人厉声言曰：‘大丈夫不与国家出力，何故长叹？’玄德回视其人，身长八尺，豹头环眼，燕颔虎须，声若巨雷、势如奔马。玄德见他形貌异常，问其姓名。其人曰：‘某姓张名飞字翼德……’”可谓先声夺人。其后草蛇灰线，千里伏笔，至第八十一回写张飞遇害，仍是“大叫一声而亡”。不惟如此，小说中作者要着意突出、写得最精彩传神的也是他的“声”势——第五回“三英战吕布”中张飞的“虎牢关上声先震”[①]；第四十二回“大闹长坂桥”中张飞的“一声好似轰雷震”。特别是第四十二回，通过精心描绘张飞“我乃燕人张翼德也，谁敢与我决一死战?”、“燕人张翼德在此，谁敢来决死战?”、“战又不战，退又不退，却是何故?”的一连三声大喝及其反响，把张飞威猛豪爽的主要性格刻画得活脱动人，堪称雄奇壮美。显然，比之于“豹头环眼，燕

领虎须”的描写，“声如巨雷”才是罗贯中表现张飞的着力点；比之于对关羽“声如巨钟”（第5回）、黄忠“大喝一声，犹如雷吼”（第71回）的填充性质的简单描写，对张飞“声若巨雷”的生动细致处理才真正具有揭示人物性格核心要素的意义。毛宗岗在小说第42回的回评中曾说：“……写张飞只一声叱喝。天下事亦有虚声而可当实际者，然必其人平日之实际足以服人，而后临时之虚声足以耸听。”如果说这里毛氏已经看出了《三国演义》写张飞之叱喝的合理性、一贯性以及对于塑造张飞形象的重要性的话，那么他在小说第八十一回“（张）飞大叫一声而亡”处“读书至此，亦为之拍案大叫”[17]的一语夹批，则反映出其对小说紧拽“一声叱喝”而完成张飞形象塑造的艺术成就的激赏。这种激赏，不仅是在追验前文之后对其草蛇灰线手法的最终肯定，也是对小说把“一声叱喝”确定为张飞形象最重要性格表征加以重笔展现的高度认同。而小说之所以会把“一声叱喝”确立为张飞形象的表现核心，自然应该是罗贯中“据正史，采小说，证文辞、通好尚”[18]，广泛吸收史传记载和包含了《骄儿诗》“张飞胡”的描写在内的戏曲、话本等民间艺术以及民间传说中的有关内容的结果。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我们在读《骄儿诗》而理解“张飞胡”时，如果能横向地紧密联系其下文“或笑邓艾吃”之句和义山诗之总体特点，同时又纵向结合史传、小说中所写张飞之事以为辅证，是可以求得对“胡”字的准确把握的。相对于旧注而言，释“胡”为呼、喝、咋呼之义，当更切合于诗中的具体语境，亦更能尽致淋漓地揭示张飞性格的核心内容。“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所描写的，即衮师小儿不时模仿粗嗓门的张飞遇事动辄大呼小叫和口吃患者邓艾自称时不断重复“艾”字音节以取笑娱乐的状况。正如前几年一首名叫《说唱脸谱》的流行京歌里所唱：“黑脸的张飞叫喳喳”，这“叫喳喳”即咋呼，

才是张飞其人最大的特点之所在，才是“张飞胡”之“胡”字的真正含义，而非“黑脸”、“多髯”、“燕颔”云云。

注释：

①吴调公《李商隐研究》论义山诗，称《骄儿诗》和《井泥四十韵》为其“晚期的两篇佳作”。详见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年版该书 154 页。

②参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 72 页；关四平《三国演义源流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1 年版180 页；郭箴一《中国小说史》，商务印书馆1998 年版244 页；任半塘《唐戏弄》，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 年版 764、953 页；周振甫《李商隐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年版 216 页等。

③见四川、湖北辞书出版社《汉语大字典》1986 年版 4592 页、中华书局《王力古汉语字典》2000 年版 1705 页“覇”字条引证。

④参商务印书馆《辞源》（合订本）1988 年版第 1897 ~ 1900 页“髟部”诸字引例。

⑤鲁尔曼《中国通俗小说戏剧中的传统英雄人物》，转引自王丽娜《国外研究〈三国演义〉综述》，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1985 年版《〈三国演义〉论文集》，第 465 页。

⑥详任半塘《唐戏弄》第三章《剧录》“张飞胡”、第五章《伎艺》“化装”，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764 ~ 766、953 ~ 957 页。

⑦见王力《同源字典》“胡”字条下引“朱注”、“徐注”、“师古注”，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 144 页。

⑧参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 346、218 页；曹永安《文言复式虚词》，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6 年版 153 页。

⑨例如，《览古》“欲举黄旗竟未成”：“黄旗”用《三国志·吴书·孙权传》注陈化、曹丕“紫盖黄旗”事；《有感二首》（其二）：“苍黄五色棒”用《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曹操事；《无题》（万里风波一叶舟）：“益德冤魂终报生”用《三国志·蜀书·张飞传》典；《行次西郊一百韵》：“节使杀亭吏”典出《后汉书·百官志》；《柳枝五首》（其三）“嘉瓜引蔓长”：“嘉瓜”典出《后汉书·五行志》；《一片》“天泉

水暖龙吟细"："天泉"典出《晋书·礼志》。

⑩程梦星《李义山诗集笺注凡例》，转引自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诗歌集解》（附录四），中华书局1988年版2036页。

⑪"声先震"句出自小说第八十一回"后人有诗叹曰"（中华书局1995年刘世德、郑铭点校本904页），其具体描写见于小说第五回："……飞马大叫：'三姓家奴休走，燕人张飞在此！'"（同上，54页）

参考文献：

[1] 周振甫．李商隐选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216．

[2] 陈伯海．李商隐诗集选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55．

[3] 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门化1955级．中国文学史（第二册）［Z］．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507．

[4] 一粟．谈唐代的三国故事［A］．文学遗产增刊（第十辑）［C］．北京：中华书局，1962．117．

[5] 叶葱奇．李商隐诗集疏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658．

[6] 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诗歌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8．867．

[7] 孔另境．中国小说史料［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49．

[8] 许慎，段玉裁．说文解字段注［M］．成都：成都古籍书店，1981．

[9] 任半塘．唐戏弄［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5．

[10] 扬雄．太玄经［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03册）［Z］．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87．

[11] 孙诒让．周礼正义［M］．十三经清人注疏［Z］．北京：中华书局，1987．

[12] 张自烈．正字通［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

[13] 黄汝成．日知录集释（外七种）［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2423．2424．

[14] 章太炎．新方言［M］．章氏丛书［Z］．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1．

[15] 彭大翼．山堂肆考［M］．四库类书丛刊［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明万历乙未（1595年）刻本，1992．

[16] 陈寿. 三国志 [M]. 北京：中华书局陈乃乾点校本，1959. 943.
[17] 罗贯中. 三国志演义 [M]. 北京：中华书局刘世德、郑铭点校本，1995. 469. 904.
[18] 高儒. 百川书志（卷六）[M]. 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

（原载《重庆社会科学》2005 年第 5 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2005 年第 10 期全文转载）

词的段落称名琐议

分段是词体的一个基本特征，对词的段落称谓的探讨本属词学研究的一项常识性工作。然而，由于人们习惯性的对“常识”的轻忽，加之词段称谓本身的名目繁复，致使后出的相关解说歧见纷呈，有碍于对词之体性的把握和词学知识的推广。本文结合古今用例，主要运用语义分析的方法，就词段称谓中以“片”称词的来由、“阕”字误作为“阙”用于词段指称的合理性与适用范围、“前后阕”究竟是两阕还是一阕等问题进行考察辩正，提出了与往常不同的观点。

词；段落称名；片；阕（阙）；“前后阕”

寇梦碧先生曾说：“古典文学工作者应多研究一些最基本的、又难于理解的知识。”（孙正刚《词学新探·寇跋》，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85页）笔者忝列其职，在翻阅词学书籍的过程中注意到，有关词的段落称谓方面的一些知识正是这样：既是属于“最基本的”，又是见仁见智歧异纷呈，让人“难于理解的”。遂不揣鄙陋，将浅见所及次为如下三札，聊抒愚尼，亦藉以向学界同仁求教。

一、词段称“片”来由补说

“片”字的使用，在词的段落指称中极为普遍。词段何以称“片”，说者诸家几乎无一例外地认为，“片”是“遍”或其古字“徧”（按，《广韵·线韵》云：“徧，周也。”）的省写，意

义同"遍"，一片就是一遍，意为音乐演奏过了一遍。（见夏承焘《唐宋词欣赏》，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131 页；周笃文《宋词》，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10 页；杨文生（《词谱简编》，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3 页；刘尧民《词与音乐》，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286 页；施蛰存《词学名词释义》，中华书局 1988 年版第 51 页；常国武《新选宋词三百首》，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560 页，等）这样的解说，给人的感觉总是有些牵强。因为可以非常肯定地讲，"片"字本身是没有"遍"字在这种语境下可能具有的二义（或作为段落名称，指音乐和相应唱词可以暂时休止的段落，如陈陶《西川座上听金五云唱歌》"愿持卮酒更唱歌，歌是《伊州》第三遍"；或作为量词，指音乐和相应唱词从头到尾演唱一次，如李益《从军北征》"天山雪后海风寒，横笛遍吹《行路难》"。）中的任何一种意思的，而"片"、"遍（徧）"二字之间除了只是韵同音近之外，又根本不存在同源假借关系，也不见有"遍（徧）"字简作"片"字的用例。

笔者认为，以"片"指称词段，应当是来源于双调词的结构形制，与音乐意义上的"遍"无涉。《说文·片部》云："片，判木也。"段玉裁注："判，分也。"引申为半，凡物一分为二曰"片"，故《玉篇·片部》有云："片，半也。"按事物发展由简到繁的通常逻辑，词的分段当始于"双调"（分两段的词），而后才有"三叠"、"四叠"之词。双调词的两段，字数相等或基本相等，大约各占全篇的一半，故曰"片"，分称前、后片或上、下片。这既可以从前人指称双调词的两段有时径谓"上半"、"下半"（如陈廷焯《白雨斋词话》评谭献《蝶恋花》[庭院深深]"上半传神绝妙，下半沉痛已极"、许昂霄《词综偶评》称韦庄《清平乐》[春愁南陌]"前半说远，后半说近"等）得到印证，也能够在"三叠四叠词每叠不称片"（吴丈蜀《词学概

论》，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5页。按：依笔者理解，三叠四叠词中的每个段落，仅占全篇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不足一半，故不得称“片”。吴氏之说恐怕正是以“片”即是“半”这样的本原意义作为其出发点的。）这样的观点中得到反证。当然，时至今日，我们也不必太过拘泥于“片”字原义，因为双调词中的片（半），无论怎么讲也都还是整首词的一部分（段、截），在这个意义上它和三叠四叠词的段落是一致的，因而“片”也就同时具有了“片段”的意义。由此，实际运用中把三叠四叠词的段落按排列顺序称为前中后片或第一、二、三、四片，也就顺理成章。

二、词段称“阙”的合理性及适用范围

笔者在阅读过程中注意到，晚近一些的词学书籍中不时出现以前从没有过的以“阙”字指称词段的情况，并有逐渐普泛化的倾向。例如，徐洪火《诗词曲律常识》说：“大部分的词都分片（段），‘片’也叫做‘遍’或‘阙’，是音乐唱完一遍的意思。”“一首词分两段（片、阙）的叫双调……有的双调词前后（上下）阙的形式完全相同。”（四川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52、60页）又，许山河在《诗词鉴赏概论》中也称：“词在结构上是由相对独立的几个部分组成，叫做段，又叫片或阙。”“一首词是两段的，分别称为上下片或上下阙。”（海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5页）其评敦煌曲子词《鹊踏枝》［叵耐灵鹊］即说“上阙是人言，下阙是鸟语。”（同上第259页）至暨南大学中文系“国家文科基地”系列教材之朱承平《诗词格律教程》，更是在“片的称谓”中将“阙”正式立为一目。其第十章第一节曰：“阙（què）亦作‘阕’，原为古代音乐术语，意为乐曲的终结。……也可以用来表示词的单位。宋人称一首词为一阙，……（按：此处例略。但其所举《墨客挥犀》记卢氏驿舍题壁词序‘因成《凤栖梧》曲子一阕’、欧阳修《玉楼春》［樽

前拟把］词句‘离歌且莫翻新阕’二例，均作‘阕’而非‘阙’。）由于多数乐曲是唱完一遍，再唱一遍，由令词叠为双调的，所以双调词的一遍，也可称为一阙。不过称词的一片，只能用上阙、下阙，或前阙、后阙，不能说一阙、二阙，更没有三阙、四阙的说法。”（暨南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307 – 308 页）另外，徐育民、赵慧文《历代名家词赏析》评李太白《菩萨蛮》［平林漠漠］云“全词上下两阙，然而两阙之间词意紧密相连”（北京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2 页），李振国《宋词译评》评严次山《玉楼春·春思》［春风只在］云“上阙写西园春景”、“下阙写游园之情”（光明日报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293 页）等，也是如此。显然，这已不是简单的无意识的排印纰漏，而是实际运用中与时推移生出的一种新变。按前举最早的徐洪火先生“‘片’也叫做‘遍’或‘阙’，是音乐唱完一遍的意思”的阐述，以及其它书中别处称段又多作“阕”字可推，以“阙”字指称词段本是由于使用者自作主张的同音假借造成的误植。但这样的称谓用于（仅限于）双调词的两段，确是有着明显的合理性，甚至可以说是十分恰当的。《说文·门部》云：“阙，门观也。从门，欮声。”古代宫殿、祠庙和陵墓前常建两相对峙之高台，其间阙然有路可通，故名。阙通常左右各一，成双成对，又称“双阙”。双调词的两个段落，大致相称，形如二台对立；两段之间，传统的书写方法是空出一、二字的地位以示分隔（如果用每句一行的方式书写，也要在两段之间间隔一个空行），貌似二台间之通路。其整个形制，概然若双阙对峙。故而笔者认为，称双调词的两个段落为上下（前后）两阙，实在是贴切不过。当然，三叠四叠词不具备同样的形制特征，也就不适用这样的称谓了。换言之，以“阙”指称词段仅限于双调词。

三、两阕还是一阕——双调词段落称谓“前后阕”含义辨正

前后阕或称上下阕，分而言之即是前阕、后阕或上阕、下

阕。它（它们）除了经常用来指称具有某种联系和比较意义的两首词（例如周济《宋四家词选》评王沂孙《齐天乐》［绿槐千树］、［一襟馀恨］二词云：“前阕身世之感，后阕家国之恨。”）外，更多的时候是用于指称一首双调词中的前后两个段落，并且由来已久。如，马令《南唐书》云：“延巳著乐章百余阕，其《归自谣》［寒山碧］一阕，其《鹤冲天》［晓日坠］上阕，均见称于世。”据张璋、黄畬《全唐五代词》按“《南唐书》载延巳《鹤冲天》词前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413页），其中“上阕”即是词的段落谓称。又，姜夔《白石道人歌曲·长亭怨慢序》“予颇喜自制曲，初意为长短句，然后协以律，故前后阕多不同。”常国武《新选宋词三百首》注云：“前后阕：前后两片、前后两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95页）此外，周济《宋四家词选》评柳永《卜算子》［江枫渐老］云“后阕一气转注，联翩而下，清真最得此妙”、评周邦彦《星月慢》［夜色催更］云“但读前阕，几疑是赋也”；许昂霄《词综偶评》谓韦庄《清平乐》［野花芳草］云“前阕说远，后阕说近”等等，均属此类。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运用既广且久的段落称谓概念，在晚清至今近百年的时间里，词学家、格律家们在其相关词学书籍中的具体理解阐释上却一直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其一，以“前后（上下）阕”为两阕者。曹焕猷先生说：“双调者，两段也。首段为前阕，次段为后阕。阕者，一曲告终而少息之谓也。……长调则有多至三阕或四阕者，然用者绝少。“（《词学详诠》，武汉古籍书店1986年版“凡例”第五）王力先生说：“双调就是把一首词分为前后两阕（按，此处原注：‘曲终叫做阕。一阕，表示曲子到此已告终了。下面再来一阕，那是表示依照原曲再唱一首歌。当然前后阕的意思还是连贯的。’）……三叠就是三阕，四叠就是四阕。”（《诗词格律》，中

华书局1977年版第71-73页）夏承焘先生说："一首词可以说分为两阕、三阕、四阕"，"词的一段叫做一片，一片就是一遍，就是说音乐奏过了一遍。乐奏一遍又叫一'阕'，（乐终叫阕。从门。《说文解字》：'事已闭门也'。）所以片又叫阕。""阕是从曲调上说的一段。"（《唐宋词欣赏》，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第2、131、161页）此外，徐青《古典诗律史》（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62页）、席金友《诗词基本知识》（见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03页）、杨文生（《词谱简编》（见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页）、刘尧民《词与音乐》（见云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85页）、陈振寰《读词常识》（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37页）、施议对《词与音乐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99页）、陈声聪《填词要略及词评四篇》（见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页《要略》引言）、贺新辉《宋词鉴赏辞典》（见燕山出版社1987年版第1289页）、吴丽跃《诗词曲韵律通则》（见华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12页）、涂宗涛《诗词格律纲要》（见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70页）、施向东《诗词格律初阶》（见天津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20页）等，亦有类似说法；而黄蓼园《蓼园词选》评欧阳修《浣溪沙·楼外》[堤上游人]"第一阕写世上儿女多少得意欢娱，第二阕写老成意趣。"（黄畬《欧阳修词笺注》引，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7页）、陈迩冬《宋词纵谈》说周邦彦《满庭芳·夏日溧水无相山作》[风老莺雏]"是两阕组成，上阕十句，下阕十一句，……"（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页）、王仲厚《唐宋词话》说李易安《菩萨蛮》[风柔日薄]"上下两阕，由轻而重，造成急转直下的跌落之势。"（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81页）等等，则是在实际运用当中体现出同样的观点。其间，虽然尚有具体理解上的差别（如曹焕猷、王力、席金友、陈声聪等以"一曲告终而少息"

为“阕”，认为多段词的各段落，在乐曲上只是同一支曲子的不断变化反复。因此词的一段，从乐曲上说是一支完整的曲子即一阕。而夏承焘、徐青、施议对、涂宗涛等却是以一首词在乐曲上为一支完整的曲子为前提，说“阕是从曲调上说的一段”，故而与之相应的一段词也就是一阕。)，但他们所得出的最终结论却是一致的，即：一段词为一阕，一首词可以包含数阕。《忆江南》等单调词只有一段，即一阕；《木兰花慢》等双调词都由两阕而成一首，称前后（上下）阕；《戚氏》、《莺啼序》等三叠、四叠词就有三阕、四阕，依顺序称为前中后（上中下）阕或者第一、第二、第三、第四阕。按这样的理解，“前后阕”无疑是指前、后两阕。

其二，以“前后（上下）阕”为一阕者。如，施蛰存先生在其《词学名词释义》中说：“宋人习惯，无论单遍的小令，或双拽头的慢词，都以一首为一阕。分为上下遍的词，可以称为上下阕或曰前后阕。无论上下或前后，合起来还是一阕，不能说是二阕。”（中华书局 1988 年版第 40、41 页）王洪先生主编的《唐宋词百科大辞典》说：“乐曲每奏完一遍为一阕。词是配乐演奏的，故一首词即称一阕。双调词分为两段，称上、下阕。但三叠、四叠词的每段称叠或段，不称阕。”（学苑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1145 页）钱仲联、傅璇琮等先生主持编写的《中国文学大辞典》也说：“乐曲终了称‘阕’，后以一首乐曲为‘一阕’，一首词亦称‘一阕’。分上下片可称为‘上下阕’或‘前后阕’。”（上海辞书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861 页）显然，这里的“一阕”是指一首完整的词，即一首词无论它有多少段，都为一阕：单调词一段便是一阕，双调、三叠、四叠词则由数段合为一阕。反过来说就是，一首词分做几段，其中的每段大约就是几分之一阕。由于双调词的两段总是均衡地将一首词分作两半，各占半阕，“上半部就叫上半阕，下半部就叫下半阕。”（周笃文《宋

词》，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9 页）所以，其所谓的“前阕”、“后阕”，实际上分别是指两个半阕，应看作是为了简便对前半阕和后半阕的一种省称。前后阕合为一阕，道理正在这里。而基于同样的指称上便利与否的考虑，三叠、四叠词由于其中的段落各自仅为三分之一阕或四分之一阕，以“一阕”作为单位名词来进行段落指称就显得十分繁琐不便，所以“三叠、四叠词的每段称叠或段，不称阕”。

学者们对“前后阕”这一概念含义的解说，由于长期以来存在着上述两种不同的看法而莫衷一是，造成了实际运用上的极大混乱，也给相关词学知识的推广普及带来困难，让人不知所云。显著之例，早有刘公坡撰于民国初年、流传颇广的古典诗词启蒙读物《学诗百法学词百法》，晚的则如李瑛先生的赏析文章《不到长城非好汉——读 <清平乐 · 六盘山>》。刘著云：“词谱中称一首词为一阕。阕者，一曲告终而少息之谓也。凡双调之词都两阕而成一首，故称词之前半首为前半阕，或称前阕；称词之后半首为后半阕，或称后阕。其长调多至三四阕者，则称第一阕、第二阕，以下类推。（按，此处原注：‘本书前此亦称阕为段’。）”（中国华侨出版公司 1991 年版第 162 页）又，李文云：“毛主席所写的词往往是上半阕描绘眼前景物，下半阕抒情感怀。而这首词的上下两阕，却都是在前两句写景之后，紧接着便是抒情。”（蔡清富《毛泽东诗词名家赏析》，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07 页）在这些表述中，既以一首词为一阕，同时又以一段词为一阕；一首双调词既是由前后（上下）两个半阕合起来的一阕，同时又是“两阕而成一首”，包含着前后（上下）两阕。换言之就是，双调词的一段，既是半阕而同时又是一阕，半阕等于一阕。这显然是荒谬的。那么，究竟一首词是一阕还是可以包含数阕，双调词中的前后（上下）阕究竟是指两阕还是合为一阕呢？这样的问题难道就真的那么复杂、无法廓清

辨明吗？不然。

其实，只要我们明确坚守“阕”字本义的立场并对一首词段落之间的关系有清晰的认识，参以以往运用之实际，辨清上述的问题并不是十分困难。《说文》云：“阕，事已闭门也。”引申用于乐曲，即指乐曲的终了（如《礼记·文王世子》“有司告以乐阕”注云：“阕，终也。”），亦称乐曲一首为一阕（如《吕氏春秋·仲夏纪·古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一曰载民……八曰总禽兽之极。”高诱注：“上皆曰乐之八篇名也”）。由于早期曲子词总是配乐演奏，与乐曲相始终的，因而形成比附乐曲，以阕称词的传统，称一首词为一阕［如《能改斋漫录》卷十七：“（梅）圣俞因别为《苏幕遮》一阕，云：‘露隄平’云云，欧公击节赏之”］。既然“词即曲之词，曲即词之曲”（刘熙载《艺概》卷四），“今之词，古之乐也”（俞樾《词律序》），词与乐曲相比附，一词一调，一调一曲；而由白居易《霓裳羽衣舞歌》自注“《霓裳》十二遍而曲终”、周密《齐东野语》谓“《霓裳》一曲共三十六段”又可知道，一首乐曲无论包含多少段落（按：即“遍”或“叠”），无论段与段之间是怎样的变化反复，仍然“限于一曲”（朱谦之《中国音乐文学史》陈钟凡序，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8 页），即只是一阕。那么相应地，一首词无论包含几个段落（片），都只是由它们共同构成的一个整体，始终只能是“一阕”。这一点，不但可以在古今词学家、乐律家（包括以双调词的“前后阕”为二阕者）有关词曲段落及其相互关系的具体论述中得到进一步的、不同角度的印证，也是与过去长期以来的实际运用情况相吻合的。张炎《词源》卷下论“制曲”云：“最是过片不要断了曲意，须要承上接下……此则曲之意脉不断矣。”沈义父《乐府指迷》论及词的作法云：“过处多是自叙，若才高者，方能发起别意，然不可太野，走了原意。”夏承焘先生说：“词虽分片，但仍是一首。它

的上下片的关系是同首，却又好象不是同首。”（《唐宋词欣赏》，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131 页）王力先生云：“（双调词）前后阕的意思还是连贯的。”（《诗词格律》，中华书局 1977 年版第 71 页）施议对先生云：“词中的片，相当于乐曲中的段，每一首词分为数片，表示它是由几个乐段组成的一个完整的乐曲，一片结束，表示音乐的暂时休止，而并非全曲终了。”（《词与音乐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95 页）这些论述都清楚地表明：只有一首完整的词才是表示乐曲的一次“终了”，才是“一阕”；多段词中的任何一个段落，只是构成整体的一首词的一个部分，不能称为“一阕”。因此，任何曲解“阕”字本义，背离一词一阕这一基本前提而以多段词的一段为一阕，以为一首词可以包含数阕的观点，都是明显站不住脚的。这也与施蛰存先生的实际验证结果是一致的。他说：“我翻遍宋元以来的词集、词话，绝没有发现以一首分上下片的词为二阕的例子。”（《词学名词释义》，中华书局 1988 年版第 41 页）

基于以上的考察认识，我们对前述涉及作为双调词段落称谓的“前后阕”究竟是两阕还是一阕这一问题的两种观点大致就可以作出如下判断：以双调词“前后阕”为前、后两阕者，既不符合以“阕”称词的本义和词的段落结构体制，也与前人实际的运用传统相扞格，故而从根本上说是不能成立的。正因为如此，相关的阐释也就难免捉襟见肘，经不起推敲。如：曹焕猷先生释“阕”为“一曲告终而少息之谓也”，“少息”之义显然并非“阕”字所本有，何况既已“告终”，又何曰“少息”？王力先生既清楚“曲终叫做阕”，而双调词“前后阕的意思还是连贯的”，又把“前后阕”视作两阕，其本身也是自相矛盾的。至于夏承焘先生说“一片就是一遍”和“乐奏一遍又叫一‘阕’”，分别来看都没有错。但前一个“一遍”的“遍”是指陈陶《西川座上听金五云唱歌》“愿持卮酒更唱歌，歌是《伊州》第三

遍”和贺铸《谒金门》［杨花落］词序“李黄门梦得一曲，前遍二十三言，后遍二十二言”之“遍”字义，指乐段或词段；而后一个“一遍”的“遍”却是周遍、普遍之义，指乐曲和歌词从头到尾演唱一次。将二者作等量替代，得出“阕是从曲调上说的一段”的结论，无疑犯了逻辑上“偷换概念”的错误。但是，由于把“前后阕”看作前、后两阕符合人们通常的理解逻辑，加之其在特定的语境中又确实有用来指称“前后两阕”即相邻的两首词的用法习惯，容易让人混为一谈，因而这一观点极易为人接受和认同，这恐怕就是此种观点虽不正确却影响广泛，能够长期存在的原因所在。相反，以“前后阕”合为一阕的观点，表面看似乎已经超越了逻辑上的可理解性，但正如前面所分析，只要我们明白了“前后阕”实为前后半阕之省称，所有的问题均可迎刃得解。而这，不但是可以理推的，也是能够被交互使用“前后阕”和“前后半阕”来指称词段的大量实例所证明的。例如，周济《宋四家词选》：评姜夔《暗香》［旧时月色］云“前半阕言盛时如此，衰时如此。后半阕想其盛时，想其衰时。”评周邦彦《拜星月慢》［夜色催更］又云“但读前阕，几疑是赋也。”谭献《谭评词辨》：评王沂孙《眉妩·新月》［渐新痕悬柳］云“后半阕蹊径显然。”又，评秦观《满庭芳》［山抹微云］“下阕不假雕琢，水到渠成。”龙榆生《词曲概论》说苏轼《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上半阕的四个五言句和下半阕的两个五言言句，拗怒都在句中；上下阕的两个六言句，拗怒兼及句脚。”（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110 页）程毅中《中国诗体流变史》：“词中最常见的是双调，一般是上下阕相同的，……较长的双调往往是后半阕与前半阕相同而又略有变化。”（中华书局 1998 年版第 121 页），等等。从这些用例，我们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作为双调词段落称谓的“前后阕”即前阕、后阕，实为前半阕和后半阕之省称。因而双调词的“前

后阕”合为一阕的观点，才应该是惟一正确的理解。

（原载《修辞学习》2005年第4期）

后　记

这本小书，是我最近五年学习研究地方历史文化的阶段性成果。

书中所收文章，大都在国内各种学术刊物上发表过并曾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陶文鹏、刘跃进、郑永晓诸先生，国家图书馆王菡先生、张廷银先生，北京大学杨忠先生、漆永祥先生、郑园女史，华东师范大学胡范铸先生，西南师范大学胥洪泉先生，四川大学胡昭曦先生，四川师范大学李大明先生，《重庆社会科学》杂志社特约编辑敖忠先生以及涪陵地方志办公室蒲国树先生等师友们的深切指导与无私帮助。此次编集时，考虑到成书的需要，对语言文字作了必要的加工，有的地方还适当增补修订了一些内容。由于这些文章的写作前后持续时间较长，而发表时不同的刊物在文献的注释标引方面往往又有不尽相同的要求，所以在行文的格式和风格上难免有不够统一的地方，个别观点和材料的运用，也略有重复，甚或相互抵牾。

本书的出版，承蒙中央文献出版社不嫌鄙陋，鼎力相助。涪陵师范学院科研处、教务处、中文系也给予了经费上的支持及其他具体的帮助，为我减轻了很大负担。北京大学教授、教育部全国高校（大学）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秘书长杨忠老师欣然赐序，奖掖后进，更是使拙著增色不少，令我感念万分。在此，谨向上述师友和单位一并致以衷心的谢意。

涪陵历史文化绵延数千年，包含各方面，是一个不小的题

目。我虽然花了不少的时间与精力，也顶多不过是就其中的一些具体问题作了一点初步的探索与阐发。基础薄弱，材料分散，难度较大，加之本人生性駑钝，居地僻远，孤陋寡闻，学识肤浅，所论多有未尽之处，疏漏、错误亦复不少。恳切希望专家学者、读者多所示教，提出宝贵的批评意见。

作者谨识

2006年春初于北京大学圆明园校区寓居